

血肉

之

周主培牧师

50年

宣教心路历程

Let My People Go!

亲

周主培 著

骨肉之亲 Let My People Go

周主培牧师50年宣教心路历程

作者	周主培 Moses Chow
审编	苏文哲
文字编辑	简海兰、林珍圭
美术编辑	李雪莹
发行	基督使者协会（AFC）
出版	基督使者协会（AFC）
地址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
网址	www.afcinc.org
电话	717-687-8564
使者书房	717-687-0537
邮箱	book@afcinc.org
出版日期	2024年8月

Copyright © 2024 by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ISBN: 978-1-63420-229-9

献言

谨将本书献给
那爱我们并召我们的主，
以及那引颈切盼着我们
去传扬福音的
海内外骨肉之亲.....

序一

难产的婴孩

周主培

十年前“Let My People Go”出版后，美国及香港的同工都鼓励我发行中文版，甚至把译稿等都准备就绪。我思想后，觉得自己的一生，可用十四个中文字来形容：“蒙恩的罪人，无用的仆人，乏善可陈。”所以就把中文版的发行工作搁置下来。

二〇〇四年，在“基督使者协会”主办第八届宣教大会的前两个月，接到总部同工通知，他们有意发行此书的中文版。

我认为一本出版物，需要达到“可知、可读、可行”的三个原则，否则仅是浪费纸张、油墨及精力。因此，劝他们三思，最好不要出版，但是他们坚决要我再次考虑，我即勉力为之。

三年前，我二度中风后，体力大不如前，手脚不太灵活，左边的眼睛及嘴唇麻痹，不能久坐，阅读亦不能持久，书写更觉困难。感谢神，感动加州圣城福音教会的林珍圭姊妹及卢其斌弟兄，甘愿在我身边随时协助，使中文版得以顺利完成。

曾胜德弟兄，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著名艺术家，极具创意地为我制作画像，我十分地珍惜。于伟清弟兄为我设计英文版封面，也令我铭感不已。

内子徐文田（Wendy）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相信，无论我的家庭现在及未来如何，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我的祷告和盼望就是：我的家

会世世代代完全跟随主，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历代志上二十九章14节）

我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见证神的大恩及祂奇妙的作为，我不过是祂渺小的仆人、手中的器皿，所有的工作都是靠着祂的能力才完成的。中国后继者，若能藉此书稍微了解宣教士的一鳞半爪，将一切的荣耀全归于神，则余心足矣。

2005年11月
写于美国加州寓所

序二

书与画

曾胜德

周主培牧师曾经送给我一本海天书楼出版的《圣经启导本》。这本圣经，把经文和辅读材料融合为一，使信徒在认识圣经、解析圣经、应用圣经三方面，都提供了详尽的辅导资料，让我在过去十年里获益匪浅。周牧师以赠书的方式，代替了他的言教和身教，每当我使用这本圣经时，都对他感念不已。

回顾十年前，一九九五年的初夏，周主培牧师夫妇，和他们的公子周大卫牧师，到舍下便餐，相聚甚欢。饭后，大卫牧师私下和我商量一件事情。他说该年底是周牧师的七十大寿，「基督使者协会」要出版周牧师的英文本自传“Let My People Go”，想请我画一幅周牧师的像，作为自传的封面。对我而言，这是一件美事，然而，时间紧迫，我只答应将尽力而为，并希望能及时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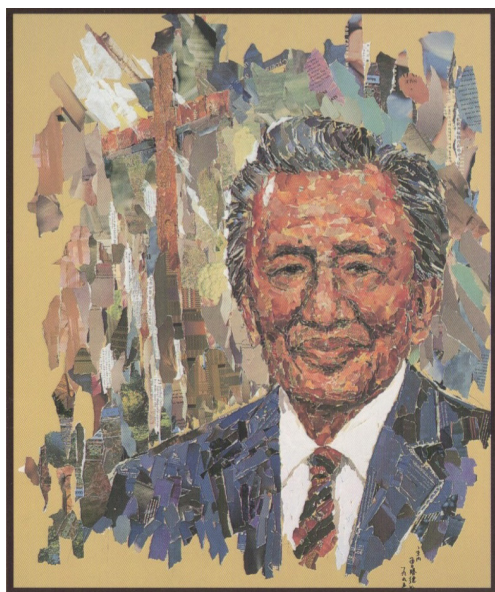
现今的电脑软件，提供多种不同的绘图工具。我从事电脑工作，却喜欢使用独特的方式作画。我的画作初看好像是油画，事实上是用一些要丢弃的报纸、书刊、杂志，以及超市广告等废纸回收撕贴而成，制作相当费时。

于是，我开始采用周牧师一些不同角度的个人照作为蓝本，加上一段时日的观察，再选用一些合适的废纸，细心撕贴，并多番修改，终于

及时完成。

制作期间，我询问周牧师最喜欢圣经中哪一章节，他说是「诗篇二十三篇」。我就在制作画像的背景时，特别翻印该诗篇不同的译文；计有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印尼文等。这些不同的国度，是周牧师一生服侍脚踪所及的国家。如果仔细看画像后方直立的白色条纹背景，正是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译文。

我曾问周牧师，是否在意我用废纸作成画像？他说，一点都不在意！还说：我们大家都像废纸一样，若不是主耶稣使用我们，我们都只是废物一堆。他又将大家比喻成一个手套，说如果不是圣灵的手伸进去，手套是不能做什么的。他对画作的这番金玉良言，也意外地成为我最大的收获。



*原始肖像位于宾州乐园镇的使者总部。

目录

引言		1
第一篇 揭开序幕		
第 1 章	我的根	6
第 2 章	出埃及	9
第 3 章	入学堂	12
第 4 章	主栽培	15
第 5 章	神保守	21
第二篇 早期生活		
第 6 章	属灵影响	27
第 7 章	天国精兵	31
第 8 章	爱情、婚姻	36
第 9 章	再见，中国！	42
第三篇 海外宣教 I		
第 10 章	初抵印尼	49
第 11 章	印尼风情	56
第 12 章	印尼华侨	60
第 13 章	印尼事工	64

第四篇 海外宣教Ⅱ

第 14 章	中美差异	76
第 15 章	暗室之后	82
第 16 章	溪边的树	88
第 17 章	赶牛上树	94

第五篇 海外宣教Ⅲ

第 18 章	不愿去日本	103
第 19 章	韩国事工	110
第 20 章	属灵果子	115
第 21 章	赢得学生	123

第六篇 海外宣教Ⅳ

第 22 章	岛国事奉	133
第 23 章	差传年会	140
第 24 章	神国生力军	143
第 25 章	接受挑战	147

第七篇 重返家园

第 26 章	应许之地	157
第 27 章	宁波团圆	166
第 28 章	一起敬拜	172
第 29 章	父亲受难	177
第 30 章	恐怖岁月	181
第 31 章	红毯底下	187

第八篇 旧地重游

第 32 章	西湖畔	193
第 33 章	上海滩	197
第 34 章	苏州庭院	202
第 35 章	北京见闻	204

第九篇 海外宣教 V

第 36 章	德州道乐思	210
第 37 章	香港的震撼	214
第 38 章	圣牛地脚踪	217
第 39 章	泰国福音门	220
第 40 章	越南烽火劫	224
第 41 章	再访中国心	228
第 42 章	阿拉木图情	230

第十篇 骨肉之亲

第 43 章	三牧香港灵粮堂	238
第 44 章	影响一生的两个女人——念我慈母	240
第 45 章	影响一生的两个女人——爱妻文田	245

后 语 长存盼望

第 46 章	还有那未完成任务	253
附录 1	愿作国度精兵——1992 差传讲章	265
附录 2	满山秋色——同工忆语	274
附录 3	周主培牧师年表及大事记	278
	基督使者协会事工简介	280

引言

周主培

希伯来人曾在异国为奴四百年，在埃及受尽千辛万苦。“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出埃及记三章7节）

千百年来，中国的“法老”也迫使中国人饱受许多不同的奴役。从封建制度到无神论思想，然后是物质主义，中国同胞生活在黑暗、迷信、拜偶像和拜假神里。神一向怜悯千万生灵，祂渴望人人得救，认识真理（参考提摩太前书二章4节）。超过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正如祂在摩西时代，已看见希伯来人的痛苦一样，神肯定也看见了中国人的困苦。

以前的中国基督徒，在某些方面也像受欺压的希伯来人，他们得不到草，却被强迫去造砖。换句话说，他们不能享有公开表达信仰的自由，却被要求如常的生活和工作。但，神与中国基督徒同在，使他们仍能造砖。

不但如此，他们更成为“活石”——虽没有传统的聚会结构和材料，照样带领人进入神的国里。基督徒用他们所能找到的方式，收集了足

够的“残株”来喂养他们的心灵——他们片片断断地把圣经背诵下来，或彼此分享，如何秘密收藏极为稀少的圣经——并且胜利地将信仰繁衍开来。竹幕防不了风——圣灵可以从竹幕外吹进去；肉眼看不见的无线电波，也能忠心地向人心灵传播神的话语。

希伯来人不仅是神的百姓，也是摩西的族人。虽然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养，抚育成人，在埃及受教育，但却是生于希伯来为奴之家。他原本可以在埃及过奢华、舒适的生活，却看见同胞饱受为奴之苦。一次，为了不公平的事情大动肝火，企图用一己的力量和热忱去释放他的一个族人，而不惜把埃及督工打死。

神想释放的不单是一个希伯来人，而是整个民族！祂不赞同摩西用人为的方法处理事情，就把他放逐到米甸，度过四十年卑微的牧羊生活。神使用摩西带领百万同胞走过旷野之前，必须先赐给他在旷野那些干燥、贫瘠和荒凉的经历。

他在埃及可能选修过政治、行政和人事管理等课程，但神想要他抛弃人本能的处事方式，学习神的方法——超自然的方法。摩西需要实际的沙漠训练，才可承担带领希伯来人经历旷野，奔向自由的重责大任。所以神给他的工作，是管理一群不听使唤的羊。摩西可能曾经在领导学上名列前茅，甚至代表毕业班致过谢辞，但是经过四十年的牧羊生活，他的傲气消磨了，自以为是的努力和口才也被视如敝屣。他学习在沙漠里倾听天籁，只与神对话，深入研究埃及课室里教导不出的属灵功课。

当摩西通过他的“荒漠考试”时，神命令他离开那平静、简朴的牧羊生活，回到埃及王宫，向法老发出挑战，要法老无条件释放神的百姓离开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摩西。最后，神派遣灭命的天使，取去埃及所有头生儿子的性命，法老才肯屈服，让两百多万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去事奉神。摩西就像咆哮的狮子一般，使全国上自法老的宝座，下至最低微的埃及人，都大受震动。

正如神任命摩西带领希伯来人脱离劳役之苦——容祂的百姓去，祂也任命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借着祈祷摇撼这世上的国度，并且向万国万民传扬福音。我相信中国的基督徒，若得以从捆锁中释放出来，获得自由去传扬福音，神必会在祂再来、以新郎之身迎接祂的新妇——教会——之前，在中国做一件大事。

我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摩西”，或宣称自己拥有什么领导地位。我的父亲给我取“摩西”这个英文名字，是要在灵性上鼓励我。神透过许多荒漠和旷野的经历，不断地塑造我，在我身上动工，正如祂在旧约圣经里的摩西身上所做的一般。

我不是拯救者，神才是。神正动工，要将世界各地的华人从罪中释放出来，成为属灵的力量，好去完成祂的旨意。我只是效法摩西的榜样，从我个人的经历中验证神的作为。

所以，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数算过去几十年来，神在我生命里的工作，并把一切荣耀归于神。我撰写本书，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我想向华人和非华人基督徒表达我的宣教异象——我那“骨肉之亲”的负担，因为它不只是我个人的异象。凡是神的子民，无论是谁，都应每个还未认识基督的祖国同胞祷告，好叫他们脱离捆锁，进入基督的自由，由黑暗而入光明。

我渴望读者能分担我对骨肉之亲的负担，盼望他们能与万王之王和好。圣经里的神仆，永远负有重任去带领自己的同胞归主。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尼希米、但以理，新约圣经里的保罗。耶稣在橄榄山上眺望耶路撒冷，为祂的百姓哀哭。无论我们身处任何地方，都应该从那里开始，向万国传福音。主首先呼召我，向我在中国的至亲，然后是向各地的华人传福音，并且进入跨文化的宣教。

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源自什么种族，都要为骨肉同胞代求，负起责任传扬福音。我们应从自己的家庭、家乡开始，然后传遍全世界。使徒行传一章8节将神的计划告诉我们：全世界是我们的宣教工场，无论是什么国籍的人，都需要认识神的爱和救恩。若万民万口都能承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么，神这个“容我的百姓（万民）去好服事我”的旨意就能实现。

第二，谨为所有牺牲舒适自在的生活、把生命献与中国的忠心宣教士，向神表示感谢，并且向他们致敬。虽然这些宣教士常被指控、抹黑，然而，他们大都是受人尊敬、尽忠职守的，借着建立学校、医院和教会来传扬福音。想将那些透过著作和榜样影响我一生的宣教士一一列举出来，实在不可能。他们当中不仅有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他的前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史达德（C. T. Studd）、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近年来还有艾德理（David Adeney）、师梯德

(George Steed)、戴绍曾 (James Taylor III) 等宣教士，以及其他许多忠心、谦卑的仆人，在幕后默默地、满足地事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此谨向他们致谢。

第三，我想追溯服事约三十年之久、在美的中国学生运动。我们这些能在短短一生里参与开拓华人学生事工的人，深觉被神使用是何等荣幸。美国很多华人教会是从华人查经班开始的，透过这种校园团体，无数华人的属灵生命得以坚固，很多人归向基督。有愈来愈多的毕业生，以商人、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身分回到中国，成为神的“光点”，作为神使用的管道，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祂。

第四，我的目标，是向每个人发出挑战，要继续为福音传遍中国而祷告和做工。神垂听了许多人的祷告，在近乎不可能的时候，打开了进入中国之门。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回到童年故里宁波时，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开始正常化，确实是神对我祷告的极大应允。但那时候，我只感到自己像是奉派窥探迦南的一个探子。

神的时间是在十六年后。一九九五年，祂带领我回到中国，可以公开地向那里数千人传讲福音。自从铁幕落下以后，在这地区举行大规模聚会，以及有一百位年轻人公开献身事主，都是从未有过的事。我祈求神在祂永恒的计划里，借着我那次短暂的传道机会所产生的结果，能在中国倍增，就像五饼二鱼一样。愿荣耀归给神，祂成就了大事——我们只要继续祷告，祂就会成就更大的事。

在现今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变得愈来愈重要。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 (Arnold Toynbee) 宣称：“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中国人的。”在世界的舞台上，我们将担当重要角色。但是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基督徒仍是少数。不过，小小的酵母可以发起整个面团，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只要有神的同在，千人之军照样能成功地迎战万人部队。中国的基督徒，照样能够举起福音的火炬，为亿万人照亮进入神国之路。

我替神向黑暗势力呼唤：“容我（祂）的百姓去！”向今天世上政治性的“法老”发出呼吁，也向捆绑人类的属灵仇敌撒但宣告：

“容我的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出埃及记五章1、3节）

揭开序幕

惟有圣灵

才能安排父亲第一次接触福音就读到《约翰福音》，

因为《约翰福音》中谈到

从希腊文“洛哥斯”（Logos）翻译而来的“道”。

第1章

我的根

因信仰关系，加上我在海外工作，
父亲曾被拘禁，母亲曾多次被批、被斗，
据说，他们要求她与我划清界线，脱离母子关系，
理由只因为我是传道人、是做学生工作的、
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母亲坚决反对，她说至死我都是她的儿子.....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县。这地区，地灵人杰，颇多文才武略之士，不少在中国历朝历代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源于此，周氏家族一路追溯上去，也出了许多知名的祖先。自从早期宣教士来华，这地区也以虔诚基督徒聚居之地而知名，他们虽然历尽战乱和苦难，至今仍对主忠心。

父亲的家族很大，叔伯兄弟众多。父亲擅长会计和商业管理，就我记忆所及，祖父有一间钱庄，中国早期是没有银行的，这些钱庄就类似贷款公司，听长辈们说，父亲在钱庄工作时，能用一只手打算盘，同时用另一只手书写。

后来，父亲加入国军担任军需官，我还记得他穿上军服时，看起来是何等英气逼人。他在军队里的时候，我们住在中国的首都南京，退伍之后，我们就迁回绍兴。

父亲结过三次婚，两任前房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就去世。在他第二任

妻子病逝后，便在双方家庭安排下与母亲成婚。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正是二八年华，她是外祖父母的幼女，有兄姐各三人。外祖父曾在清朝的衙门里任职，母亲回忆小时候，全家住在一栋巨宅里，佣仆成群，家中经常高朋满座。因为外祖父看中我父亲，所以将母亲许配给他，虽然父亲那时已届而立之年，比母亲大十四岁，不过外祖父认为他诚实可靠，又有才华，所以将女儿托付终身。

他们婚后第二年，母亲只有十七岁，我就出世了。父亲有子万事足，自是欣喜万分，以我为他的命根子，母亲则说我是她的心头肉，对我疼爱有加。母亲和我的年纪相差无几，从外表看来我们像是姐弟多于母子。

母亲身材中等、长相清秀、体弱多病，却意志坚强，甚至有点固执。她在笃信佛教的旧式家庭里长大，当时一般人并不注重女孩子的教育，她们只在家中做针线、刺绣。母亲却不仅聪明，也很好学，信主以后很快就学会念全本圣经，后来毕业于圣经学院，我曾经随她去旁听学院的课。

一九五〇年代，政权易手后，大陆境内有许多改革，常有各样的运动，在教会的内部也常有开会、学习、自我批评，民间不单是参加学习，还要开斗争会。父母亲因信仰的关系，加上我在海外工作，所以常作“运动员”。

特别因为海外关系，父亲曾被拘禁，母亲曾多次被批、被斗，据说，他们要求她与我划清界线，脱离母子关系，理由只因为我是传道人、是做学生工作的、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说至死我都是她的儿子，后来事情不了了之，她始终是我的母亲。

///

我的出生地浙江绍兴是中国产酒地之一，绍兴酒闻名全国。在故乡，习惯称为“绍兴老酒”或叫“状元红花雕”。状元红是指刚生下男孩时做的酒，一直储存到他中了状元才开坛来喝，父母的心愿是讨一个好彩头；花雕是为了美观，在装酒的坛上描了许多彩色的花草，所以命名。

我因得地利、人和，所以跟酒结缘。听说母亲进食之际，就把睡在

摇篮里的我摆在桌子旁，我若哭个不停，只要用筷子蘸点酒放在我的嘴里，就笑逐颜开，母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个酒鬼。

当时我们在家中自己酿酒，不是为了販售，乃是为了自家人享用。我们不单是每餐饭前都要饮点酒，有的人连早上也喝，简直是饮酒如水。文人是饮酒吟诗，商人是花天酒地，酒成了必需品。因为我喜欢喝酒，亦会喝酒，所以父亲每次出外应酬总是带我去，饭局上总要喝酒，每次喝酒总是会划酒拳，输的人就得认输罚酒，父亲输了，我就代罚，每次要喝十二小杯。幸亏我的酒量还不差，虽然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很不舒服，不过我还是乐此不疲。

喝酒，我是家有渊源，烟则有点不同。父亲母亲原本都抽香烟，但是他们不许我抽，所以无法尝试。

有一天，他们二人都外出，留下三四岁的我一个人在家中剥桂圆，我剥得很闷气，就找出一个空的香烟盒，到附近的小店里向伙计换了一枝烟（以前我常替父母去换烟枝，所以他们不疑有诈），我拿到烟后，想抽，可是不会用自来火（火柴）点烟，就请伙计替我点，然后独自坐在街沿上抽起来。

父母回来当然大怒，父亲用家法将我重打一顿，并命我跪在祖宗牌位前，用一柱香的时间自省。想不到的是，他们二人为此深深自责，从此我们家中成为禁烟区。他们重生得救以后，与酒脱离关系，我亦不再喝酒。

第 2 章

出埃及

“我们给你最后改变主意的机会。

你是要相信耶稣呢？还是祭祖？”

“我宁愿要耶稣。”父亲勇敢地宣告。

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像垃圾一般，被扫出家园，
被迫离开我们的亲人，
放弃作为家族一分子所享有的声望、权利和财产。

时为一九三一年，虽然当时我只有七岁，却清楚记得我们的家庭正处于属灵上和事实上“出埃及”的那夜，地点在中国。

由于我是家中惟一的男孩，又是儿子，所以在我们全家刚刚归信基督的时候，父母亲把一件严肃的、属于大人的责任交给我，就是让我在祖先的牌位前，用祭祖的仪式向祖先们宣布我们周家信主的这件大事情。母亲遵照父亲的指示，花大半天时间煮了几样美味的菜，作为“最后晚餐”，向祖先供奉。她派人守在门口，说，如果看到有牧师或任何教会的人经过，就通知她。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发觉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知道这样做，和我们的新信仰并不搭配。特别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基督徒来说，这个举动古怪又不合宜。

一切准备就绪，父母和我带着食物进到祠堂里，把食物放在祖先牌位前，轮到我时，我跪了下来，用满有权威，但带着稚气的声音宣告：

“这是你们最后一餐。吃过以后，我们便不再祭拜你们了，因为，

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不能再拜你们了。我们要向你们大家说再见。”

那真是一个大日子！是我们生命的转折点！但，事情还没完，俗语说：“纸包不住火”，当我们把祖先的灵牌包起来，送进家族祠堂的时候，突然间，人人都知道我们已归信了耶稣，有人震惊，有人高兴。

///

我们的大家族拥有很多财产和田地，每一季，各房轮流主持祭祖，一大家族的人先一起到坟地祭拜祖先，然后，便按着百分比，把农地收益分一些给每一家。通常那笔钱足够一户人家一、两年的开支。如果分享收益的家庭减少了，其余的家庭就可以多分一些。

由于我们决定归信耶稣，并且正式离开这个大家族，所以就在祠堂召开家族大会，由曾祖伯父主持。父亲站在正中，男人坐在最前面，妇女则按照习俗坐在竹帘后面。

他们指控说：“我们听说你‘吃’洋教！”

“是的！我们信了耶稣。”父亲坚决地回答。

“你不再拜祖先了，是吗？”

“是！”

“那么，你就丧失了一切继承财产和任何利益的权利，你知道吗？”

“知道！”父亲又再回答。

“我们给你最后改变主意的机会。你是要相信耶稣呢？还是祭祖？”

“我宁愿要耶稣。”父亲勇敢地宣告。

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像垃圾一般，被扫出家园，被迫离开我们的亲人，放弃作为家族一分子所享有的声望、权利和财产。他们只给我们几天的时间收拾东西。

在离家后的一个晚上，父亲跪下来，按手在我身上祷告，把我的一生献给主。他说：“神啊，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这惟一的儿子，我想把他献给你。”然后他对我说：“我给你取个新的基督徒名字，就叫摩西吧！”父亲的圣经知识虽然有限，但还知道摩西是位属神的伟人，他希望他的儿子也能够效法摩西的榜样。他说：“我盼望、祈求有一天神会使用你，带领我们的骨肉之亲脱离捆绑、罪恶、黑暗和属灵的奴役。”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放弃了世上一切的财物，离开了我们的“埃及”。搬离舒适的豪门大宅后，蒙一位在同一间教会敬拜的基督徒接待，迁往他简朴的家中居住。

摆在我们前面的“旷野”路程，以及在“荒漠”的经历会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凭信心走出第一步，就如祂带领希伯来人往应许之地一样，我们信靠神的带领与同在。

第3章

入学堂

从家里到学塾虽然不远，只有二、三里路，
不过我刚刚上学时，父亲因疼惜我，毫不厌烦地每天来回接送，
路上父亲总是教我念唐诗或者讲些益智的故事给我听，
也教我一些简单的对联，
自小因为父亲的栽培，使我对中国文学颇有兴趣，
这是我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

大约在我五、六岁，我们一家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便进学校读书了。在那重要的一天，天没亮我就起床，迫不及待地等候那些即将发生、令人兴奋的事情。

父母亲为我穿上少年人的传统服装——蓝袍马褂、瓜皮帽。他们还要我带一个灯笼和一把葱上学——灯笼代表光明、启蒙和教化；葱，则因为它的谐音是“聪”，象征聪明。

吃过早餐，他们便带我到祠堂祭祖。我们都跪下，然后由父母亲和叔伯阿姨向祖先说：“请照顾这男孩，一生引领他、教导他。他今天要开始启蒙教育了。”

父亲随即陪我去学校。按照传统，我要带一些甜糕点和同学们一起享用，另外还要准备一个红包送给老师，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会有一位老师在学堂门口等着我。

一到达学堂，我就对挂在课室墙上的孔夫子画像跪拜，把带来的水

果和食物摆在画像前供奉（孔夫子才不会吃那些食物，我怀疑后来是老师吃了），然后我把糕点分给同学们吃。

在当时的中国，上学是一件严肃的事，没有游戏时间，也没有所谓的幼稚园，孩子直接上一年级。但是在这间只有一个课室的学校，各年级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由一位老师教导。我是家中惟一的小孩，大部分时间都与大人在一起，所以渴望到学校与其他孩子做朋友。不幸，我的期望变为失望，行礼如仪后，因为他们认为我年纪尚小，不宜全时间上学，所以，虽然我已正式入学，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只能留在家中玩耍，有时跟着年龄较大的孩子到学校去，模仿他们背书。

中国孩子向来不大明白他们所背诵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学校虽教导书法，但没有数学或其他科目。当我终于开始上学后，同一位老师就教我约有三年之久。

对于早期的学校生活，我清楚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的情绪对我们的影响。如果老师的心情好，我们就皆大欢喜；如果他心里不痛快，就会把怒气发泄在我们身上。如果他疲倦了，点头去梦周公，我们便会得到更多的自由，趁他睡得香甜，像小猴儿般在课室里嬉戏。我还记得他严厉的样子，如果我们顽皮，他一定会责罚，决不宽贷。

///

从家里到学塾虽然不远，只有二、三里路，不过我刚刚上学时，父亲因疼惜我，毫不厌烦地每天来回接送，他每次都让我骑在他肩膀上，我或是扶着他的头，或是让他拉着我的双手，一路开心、舒适地让父亲带我回家。在路上父亲总是教我念唐诗或者讲些益智的故事给我听，也教我一些简单的对联，有一则对联到如今我还记得：“有一位父亲也是这样的送儿子上学，他出了上联给儿子，要他接下联。父亲说：‘将父作马’，儿子就应声说：‘望子成龙’。”

有次，在地上看到一个以前中国通用的铜钱，父亲就趁机告诉我一些处世待人的道理，他说做人要像铜钱一样，外圆内方，对人宽，律己严。

私塾的附近有一个极为优美的竹园和梅园，一到春天，梅花盛开，非常漂亮。有一次先父带我经过此地，突然想起一幅对联，非常有意

思：“傲骨梅无仰面花，虚心竹有低头叶。”我一直觉得这是很有诗意的一幅对联，始终没忘记，讲道时偶而也会用到。自小因为父亲的栽培，使我对中国文学颇有兴趣，这是我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

第4章

主栽培

在我仍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向同学见证基督。

我的名字是“祖培”，意思是“祖先所栽培”。

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全家都认为祖先帮得上忙，
但我不喜欢，因为这不是我的见证。

于是我把名字改为“主培”，读音相似，
意思却是“主所栽培”。

我并非生于基督徒家庭，父亲在宗教上原是一个执着的人，自称信奉道教。那时候，民间普遍同时信奉儒、释、道三种宗教或哲学思想。他们觉得按场合采用儒、佛或道的仪式并没有什么矛盾。孩子出生时，家人会在佛寺上香；预备入学时，便要行儒家的礼仪；至于他的人生操守、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则可能奉行道家思想。

道教的信仰，哲学成分多于宗教。虽然没有典籍记载是否真有老子其人，但他一般被视为道家的始祖。信奉道家的人奉老子所着《道德经》为经典，其年代可以追溯至纪元前四世纪。

道家中人，包括我父亲，讲究深思和修持。作为清静无为的消极主义者，他们对人生感到迷茫，主张遁世。他们对大自然感到迷惑之余，努力对下列问题寻找答案：天地在周而复始吗？大地是否静止不动？太阳和月亮会争夺位置吗？有什么机械装置叫日月自动运行？或者它们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在不断周转？是云造雨，还是雨形成云？谁有闲工夫去

使这些自然事物发生？我父亲也埋首于这些哲学问题里穷思苦索。

神透过我父亲的道教背景，和他喜爱深思熟虑的个性，特别预备他成为福音的“好土”。道家信徒寻求与大自然神交，他们称大自然为“道”。“道”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不是儒家所谓道德、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行为之“道”。

道家相信“个人的意识”，即“我”或“自我本体”，会与肉身一同死去。所以他们寻求各种在世上长寿之道。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因此，他们相信获得不朽的惟一途径，便是与宇宙认同或合一。

我记得，父亲不单信奉道家的哲理，还参加许多道教的集会，并且成为当中具影响力的领袖。神培养父亲的领导才能，是在栽种另一颗种子，以装备他将来的基督徒事奉。

///

虽然父亲浸淫在道教的思想里，母亲生长在笃信佛教的家庭，神却用奇妙的方式让我认识祂。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与较年长的同学在一起，其中有一位朋友，经常参加一间华人教会的主日学，他自豪地向我展示他从教会得到的一本小小彩色圣经故事图画书，那些图画很吸引人，我好希望也有一本。

我决定冒险，瞒着父母跟他去教会，假装说和学校的好友玩，其实是偷偷地跟他一起去教会。我的父母信以为真，理所当然地以为我在别人家里，就这样，我快乐地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主日学。

那位主日学老师说：“神是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说：“神爱世人，所以差遣祂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从没听过这种事情，更稀奇的是，耶稣竟然爱我！

她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当时虽然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却也知道自己是罪人，需要救恩。我恳切地求神赦免，结果真的获得重生，也常常把耶稣介绍给其他小朋友，带领他们去主日学。

就在这时候，体弱多病的母亲又病倒了，这次大病一场，几乎要了她的命，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亲戚朋友都催促父亲尝试各样偏方，设

法救活母亲，以免他又失去第三任妻子。他试遍每一样传统草药，请教过认识的每一位中医，又烧香拜佛，请和尚念经，甚至尝试巫术，都不管用，母亲的病愈来愈严重。

我问父亲，可否请教会的人来为母亲祈祷？父亲同意，于是三位姐妹来到我家，为母亲祷告后，母亲的病马上好转，可以入睡，并且开始进食，复原得很快。后来母亲就开始跟我一起去教会，父亲没有反对，他觉得妇孺可以去教会，但身为一个士大夫，这不是他需要关心、参与的事。

///

我接受基督以后，主日学老师教导我：“现在，你必须向你的父母作见证。”

“见证？怎么回事？”我问。

她解释说：“告诉他们，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并且神也爱他们，耶稣曾经为他们受死。”

我怕得要命，哪敢这样做啊？“我的父亲不会相信这些事的，他一定会大发雷霆，揍我一顿。”

“把这本《约翰福音》带回家去，送给你的父母。”我遵命照办，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后果，实在害怕得很。

起初，我把书放在书桌上，不敢直接交给他，也不敢坦白地和他谈论我的信仰，我希望父亲自己会注意到。父亲一踏入家门，我就立刻躲起来，留意看他发现那本陌生的书时，会有什么反应。

“《约翰福音》？约翰是谁？这里面写些什么？是洋教的书吗？丢到一边去！”他一面说，一面随手把书扔在一旁。

虽然第一回合似乎已经输了，但我下定决心要作见证，就把书从书桌上拿走，放在另一张桌子上。终于，父亲又看见它了，这一次他好奇地打开来看。

惟有圣灵才能安排父亲第一次接触福音就读到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中谈到从希腊文“洛哥斯”（Logos）翻译而来的“道”。我记得父亲在我小时候，向我解释“道”是万物的总和，也是万物之本，道在天地之前

已经存在了。父亲从道教的经典中引述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父亲打开约翰福音开始阅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造的。”（一章1-3节）

“哎哟，这书是讲论道家思想的！”父亲喃喃自语。圣灵在他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开始照亮他的心。我屏息静气地看着父亲一口气读完《约翰福音》，他开始认识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及祂受死的经过，这令他惊讶不已！

父亲读完后，便呼唤我：“你从哪里得到这本书？”我很紧张，颤抖地招认自己去过教会，他要我立刻带他到教会去，我真的希望他不会与教会的牧师争论，给牧师难看。父亲关着门跟那位牧师谈了很久很久，我在外面提心吊胆地等候着。

自从父亲读了《约翰福音》后，接着几个月来，他每早晨起来都热切地研读神的话语。圣灵剖开他所有的道家背景和偏见，最后，他做出决定：“我们全家都要信耶稣。”母亲也跟随他接受了耶稣，我们一家三口公开承认我们的基督信仰，而且受洗。

我们无法隐瞒这新的信仰，因为我们的家族很大，几代同堂，包括叔伯、婶母和表兄弟姐妹，还有许多佣人，整天都有人在身边来来往往，亲属的住宅就在我们的庭院四周。我们一信主，就必须停止祭拜祖先，这时候我们决定“出埃及”，离开大家庭。

///

离开这个大家族，不仅对我们是一个创伤，对父亲的兄弟及他们的家人亦然。自我出生以来，我的生命已与他们紧紧连结，因为我出生的时候，父亲的前两任妻子都没有生下一男半女，我被全家族看成了一件宝！才呱呱堕地，父亲便抱我到寺庙去酬神。他问和尚：“这天赐麟儿将来的命运如何？”

他很惊愕地听见和尚为我所算的命：“依照这孩子的生辰八字来推算，因为有许多鬼神等着攻击他，他活不过十岁，如果他侥幸能长大成人，前程一定远大。”

父亲担忧不已，他恳求和尚给他指引解运之法，好防止这可怕的灾难临头，他又求取保护我避过鬼神的方法。那和尚说：“首先，你必须让这孩子过继给菩萨作儿子，这可以透过烧香拜佛的仪式完成。”我出生的第三天，便举行那仪式，由这一天起，我的头皮、耳下和背上，都留有一个小小的戒疤，这些疤痕是用香灼烧那些部位造成的。

和尚又说，必须至少再把我过继给两个家庭，扰乱鬼神的耳目，才能保我平安。那时，我的伯父和舅父都没有儿子，他们正计划按照中国习俗收养我，听到和尚的话，他们都十分乐意作我的养父母。因此，我从不称他们为伯父、伯母、舅父、舅母，而改称他们为父亲和母亲。这些纠缠不清的家庭关系，令我的童年时期感到混乱不堪，有一段时间，我很难把这些“父母”分清楚，并且怀疑我究竟是谁的儿子！

我穿梭于三个家庭中，轮流由三对父母来抚养，好混乱那些鬼神。他们认为只要那些鬼神不知道我住在哪里，便不能奈我何！你可想像，那时，我是如何地被娇宠。我任性而为，并且骄傲淘气。尤其我的舅父母，对我视如己出，因此，我与舅母十分亲近，称她“妈妈”，却称我的生母为“阿姨”。

到了我会走路、会说话的时候，无论哪一对“父母”拜祭祖先，我都必须在场。在主要的庆典中，他们指派我在拜祖先的仪式里站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懂得带头行礼如仪了。

他们原本计划按着习俗，在我到达适婚年龄时，由三个家庭各自为我挑选一房妻子。他们的主意是，如果某一家挑选的妻子生下孩子，那孩子便属于那个家庭，成为他们的孙儿。我真感谢神，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一切烦恼和困境全没有了，否则，我难免陷身于三个妻子和一个复杂的家庭中，无法自拔！

///

在我的家“出埃及”后，父亲曾带我回去探望他的兄长（我的伯父），跟他谈了很久，劝他接受耶稣基督。我听见他们争论得十分激烈，当时伯父甚至把我们赶离他的家。“离开这里！我不再认你这个弟弟！”他高声咆哮。这等于说，他宝贝的养子也被逐出他的家庭了。

每天早上，父亲都到我们在绍兴住家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祷告。他不单为伯父祷告，也为我们所有的亲戚祷告。感谢神，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一个个地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记不得他们归主的详情，但这些无疑是神迹，因为他们原是强烈反对基督教的，这完全是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带领他们归向神。对我来说，也大大证明，无论事情看来是如何不可能发生，神仍然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可以用祂大能的手做成任何事情！

在我仍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向同学见证基督。不久以后我发觉，若我保留现有的名字，就跟我的新信仰发生抵触，因为我的名字是“祖培”，意思是“祖先所栽培”。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全家都认为祖先帮得上忙，但我不喜欢，因为这不是我的见证。于是我把名字改为“主培”，读音与“祖培”相似，意思却是“主所栽培”。

第5章

神保守

感谢神，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变僵、变冷，

却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又活过来了。

每个人都感到惊讶和兴奋不已！

他们目睹一个死人突然复活了！

母亲信守她的诺言说：

“儿啊，你现在是完全属于神的了！”

我们离开绍兴迁到上海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虽然仍参加教会聚会，但是对于别的事物兴趣渐浓，与神的关系则愈来愈远，我对神渴慕的心，已经不如初信时那么热切了。

一九三〇年代有一天，上海举行了一个儿童主日学决志大会，那是一件盛事，不单我们的主日学参加，许多其他教会的主日学也来参加。那天的讲员是赵世光牧师，借着 he 活泼动人的信息，我与神的关系真正复兴了，我决定献身事奉主，自此，我年轻的人生岁月有了不同的方向。

母亲从未忘记那和尚的预言，对我特别保护。虽然我们已经全家信主、拒绝迷信，但母亲心里仍为着那僧人的警告耿耿于怀。不论什么原因，她很少责打我，我做错了事，她会命我坐下来，然后仔细向我解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成为基督徒之前，母亲常要我在祖先的牌位前跪拜，每天向牌位上香。我做错事的惩罚，就是跪在牌位前，为自己未曾效法他们的榜样而

悔改认错。成为基督徒以后，每当我犯了错，母亲都会跪下来为我向主祷告，甚至为我痛哭流泪地祈求，直到我悔改为止。

另一方面，父亲则对我极其严厉，因为我是他的独子，他对我的期望特别高。我记得他如何坚持要我一字一句地把许多中国古诗、古文背得滚瓜烂熟，耐心地向我讲解其中的含意。他严格的督导，令我受益良多。

///

我九岁的时候，在上海突然患了一场重病，可能是伤寒，两周里病情日渐恶化，一直高烧不退，大家都以为我小命不保。他们探不到我的脉搏，听不见我的心跳，判断我已经断气。按照中国习俗，人死了，要把房门板拆下来，在尸体僵硬以前，移到门板上。我的家人已经照办，并且着手筹办我的丧礼。

那时父亲不在家中，只有母亲独自承受严峻的考验，她和亲戚们所受到的打击与痛苦，实在难以想像，因为他们将家庭的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我身上。母亲完全无法接受我已死去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虽然人人都认为我已经死了，她仍不断为我的生命向神祷告和祈求。

当初父亲把我献给主的时候，他很高兴，母亲却很担忧，因为那时候，基督教传道人的生活贫苦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母亲提出反对：“我不想我的儿子作个贫穷的传道人，我的儿子聪明伶俐，应该有更好的前途——我希望他将来赚大钱。”（舅父在上海开了一间制袜厂，计划等我长大后，就由我接管他的生意。）

现在，看来我已经死了，他们为我将来所订的一切美好计划全都落空。母亲哭着、喊着，求神饶恕她违背祂旨意的罪。她恳求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会让他作个传道人，我现在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你！”（事实上，当时的我，已经不是一个“活祭”，而是“死祭”，一切都太迟了！）站在母亲四周的人，都不禁摇头叹息，就算她回心转意，放手让她的儿子为神工作，也似乎太晚了。

感谢神，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变僵、变冷，却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又活过来了。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和兴奋不已！他们目睹一个死人突然复活了！

母亲信守她的诺言说：“儿啊，你现在是完全属于神的了！”

///

一九三七年，十二岁的我再次濒临死亡边缘。由于母亲对我过于保护，既不准我走近水边，更不准我学游泳，这使我与好友疏远，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喜爱到池塘游泳。

有一天，我受不住引诱，随着几个男孩来到一个游泳的地方。我蹲在湖边，不敢下去，突然，一个大男孩开玩笑地猛推我一把，“噗通！”一声，我掉进又深又冷的水里。那天回家，我挨了冻、受了惊吓，连续十天高烧不退。

父母亲从早到晚轮流看护我，弄得筋疲力尽，直到我的病情稍有好转，他们才放下心头大石，小睡片刻。有天半夜，我想喝点水，又不想打扰他们，就自己下床，但是我虚弱得走不动，失去平衡，结果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高烧又起，小命危在旦夕。感谢神，有一位基督教医院的丁院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当他获悉我病得那么沉重，立刻安排住院。

一个沉闷的下午，我正在生死边缘挣扎，那时下了一场像是浓浓云雾的雨，在似梦非梦中，我觉得自己的躯体正离开医院，像个童子军一样，背着一个背包，走在一条泥泞的路上，在那像雾一般的凄风苦雨之中，朝不知名的目的地前进……

忽然间，我来到四野无人的河边，坐在石凳上等候渡轮。雾浓得令人看不见对岸，天色也渐渐黑暗。有一个身穿蓑衣、头戴竹笠的男子走近，这个陌生人对我说：“喂，今天下午没有渡船了，回去吧！”我遵命回头。就在此时，我开始恢复意识，醒来的时候，正身处照料垂危病人的加护病房。我看见几个医生围着我，父母则在一旁哭泣。后来医生告诉我，我的父母当时不断祈祷：“神啊，我们两人已将惟一的儿子献给你，他完全属于你了，你为何舍得他现在就死去？”后来丁院长告诉我，那天进院的十八个病人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活着出来的。

大家都很高兴我从死亡边缘回到人世，我自己则越来越感到是神的手在引领我。我开始知道神拣选了我，一定有祂特别的目的，但在灵界中有某种争战，企图拦阻我完成神的计划。当我再次康复，虽然犹少不

更事，却强烈感到神的呼召，于是下定决心要装备自己去事奉祂。



1. 我蒙救赎而坚心爱主的
慈爱双亲。



2. 我和赵世光牧师一起亲
密同工。



3. 出埃及七十年后，看到
了神的信实和同在。与
孩子和孙子们在家庭聚
会中共度时光。

第二篇

早期生活

父亲回答得妙：

“儿啊，让我们祈求神能使用你做这工作——建立海外传道会，向非华人传福音。但愿神恩待你、带领你。”

第6章

属灵影响

戴德生的生平事迹令我既惊讶又感动。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来到我们的国家，
建立内地会，向那些不是他同胞的人传福音？
为什么我们中国基督徒不到海外去，建立外地会呢？”

父亲回答得妙：

“儿啊，让我们祈求神使用你做这工作……”

成长的过程中，我在肉体和属灵上，面对过许多试炼和困难，尤以属灵方面为最甚。

青年时代，我对一些基督徒领袖的言行不一感到失望。有些外国宣教士，以及一些中国牧师，在人前表现得很属灵，但是对同工和其他基督徒，则既不体恤，也不友善。我当时正处于容易受影响的年纪，虽然才刚立志献身全时间事奉主，这情况却又差点使我打消了服事主的念头。

当然，我也看见许多真正善良、诚恳和谦卑的宣教士与基督工人，献身事主，为基督的缘故真的忍受了很多的苦难。他们平等看待中国基督徒，能与他们和谐共处，也赢得他们的尊敬。

我承认，有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软弱和不成熟，以致对人期望过高，忘了定睛仰望耶稣；也知道，是我的态度造成我摇摆不定的信心。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领袖，或在教会及基督教机构中负起领导责任的人，无论是宣教士或本地信徒，也无论在任何国家，都需要知道，

我们的生活将会影响那些注视我们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不单要言教，也要身教，特别是我们的态度，正是无形却有力的见证。

///

我年少的时候，神使用了著名的中国传道人宋尚节博士的榜样和事奉来影响我，使我刚强壮胆地传福音。他曾在美国俄亥俄州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后来却放弃了美好的前途，回国传福音，国人十分尊敬他。我常参加他的聚会，他不以传统的方式讲道，有人认为他很古怪。他在讲坛上的表现富有戏剧性，时而激情，跳上跳下，并且采用一些令人吃惊的例证；时而严厉直率，甚至得罪人，但常常很有灵性上的果效。

有一年新春布道会中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永远难忘。未信主的中国人十分迷信，在新年期间，都小心翼翼地只说吉利的话，并且举止有礼，惟恐不当的言语和行为会影响未来一年的运气。宋博士在那次新春布道会中，却把一具小小的棺木放在衣袋里带到讲台上，他说恭喜发财是发“棺材”而非升官发财。他从棺木中抽出一些字条，上面写着骄傲、贪婪、说谎、憎恨等罪恶。他呼召人认罪、悔改，并且指出我们虽然死了，却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他以此说明为何新生命是必须的。

台下听道的人，在新年看见讲台上摆放着与死亡有关的禁忌之物，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害怕那会带来恶运。然而，人们虽不喜欢他这种表达方式，信息却已深入他们内心。神不单使用这位著名的布道家影响了我的生命，也影响了许多基督徒和基督工人的生命。

///

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对我的一生也有重要的影响。我在宁波的时候，住在城外，就读于一间由宣教士开办的小学，每天早上必须步行一小时去上学。学校离戴德生建立的一所教会不远，我下课回家的时候，常在那里停留一下。那里的人给我一本中译版的《戴德生传》，我很有兴趣明了戴德生的生平和为人，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来到中国宣教。按照这间教会的传道人所说，戴德

生的布道工作推展到内地后，他便将那间教会交给长老会管理。

我是在一间真正奉行“三自”原则（自立、自养、自传）的本土中国教会归主的，教会称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后来，我们从绍兴迁到上海后，我参加一间长老会的教会，母亲则在一所长老会的圣经学校里就读。

听到戴德生在完成信心宣教的工作以后，将他的成果交给另一个宗派，我感到困惑。一个传道人辛辛苦苦建立一所教会，为什么又交给别人，这不是太笨了吗？我对中国内地会或宣教工作所知甚少，但从那时候起，我视戴德生为一位与众不同的宣教士，因为，在一百年前，中国内地还是个低度发展的地区，戴德生却能勇敢地面对难以置信的困难，去那里事奉主。

戴德生的生平事迹令我感到既惊讶又深受感动。我读他的传记时，父亲就坐在我对面。他看到我满脸深思和疑惑，便问：“你怎么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来到我们的国家，建立内地会，向那些不是他同胞的人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中国基督徒不到海外去，在别的地方建立外地会呢？”

父亲回答得妙：“儿啊，让我们祈求神能使用你做这工作——建立海外传道会，向非华人传福音。但愿神恩待你、带领你。”于是我们一起祷告。我那时只有十来岁，父亲竟然也为我未来的子孙祷告，祈求他们能借着他们的生命和事奉来荣耀神，真令我惊讶且难忘。

那是我奉献的里程碑，并具有预言意义。我那时只有十二、三岁。神使用戴德生的榜样，来激励我献上一生，为主工作。后来，我进入一间由浸信会、长老会和循道会合办的中学读书，感谢主，我在这所好学校里获得很好的宣教士教育。

///

日军侵入华北后，不断轰炸各大城市，我们被迫离开上海，迁至宁波。父亲对传福音有负担，所以奉献他的住所作为传福音的场地。我们一家都参与教会的活动，因此，自我十二岁，还就读小学的时候，就已负责在聚会中领唱，有时候，我甚至担当译员，把国语译成宁波话。

日军占领之初，我必须住在上海陪我的舅父母兼养父母。有段时

间，我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中学读了一年书，又参加很多教会活动，所以有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舅父在疫病流行期间，突然患上了霍乱，医院挤满垂死的病人，我们找不到病房，只能把他送进拥挤的医院大厅堂，尽人事、听天命。不出几天工夫，他便与世长辞，我的人生方向也从此完全改变。

舅父生前激烈反对我献身事主。他明白地说：“我不希望你作个吃不饱、饿不死的穷传道。你也是我的儿子，你的人生方向由我来决定。你非得来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好好预备继承我的事业才是。”

现在，才不过一年，舅父就撒手人寰、与世长辞。由于他的生意是独资经营，很多帐目并没有清楚记载，如果是他欠别人，债主很快便会拿着证据来，要求我们付款；如果是别人欠他，他们不是抵赖，就是保持缄默。我们别无选择，惟有关闭工厂。之后，我和舅母及外祖母三个人，一起从上海迁到了宁波。

从这些事件中，我看见神的手在带领。如果我的舅父还在世，我的人生可能受其影响，不能自由地事奉主。

第 7 章

天国精兵

初中一年级时，
学校举行了一次抗日演讲比赛，
我虽然没有演讲经验，仍去报名参加。
没想到，竟赢得初中组的冠军！
这时候，
一位高年级的学长问我将来的计划是什么？
我说：“我已经决志为神工作了。”
并且向他见证主在我生命里所做的一切。

我从上海回宁波时，年纪虽然轻，又缺乏经验，但是教会中的长者都鼓励我在主日传讲信息。每次获邀讲道，我都差不多在两星期前，就开始为预备讲章而研读圣经、迫切祷告。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我写下每个字，估计可以讲三十分钟，没想到，一上讲台，只用了五分钟便讲完要说的话，叫我觉得好尴尬，恨不得讲台上有个洞，让我钻进去。等我领受了圣灵的洗，又从病中复元后，神加添我讲道的机会。在预备和传讲信息方面，我也经历到祂在我身上的大能。神的话开始带来属灵的果效，人们回应良好。十六岁的我，那时已经有了“小传道人”的称号。

两年后，神给了我一个不寻常的经历。有一位女传道人，曾在我们教会参加聚会，听了几个月我的讲道。后来她被一所长老会聘请去服事，那地区的众教会计划举行一个年度特别聚会，正物色一位讲员，在她的推荐下，他们邀请我作讲员。我简直难以置信，但还是接受了。这位女传道告诉我，有人会去码头接我。我带着恐惧战兢的心，第一次外出讲道。事前不断祷告求问主，要我传讲什么信息？

当我到达目的地，只见有好几百人上船、下船。我穿一套蓝色长袍，手提小箱，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年轻的中学生，而非传道人。下船以后，我不知何去何从，也看不见有人来接我，只好步行到教会去。当我到达的时候，守门的人问我有何贵干？我说：“我是来参加聚会的。”

“请你稍等，负责人刚出外接人去了。”我便在一间空置的小房间坐下等候。过了不久，一大群人来到教会，兴高采烈，高谈阔论。

门房瞧我一眼说：“该吃午饭了，请问贵姓大名？”

“周主培。”我回答说。

“什么？你就是那位……？”他满脸狐疑地朝我上下打量，然后跑出去高声向其余的人说：“讲员已经到了！”我想他们看见这样一个小伙子，一定有点失望，只是碍于礼貌，不好意思形诸于色。感谢神，虽然祂的仆人经验不足，祂仍赐福那聚会，使众人都感到喜乐。

///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曾有一位著名的讲员，原定要去浙江山区主领聚会，却突然病倒。他请我代替他，并安排人带我去那遥远的山区。那些赴会者见了我以后难免感到失望，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后来作见证时也坦承有这个感受，但是我学习隐藏在主的背后，让人们直接朝见祂。神果然在他们中间动了奇妙大工。

我们在那山城，连续举行了八天聚会，因为他们要轮流款待传道人，所以我必须在二十四个不同的家庭轮流用餐。按照习俗，主人要常为客人添菜，有时饭碗上的菜堆得像座小山，再努力也吃不完。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奇怪，就是我常常看见桌上摆着一个大浅盘，里面放着一条看起来很美味的鱼，但总是没有人碰牠，也没有人挟给我吃。身为客人，

又是年轻后辈，我当然不敢迳自下箸，但这事一直都令我困惑。

后来我想，会不会像中国某些方，每年年底都按着习俗，在餐桌上放着一盘鱼，大家都不去碰，直到用餐快结束时，主人会说：“请吃鱼！”客人就有礼貌地回答：“吃过还有余！”因为“鱼”和“余”是同音字，象征年年有余。可是，无论我往哪一家去，这条鱼每餐都在桌上出现！后来，我拜访过六个家庭，也和牧师熟悉后，才鼓起勇气问他，这是哪门子的习俗？

“啊，不！”他笑着回答：“因为我们住在山区，鱼很稀罕，外地的鱼运来不易，本地产的又小得只能喂猫。但是我们若有大筵席，就必须准备十道传统菜式，鱼是其中一道。因此，我们用木头雕了一条鱼。你从第一天到今天看见的，都是同一条鱼；一直到你离开那天，你仍会见到牠！我们把不同的调味料放在上面，加上村屋的灯光很暗，你很难分出真假。但我们都知道，所以没人会碰牠。我们每天都把牠洗干净，然后按着招待你的次序，把鱼传给下一家。”

///

还有一次，有人请我到浙江附近，东海一个岛屿上的乡村讲道。他们派了四个人来接我。我感到奇怪，为什么需要派那么多人来陪伴一个小传道去岛上？我们在首段旅程下船后，要步行约二十里，才能到达另一个搭船的码头。我估计步行十里约需一小时，就准备动身。护送我的人却有不同计划，他们预备了一张竹椅，套上两根杆子，就像一顶轿子，是用来抬我的！

我坚决反对这样做，但他们坚持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容易得多，因为我没有在崎岖山路行走的经验。他们四人轮流扛着我走，不时替换歇息。从谈话中，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两位是执事，一位是长老，这使我十分尴尬，我只是个毛头小子，他们竟然这样尊敬我。

好不容易到达码头，上了船，从海道走最后一段路程。忽然四周黑云满布，风雨欲来。海上波涛汹涌，波浪卷上甲板，猛力拍打我们的小船，人人都像在晕船。回想这段经历，我没有半点害怕，在甲板上，我紧紧抓着围栏，免得被抛下海中，同时，心中深深被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所吸引，并确信，“这是我天父的世界”，我就在祂的手中，我既是事奉祂的，又何必害怕呢？应该信靠祂的保护才对啊！我全身都湿透了，躲在船舱里的人也不例外。

但那场暴风雨却带来一个好结果，由于风急浪高，许多渔夫不能出海，所以他们能参加聚会。我在没有翻译之下，讲了约一小时的道，就在准备结束聚会的时候，其中一位教友站起来，像是发言人般，催促我继续讲下去：“请继续下去，不要这么快停止！”于是，我足足讲了两个小时。我想，如果撑得住的话，他们真想让我从早讲到晚哩！

///

当地人主要的粮食是甘薯，因为很难得到米粮。我发现那些护送我来的人，甚至一路攀山涉水地特别为我带了一些米到岛上。

若不是在那里看到，我真的不能相信，他们竟有那么多种吃甘薯的方法。其中一种是把甘薯切成条，然后晒干，想吃的时候，就把干薯煮软或蒸熟吃。那里有很多鱼，但又大又好的鱼多运送到外地贩售，当地人极少吃鲜鱼，多是把鱼晒干，只吃咸鱼。我不想要他们额外为我预备米饭，就坚持说甘薯也很好吃，但后来发现，原来煮甘薯比煮饭费时得多！他们先切去甘薯条的两端，把甘薯蒸熟，再加上糖、面粉及其他作料。他们将最好的部分给我吃，我至今仍记得那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那时候，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神学训练，我却已经带领过多次奋兴会。当赵世光牧师到我们这地区来的时候，他请我当领唱员。他还记得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决志，将一生奉献事主。现在他认真地和我谈起接受更进一步栽培的事。赵世光牧师计划创设华东神学院，鼓励我入学，这是我和世界灵粮布道会建立关系的开始。我在家乡的小礼拜堂工作的时候，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的院子里种了一些竹子、蔬菜和果树。五棵梅树所结的果子，味道甜美，制成的果酱，滋味之美更不在话下！下过几天雨之后，嫩竹笋纷纷茁长，吃之不尽，只要趁嫩的时候摘下，无论怎么烹调，味道都是无法形容的鲜美。

///

在宁波的时候，因为战火越来越近，每天清晨，都目睹人群背着口粮奔往乡下避难。战事越来越激烈，城中每天都有轰炸。城外的人，或是躲藏在船只附近，或是躲在树下。

日本轰炸机飞得很低，我们从藏身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见飞机下面漆着的太阳标志。日本军显然认为宁波附近的小机场是一个重要目标。那时候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躲空袭，很多人被炸死，也有很多房屋被炸毁。后来，宁波市被日军占领。我听见许多传说，讲到日军如何残酷对待中国人。宁波所有的中国学校都关闭了，我不得不去占领军准许的学校上课。学校里有日本教师，同时教授日文。

由于饱受日本人的虐待，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愈来愈深。早年，我住在上海虹口，有一天走在路上，一个日本男孩态度十分傲慢地拦着我。我与他争论，甚至打起来。很多日本男孩加入战圈，和他一起对付我。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我不得不快快逃跑，那次经历令我永远难忘。

读初中的时候，我加入一个抗日宣传队，到附近的城镇去唤起民众抗日的情绪，和对国家的忠心。我们演出爱国话剧，而且积极地鼓吹抗日。初中一年级时，学校举行了一次抗日演讲比赛，我虽然没有演讲经验，仍去报名参加。没想到，竟赢得初中组的冠军，真令我喜出望外！这时候，一位高年级的学长开始留意我，问我将来的计划是什么？我说：“我已经决志为神工作了。”并且向他见证主在我生命里所做的一切。

即使这样，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爱国之情有增无减，曾经一度慎重考虑加入新建立的空军初级生，为中国作战，因为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了。母亲因为我是家中独子，力劝我不应该抛下她；而且说，在恩主多次保存我的性命以后，我不该做那种危险的事。对我来说，这真是一番挣扎，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为国效忠的雄心大志，选择作一名天国的精兵。

第 8 章

爱情、婚姻

神开了我的眼，
就像他为亚当预备妻子以后，
开了他的眼一样。
我清楚知道，
文田是神拣选
作我终身伴侣的人。

年轻的单身汉积极参与教会工作的时候，往往受到很多热衷神工作、热衷物色基督徒丈夫的年轻姐妹们包围！我们常与宁波其他教会的青年人举行团体活动，在不同教会里，有几位这样的小姐开始向我表示好感。有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富家小姐，对我特别感兴趣，她与父母住华夏，衣着时髦，我也很喜欢她。

表面上看起来，她对神的工作十分热心，经常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常常见面，来往颇为密切。甚至平日，她也到我寄宿的学校来探望我，星期六下午，我预备回家的时候，她会等我，然后我们一起步行回家。她是个好女孩，我曾认真考虑过，她是否就是我理想的对象？

但是不久，我发觉她不是真的热衷于神的工作，她来教会的动机，也不是因为爱主。几乎全教会都察觉到她爱上了我，我才是她到教会来的主要目的。她用许多物质上的东西，来表达她对我的爱意。十八岁的时候，父母就打算为我安排一门合适的亲事，但是被我拒绝了。我觉得

自己年纪还小，不想那么早就结婚，而且学业未成，希望能专心读书。他们不断和我谈论婚事，向我施加压力，但是我坚持要多等一段时间。当他们看见这位小姐即将进入我的生命，就开始迫切为我祷告，说，若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就求神停止我们的关系。

有一天，当我和她一起散步，再次坚定表示我的志愿是作个传道人，一生事奉主。她顺着我说：“主培，你自己决定吧，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我都不会反对。”但是，她也提醒我，她的家人和亲戚是多么富有，他们在商场和其他事业上是多么成功，而作个传道人，肯定会一辈子贫穷，翻不了身。

成长的路上，我遇到很多危机，数度使我几乎迷失而不走神的道路。最初是几次患上重病，濒临死亡边缘；然后是母亲的强烈反对；接着是舅父的反对；后来，在我十六、七岁期间，对基督教工作者和整个传统的教会制度感到失望；而这一次，是一位美丽小姐对我微妙的吸引，要引诱我离开传道的路。她计划要我一方面做生意发财，一方面仍以平信徒的身分参与教会工作。

她劝我说：“如果你和我结婚，我的家人会立刻提拔你开创一番事业，我们便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我回答她说：“不，我决定追随主，一生事奉祂，顺从祂的安排和带领。另外，我们如果真的要结婚，还需要多多祷告，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她以为我在找借口，就问我：“你爱上别人了吗？”

///

我想她可能注意到我和文田的友谊。徐文田是我们教会的一位会友，自小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祖父是一位虔诚的长老，全家都在我们教会敬拜神。早年，我的父母迁到宁波的时候，她的姑妈曾协助我父亲建立教会。文田的父亲三十多岁就去世，留下她母亲抚养两个女儿。她们姐妹俩与我读同一间小学，文田的年级比我低，她的姐姐则比我高，我们双方有通家之好。

中学毕业后，文田进入伯特利圣经学院就读。她是个好学生，既聪明、又认真地装备自己做神的事工。我们长久以来都是好朋友，虽然读

书的时候关系并不特别密切，但是我已看到她良好的属灵素质。后来，那位富家小姐给我下最后通牒：“如果你现在不能决定是否娶我，我就要嫁给别人了！”她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并表示：“他对我好得很！”我这个人很率直，听见她说这样的话，便回答说：“好吧。祝福你！”

我们分手后，她真的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了婚。后来，她来找我诉苦：“我不知道那个人已经结过婚，我成了他的小老婆了！我现在想要办离婚，如果你还要我，我立刻离开他，投向你的怀抱，我知道我错了。”

我说：“婚姻不是儿戏。我已告诉你，我打算一生事奉主。”

///

我的父母知道我差一点犯下终生大错，便越发地为我的婚事着急。

这时候，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困惑，就是神的旨意和命运的安排，两者之间有何不同？中国人一直这么说：“鸿运当头，事事顺利；恶运当头，事事碰壁。”我好沮丧，究竟什么是神的旨意？万一误会了怎么办？基督徒不是常说，因为神的旨意如此，事情才会这样发生。这种想法基本上不是跟中国人的宿命思想一样吗？我开始怀疑，基督徒是不是有时也会感到困惑？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会把坏事归咎于命运；若能飞黄腾达，就说是因为他们运气好。信主后，他们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解释，说是因为神的旨意如此，事情才会这样发生。两者似乎都相信宿命论，两者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我不断地寻找答案。

有一天，当我坐在一艘往来于上海和宁波的轮船上，神给我上了一课，解开了我的困惑。船在每天下午五、六时启航，通宵航行，第二天早上抵达宁波。当我们离开苏州河，进入河海交界水域，潮水就向大海涌去，跟我们航行的方向一样。这时我看见一根巨大的树干飘浮在水上，它使我联想起它的命运。

船，跟水上飘浮的大木块，两者的分别代表了神的旨意和命运的分别，那木块不知道它的方向或目的地，也不能控制自己。可能被人拾起制成家具；或是从水中捞上来，卖作燃料；或是常年在海上飘流，变成无用的浮木，终于腐烂朽坏。但那艘船有一位船长，有一个计划、方向和目的地，而且受到控制，它会到达指定的港口。波浪对船和木块都产

生同样的冲击和影响，但船和木块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因此，我们若是凭着信心，自愿登上神的船，怀着欢喜的心顺服神的旨意，遵循神完美的计划，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知道什么对祂的儿女最好。作为基督徒，我不再像浮木一般随波逐浪。我领受这属灵的亮光后，便开始感谢主，更加注意怎样在神的生命船上作个好乘客。我不单感谢祂，并且完全喜乐地信靠祂，顺服祂的旨意。

神开了我的眼，就像祂为亚当预备一个妻子以后，开了他的眼一样。文田和我就读同一学校，这使我和她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她很高兴接纳我乐意献上一生事奉主的心志，并说，即使有必要到海外服事，她也愿意嫁给我。这时我清楚知道，文田是神拣选作为我终身伴侣的人。

后来，我的父母也建议安排我与文田结婚，更印证那是神的旨意，于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和文田结为夫妇。她一生对我及我的服事所表现的忠心和支持，从那时直到今日都未曾改变，实在让我珍惜。神计划我们的婚姻，叫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特点，这成为我们美满婚姻的基础，以此来荣耀祂。

///

我们婚后不到几天，教会举行冬令会，由于我要负责圣工，所以得和妻子暂时分别一段时间，而这次分别，只是我们为着神的事工，无数次分隔两地的开始而已。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再次离开她，到杭州的华东神学院读书，要一直等到暑假，才可以回家和她团聚。不过，文田自己也很快乐地忙着她学校的功课。

华东神学院原设在苏州，后来迁至杭州，设在已经停办一段时间的前内地会圣经学院里。灵粮布道会和内地会合作，使用此校训练中国牧师。学校教授人数虽然不多，但借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得到极佳的栽培。

我在华东神学院读到一九四八年，有一天，教会负责的同工忽然要求我提早结束学业，以便到上海去工作，这令我有点惶恐。那时上海灵粮堂教会的传道人，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弟兄，我在主日学里亦曾见过他的太太，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教会在他们两位带领下很有进步，弟兄姐妹也很欣赏他们，但是神有更大的工作要托付他们，所以他要求辞职，

因此上海灵粮堂教会要我去接替他。我深感自己不配，经过再三祈祷，就带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傻劲，领著文田并初生的女儿，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

上海虹口是我幼年时住过的地方，日侨的人数相当多，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日租界，不过在虹口有很大的日本海军驻扎地区，离开海军总部不远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公园，它出名的原因，是因为战前，在公园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说：“华人与狗，不许入内。”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我认为亦是一种挑战。

我还清楚地记得，接任教会工作后第一次参加的教会祷告会。那是一个仲夏的夜晚，是教会循例的周三祷告会，阵阵浓郁的香味，清幽而带点甜味的香气，满布在讲台前，这香气出自讲台前的夜来香，由一位忠心的信徒每周自愿安排。我认为布置在教会里的植物，应该都尽量用真的，而不是人造的，因为神喜欢真诚、自然。那天讲台前的夜来香香气，后来在印尼我亦闻到过，不过在别地方所闻到的夜来香香气与上海的不同。

我们聚会的地方，是以前日侨信徒使用的教会，胜利后，政府称它为“敌产”，交给中国教会使用。这教会是一栋两层楼的洋房，楼下可作聚会用，并有一所附属幼稚园，二楼有一个大客厅，并有两家人可住的房间，各套房间都有厨房及卫生设备，我们一家三口就使用较小的一套卧室，另外一套由赵世光牧师一家八口使用。

聚会的地方，可容一百五十人左右，挤满时可达二百五十到三百人，是一个很理想的场所，聚会的人是老、中、少都有，大家同心合意事奉主。最可爱的是一班年长的信徒，虽然我只是个未经世故、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他们有的学识丰富、有的信主多年、有的曾在外国留学、有的丈夫或子女做过大事，是赫赫有名的人士，但他们都很爱护传道人。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她的家离教会很近，丈夫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工作过，她热心爱主，忠诚事奉神，对我特别照顾有加，她不但教我英文，而且常留我在她家吃中饭，那慈母般的心肠，使我铭心感谢。

当时全教会同心合意参加祷告会，协力事奉。加上当时有很多人从北方逃难到上海来，人心惶惶，寻求平安，聚会人数每周增长。但是，撒但也加紧努力地工作，有人看中了我们所用的“敌产”，曾经到法庭控

告我们，我出庭作证，借着全教会的祷告，我们终于度过了险难。

///

不久后，在印尼雅加达，有一间华裔教会，是战前赵世光牧师曾工作的地方，他们在过去七年中，曾更换七位传道人，现在急需有人去担任牧职。赵牧师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口拒绝。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想起抗战时，我要去参军，家母再三阻止，说中国的古训是“父母在，不远游”；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愿意离开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在这里事奉只有一年左右的光景，我与他们之间已建立了很浓厚的感情，他们用爱来扶持我，使我像一只羽翼丰润的雏鹰，不肯离开温暖的巢远飞，也像早产的婴孩赖在保温箱，不愿被移开。

可是赵牧师锲而不舍，每天跟我交通，要我寻求神的引导。后来经过执事会的同意，并同工的祝福，我终于顺服下来，向会众公开这事，并要求他们代祷，更回到宁波征求母亲的首肯。教会建议我离开上海之前，应该由教会按立圣职，这样，他们就会更多在祷告上与我同工，像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保罗和巴拿巴一样。于是，我们一家人在弟兄姐妹的祝福下离开上海，起程前往印尼，开始宣教士的事奉。

第9章

再见，中国！

母亲经过几天的祷告和挣扎后，对我说：

“儿啊，虽然我心里还是反对，但是我必须顺服神，你可以去，我会为你祷告……”

我终于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和祝福，

离开中国到印尼去拓荒宣教。

却没有料到从此与父亲永别，也与母亲分隔三十年！

赵世光牧师是对远方差传深具异象的一位先驱。他年轻时在上海，是宣道会的牧师，后来翟辅民博士（Dr. Robert A. Jaffray, 1873-1945，宣道会华南区西差会主席）鼓励他探访荷属东印度群岛。回来后，他很有负担向印尼传福音，于是热切地招募年轻的中国基督徒，与他一起作海外宣教士。但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阻挠了他这项计划。珍珠港事变发生后，这计划更成为泡影。

赵牧师虽然不能立刻完成外国宣教的异象和呼召，但宣教的负担仍在他心里燃烧。他创办了一份《灵粮杂志》，然后开始第一间教会“上海灵粮堂”，最后则成立了“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在日军占领时期，他开始在上海植堂，带领很多人信主，后来又在南京、杭州、苏州等上海以外的地方建立教会。他创办了华东神学院，第一任院长是林道亮牧师，也是我的老师。但是对赵牧师来说，印尼才是他的至爱和最早的呼召。

///

当世界局势稍微平稳下来，赵牧师便和我谈及前往印尼的事。他知道我少年时期就接受了宣教的呼召，只是不确定主会带领我往哪里去。我要求他多给我一点时间为此事祷告。我有点犹疑，因为我身为家中的独子，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沉重的家庭责任；我怕父母不会同意我往外国去。还记得我要加入空军的时候，曾与他们争论。母亲声称：“等我死了你再去，我活着就不行。”

何况我自己也不想离开教会里的事奉。虽然我的经验尚浅，但会友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学到很多有关事奉神的功课，我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他们也给我引导。教会里有很好的少年团契、强而有力的祷告会，来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共产党正从华北南下，兵灾迫在眉睫，但是我仍然不想离开中国，我觉得在这种危难时刻，中国更加需要福音。但是赵牧师不断为我祈祷，鼓励我参加海外事奉。最后，我肯定那是神的带领，所以决定顺服。正好那时候赵牧师要到宁波主领聚会，我便和他乘船同往，好征求父母的同意。父亲虽然不愿我和文田被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但是他仍表示谅解和支持，认为我应当遵从神的宣教呼召。我获得他的祝福，却又一次面对母亲的反对。

“妈，我必须听从神的呼召，去印尼作宣教士。”

“儿啊，‘作宣教士’是什么意思呢？”她有点迷惑。她有着中国基督徒的典型思想观念，以为“宣教士”只是指那些蓝眼睛、红头发、高鼻子的白种外国人，中国人怎么能够当宣教士！我耐心地向她解释说：“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所有信徒的，不论他们来自什么国家。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十六章15节）我必须遵从祂。”

接着，她问道：“印尼是什么地方？”我向她解释，印尼是一个由三千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它犹如一座桥梁，将亚洲和澳洲连在一起。它也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大洋，但那里的人与神之间没有桥梁相连。他们不认识这位中保——耶稣基督。那里的一亿人口中，有80-90%是信奉回教的。“妈，我必须作个宣教士，介绍他们认识耶稣。”我总结说。

“儿啊，中国也需要你。这里有千千万万人需要听见你向他们传讲耶稣的事迹，不要去。你是我惟一的儿子，我爱你甚于爱自己，留在中国吧！我要你待在我身边，我要常常和你在一起，听你讲道。如果你离开，我会感到绝望和寂寞。”

她难过不安到极点，又说：“是的，我知道，我已经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主，让你事奉祂，但是你用不着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事奉祂啊！”我的感觉就如圣经故事里，当法老终于同意让百姓去，但却强调“不可去得太远”时摩西的心情。

我陷入无助，只能问：“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把事情交给神去决定呢？”

“当然可以。”她同意，我满怀希望地看一看挂在墙上的字句：“祷告改变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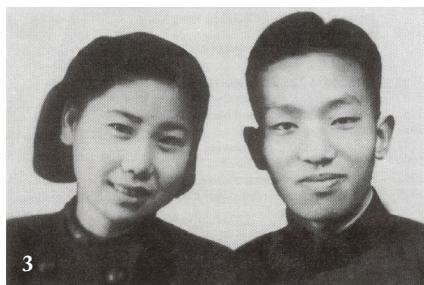
祷告没有叫事情改变，主却教导我一个新功课：祷告的结果，常常不是改变事情来取悦我们；却是改变那些祷告的心，使他们顺服神的旨意。母亲经过几天的祷告和挣扎后，对我说：“我祷告了，问题仍然存在。但祷告改变了我！儿啊，虽然我心里还是反对，但是我必须顺服神，你可以去，我会为你祷告。如果你活在神的旨意中，就离我近；如果你离主远了，就会离我也远。”我终于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和祝福，便开始拟定计划，离开中国到印尼去展开拓荒宣教旅程。那时，我没有料到从此与父亲永别，也与母亲分隔三十年！

一九四九年，中国的政局愈来愈紧张。我还清楚记得，申请护照那天发生的事情。我搭上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卧铺，但是全车塞满了人，甚至连一个座位都找不到，只能全程站在三等车厢里。感谢神，我仍是幸运的。因为很多人不顾一切要逃离那地，而爬上火车顶，不幸，有几个人在火车过桥的时候，被桥栏击倒，身首异处。

申请护照时，只知道神呼召我去那个国家事奉祂，对那里的情形，几乎毫无所知。连印尼的中文全名“印度尼西亚”，都由于我对印尼一无所知，还将目的地填错了呢。



1. 1947年在宁波教会，开始操练讲道。
2. 就任上海虹口灵粮堂牧师，时年二十三岁。



3. 文田，神所赐我的贤妻。

4. 我们的爱情坚贞胜过一切，众水不能熄灭，也不能淹没。

5. 我们带着初生的女儿，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牧会。

6. 我选择作一个天国的精兵。

7. 离开上海前往印尼。



第三篇

海外宣教 I

【印尼点滴】

我们应该要爱印尼本地的人，
不能单单享受神给这块土地的恩惠、
只顾自己的利益，
而不回报给这个社会、不顾念当地人的需要。

第 10 章

初抵印尼

教会的服事上虽有许多困难，
但我每天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赏赐智慧，
好叫我知道如何帮助印尼的教会。
虽然我只会用洋泾浜的印尼话讲道，
但神使用我这卑微的人，他使教会逐渐增长，
由三四十人，到五六百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和文田带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八个月大的圣惠，从上海乘船出发。父亲到码头送行，母亲则难忍离别之痛，跟我们含泪道别后，留在家中为我们的平安代祷。

那艘船很大，船上除了我们三人，其他旅客我们都不认识，令人感到好孤单，不知前途将如何。但是我们肯定，神正带领我们到外国的一个宣教工场，在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中去传福音。

那时，中国人的海外宣教工作仍前所未闻，中国基督徒没有宣教装备训练，也没有人教我怎样作个宣教士。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和分享神的爱时，是遵行大使命而来。但他们多半忽略了，主的期望是每个属祂的子民都要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他们没有教导中国基督徒也应该作宣教士。不知怎的，他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基督徒不会成熟到可在未来负起宣教使命，因此，他们只是不断差派新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就因为这样，纵然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

1834) 来华已超过一百年，却很少有中国教会想到：自己也该差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

犹如瞎子一般，我在黑暗中摸索，学习怎样作个宣教士。我们在上海的教会，曾答应提供一点经济支援，但不久共产党进占上海，我们便与教会失去了联系。

我在神学院没有受过宣教的装备，因为那时还没有这类的课程。当地也没有任何有经验的宣教士可以指导我。宣教士要做些什么呢？在家乡牧会，和在另一个国家开拓一间教会，有什么不同呢？我对当地文化毫无认识，应怎样与不同文化的人相处呢？

///

我们在海上顺利航行了十多天才到达印尼。当爪哇海在眼前展开的时候，我兴奋得不得了，海面波平如镜，矫健的飞鱼在宁静的海面上飞跃，我站在甲板上观赏这情景，祈求主把我预备妥当来迎接宣教工作，我的生命完全属于祂，愿祂使用我来荣耀祂。

当船停泊于雅加达，我百感交集。是的！我很兴奋，但一阵沉重的孤单和寂寞涌上心头。我们三人身在他乡，看椰树在和风下摇曳，景色和中国是多么的不同啊！

离开上海时，几位考虑周到的基督徒送给我五十美元，供我们最初的需用。那时候，金元券贬值得很厉害，美元兑换本地货币，可以得着颇高的兑换率。在船上，我得悉管辖印尼的荷兰人，对于外币兑换，监管得十分严格。我们带进这国家里的每一分钱都要申报。于是，我决定把那些美元放在不同的口袋里，有些更夹在我的圣经中。我心里想，也许我可以不必全数申报，但我的心却没有平安，主催逼我要完全诚实，信靠祂会供应我的需要。

当荷籍的海关官员问我有没有外国货币，我说：“有！”，然后从其中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张二十元面额的美钞。在他开始登记的时候，我说：“等一等！”，又从另一个口袋取出一张十元钞票，接着再从圣经中取出二十元，直到所有的钱都申报了。

海关官员笑着说：“从没见过这种事情。你一定是个老实人，而且会

是个很好的宣教士。”我心里平安，良心清洁。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课。

大多数的旅客有亲友热情地迎接他们，四周充满喜悦的气氛。但我看不见有人来接我们，心情为之下沉。我们被陌生的人群包围着，他们的衣着、语言、习俗都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口若悬河，我却不知他们在说什么。我不得不承认，离开故国这样遥远，实在令人沮丧。

抬头看看蓝天白云，这儿的天空与中国的并没有两样。我知道，无论天父差我到哪里去，都是天父的世界。于是我引述诗篇第一百二十一节的话：“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華而来……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1、8节）

///

刚念完，便听到背后有人说中国话：“欢迎你来到巴达维亚（一九四九年改名为雅加达）！”

来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宣教士——林证耶牧师，他伸出有力的手与我紧握。神差派人来了！这位阅历广博的神仆，早在日军占领以前，就在东婆罗洲的达雅克人当中服事。神没有撇下我们，总会让我们得着安慰和帮助！我对这陌生的国家和人民几乎一无所知，我需要了解这里的历史背景，才可以知道他们的问题，才能够向这里的人作见证和传福音，来因应他们属灵的需要。我怀疑，怎会有那么多中国人在印尼定居？我在这里的事奉真是跨文化的吗？这些人不是我的同胞吗？我的疑问这么多，却没有太多时间来研究这新文化。第一天开始，便投身其中，边做边学。

对我而言，每样东西都是新奇、陌生的。即使是太阳，也好像不一样。在中国，当时还是寒冷的三月天，印尼却酷热得可怕，尤其湿度更令人难耐。我们被安排在教会里居住，教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房间，是宿舍，也是聚会的地方。

第一个晚上，我遇到从没经历过的事情。在印尼，执事在教會的行政工作上，权力很大。荷兰殖民地政府统治印尼超过三百年，随之带来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传统，执事的地位比牧师还要高。按照荷兰传统，执

事犹如“执法官”，说实际些，执事是雇主，牧师是雇工。这是仿效印尼做生意的模式，商店的东主就是老板，是管钱的一家之长，在他之下是受薪的雇工。所以，教会的牧师是受薪的雇工，而执事是富有的雇主，职司发号施令。第一天晚上，教会便召开执事会，商讨我的生活津贴。

“牧师，你一个月需要多少钱过生活？”我回答说：“我刚到，不熟悉本地的情形，你们一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们就像老板一样地一直盘问我。

我告诉他们：“弟兄们，我来到印尼，是因为神的差遣。不是为了吃饭到印尼来，乃是为了神的工作在印尼吃饭。这是你们第一次商谈我的‘薪金’问题，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我知道，神要我在这里工作，即使你们不付我分文，我还是会留在这里。当时候来到，神要我离开时，就算你们给我许多钱，我也会顺服神，照样离开。我的老板是神，我们在金钱上的关系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你们把钱奉献给主，我从主那里领受它。如果我有任何需要，我不会问你们要，我会向神求，因为我知道谁是我的牧者。”

后来，我发现，刚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正陷于经济拮据的景况，收入很少。更糟的是我到任不到几个月，林牧师辞职另有高就，没有经验的我，便要独力承担整个工作的沉重责任。不过，虽然我们面临了许多困难，但感谢神，祂的工作渐渐兴旺，教会的属灵生命和出席率都奇妙地提升，很多人信主，奉献便自然增加，以致执事们在以后开会时讨论的，竟是如何运用余下的金钱。他们不断增加我的生活津贴，直到我要求他们停止。我向他们提议：“我们可以善用那笔钱来传福音。”于是，我们立刻设立两个新的布道所，从雅加达差派宣教士到西婆罗洲的山口洋去布道。不出几年后，我们开始建造另一间新堂。

///

作为一名宣教士，目的就是要将耶稣介绍给当地人。宣教士的功能是传道，传道的对象是人，言语是与人沟通的工具，言语若无法沟通，就不能把你所要告诉别人的讯息传达出去。所以到达印尼以后，我就竭尽所能地学印尼话。

印尼话和中国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尼话有好几种，爪哇的古语是最早的印尼话，现在已很少人能懂得，目前印尼的国语比较容易学，可以用英文字母、罗马拼音来学。当时教会并没有拨出一笔费用，为我聘请一位语文老师，也没有腾出一段时间，让我学习当地的语言。不像西方宣教士，他们有机会用一两年时间什么事都不做，集中精力学习语言。我只能从工作上学语言，一面尝试，一面改正。

在荷兰占领下，官方不注重印尼文，上层社会和政府机关只使用荷文，这是身分地位的标志。因此大部分华人，都想送他们的子女进入荷文或中文学校读书，而非印尼文学校。

到印尼的第二天，有一位老太太听说传道人从唐山来了，便带了许多自己做的糕点来看我，这是他们的礼节、习惯。她一到就叽哩咕噜地跟我讲了一大堆话，我一句也不懂，有一位青年曾到华语学校念过书，他每天早晨来，一方面教我讲印尼话，一方面帮忙我翻译。当老太太来时，这位青年人还没有到，我真是鸭子听雷——完全听不懂。

后来青年人来了，我赶紧请他先教我讲一句印尼话：“请等一等。”他说：“等一等叫‘Tunggu Sebentar’。”我是牢记每一个字音，尝试在脑海里把它们与中文字音扯上关系，好牢牢记住。我想起最接近的句子便是“中国日本打”。后来又有一个来看我，我先跟他说“中国日本打”，然后进去请翻译的青年人告诉他，我刚从中国来，不懂印尼话，那人回答说：“哪里，牧师刚才用印尼话跟我讲话呢！”大概我的发音听起来还蛮像的吧！这是我学的第一句印尼话。

我因为没有机会正式学印尼话，只有不断地与人交谈，使用想像力来补充新词汇，再混杂着印尼文来说话。学了一段长时间，才有足够能力用印尼话和人谈论神。刚到印尼时，虽然不能用印尼话和人交谈，但可以为当地人祷告。挣扎了不少日子之后，才渐渐掌握这陌生的新语言！虽然，我仍然不能正确读出某些音，不过，我决定努力学习。

我也在生活中学会一些单字，譬如，每天早晨起来，都可听到外面有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鬼（Kue）、鬼！”，弄半天才知道这是福建话“糕”的意思，晚上也有人叫卖一种叫作“沙嗲”的串烧烤肉，听起来像上海话讲的：“撒但（Sate）。”因此，早上吃“鬼”，晚上吃“撒但”，真是很有趣！

///

慢慢地，多听多讲，印尼话会得多了一些，六个月后，我已经敢在小型聚会中，用粗浅的印尼文讲道和带祷告聚会。我一直都在听电台的印尼文广播节目，虽然它的水准很高，尤其是新闻报告，但我仍尝试模仿那些语音。借着神的恩典和我的努力，逐渐可以掌握印尼话了。中国人说“脸皮要厚”，不应该因失败而感到尴尬或沮丧，所以我下定决心，不怕说错，无论怎样都大胆地说出来，朋友才会纠正错误，自己也才有进步。

有一次我去一个村庄讲道，按照规矩，得先知会村长，所以我就到村公所，告诉他们：“我要跟你们的首长讲话。”大家都知道印尼有许多椰子，椰子叫“Kelapa”，头（或主管）叫“Kepala”，我讲错了，说我要跟你们的“Kelapa”讲话，把他们搞得一头雾水，回我说：“我们这里没有椰子，如果你要买椰子，得去市场。”

我一直强调我不是要买“头”，我只是要跟你们的主管讲话，他们一脸不解：“你怎么可能跟椰子讲话呢？”

后来村长由办公室出来，我对与我争论的人说：“你说你们这里没有‘椰子’！这位就是大‘椰子’！我就是想和他说话哩！”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弄清楚了，村长说：“还好你是外国人，平常要是有人叫我‘椰子’，我是会翻脸的！”

另一次，当我向一群印尼基督徒讲道，我严肃地宣讲：“世上的苦难永不会停息。我们会常活在苦难当中。但是我们不应让苦难进入心里。让我举个例子：这个世界上的困难，正好像你们乡下有很多的‘猴子’。

（因为印尼乡下的确有猴子，所以听到这里他们还一副挺理解的样子。）如果有成群的‘猴子’在你的蚊帐外，你仍然能够安睡。不过，如果有一只‘猴子’进入你的蚊帐里，你就整晚都睡不着了。”（其实我想用的词语是“蚊子”“Nyamuk”，却说是“猴子”“Monyet”！）

我的会众恭敬地安坐着，有点狐疑地点头称是。我则毫不知情地继续谈到“猴子”如何在蚊帐里骚扰我们：“像昨天晚上，有一只猴子跑到我的蚊帐里，闹得我没法好好睡觉，直到我起来把它打死了，才能再睡。”

他们开始睁大眼睛，事后，有几个基督徒上前来问我：“牧师，那只死掉的‘猴子’现在在哪里呢？”

我耸耸肩，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洗洗手，事情便了结。”

“怎么可能呢？”他们惊诧地围在一起窃窃私语。

最后，有人猜到是我把两个词语弄混淆了，全笑得眼泪迸流。当他们知道牧师不是那种凶暴的人，夜间会在房里与猴子搏斗，甚至赤手空拳地打死几只，然后洗洗手便了事，总算松了一口气。

有些印尼话很奇怪，譬如：眼睛是“Mata”，水是“Air”，泪水叫作“Air Mata”，泉水则刚好相反是“Mata Air”。我原本要说：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他会流泪，结果变成：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冒出许多泉水来。他们一听就知道牧师又用错字了！

感谢神的恩典，虽然我印尼话讲不清楚，闹了很多笑话，但是我可以跟神沟通，祂明白我的心思意念。那时在教会的服事上虽有许多困难，但我可以每天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把智慧赏赐给我，好叫我知道如何帮助印尼的教会。虽然神用我我只会用洋泾的印尼话讲道，但这卑微的人，祂自己在人心里工作，使教会逐渐增长，由三四十人，到两三百人，以后到五六百人，神的恩典实在是奇妙！

第 11 章

印尼风情

印尼人特别爱吃辣椒，
我也天生爱吃辣椒，愈辣愈好。
于是，抓起一个生的小辣椒，一口吃下去，
立刻感到有座火山在我口里爆发，烈焰直冲头上！
我的眼睛充满泪水，耳朵里充塞着雷轰之声。
冒险尝了一次这道地的食品，
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天生皮肤黝黑，在印尼颇有宾至如归之感。虽然我不是“印尼制造”的，但我相信，神造我是为了到印尼服事。自从一九四九年起，我便在这个国家的土生华人当中事奉。在某些方面，他们对我来说和外国人无异，我知道我确实在参与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很多华人看起来很像印尼人，从名字也很难分辨谁是华人，因为政府规定中国人必须改用印尼人的名字，因此，只有真正的印尼人才分辨得出谁是华裔。

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有那么多华人？在一亿三千八百万人口中（印尼是亚洲人口第三多的国家），有三百八十万是华人。有些是大约二百年前，来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移民所留下的后代，有的还更早，他们在西加里曼丹岛和邦加岛等地组成了典型的华人社区。

过去一百年间，大多数华人在两个特别时期来到印尼。第一个时期

是一八六〇到一八九〇年间，那时中国劳工涌至北苏门答腊的橡胶园，和其他出产锡的岛上工作。一八〇〇年代中叶，中国商人定居各岛，使印尼的华人达到二十五万之多。第二个时期来的人最多，是在一九二〇年之后，因为荷兰政府解除了中国移民的限制。到一九三〇年，已有一百二十五万华人，华人的数目从那时起

印尼是由三千多个岛屿所组成的岛国，横跨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像是蓝色大海中的一条翡翠项链。近一亿左右的人口都挤在爪哇岛上，其余的大岛如婆罗洲（已改称为加里曼丹、分南北二部）、苏门答腊、新奇内亚（现称为八巴亚）、西里比斯等，有度假胜地的堂皇，却也有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岛，只供渔民作息。

///

印尼物产丰富，是一个天富之国，矿产有石油、锡，特别在有些岛上出产大量的锡，亦有少许的金和金刚钻、宝石。

农产方面，因为气候适宜，加上火山灰肥沃，稻米一年可有三次收成，糖的产量也很多。像其他热带国家一样，印尼出产许多种水果：香蕉、木瓜、榴梿、红毛丹、人参果（Sawo，类似奇异果）、还有味道很特别的杜果（Dugu），冷一点的地方也有橘子、苹果、桂圆。婆罗洲还产一种小小酸酸的水果，得用许多糖去腌渍才好吃。印尼人对榴梿喜爱的程度，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我开始时有点畏惧它的味道，后来就非常喜爱。木瓜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

林产是印尼经济的大宗来源，“加帝木”的木材可作优质的家具；橡胶则在工业上、军事上都有许多用处；可榨椰油的椰林随处可见；同样可制油的棕树林也不少。印尼还出产一种丁香烟，中国人不太喜欢，欧洲人和印尼人抽这种烟的比较多。海产是人民赖以生主要来源，大小鱼类更是不可胜数。

因物产丰富，印尼人民不需要过分勤劳便可度日。他们衣着简单，因为天气温和，终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除了火山外，台风、海啸，亦是难得一见，龙卷风之类简直闻所未闻，虽然卫生条件较差，不过很少听到瘟疫。但是蚊子过多，所以仍有人患疟疾。

有些印尼食品与中国食品分别很大，而且印尼人在家不用筷子、刀叉或汤匙，他们只用洗净的手抓食物吃，在印尼住久的华人也是如此。有位印尼朋友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我必须跟他们一样用手抓食物吃。那天，我决定要吃下摆在我面前的任何东西，表示我何等欣赏他们的食物。

印尼人特别爱吃辣椒，我也天生爱吃辣椒，愈辣愈好。于是，对其中一小碟生辣椒，根本不放在眼里，抓起一个生的小辣椒，一口吃下去，立刻感到有座火山在我口里爆发，烈焰直冲头上！我的眼睛充满泪水，涌流到两颊，耳朵里充塞着雷轰之声。连忙抓起一杯冰水，想把火熄灭，否则一定当场辣死！我初尝这道地的食品，确实令人难忘！冒险尝了一次，以后再也不敢吃生辣椒了。

跟中国人一样，印尼人也吃许多种“特别”的食物。有一次我去苏门答腊岛讲道，他们问我要不要吃猴子？有人专养猴子、卖猴肉。我说我从来没吃过猴肉，他们就去买来炒给我吃，其实味道还不错，文田就不敢吃。除了猴子，他们也吃蛇、狗肉和一种吃水果的大蝙蝠——果蝠。根据当地人说，蝙蝠翼十分美味，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怕，我还是试吃了一点，不过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古怪，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领教了！另外有一种蜥蜴，印尼人常烤来吃，味道倒是不错，很像鸡肉。在我们圣经学校后面的河里有不少鳖（甲鱼），印尼人不吃甲鱼，但是他们会去抓来卖给华人。

///

印尼的原住民有四十多种，人民性情温和。大多数印尼人讲马来话，各岛上也有一些少数族群的方言，不过印尼话到处可以通行。我初到印尼时，荷兰仍是统治者，那时社会上分成三种人：殖民主义者（荷兰人）高高在上，下层是印尼土人，中国人则夹在中间。有人甚至这样形容：荷兰人吃剩的，中国人吃；中国人吃剩的，才轮得到印尼人吃，所以印尼人十分仇华。荷兰人不但在政治上握有主权，印尼的矿产、林产、农产的销售，也都在荷兰人的掌控之下。商业上，中国人和荷兰人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中国人倚靠荷兰人的势力作生意维生；荷兰人则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办事、作仲介商，自己只负责管理。

荷兰人在管理人民的事上颇有脑筋。他们选一些当地有名望的人，给他们“马腰”（Mayor）的封号，或职权小一点的“甲必丹”（Captain）封号，给他们权力去治理当地人，他们称作“以华治华”。有一个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大家族，他们的祖父就曾在荷兰人统治的时代当过马腰，他们的住家就是完全中国式的大门户，称为“马腰府”。

由于印尼受好几种文化的薰陶及影响，所以印尼语中也掺杂了许多外来语。葡萄牙曾统治印尼约三百年，它也曾曾在荷兰的统治下度过一段岁月，因此印尼话中掺有许多葡萄牙语及荷兰话；加上许多中国人移居至此，所以他们也用许多中国话，不过多数是闽南语，其次是客家话，粤语排第三。近几年来，因为跟西方国家接触多了，英语也融入，成为印尼语言的一部分。

第 12 章

印尼华侨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作美国人、
荷兰人，却不愿作印尼人？
我们应该要爱印尼本地的人，
不能单单享受神给这块土地的恩惠、
只顾自己的利益，
而不回报给这个社会、不顾念当地人的需要。
我们不能一味抱怨印尼人排华，而不反省自己。

印尼的华侨社会是极其保守的，他们固守祖宗传下来的旧有习俗，可能比中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农历新年的庆祝是一年的大事，正月十五的Capgome（上灯节，也就是元宵节）、八月的中秋节等等，更是不在话下，提灯笼、吃中秋月饼，非常热闹。过节的时候，吃汤圆、包粽子，新年吃加了椰汁的糖年糕，加上荷兰的西点、用牛油加糖及很多蛋黄和面拌成的千层糕。

在荷兰人统治的时期，印尼人会趁中国节期到中国人家里讨钱，直到独立后，这种行为才被禁止。当地信徒对传道人非常关心，逢年过节都会送一大堆食物，营养极为丰富。趁新鲜时，我就充当圣诞老人，挨家挨户地与需要的人家分享。

华侨分为老华侨与新华侨，他们的穿着、言语、习惯都不同，特别是言语。“新客”主要是说国语的新移民，生活以中国文化为主导；“老华侨”大都以福建人为主，也有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广州人。所谓的老华侨，大都在战前就到印尼落籍，三四代甚至十几代都住在印尼，可说是土生土长，他们说印尼话，生活已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既非完全中国化，亦非完全印尼化。有的与原住民通婚，子女则与印尼人无异，除了保持中国姓以外，生活起居与当地人并无分别。

福建人大概是最早到印尼的中国人，为数最多，多集中在爪哇岛，他们主要做米、布和糖的生意，在印尼有很好的根基；广东人大约有三类：

第一类，普通的广东人被称为广府人，他们经营铁工厂，作铁匠、木匠的多。第二类，客家人吃苦耐劳，特别是客家妇人，非常能干。客家人以经营杂货生意为主，在穷乡僻壤也开小杂货店，叫“亚弄店”，也有不少开家庭式的小工厂。在西加里曼丹岛的客家人，以务农为业，他们结合在一起，组成独特的经济制度，称为“公司”，是矿工和农人的自治组织，这使他们与其他当地人士疏离，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荷兰政府才禁止他们继续采用此模式。第三类是海南人，因为他们的料理有特色，所以许多人开饭店。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很类似。

江浙人大多是战后才到印尼的，他们开工厂、作进出口生意。大多数的福清人（福建省的一个县）非常有商业脑筋，我刚到印尼的时候，三轮车业大都由他们经营，他们出租车子，让印尼人出劳力工作。原本在印尼只有荷兰的几家大银行，一度印尼政府忽然开放银行执照的申请，许多福清人便进入银行界，他们自己当老板，雇请印尼人在柜台工作。那一段时期银行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都是。福清人在生意上十分干练，好几位印尼的大富翁都是福清人。

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华人彼此之间都非常亲密，他们看见长一辈的男人，就用闽南话称呼“Mpe”（伯父）、“Encek”（叔父），女的就称呼“Enjen”（阿婶），同辈的就叫“Engko”（阿哥）、“Enci”（阿姐），把中国人都看成一家人似的那么亲。

印尼的华人，大部分是在大城里商业兴盛之处活动，华人刻苦耐劳、工作勤奋、有创业的精神，虽在穷乡僻壤，亦有华人经商营业，因

此多数华人生活富足。但在印尼人眼里，他们看中国人到印尼时什么也没带来，两袖清风，后来却有高级轿车坐，有豪华的房子住，像荷兰人一样，因此排华之风兴起如云涌，难以遏止。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在讲道中呼吁中国信徒要思想、省察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作美国人、荷兰人，却不愿作印尼人？我们应该要爱印尼本地的人，不能单单享受神给这块土地的恩惠、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回报给这个社会、不顾念当地人的需要。我们不能一味抱怨印尼人排华，而不反省自己。

中国人无论迁移到那里，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中文教育，所以每个城里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华校，甚至大城市有两三间华校也不稀奇，像雅加达就有三间。有的学校单是小学或中学，也有较大规模的，中小学都有。不过华校都没有大学课程，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回国升学，有的去台湾，有的回中国大陆。当地华校也分左派、右派，有的每年十月一日升五星旗，有的十月十日升青天白日旗，印尼政府对这个没有什么限制，不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较得势，升五星旗的华校就多起来了。

有一段时间，印尼有很激烈的排华运动，许多人就变卖家产回到中国，他们叫“转唐山”，不过后来听说那些人的情况并不是太好。我在香港的时候，还遇到一些再由中国出来的家庭，由于离开印尼时，他们必须签字表明自己不再回印尼，才能带很多东西去中国，因此这些人无法回去，只得转往其他国家。

因为到处都有中文学校，青年人大多会讲中国话，所以在中国教会用福建话、广东话、国语证道完全不成问题，自从印尼关闭所有的华侨学校，所有的华侨子弟都要入印尼语学校，教会只得随大势而变，改用印尼语证道。

///

初到印尼时，我常在清晨被一阵阵的鼓声，伴着起伏有韵的男高音惊醒，同工告诉我这是邻近的回教会堂中发出来的清晨祈祷声，催促居民到会堂中向真主祈祷，大多数虔诚的回教徒都会奔向会堂去洗脚、洗嘴向真主顶礼。印尼是一个以回教徒为主的国家，有75%以上是回教徒，岛上到处可见头戴白帽的印尼人，这表明他们已经去过麦加朝圣，

完成他一生的心愿，每逢礼拜五一定要去回教寺或临近的会堂去朝拜。当时通称大的为回教寺，小型建筑比较简单的为会堂。

回教徒不吃猪肉，他们视猪、狗为不洁的动物，不愿接近。在他们的菜肴中，也绝对不用猪肉或猪油。印尼亦有佛教和印度教，不过大多数在峇厘岛。在苏门答腊有些原住民是基督徒，他们的歌声很雄壮。印尼除了回教党参政外，也有基督教党及天主教党，不过势力较弱。华人大都是佛教徒，有时在路旁可以见到中国式的庙宇，偶然也有和尚及尼姑出现。华侨中基督徒并不多，不过也有教会建造了宏伟的教堂，聚会的人数上千。

第 13 章

印尼事工

我们宣教的对象，是印尼人，
还有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
我们的目标，是训练本地基督徒成为宣教士，
不单向他们本土的人传福音，
也向他们居住地区以外的人宣教。

从我第一天踏上宣教工场，就有很多事等着要学习，必须一点一点去寻找。不断出现的新政府，常使事情变得更混乱。还记得刚到印尼时，正是多事之秋，在教会中，执事与传道人之间时有矛盾；而印尼这个国家正在争取独立。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虽然投降，可是他们却在印尼放了一把火，导演了印尼独立的战争。他们鼓励印尼民族领袖向荷兰争取独立，把用剩的武器移交给印尼革命军，那时革命军以中爪哇为基地，荷军则在大城市驻防，但不时到附近乡镇去扫荡。

我有时会到雅加达附近的一个避暑胜地苏加波米（Sukabumi）去讲道，此城离雅加达约有三小时的火车路程，车上常见到荷枪实弹的荷军随车护卫，以防印尼军袭击。有一次火车经过一个山谷，忽闻枪声大作，结果一名荷兰军人挂彩，好多的乘客都在求他们的神保命，火车加速，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总算平安脱险，抵达目的地。

然而，无论政局如何复杂，人的属灵需要仍是一样的。无论他们戴上什么样的政治标签，或外表看起来怎样，他们的心灵都一样。神呼召

我做的工，就是满足他们属灵的需要。

在印尼展开宣教工作时，我所面对的宗教情况，跟种族的问题同样复杂。我鼓励往另一个国家宣教的基督徒，首先要熟悉当地的宗教情况，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还要尽可能遵守当地的法律。

///

印尼人大部分是回教徒，但印尼却不是一个回教国家。如果是的话，印尼就会制定回教法律要求人民遵守，那么现有的宽容宗教尺度，就不复存在了。感谢神，基督教在印尼仍被认可，仍在印尼政府的默许下存在。不过，这敏感的情况随时会改变。

印尼怎会有那么多回教徒呢？早在十四世纪起，回教的传教士已开始在东印度群岛传教。到十八世纪，当地大部分的居民都成了回教徒。

一六〇〇年代起，荷兰便开始在爪哇和其他岛屿殖民，并且取得统治权，直到一九四〇年代日本入侵为止。荷兰人将荷兰改革宗教会模式的基督教带入当地，这原本是为那里的欧洲人设立的，至今仍是印尼最大的基督教宗派。

日据时期，印尼的民族主义日渐茁壮，日本投降后，印尼随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独立。这次独立，带给印尼公民一些重要的权利，包括宗教自由在内。人民可以自由信奉回教、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人民享有人权，所有人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都被尊重；社会公正，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民主，人人都有权投票选举政府；团结，相信人民只有在民族主义下团结，印尼才会成为强国。这件宣言称为“班结西拉”。

一九六五年底，印尼经历军事政变，使成立的政府受到几乎致命的一击。共产党势力庞大，渗入许多政府高层中，企图在苏卡诺总统执政期间控制整个国家。这计谋差一点成功，但在一夜之间，局势完全倒转，新政府监禁和处决了很多。

新政府想出一个方法来辨别谁是“敌人”。由于共产党一向以无神论著称，你不会在任何信神的群体中找到他们。因此，政府规定每个公民都要信神，就是和上述四个认可宗教中的一个取得正式联系。

这引致原来没有所属宗教的人，纷纷寻求“安全”保护，加入宗教的行列，好跟共产党划清界线。所有宗教的信徒人数大增，尤以基督教为最。当然，有些人只是有名无实的信徒，但许多是真正归向神的，这使教会混杂了一些连基督教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同时，借着圣灵的工作，千千万万真正的信徒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十五年里，基督徒族群大大增长。

由于新信徒大幅增加，教会没有足够受过训练的牧者和基督教工作者，去牧养、培训每一个新加入教会的人。所以，平信徒开始在教会生活和对外见证上，担当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神赐福那次平信徒运动，叫为数极多的人，不但对基督教感兴趣，而且真正地归向神。

基督徒热心领人归主，似乎令政府感到担忧，于是定下规则，限制宗教团体的一些活动，以及外国对那些团体的支援。其中的禁令包括：限制外国宣教士参与宗教工作，政府要求，每个宗教团体签署那个决定之后，要开始推行训练计划，用六个月时间装备印尼人，并在两年内完成计划。这法令带来了限制，也带来了机会，因为它加速了基督教会的本土化，促成教会健康成长，鼓励信徒向外作见证，而不再倚赖外国宣教士。

感谢神，让我在一九五〇年代与那些我极尊敬的印尼领袖们和谐共处，他们很多是我主内的弟兄姐妹。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欣赏、认可并接受我们身处任何国家时，神所交付的责任。我们应与所有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忠于所在的国家，并且帮助它建立。由于中国人习惯个人主义的思想，所以常不肯参与所在国的事务。不过，时代已经改变，许多华人适应得很好，他们以更健康和务实的态度，投入居住的国家里。

感谢神，祂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宣教士，只凭对祂单纯的信心，在过去许多年的事奉中荣耀祂。我们不单建立了本地的工作，还成立了福音站。尝试使我们的见证繁衍下去。一开始便强调宣教使命，不必等到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成熟的程度和经验时才展开。神赐福我们付出的努力，首先差派宣教士到婆罗洲。

婆罗洲是一个很大的岛，现在叫加里曼丹（Kalimantan）。北婆罗洲由英国政府管辖，所以与印尼政府无关。西婆罗洲原先由荷兰统治，后来由印尼政府收回。西婆罗洲面积很大，是个很富裕的岛，土壤肥沃，落叶成泥，是天然的肥料。此地有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客家人和潮州人，曾有一度客家人多到在当地用客家话可以通行无阻。听说曾有一个中国人在西婆罗洲跟荷兰人打仗，闹独立，而且成立自己的“国家”呢！

我们教会因为人数渐渐增加，神开路，感动一位姐妹愿意到西婆罗洲做拓荒的工作，经过祷告后，我们差派她到一个地方叫山口洋，在那里开始宣教的工作。这位姐妹非常热心，做事也很勤劳，工作十分有果效。有一位原本吃素拜佛的长者，因为听了这位姐妹所传的福音信了主，后来成为非常热心的基督徒。

我第一次去婆罗洲，就是因为那个教会买了一幢民房，将它改建成聚会的教堂，要举行开堂奉献礼拜。我先由雅加达搭水上飞机到坤甸，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水上飞机，机场就在河上，感觉很新奇。然后再由坤甸搭两小时的汽车到山口洋。山口洋在内陆，以客家人为多数，坤甸则是以潮州人为主，到坤甸要讲潮州话。

还记得第一次在坤甸参加聚会，牧师讲潮州话，潮州话和闽南话有点类似，不过我还是鸭子听雷——完全听不懂。牧师在领诗时，先讲唱第几首，然后说：“做不来。”我奇怪他为何说做不来？问了旁人才知道所谓的“做不来”（作伙来）是“一起来”的意思，我说：“一起来就会做得来了，不会做不来。”

在山口洋参加开堂礼拜，看见神实在恩待那里的工作。不过，神工作，撒但也不松手。献堂三个月后，我们在雅加达接到电话，说那里的宣教士被谋害了！于是，我和一位当地内地会的宣教士、遇害宣教士的侄女，以及一位陪伴她的同学，连夜赶去婆罗洲的山口洋。感谢神的保守，虽然半夜由坤甸开车去山口洋十分危险，有些路段没有桥，车要由河上开过去，我们一行四人还是平安地到达山口洋参加丧礼。这位宣教士之所以被杀，据说是因为前两天有人由新加坡邮寄了一包包的单张给她，她到邮局去领的时候，当地的工人以为是一包包的钱，就杀了她，想抢她的钱。然而，神真是赐福了这位姐妹在婆罗洲所事奉的几个教会。

后来，我又有机会跟四五十个青年人一起到婆罗洲更内陆的几个教

会，除了水上飞机、汽车，还搭巴士跟乘坐机车，才能到这些偏远的地方。我们先去一个在大河旁的教会参加献堂的聚会。可能因为交通及做生意的关系，许多城都由河边发展建立起来。我在乘机车到更内陆的布道所讲道的时候，不但是一路颠颠簸簸十分危险，小腿还被排气管烫到。

我们宣教的对象，是印尼人，还有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我们的目标，是训练本地基督徒成为宣教士，不单向他们本土的人传福音，也向他们居住地区以外的人宣教。一位来自苏门答腊的印尼领袖谭文南先生（A. M. Tanbunnan），是印尼国会基督教党的主席，在一九五三年时，他帮助我们向印尼政府申请一块土地，兴建学校。

神带领我们找到合适的人，使我们可免除所有的繁杂手续。宣教训练学院在一九五四年开办，第一个学期，我们招收了十多个热心奉献的学生，其中一半是印尼人，另一半是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

///

印尼有另一个重要的教育需要。华裔学生若要接受高等教育，必须到中国去修读，但他们喜欢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所以，我们在雅加达成立了一所华裔学生的大学。谭文南先生建议将那所大学命名为迦玛列大学（Gamaliel University），因为迦玛列是使徒保罗的老师。这大学没有自己的校园，必须和宣教训练学院共用部分校舍。因此，在政府看来，迦玛列大学似乎与我们的宣教训练学院连在一起。后来政治情况改变，政府便把两所学院都关闭。不过，感谢主，二十年后，即一九七九年夏天，政府将宣教训练学院在关键时刻归还给教会。

印尼的天气极其炎热、潮湿，我必须每天洗两三次澡。即使晚上坐下来读书，也会汗流浹背，湿透衣服。在印尼，洗澡其实是指淋浴，但又不像西方的现代化淋浴间，有别致的水龙头可以调节水的流量和温度。我们用一个长柄的杓子，从桶里舀水淋在头上，但，水流到脚上的时候，本来是冷的水，都因体温而变热了。要想凉快一点，得不断地浇淋，不过，那也只是暂时凉快而已。

我在那极其酷热的环境里事奉七年后，健康逐渐受损，无法入睡，无论天气炎热与否，汗水从早到晚都使我浑身湿透，垂垂欲毙。这时赵

世光牧师从香港来到印尼，使我事奉的担子暂释，可以转换一下环境。他鼓励我利用这段时间，到欧洲或美国短期进修，我个人选择到瑞士读书，但当我祷告的时候，神清楚地指示我到美国去。我那时还不知道神领我离开印尼，是要保护我和我的家人，免受牢狱之苦，甚至杀身之祸。在政治环境愈来愈黑暗和险恶之时，神至高的主权保守了我，好让我在未来的岁月中仍能事奉祂。



1



2

1. 与印尼华侨领袖及政府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
2. 差派宣教士。



3. 在印尼服事的几年中，我们添了四个宝贝儿女。
4. 林证耶牧师（Jason Linn），是1920年代后期中国最早派往印尼的跨文化传教士之一，前往东婆罗洲工作，服务于达雅族人民。



5. 在印尼服事。

6. 椰城灵粮堂分堂的新堂落成。





7. 神使用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宣教士，不单建立了本地的工作，还成立了福音站。



8. 浸礼前合影。

9. 雅加达新堂落成。

第四篇

海外宣教 II

【留美生涯】

我承受了李玛丽女士的遗爱，
巴不得穿了这件外袍的人，
里面能蕴藏她那样仁慈、谦恭、柔顺的性情；
刚毅、正直、不挠的精神；
以及她爱神爱人的心。

第 14 章

中美差异

一群友善的美国基督徒把我团团围住，
他们十分热情、亲切，但看待我则犹如
观赏一只企鹅或某些奇异的动物。
中国对他们来说，是太神秘、太遥远了。
小孩子吃吃地笑着说：
“我们从未摸过一个中国佬啊！”

神带领我到美国宾州一所小型的圣经学院读神学。虽然我可以选择其他国家的圣经学校，但是在一间较小型的学校，只有四十多个学生，可以让我有更好的机会，学习同样规模的学校是如何运作的，这对我回印尼去协助宣教的训练学校很有裨益。在小型的学院中生活，也比较容易适应。我负笈宾州亚伦镇（Allentown）圣经学院，有很多学习机会，老师、同学们都很帮助我、支持我。如果在大型的学校里，芸芸数百或数千学生中，我就可能会迷失了。

抵校后不久，同学们邀我和他们一起参加福音队，去到车程一小时外的乡村教会布道。当年轻的同学请我“露一手”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马上看出我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除了种族和语言之隔，还有代沟。这些互称“毛头”的小伙子，几乎等于高中生，小的十八九岁，大的二十出头，全部未婚。我却是个虚度三十一载、养育五个孩子的父亲、牧会足足十年的传道人。

///

至于文化差异，则更为惊人。我是在一个比以往更大的跨文化环境里，学习另一种极其复杂的语言。从教科书上学到的英语，和这些小伙子的口语相比，差别实不可以道里计。如果中国人说的是“京片子”，那么我的小老美同学说的，可是“俚语之语”喽！走的时候，他们会喊一声“上路了（Hit the road）！”等到倦游归来，他们会呻吟道：“睡大头觉吧（Hit the sack）！”

参加聚会时，我很享受和他们一起唱诗的时间，因为我熟悉那些音调，但我能够明白的英文歌词却只有一半。忽然，我听见牧师说：“现在，我们请周主培作见证。”我吓呆了，急出一身冷汗。

对一个外国学生而言，读英文或用英文写作，都可以花时间去修正错误或调整思路，但演说即席的，人人都立时听见你所犯的错误！而我的问题，是必须先用熟悉的中文句子结构和文法，去思想我要说的话，然后在脑海里翻译成英文，才能够用英文把它说出来。当我脑子里还存着中文的文法和结构，口里用英文把话说出来时，便常常会说错。何况我根本没有准备，怎能立刻用英语去作见证？

我的新朋友全都点头向我微笑，鼓励我，在我颤抖、挣扎的时候，等候着我作见证。我想起小时候，朋友把我推进深水里而我不懂游泳的那个光景！当时，我认为自己快要淹死了。这次，更肯定自己一定会淹死！于是我用中文向神发出紧急求救讯号。我知道，祂完全听得懂中文。之后，我就一头潜入水中。

记不起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我曾说耶稣很奇妙，在祂没有东方或西方之分，而且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是合一的，都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等等。感谢神，事情终于过去了，我却没有“淹死”！

聚会以后，我们在教会地下室享用茶点，这对我来说是个新的习惯。一位友善的美国女士，拿着一个大咖啡壶到处转，给我倒了一杯，又给了我一块蛋糕。我吃了他们精制的蛋糕，喝光了杯中的咖啡。她又来到我身旁：“‘不要’再来一杯吗？”

我喝够了，所以回答：“是的。”她开始倒另一杯咖啡给我。

我退后说：“啊！不！”我又肯定地说：“我不想再喝了！”

“但是你刚刚说‘是’。”她感到奇怪。

“我说‘是’，是在回答你的问题，正如我们用中文说：‘是的，我不要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仍然一直犯同样的毛病。以后才知道，在美国，人们不期望你回答那问题的内容，只要你说出对那问题所做的决定。

聚会结束以前，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件小礼物，我得到的是一枝铅笔，上面印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13节）我把这句英语记在心中，并充分地应用在我的处境里。这个应许就像块锚一般，成为我在美国读书那段日子里的期盼和希望。

要练一口过得去的英文，实在比学习印尼文困难得多。英文的标准既高、文法又复杂，要朗朗上口几乎不可能。同时，我是个年纪较大的学生，还必须努力追赶功课，才赶得上那些从小说英语、年轻又聪明的同学。很多时候，我感到寂寞灰心，极其想念与我相隔万里的家人，同时怀念在印尼的教会及弟兄姐妹，对于自己能不能完成学业，感到毫无把握。

离开印尼的时候，我已经有五个孩子了。现在相隔遥远，文田身处异国，面对战争的危险，又要全力照顾子女。我不能分享孩子们童年的喜乐，也不能分担妻子的劳苦。但是我在印尼的教会，在我出国读书期间，仍在经济上支持我的家人，并负责照顾他们，付给家中的生活费和以前支付的薪水完全一样，这远超乎任何义务，实在是因为他们爱主、爱我们，所由衷发出的行动。我为恩主对家人的供应极其感恩！

最初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人们常问我修什么科目。我答道：“第一个学期就选修十四个小时的希腊文。”“哇！你一定是很聪明了！”他们惊奇地说。其实不是那回事。正如我的年轻朋友们，常开玩笑地用美国俚语说：“这对我只是希腊文”一样；这十四小时的课对我而言，就是希腊文——一点都听不懂！

学校开课后不久，我面对新入学的一个传统考验，就是高年级学生强加于低年级生——尤其是新生的一些骚扰行为。高年级学生会问新生一些刁钻的问题，并要求他们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像是硬要穿上古怪的装束、做一些疯狂的事、替他们捧书、服侍他们等等。

对我这个牧师和宣教士来说，这种事情不但古怪尴尬，简直是浪费时间。我勉强与那些年轻人一起参与这些无聊的事情，实在难受。虽然有心入境随俗，但是当事情愈来愈糟时，我真想休学一段时间，等那些活动结束后再说。我把感受告诉校长，他立刻明白我的看法，很仁慈地体谅我。结果，学校顾及我的情况，想使我在学校有宾至如归之感，易于适应新环境，就取消了那一年的恶作剧活动。对那些失去个中乐趣的学生，我感到抱歉，但却不认为他们真的会怀念那些恶行。

系里有一位教授对我颇感兴趣，因而邀请我到他家共进晚餐。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我的学习、宣教事奉、家庭，以及未来的计划等。由于我告诉他，我在印尼是自己驾车的，所以在回校途中，他让我驾驶他那辆崭新的克莱斯勒轿车。在宾州的泥土路上驾车，还算应付自如，但当我开上高速公路，很自然地像在印尼一样靠左行驶时，这可把我的教授吓出一身冷汗！

///

我对美国的现代化商店陈列了那么多的货品，叹为观止。到达美国的那一天，是从波士顿港进入的，我搭乘的货轮，途经锡兰、衣索比亚、埃及、红海、地中海和其他港口。上岸的时候，一位中国基督徒朋友来接我，并邀请我到市中心的中国餐馆去吃饭。因为经过海上长途旅程之后，我需要购买一些日用品，就要求先在百货公司停一停。

“要买这些东西，我带你到药房去吧。”我以为他说的药房，是指我们在亚洲专卖药品或中药材的店铺，或者更糟的是卖麻醉品的地方。因为有人曾警告我，美国人食用禁药的风气很盛，所以我表示反对：“我不想买药品！”

他随即解释：“在这国家里，你可以从药房买到任何东西。要不要试一下美国的冰淇淋？”

“好啊！”我同意了。我们就走进一间药房，坐在柜台旁品尝冰淇淋。那地方就像我在印尼所见的大型百货公司，除了药品外，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

“药品呢？”我问道。

“就在后面靠墙处。”他指着并解释说，在美国，处方药品、维他命等都算作药品。

原来，在美国所谓的药房，其实是小型的百货商店。我很高兴在药房里买到我需要的东西，也顺便在那里买了一些明信片寄回印尼。在寄给家人的明信片上，我写着：“你们相信吗？在美国，竟然可以在药房里吃冰淇淋！”几个星期后，我收到家人充满疑惑的回覆：“他们在药房里卖的是什么冰淇淋？是‘药用冰淇淋’吗？你是不是生病了？”

美国药房已经不单单卖药，它现在贩售的是各种不同的货品。我希望美国的教会别像药房一样，各种东西都供应，除了福音之外，或是把福音放在你看不见、找不到的地方。

抵美不久，一位牧师从煤矿区打电话到学校来给我：“你可不可以到我们的教会，领主日崇拜聚会？”“好的，谢谢你，”我回答：“但我不知道怎样到你的教会去。”

“那正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们有一位会友是驾驶运煤车的，他会在星期六下午经过你的学校，可以在学校‘抬起’你（Pick you up.‘把你载上车。’），来到我们这里便把你‘丢下’车（Drop you off.‘让你下车。’）。”

他一定留意到我有点犹疑。就问我：“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喜欢乘坐运煤车吗？”“啊，不打紧。我只是奇怪，他怎样‘抬起我’，我更担心他怎么把我‘丢下车’呢？你可不可以请他先把货车停下来，然后才让我下车？”我的困惑让他捧腹大笑。

当我到达他的教会，一群友善的美国基督徒把我团团围住。他们十分热情、亲切，但看待我则犹如观赏一只企鹅或某些奇异的动物一般。中国对他们来说，是太神秘、太遥远了。他们多半从未在真实生活中见过一个中国人，只是从漫画和电影中，对中国人的滑稽模样留下些许印象。

“让我跟你握握手！”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士说：“你是我所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

小孩子都想摸摸我，“我们从未摸过一个中国佬啊！”他们吃吃地笑

着说。

还有人说：“我见过惟一的中国佬，就是铁路旁洗衣店里姓黄的工人——‘没带收据，没衬衫！’（No ticket, no shirt）”他们笑道。

他们都是善良、单纯的人，除宾州的山谷外，很少和外界接触，因此不知道“中国佬”一词是从中国移民被送到美国当铁路苦工起，一个贬低中华民族的词语。

第 15 章

暗室之后

人前人后，我多次听蔡小姐说，卧病在床几十年，

她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什么？”

只问：“你要我做什么？”

她真是一位对主忠心又顺命的使女，

是以爱心坚持不懈传福音的好榜样。

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来探望她，

无论病情如何令她不适，她都很少拒绝。

我在亚伦镇读书的时候，曾经拜访一位著名的中国女士蔡苏娟，这次历史性的拜访说来很奇妙！学校系里有两位教授，其中，菲利普夫妇（Mr. and Mrs. John Phillips），曾是苏丹内地会（Sudan Interior Mission）的宣教士。他们很爱中国人，并且和蔡苏娟结为挚友。有一天，他们提议说：“主培，你想到‘乐园’去吗？”身为基督徒，我立刻回答：“当然想。”

“本周末怎样？”我犹疑了一下，因为我还想为主多做些事，不想这么快就升上“乐园”。他紧接着说：“只需一个半小时便到达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所指的，是地球上某个地方叫做 Paradise，而不是天上的“乐园”。

“好的！”我立刻同意。

以前在上海虹口教会工作的时候，因为离开江湾中华神学院很近，

听说有几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女在那边授课，就去旁听，因此听过蔡苏娟小姐的名字，后来在该学院所出版的《半夜呼声》上，读到她那本脍炙人口的自传《暗室之后》的连载，就更熟悉她的故事。《暗室之后》描述蔡苏娟在上个世纪交替之初那几十年间，在中国为基督所作的见证。这书后来翻译成包括盲人点字在内的三十四种语文，以不同形式出版，还拍成电影。我在印尼的时候，也曾读过她的故事。

///

抵达宾州兰卡斯特（Lancaster County）的乐园镇（Paradise）后，我们将车驶离三十号高速公路，转入一条私家车道，经过一片草地，看见一个黑白两色、中英对照的大型告示牌——“信耶稣得救”竖立在草地上，里头一间棕色灰泥大屋，是李曼（Leaman）家族好几代的祖产。敲门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这个第一次探访、令人怀念、非常宝贵的地方，后来竟陆续来了好几百次呢！

欢迎我们进入屋里的，是一位女宣教士李玛丽女士（Mary A. Leaman，蔡苏娟女士书中称为“李曼”女士），人人称她“中国马利亚”（即蔡苏娟所说“中国玛丽”）。李玛丽出自一个著名的宣教士世家，她的父亲在一八七四年离开这屋子，告别幽静的乐园村，成为第一位长老会宣教士，在中国南京买地，建立基督教工作，那是在我全家听到基督之前很久的事了，所以见了她，令我肃然起敬。

李玛丽生于中国，年轻时，在早期宣教士建立的明德女子学校当教师。出身名门望族的蔡苏娟那时只有十多岁，她央求当时担任江苏省抚台的父亲，让她到那间学校去修读英文和音乐，李玛丽和蔡苏娟一生不渝的友谊，就在那时候建立。李玛丽比蔡苏娟大十岁，当蔡苏娟在一九〇七年决定放弃佛教、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她们的友谊就开始有增无减。

我在乐园镇和她们见面的时候，她们都已年逾七十。从一九一四年起，她们便一同事奉主直到死别，在一起的时间长达五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她们一同来到美国，神让她们在宾州这个小村里共度与世无争的生活，并且一起事奉超过二十年，结实累累。

///

当“中国马利亚”首次引领我进入蔡女士黑漆漆的房间时，我的心跳加速，深怕打扰了蔡女士。她挺直地坐在床上，穿一件黑色中国旗袍，头上的黑发梳理得十分整齐。由于她的眼睛有病，对光极为敏感，所以窗子都用深色的布幔遮起来，只在她的床前装了一盏小电灯，使外面访客的视线，可以慢慢适应暗室中的光线。她也戴上黑眼镜，保护眼睛。

她面带笑容，亲切地欢迎我说：“请进来！你来看我，我很高兴！”我的心情顿感轻松。她听出我的江浙口音，就连忙改口用上海话和我交谈。她请我坐在床前一张李家从中国带回来，古色古香的高背小椅子上，它高矮适中，坐在上面很舒服。我记得她说曾经在上海王家沙花园住过，那个地方我也很熟悉。虽然，蔡女士在中国的时候，就身患无药可治的顽疾，但是她依旧热心地向从各地来的人传福音。我见她病弱数十年，却为主重用，直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

谈了一会儿后，我就很识趣地起身，因为还有很多的人要见她。原来蔡女士、李玛丽及她的妹妹露丝，和她们的表妹玛莉，邀请在附近马里兰州阿伯丁基地受训的中国军官来参加为军政人员特别举行的福音餐会。她们特别租了一辆大巴士把她们从营中接来，蔡女士与她的干妈——李玛丽女士预备了很多的中国菜招待他们。而且她们要求当地的美国信徒来作个人布道；这样一来，一方面作个人布道，一方面也做了中美交流的工作，真是一举两得。

那天来的美国信徒都是当地教会的姐妹们，有一些属于门诺会，也有一些是爱米许族（Amish）的妇女们。爱米许族人非常保守，生活态度严谨、温和而勤恳，诚心诚意地遵守他们传统的简朴生活方式，他们的祖先是来自瑞典、德国的重洗派，不与外族人通婚，不驾驶汽车，用马车代步，有时深夜马蹄声经过房子，富有诗意；他们穿着非常朴素，生活简单，家中不用电器，用洋烛、煤油灯，是勤劳的农夫，同族人中彼此都用宾州化德语交谈，在家中与同族的人守主日、唱诗、讲道都用德语；我曾被邀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结果是像青蛙跌下井——不通（噗通）！他们的农场，把宾州的乡村景色，点缀得十分美丽。当我被介绍英文名叫“摩西”，他们百思不解，后来还问那些对我熟悉的人，我是不

是犹太人？

///

也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与蔡锡惠弟兄夫妇第一次相遇，日后他们成为我终生的挚友、亲爱的同工。蔡弟兄生在中国，长于香港，在美国受教育。他与美籍妻子，和我们一样对华人学生有负担，曾在香港和新加坡事奉。我们相识那天，尚且不知神已计划好要我们在以后许多年日里，一同在美洲事奉祂。那时候，他们在国际学生协会（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服事北美的中国留学生。后来，我们有相同的异象，就一起开始了华人学生的事工，称为“基督使者协会”（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那次集会中，我也认识了一些可爱的门诺会基督徒朋友。对我来说，这宗派不算陌生，因为我见过他们在爪哇中部的美好工作。他们在艰困地区牺牲奉献的精神，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真正爱神和祂的话语，过着简朴的生活，而且忠心地以属灵和实际的方式去事奉神。我的一生，在门诺会基督徒的影响下，有许多观念上的改变。他们也热情地欢迎我到他们的教会里讲道。无论主带领我往哪里去，他们都以祷告支持我，持续着我们恒久不渝的友谊。

第一次带我到乐园镇去的菲利普夫妇，是圣经弟兄会（Bible Fellowship Church）的会友。这小宗派是从门诺基督弟兄会（Mennonite Brethren in Christ）发展出来的。我就读的圣经学校，也是这个教派资助的。我曾在他们教会里讲道，成为他们属灵大家庭的一分子。这些朋友对我的关怀和爱心，使我与那宗派结下密切的关系，并随着我走向天涯海角。他们的友情令我铭记在心，常常感念他们在我初到美国读书的时候，耐心地帮助我度过初期挣扎的岁月。

///

这次见面后，我常有机会去拜访她们，暑假时，她们也邀请我去她们家中度假，当我投入学生工作后，常常在外面旅行，她们邀请我把她

们家当作歇脚之地，让我住在楼上的客房里，她们称它为“以利亚的阁楼”。我们常有时间见面、相谈，蔡小姐要我把外面的消息报告给她，有时则一起用饭、一起祷告，她真是把我当作一家人看待，怪不得有人说她是我的干妈，虽然我还是称她“蔡小姐”，从来没有改口过，她亦以“周牧师”相称，但我以她为良师益友。

蔡小姐要我经常去她的暗室跟她谈论、聊天。她与倪柝声先生很熟，倪先生的名著《属灵人》，就是在她家族的别墅写成的。那别墅是在江西九江的庐山，庐山是我国有名的避暑胜地，风景优美，那时国家的要人都有别墅在那边，很适合安静修养。她说等时局平静以后，希望可以收回产权，不知后来如何。她还告诉我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因为没有机会征求她的许可，我只好存在心里，不多撰述。

有一天我问蔡小姐，你有什么向往的事？那是初春的季节，她告诉我唐诗中的句子：“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我们曾经推敲很久，为什么是啼鸟？不说鸟啼？后来她说很想看看桃花、听听鸟啼，我们就拍照片给她看，录音给她听，可惜无法摄成录像带给她看。

我曾经问她关于访客的情形，她说，有一次来了一位访客，是位很热心的信徒，他说得了神的启示，要借着他医好蔡小姐的病，就为她按手祷告，祷告之后，就叫她起床走路，可是她心中没有感动，也不能立刻站起来走，心里十分作难，站也不是，不站也不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令那位代祷者非常失望。

蔡小姐与她的干妈很注重健康食品、养生食物，她们常用苜蓿芽作蔬菜食用，亦教我如何孵芽菜，可每餐食用，但是我仍然吃不惯。当我对蔡苏娟、李玛丽、露丝和玛莉这几位亲爱的圣徒，认识愈来愈深以后，她们成了我祷告的支持者，也成为我在美国的亲人。每当我面对重大的决定和危机，她们的爱和关怀永远支持着我。

人前、人后，我多次听蔡小姐说，卧病在床几十年，她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什么？”只问：“你要我做什么？”她真是一位对主忠心又顺命的使女。对我而言，蔡女士是以爱心坚持不懈传福音的好榜样。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来探望她，无论病情如何不适，她都很少拒绝。很多时候，蔡苏娟向他们作见证时，她的同工便在相连的客厅里，恳切地祈求圣灵动工，直到访客逐一与主相遇为止。这几位敬虔的基督使女带来的影响，

使身处地极的人也能感受得到。她的床就是她的讲坛，在那里她带领了无数人接受基督。她们生活中那些有趣及令人兴奋的事，已写成书，名为《蔡苏娟》，是《暗室之后》的续集。

第 16 章

溪边的树

基督使者协会很荣幸成为“中国马利亚”
晚年时播种长成的一个果子，
我们也继续因她的异象感到温暖炽热。
尝试在千千万万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的生命中，
忠心地继续繁衍那颗种子，
延续她的异象，向中国亿万人传福音。

我深深地敬重并感激那些将生命里最美好的日子献上，把福音传给中国同胞的西方宣教士。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下，愿作福音的先锋。其中很多人，把一生献给中国，甚至埋骨在他们所爱的土地上。他们有些有宗派背景，有些则来自独立的或凭信心而行的其他团体。他们到大城小乡，甚至深入内陆偏僻地区工作。他们对主的爱，使他们甘心牺牲了家乡舒适的生活，追求“拯救灵魂而得的永恒赏赐”。

我祈求华人基督徒，也能追随他们敬虔的榜样，愿意在主耽延再来的日子里，去到天涯海角，将福音传给这一代和以后世代的人，愿我们能忠心地接下他们的火炬，向普世的人见证福音。

///

影响我生命的宣教士朋友，不论在中国或美国，都多得不胜枚举。

他们为我祷告、鼓励和支持我。我只选择一位亲爱的圣徒——李玛丽女士，作为代表，来向他们每一位致敬。

凡是认识李玛丽女士的，没有一个会质疑宣教士的贡献。希望借着我对这位杰出使女的回忆，能激励大家，跟随她谦卑的脚踪，像她效法圣经里的迦勒一样：“一生忠心跟随主。”

她被昵称为“中国马利亚”，而且在生活的每一层面，都名副其实。她生于中国南京，是宣教士的女儿，在举止、外表上，都十分像个中国人，说话还带着浓浓的南京口音。由于小时候伤了脊椎骨，所以她的身体有缺陷，住在日本集中营期间，脊椎骨弯曲得更严重，以致造成驼背。但是她从未埋怨过主，在中国，甘心服事主六十年。生活的试炼，使她的背屈曲，但在灵里，她昂首阔步。尽管风暴吹折了她，她却没有任何断裂。

她一生的工作，显明了对中国人的爱。她把整本中文圣经加上国语注音符号，让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读神的话语。她和蔡苏娟从事这工作许多年，向印刷厂订制了特别的铅字，而且亲自负担所有校对工作。她们这两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比大多数身体健全的人所做的工作还要多。

经过多年的挫折、压迫、疾病、战争和其他危机，年纪老迈的李玛丽女士，终于可以把她毕生完成的工作成果——标示注音符号的圣经，捧在手里。“我如果不是身体有缺陷，不能承担其他活跃的宣教工作，就可能永远没有时间投身于这项事工。”她说：“慈爱的父神虽然让我们身患残疾，却知道那对我们才是最好的。”

李玛丽，好比将彼得（蔡苏娟）带到主那里的安得烈。除了宣教工作之外，她还做了另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花了四十年时间，照顾患上不治之症的蔡苏娟，直到她自己离世，得着永恒的赏赐为止。照顾蔡苏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中国马利亚”大半生住在中国，家中有佣人伺候，和蔡苏娟到了美国之后，她却要亲自照顾病人。

她虽然是美国人，却直到晚年才开始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她本身虽有残缺，却是另外三个残障者：蔡苏娟女士、她的妹妹露丝及表妹玛莉的一家之主。“中国马利亚”从早忙到晚，负责预备饭食和接待客人，全天候祈祷、见证，并且殷勤款待访客。她凡事都倚靠主，喜乐地把基督的爱倾注予别人。

///

我爱把“中国马利亚”看为“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参考诗篇一篇3节），她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永远在神的话语里扎根。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她几乎全盲，必须借助圣经录音带灵修。九十多岁时，还学习盲人点字。虽然天然的视力日渐模糊，但她属灵的眼睛却愈来愈明亮。

她不但以神的话语滋养自己，更像一本活圣经，慷慨地把神的话传给别人。不论是书籍推销员、送货员、送牛奶的人、邮差或问路的陌生人，凡是来到家门口的，她都向他们引述一节经文，和他们一起祷告。在上海的时候，她获得一部珍贵的电话来推动他们的事工，她感谢主，并且祈求有人拨错电话号码，可以让她有机会作见证。据说，她透过那部电话，带领许多人归向基督。

“中国马利亚”常实行她自己所传讲的道，她招呼客人如“马大”，平静安稳如“马利亚”，从不匆忙，又常耐心等候，直到神回应她的祷告。疾病、贫穷、战争、监禁、瞎眼，都在她的生命树上成了年轮而不是疤痕。每当我问她：“觉得怎样？”她总是回答：“主奇妙地帮助了我们呀！”

她像一棵常青树，“常保青翠”、“叶子也不枯干”、“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灵里也不枯干”。即使在病危的时候，我去探望她，仍见她脸上发出光辉，从不发一句埋怨或苦毒的话。她的青翠可以成为别人的遮荫或避难所，坐在她的荫下，如沐春风，使人感到平安喜乐。

每次我在李玛丽女士家里住宿，都难于入睡。因为繁忙的三十号公路，距离她家的前廊只有数呎，所以车声不绝于耳，整晚都有货车隆隆地驶过。“那嘈杂的声响令你感到烦扰吗？”我问她。“中国马利亚”笑着说：“不会，那嘈杂声反而提醒我，记得为公路上必须在夜间驾驶的货车司机和旅客代祷。”

她像一棵“按时候结果子”的树，“而且结果不止”。她又像一棵橄榄树，提供大量的橄榄油—圣灵的油。因为她被圣灵充满，她的生命像基督，所以可以长出加拉太书五章所记载的圣灵九果。

她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养育过自己的儿女，但是她有许多属灵的女儿、孙儿女和曾孙儿女。在她的圣经里，标记出但以理书十二章3

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她从年少至年老，引领许多人归义，其中最著名的是蔡苏娟，借着蔡苏娟的见证，蔡家有五十五人信主。当石头掷向结满果子的苹果树，果子便掉满一地。李玛丽女士的生命，正像这苹果树，“无论得时不得时”，她都以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机，向适当的人，借着合适的言语和行为，把果子带给有需要的人。那些在中日战争时期认识她的人，都说当她收拾行李，预备进入日本集中营时，是何等兴奋和喜乐！

虽然当时她年事已高，健康又不好，却兴奋不已地说：“我不会错过这个连天使也羡慕的机会。多年来，为着上海未信主的外国人祷告，一直苦无机会接近他们。现在，主把大家关在一个无法离开的地方了！”她把以西结书一章1节带到营里：“在……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

///

当其他人认为，要在不足十二小时里安排一次福音性的聚会，宴请一百多位中国军官实在“不得时”，而且要预备两餐款待，实在不方便，“中国马利亚”却高呼：“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告诉他们，我们渴望他们光临！”她自己常忘记进食或休息，却很少忘记照顾别人的需要。到了晚年，她学习各样天然食物的益处，不过对此并不狂热，只是学习神在自然界中，为着我们的健康和好处，所给予我们的供应。她们请我吃饭的时候，常以家里种植的苜蓿芽菜、大麦面包等食物来招待我。

她的健康不佳，不能出门，但对国家及世界大事依然很感兴趣，常常留意有关圣经预言的时事，不断地为犹太人及远东地区的人祷告。

每次我到她们家去，她总是穿着深蓝色的中国旗袍，外面披着围裙，脚踏黑色中国软底布鞋，用她温暖、柔软的手，握住我的双手，柔声地对我说话，使我感到自己像是她们的贵宾。有主同在，使她脸面发光，因此，我从未留意到她脸上的皱纹。她会为我、我的家人、我们的中国学生事工，以及任何与我有关的事情祷告。对她来说，祈祷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她的家，是真正的“祷告之家”。

她最终成为一棵倾倒的树，但是，她那敬虔品格的木材，却成为神家里坚固的栋梁，支撑着别人。“中国马利亚”提供了“暗室”和对蔡苏娟毕生的照顾。我敢说，没有她，蔡苏娟就不能如此地向普世传扬基督。她像一棵最终不免老去、被烧尽的树，然而，她在事奉主时燃点的火，今天仍继续在许多人的生命里燃烧着，温暖了他们的心。“**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诗篇一篇6节），知道她的心已完全献给祂。现在，她与祂面对面，也完全认识祂，就如祂认识她一样。

基督使者协会很荣幸成为“中国马利亚”晚年时播种长成的一个果子，我们也继续因她的异象感到温暖炽热。我们尝试在千千万万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的生命中，忠心地继续繁衍那颗种子，延续她的异象，向中国亿万人传福音。

她与妹妹露丝和蔡苏娟共同决定将她们在地上的产业：超过一百亩的农地和多幢建筑物，奉献给基督使者协会。她渴望神使用那些产业，透过传福音、门徒训练、团契和宣教工作，来延续她的异象。愿我们忠心于属灵的遗产，接下传福音的棒子，不单是李玛丽女士留传下来的神圣产业，还包括所有在我们之前、为神在中国的工作预备道路的宣教士所留下的未竟之工，跑我们当跑的这一棒。

///

李玛丽女士临终时托人留下一样东西给我，至今都是我所珍惜的宝贝。还记得那是一个严冬的早晨，地上盖着一层不太厚的雪，我站立在李玛丽家宅的后门旁，面对这座李玛丽女士曾住过的大厦，心中怅然若失。苏珊娜含着眼泪来开门，柔声地道早安。这是李玛丽女士逝世后的第三天，整个房子的人都被死荫幽谷的阴影所笼罩着。

我轻轻走进暗室，坐在蔡苏娟小姐的床旁。我知道她的哀伤，眼泪在黑眼镜下渗出，直流下脸颊，我们相对无言。此时，一位蔡小姐忠诚的同工进来（幸亏她近几个月在这里照料）。她指着桌上一个包裹说：“这是蔡小姐吩咐我包好，预备送给你的。”蔡小姐在一旁接着说：“这是干妈的一件外袍，人家做了送给她的，她穿了两次就舍不得再穿，还像新的一样，她知道你每天早上很早起来，你在灵修时披着，

可以御寒。”这时我体会到什么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涵义。

我微颤的手打开包裹，一件中国古装的丝棉外袍呈现在我眼前，黑色的缎面衬着玫瑰红的绸里。睹物思人，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了，却不敢哭出声来。幸亏在暗室里，别人不太容易察觉。道谢后，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我就匆匆告辞。搂着那件外袍赶回农庄，进了寝室，轻轻地掩上门，再一次把它披在身上。

大小合适，长短亦恰到好处。系上带子，我虔诚地跪在神前祈祷，愿那降在李玛丽女士身上的灵，更加倍地感动我。在神面前，我放声大哭起来，承认自己的不配、软弱、失败，求祂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她虽死了，却仍说话。”我站起来照着镜子，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我承受了她的遗爱，巴不得穿了这件外袍的人，里面能蕴藏她那样仁慈、谦恭、柔顺的性情；刚毅、正直、不挠的精神；以及她爱神爱人的心。

紧搂着这件外袍，就好像紧搂着这位可亲的老人家一样，我热爱着她。当我垂老无梦之年，仍会抚摸这件玫瑰红衬里的外袍，期待着在晨曦里，重逢那多年阔别的笑容。

第 17 章

赶牛上树

虽然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功课压力十分沉重，
课余时间有限，但我仍尽力探望并帮助南、北卡罗来纳州，
以及乔治亚州的华人查经班。
我能体会这些中国学生在外地求学的难处与困境。
学生时代的亲身经验，
加强了我带领华人学生认识主的使命感……

我祷告寻求神，希望知道在宾州圣经学院学习一年以后，祂接着要我到什么地方去？祂是否装备我，让我回印尼，在宣教训练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担当行政工作？

另一次，圣经弟兄会赞助的宣教会议中，师悌德牧师（Rev. George Steed）和我同住在菲立普夫妇的家里，师悌德牧师在印尼的婆罗洲（加里曼丹）当宣教士，并曾为我的美国签证作担保。我曾住在他加里曼丹的家里，他朴素的生活和真挚的灵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师悌德牧师建议我，应继续留在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哥伦比亚圣经学院（Columbia Bible College）的宣教研究院进修。

借着祷告，从神获得确据以后，我知道了以后的方向，便于一九五六年申请入学。我的语文能力仍然有限，很难追上其他同学。相比之下，我在亚伦镇一年的经历，像是给初出茅庐者的迎新计划。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回到印尼去。因此，我必须修

完三十个学分、撰写一篇论文，才符合学校的要求。

定下这个目标后，我每天早上五点便起床读书，直到吃早餐为止。我住在研究生宿舍里，距离古朴的校园只有两条街。第一学期仍在试读期，我必须保持每科成绩平均B+才能成为正式学生。我尽量选修，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十六个学分。正如“赶牛上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啃得动？

赫教授（Professor James Hatch）给我极大的帮助。每天课后，他都与我重温当天的圣经、神学和其他科目的内容，并确保我都明白。我常利用午餐时间，小睡片刻，起来便继续温习，直到吃晚餐的时候才停止。

杨弟兄是我的室友，厨艺一流。由于我们在学校很早就吃晚餐，因此，有时在回家途中经过超级市场，会进去买些米、菜和肉，当我们书读到半夜，甚至凌晨一、两点，饥肠辘辘之际，就煮些宵夜来吃，可供我们支持到吃早餐的时候。离我们不远，另一个宿舍里的学生说，他们常在预备进入梦乡时，闻到一阵阵香味，他们还开玩笑说，是住在“扬州”饭店里！（和以美食闻名的“扬州”谐音。）

///

感谢神，我的成绩平均达到B+，所以学校准我继续修读下学期的学科。用英文写论文，好像另一回合的“赶牛上树”，但神为我安排了一位注册主任，修改我的英文论文。最后，借着神的恩典，顺利交出那篇论文，并获得接纳。

我在哥伦比亚圣经学院就读的时候，利用那美好的机会，聆听很多宣教士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忠告，这使我对宣教的使命感日渐增强。同时我也知道，在美国有许多华人学生还不认识真神，他们觉得人生没有目标，感到寂寞和不安。

读书期间，我很庆幸有两次机会，参加在伊利诺州（Illinois）湖畔娜（Urbana）举行的“校园基督徒团契宣教大会”。第一次在一九五八年，第二次是一九六一年。我在那里遇见许多从东南亚来的华人基督徒学生和华人学生领袖。一位热心参与、奉献自己的基督徒学生林弟兄，在大会排定的每一节聚会之间，为华人学生筹办特别聚会。该地的双城

圣经教会（Twin City Bible Church）也帮着筹募助学金，让所有希望参加湖畔娜大会的华人学生，都能免费参加。

每天下午，我们在教会大堂举行中国聚会，讨论如何在美国的校园作见证，以及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如何将福音传到中国，我们为此祷告。那两次的大会讲员，更激发了我的异象。

第一次目睹成千上万从美国各校园来的基督徒学生，聚集在一起歌颂神，认真思想神的宣教呼召，并且献身事主，我的心大受激励！看见许多华人学生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往海外宣教。我梦想、祈求神借这股属灵的力量，为祂的国度成就大事。

湖畔娜宣教大会带来的余波，就是华人教会和学生领袖成立的北美华人福音会议（North American Congress of Chinese Evangelism）。以后几年，陆续在不同城市举行大会，吸引了牧者、学生工作者和学生参加。后来，还发展成为世界华人福音会议（Chines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sm），有更大的普世异象和计划。

虽然，我在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功课压力十分沉重，课余时间有限，但我仍尽力探望和帮助南、北卡罗来纳州，以及乔治亚州的华人查经班。单单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就有四五十个中国学生参加。我能体会他们在外地求学的难处、经济和学业的压力、语言的障碍、心灵的空虚和寂寞，以及前途茫茫的困境。

主曾让我经历同样的困难，但是因为我认识主，知道祂名称为“耶和華以勒”。学生时代的亲身经验，加强了我带领华人学生认识主的使命感，也求神向我显明，让我知道将来要怎样来帮助他们。

///

学业快要完成的那一年，是我最艰苦的一段时间，身心都十分疲倦，深感压力重重，经常心跳急速，让我以为自己心脏病要发作了。当我感到胸口压力愈来愈加剧，就把这情况告诉校医，不知是否应该中止学业。经过详细检查，医生说我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极需要休息，并约我到山上去休养。我真想接受这个邀请，让自己稍微恢复精神，但是我不能去，我想尽早完成学业，回到印尼的家中和事奉的岗位上。

除了要与英文搏斗，研究院的费用也令我负担不起。离开印尼的时候，教会负责我家人的生活开支，几位基督徒朋友，也自愿支持我在美国的进修，甚至最后一分钟，还有人送给我一个鳄鱼皮制的钱包，匆忙之间没有即时打开，直到船出港口，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有两千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感谢神，祂早已供应！

在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的“油”用尽了，差点没钱缴住宿费。当我为学费和其他需要向神祈祷的时候，神叫我想起来乘船到美国途中发生的一件事：船在许多港口停泊，其中一站是锡兰，我上岸在街道上浏览观光，一个锡兰人挡着我的去路，问我要不要买些珠宝？他给我看了一些漂亮的宝石，其中有一套镶宝石的戒指、项链、手镯和别针，我一看便喜欢，就与他讨价还价，最后以七十五美元成交，这笔钱对我而言是个大数目，我把那套宝石饰物放进行李箱，便完全忘记了这回事。

我购买的那些饰物，本来打算回到印尼时送给文田，感谢她在我们分隔两地的漫长日子里，辛苦地照顾家庭。

后来一位基督徒朋友听说我想变卖它们时，便出价五百美元。他交给珠宝商鉴定，虽然市价并不值五百美金，但那些宝石都是真的。这是神供应我的额外“一瓶油”，足够支付我余下学年所需的学费、住宿及膳食费！留学美国的三年里，神不单有时出乎意料供应我经济所需，还送我到优良的学校，让我和敬虔的教授学习，遇到体恤我的同学，并且结交了一位意气相投的室友。最重要的是，神使我有更敏锐的宣教异象，来预备未来的事工。

1. 要练一口过得去的英文，实在不易。

2. 1959年，我与我的室友杨弟兄一起毕业于哥伦比亚圣经学院。





3. “暗室之后”蔡苏娟女士。



4. 沿着林肯大道位于蔡苏娟家门前的“信耶稣得救”告示牌，以及来自马里兰大学的查经小组。
5. 与“暗室之后”蔡苏娟女士的合影。

6. 蔡小姐和干妈“中国玛丽”
李曼女士。
7. 在“暗室”里，我与蔡锡惠
夫妇（左一，左二）第一
次相遇，成为同奔天路的
亲密战友。



第五篇

海外宣教Ⅲ

【成立使者】

现在的华人青年学生，
和华人教会领袖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
我们需要评估传统的传福音和门训方法是否合宜，
发展出更有效的方式，把今天的学生领向基督。

第 18 章

不愿去日本

不，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就是不去日本！

童年时在中国已亲身尝够了日本士兵的滋味！

“如果可以的话，主啊，求你把这苦杯挪开，
请不要呼召我到日本去。

我承认我不爱日本人，我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牵连！”

然而，神仍然温柔、坚定地带领我往那个方向去……

一九五九年我获得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文学硕士学位后，急于回到印尼的宣教训练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事奉，当然更想尽早与家人团聚。在分隔两地期间，文田不时寄来家庭的相片，更使我感到寂寞和思乡。子女幼年的成长岁月里，没有父亲在身旁，他们还认得我吗？

可是，印尼教会的同工不断来信警告我不要回去，因为苏加政府亲共，如果我那时候回去，会冒上被监禁的危险，也会连累我的家人身陷险境，回印尼反而阻碍了神的工作。于是，我只好迫切地等候主的引导。

当时印尼正陷入内战，很多右翼的华人政治领袖遭到监禁。政府关闭了我们所建立的学校，学校的李副校长和一些领袖都被囚在监里，赵世光牧师也必须离开印尼回香港去。

由于蔡苏娟女士及蔡锡惠弟兄的鼓励，我加入了国际学生协会（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以义工身分参与留美华人的学生工作，并在差不多一年期间里，巡回不同的城市，探访华人的查经班。不

用出外时，我就住在马利兰州伯赛大（Bethesda）的蔡宅里，或是“中国马利亚”隔邻，常用来接待宣教士和基督徒工人的“伯大尼之家”（Bethany Home）。

在普高诺山基督教大会（Pocono Mountains Christian Conference）中，我遇见普世福音运动（Worldwide Evangelization Crusade）的格诺民先生（Norman Grubb），他为我祈祷，并鼓励我到日本工作，其他人则建议我留在美国，远离世界上的危险地区。但是我深信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是床上，因为大多数人都死在床上！难道我们会因为危险而避免上床吗？其实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神的旨意中。

///

赵世光牧师也郑重地建议我，要我为是否到日本事奉向神祷告。一所日本华侨教会的邀请加强了这建议的份量。何况有人告诉我，人在日本更可以名正顺地将家人平安地接出印尼。然而为何要到日本去？神难道又要把我投进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跨文化宣教事奉里吗？

不，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就是不去日本！日军在战争期间那样地残暴，我无法想像如何与日本人亲密相处。虽然圣经中的摩西被呼召往苦待他百姓的埃及去，但神肯定不会要我在日本人中做宣教工作！

我童年时在中国已亲身尝够了日本士兵的滋味！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如何凶暴地对待中国人——既像殖民主义者，也像征服者。他们的行为，就好像上海是他们的。然而上海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土，不是他们的！我记得曾与日本孩子正面冲突打架，记得他们如何围攻我。我对那些侵略者欺压人的残酷不仁，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我们痛恨日本人，尽可能地远离他们，即使仍是学生，我已知道终有一天，难免要与他们竭力一战。

战争爆发，中国惨遭日军猛烈的轰炸，我现在闭上眼睛，仍能看见他们如何炸毁我在宁波的家园，又是怎样残忍地杀害许多的中国人民。无辜的中国百姓，无论他们如何卑躬屈膝，依旧逃不掉受日本人凌虐——日本士兵似乎全患了虐待狂！更甚的是，我亲耳听见和读到他们在东南亚与印尼所犯的罪，他们在婆罗洲和新加坡残杀了很多华人领

袖，并且用货车把他们像死猪一般拖走，使受害者的家属永远不知道他们亲人尸首的下落。

我跟主说：“主啊，你一定知道我对日本人的感受如何，你怎么可以呼召我到日本当宣教士呢？你怎么能期望我心悦诚服地接受这样的呼召呢？”我内心充满挣扎。“如果可以的话，主啊，求你把这苦杯挪开，请不要呼召我到日本去。我承认我不爱日本人，我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牵连！”

然而，神温柔、坚定地带领我往那个方向去，我只有顺服祂的引导。我知道在日本的中国教会有很大的需要，但我还是希望只在当地的华侨中工作，避开日本人。

///

到达日本当天，神就给了我一个“入境考试”。有人递给我一封信，通知我说，他们已安排我那天晚上在距离东京不远的横滨，主领一次福音聚会，而且大部分听众是日本人，只有少数华侨，我可以用华语讲道，他们会将我的信息翻译成日文。这令我感到烦恼！

听到这个不合意的消息后，我心中交战，心灵挣扎。我问神，应该为祂传讲什么信息？我希望是一篇大众化的讲道，不涉及个人的怨恨。

神果真选上了我一直抗拒的题目——爱日本人。我惊讶到极点！祂感动我讲约翰福音三章16节，就是神爱世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无论我爱不爱日本人，祂爱。这就是祂差派我传讲的信息！虽然这个主题有违我的本性和意愿，可是祷告以后，我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惟有顺服。

神教导我必须向曾经势不两立的敌国人民传讲祂的信息。我要传扬爱，代替仇恨。感谢神，出席人数超过一千。我传讲了第一篇信息后，很多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当中包括日本人和华侨。

我发现大部分日本人并不像侵华时候的军阀，基本上他们是善良、爱好和平的人。从第一次聚会开始，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的日本人交往，在团契小组和教会中一起服事。在我们教会里，每主日早上九时，有英语崇拜聚会，十一时是中文崇拜，晚上则是日文崇拜。透过这些接

触，我开始学习跟日本的弟兄姐妹真实地彼此相爱，我为他们施洗，视他们如同神家里的亲人。

我也到校园的基督徒团契向大学生讲道。有一次，学生在校园举行反核示威，矛头指向美国。我的翻译与我同到学校去，经过沸腾的人群，看见许多反对原子弹的海报和标语。当时谣传有一艘美国军舰从美国来到日本，配备有原子弹头，学生对此十分愤怒和担忧，于是传递一份请愿书，要求大家在上面签名。

我们进入会客大堂时，学生早已齐集，他们脑海里萦绕着原子弹爆发的惨景。我看到反战标语上的一些汉字，感觉到大家的情绪都已经高涨到濒临爆发的边缘。

负责人为我作了介绍后，一个日本学生举手，透过翻译向我喊道：“你是否愿意签署我们的请愿书，抗议原子弹事件？”

这真把我难倒了，无论我怎样回答，似乎都错。如果我答“是”，左翼学生当然高兴，却会引发其他人的愤怒；如果我答“否”，又违背了我作为神的仆人的良心。我不想表明任何政治立场，以免掉进他们的圈套里。当年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也用这伎俩——设下圈套的问题——来对付耶稣。我祷告，并思想耶稣所用的属天策略可否应用于我的处境中。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反问他。“请愿书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很简单，”他高声说：“就是反对原子弹。”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反战？当然，你我都是反对战争的。但原子弹问题与战争有什么关系呢？”这位日本学生陷入困惑和沉思中。

“是因为原子弹而导致战争，还是因为战争而产生原子弹呢？”我一面说一面默祷着。他仍旧默不作声。

我提醒他说：“在原子弹发明以前，历史上已经屡有战争。”我开始怀疑沿着这个推论的脉络继续下去，是否是明智之举？因为它会掀起过去的仇恨，但我仍然继续说下去：

“你们的军队攻打中国同胞，不是因为你们有原子弹或没有原子弹，是不是？这个新式武器，是因为战争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最早的时候，人们用竹杆或石头，甚至用拳头、双脚、牙齿来肉搏，接着用刀、箭和矛，再来用枪和其他武器，然后是小型炸弹和坦克车。战争的产生，是因为人心里有罪恶，我们和人争斗，是因为我们自私，心灵里没

有平安。我今天下午来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没有这种平安，你们在世上不能找到和平。我可否继续我的讲题？”

他们都很专心地听我说下去。感谢神，祂在我危急的时候赐给我智慧。正如圣经所应许，我们不需要事先设定好该说什么，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神对祂的仆人是信实的。

///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我开始在日本服事。第一年，忙于牧养教会，并祈求主帮助我的家人能从印尼愈来愈危险的政治局势中出来。

感谢神，借着许多朋友的祷告和帮助，我的家人终于离开印尼，来到日本。我们分隔了差不多四年，现在能够重聚，自是快乐极了！文田在那几年间的辛劳，真令人难以置信，她身兼父职，照顾五个年幼的小萝卜头，在我离开的时候，最小的一个还不足一岁，最大的只有八岁。

五个小萝卜头突然来到日本，最急需的莫如进入当地的学校。印尼爆发内战后，左翼人士企图把所有华人领袖监禁起来，没有一间中文学校不被关闭，因此，在那几年里，我们的孩子没有地方读书，惟有留在家中。我真想知道，文田究竟如何独力管理他们，尤其是住在教会里，人人都看见他们的行为！借着神的恩典，以及文田的辛劳努力，她做到了。她在神的道路中养育他们，教导他们认识圣经，并在他们人生关键阶段的幼年时期引导他们成长。

我们全家在日本安顿下来，开始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气候，以及子女的教养等难题，这些几乎要压垮我们。分隔好几年，我和孩子们之间有了颇大的隔阂，我求主给我智慧，去决定各样事情。我们全家都要学习，如何以少数民族的身分在这新的文化里生活。对我们而言，日本的学校是既新鲜又陌生，而一大清早，让孩子们准备就绪，搭乘早班火车去上学，那股忙碌劲儿，更是我们想像不到的。

那些年间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都感到人生的无常，他们觉得生活不稳定，对将来没有把握。那几年里，只有一对年轻人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结婚，我们的会友没有一个生儿育女。感谢神，我们在那几年里也没有遇到任何丧葬事宜。华人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谋生。

据说在日本的华人多半以“三把刀”为生。二次大战前，他们若不是理发师，就是厨师或裁缝师。日本人充满自发和进取之心，当他们发现自己在某种技术上落后了，便会催逼自己急起直追，然后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们甚至以竞争之心来督促自己改进。

大战前，日本人并不十分擅长裁缝西服，但是他们坚持不懈地学习，直至成为这方面的一流师傅。而且日本人天生有礼，知道怎样服侍人，在理发店里，从顾客踏进门那一刻，便给他们帝王般的招待——客人不单只理了发，身体其他部分都享有周全的“全套”服务。因此，日本人开始把华人挤出理发师这个行业。

日本食品与中国食品截然不同，与中国复杂的烹调方法和材料搭配相比，日本的煮食方式确实简单得多。鱼吃生的，烹调肉类、其他海鲜和蔬菜的方式，也跟中国不同。日本人以食物的视觉吸引力为优先，用颜色和形状来吸引人的注意，他们的菜点都装置得如同艺术品一般。

日本人也爱吃中华料理，他们知道中国餐馆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所以，立志要在烹调中华料理方面出类拔萃，甚至超越华人。为大公司办酒席，还提供娱乐。他们的策略是限制中国人开设餐馆的数目，然后自己开办中国餐馆。他们透过入境处，运用他们的权力，从台湾和香港聘请专业厨师来日本，把他们的工作许可证缩短至三年为限，一旦从他们身上学到所有厨艺，学会了烹调技巧以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免得与日本人竞争，进而保护了他们自己的餐馆事业。

没有多久，华人在日本赖以谋生的“三把刀”，都被日本人接收了。由于华人普遍缺乏与人合作的精神，所以处境愈来愈艰难，不仅失去了地位，甚至没有谋生之处。一位日本朋友向我解释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如果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华人竞争，华人会获胜；如果是二对二，在伯仲之间；但如果是三个日本人对三个华人，日本人一定会获胜，因为日本人比华人更团结、更合作。”

很多成功的日本公司，是由共同行政或董事会所管理的，但在华人当中却少见。华人的经商风格较多是家族式的，由家长出任老板，这限制了它的扩展。日本人则趋向于互相帮助，尊重多重领导架构。

不过，日本投降以后，中国人逐渐重获他们的经济能力，而且成功

地进入商业、贸易、出口、船运和航空的新领域，华人餐馆也再次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第 19 章

韩国事工

在韩国，基督徒占了总人口的20%，
可算是亚洲国家的第一位。它之所以如此兴旺，
一方面是因为基督徒热心读圣经、对神话语渴慕、参加主日学，
一方面是清晨的祷告、时间和物资的奉献，
还有他们对牧师、传道人非常尊敬，
怪不得韩国教会大得复兴！

我在印尼的时候，就听说韩国不只泡菜相当有名，韩国教会的增长、通宵的祈祷、宣教士的差派，更成为东南亚华人基督徒仰慕且师法的榜样。那时印尼有些基督徒组团到韩国去观摩学习，我心中也祈祷，希望能有机会去见识一下。当我在日本事奉的时候，有一位在韩国华人教会工作多年的美国宣教士，到东京来找我，邀请我去韩国主领几次特别聚会，经过祷告后，我欣然就道。

那时韩战刚结束，是二月农历新年节期。飞机到达汉城，一路上只见断垣残壁，天气寒冷，汉江大河河面都结冰，可以行人。他们陪同我到韩国的第二大城一大邱，火车上一路的景色，有如中国北地的农村风光，令我颇有还乡之感。我们一行人在暮色中抵达大邱城，晚上就住在教会里。在这里我第一次经验到北方的炕，地下有炕道，全室都感到温暖，中华民族真是个优秀的民族，能想出这么好的保暖方法。韩国的炕不知道是韩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中华先民传过去的？有待考证。

///

当地中国教会是由一位韩国籍的女传道主持，十分兴旺。她会说很流利的中国话，也非常会接待客人，她猜想我是从中国来的，大概习惯睡在床上，所以为我“搭”了一张床，上面是一块日本的榻榻米，下面架三条长板凳，头脚各横放一条，另一条直放在中间，便成为高低起伏的“床”。他们给我的被子是日本式的厚被（Futon），非常暖和。起先因为旅途困顿，十分劳累，我很快便睡着了，但是过了一阵子，因为上面的被子很热、下面的榻榻米很凉，上热下冷，我开始辗转难眠，一会儿躺着睡，一会儿趴着睡，像在烤鱼一样，最后索性将榻榻米搬到炕上，背暖和了，才再度入睡，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经验。

没睡一会儿，我便被一阵钟声敲醒，起来后，他们告诉我这是隔壁韩国教会早晨祷告会的钟声，现在只是四点钟，我还可以再睡。到了五点，又开始敲钟，虽然他们说还早，不过我决定起床，开始自己祷告。六点的时候，钟声再度传来，大家才都起床准备吃早饭。原来他们隔壁是一个韩国人的礼拜堂。战争刚刚过去，战后韩人生活清苦，玻璃窗都是破的，没有办法，他们就用木板把窗子钉起来。地板也没有，就铺几块木板在地上。大清早，天冷，信徒们用被子包在身上就这样参加祷告会，由四点到六点，每小时敲钟，他们就坐在木板上祷告，我看了非常感动！这是我对韩国教会的第一个印象，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

后来我开始在那边聚会、讲道。那是一个周末，感谢神，来参加的都是中国人，所以我可以用中国话直接讲道。他们真是饥渴慕义在神的面前。到了礼拜天早晨，他们没有聚会，我就问他们：“我跟你们到韩国教会看看好不好？”

到了韩国教会，我看到礼拜堂门口摆了好多个大的汽油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汽油桶，后来陆续有人进来，看到他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一袋米，到教会门口就把带来的米倒进汽油桶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虽然贫穷，但每个基督徒在家里吃每一餐饭之前，就把一碗生的米放在一旁，作为他们的奉献，称为“圣米”。然后齐集每一天的米，放在一个大容器里，主日的时候带到教会来，作为他们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些米，一方面

可以赈济穷苦的人，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教会販售，作为额外的收入。对我而言，这是很新奇的事情，也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

///

我在韩国教会发现的第二件事，是他们不仅参加主日崇拜，而且热心参加主日学。老师（不一定是传道人）在上面教，下面的人就洗耳恭听。他们都坐在地板上，没有舒适的椅子，但每个人都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

在韩国，基督徒占了总人口的20%，可算是亚洲国家的第一位。它之所以如此兴旺，一方面是因为基督徒热心读圣经、对神话语渴慕、参加主日学，一方面是清晨的祷告、时间和物资的奉献，还有他们对牧师、传道人非常尊敬，怪不得韩国教会大得复兴，听说有的教会多达几万人聚会。

这是我第一次到韩国，除了大邱，还到过几个城市，所到之处，都看到当地的中国教会也学习韩国教会的榜样，热心爱主。

///

第二次有机会到韩国，是因为在韩国有一个特别大的福音聚会，叫作“福音大爆炸”，我和同工们一起去，实在看见神在他们当中大大地工作。聚会地点在飞机场旁边，那天虽然下雨，但是有五十多万人参加。白天聚会的时候，他们屏气凝神，专心听道，十令安静；到了晚上通宵祷告的时候，五十万人一起开口祈祷，犹如大水的声音，十分雄壮、奇妙、可畏。看见神的大能在韩国彰显，心中不免要问：“韩国人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次我们被接待住在大旅馆里面，使我有机会认识从世界各地来的中国传道人，也让我有机会在许多方面学习，实在感谢神的恩典。

韩国基督徒的热心爱主，使我们觉得汗颜，尤其在北韓的弟兄姐妹更叫我觉得羞愧。他们被无神论的政权统制，为主所受到的逼害真是可歌可泣；他们为了固守所信的道而受的苦，不是外人能了解的。如果把

这些史迹记录下来，可以集成一大巨册，单就我个人所听到的见证，倘若全写出来，恐将成为本书的大部分。

我曾与北韓的信徒共桌，他们为了争取信仰自由而逃到南韓来，有的已经发须斑白，有的是年轻力壮的青年，听他们亲口诉说惨痛的经历，使我这个平常极少流泪的人，亦情不自禁地一面听，一面陪着他们伤悲。讲完后，我们一起为逼害他们的政权祈祷，他们没有仇恨、没有报复的心，也没有求神惩治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只求神赦免并拯救他们，像主使逼害基督徒的扫罗，变为爱主的保罗一样。当晚的聚会，蒙神恩膏浇灌，我们在祷告时都放声大哭、被圣灵充满，心中大得安慰。

很多中国人到韩国定居，其中以山东省籍为多。我在三个城市主讲了一连串聚会后，他们请我留下来，带领教牧聚会。当地许多教会都缺乏牧者，由于他们求牧心切，再三请求我来韩国同时牧养七个教会，并且答应为我们一家人，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山上盖一幢房子。我等候神的引导，不知道祂是不是要呼召我面对另一个跨文化的事奉。

///

我祈求神显明祂的心意，当我一九五九年离开美国，前赴日本的时候，已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身分，并有国际学生协会（International Student, Inc.）的保证书，正式准许我在美国以外生活两年，从事宣教工作。在东京的美国领事，透过我的副领事好朋友，提醒我时限快到了，极力催促我先回到美国，否则我的居留权便届满。我告诉他我办不到，因为神在亚洲的工作很迫切，但他还是建议我这样做。我回答他，如果神要我这样，我会照着做，但是我不自作主张。

不久，副领事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全家迁往美国的申请已获得批准。我想一定有些事情出差错了，因为我并没有申请什么啊！领事向我解释，美国一个华人基督徒团体为我们申请，正式的批准书就在他手上，可随时到他的办公室领取，他认为是神为我开了这条道路。同时，蔡锡惠弟兄写信通知我，他已透过新成立的华府中国教会（Chinese Church of Washington, DC），安排邀请我作他们的第一任牧师。

当我告知东京的华人教会，有关神明确的带领时，出乎意料之外，

虽然他们非常想要我留下来，但是却愿意“差派”我前往美国去作他们的“宣教士”。他们解释说，他们当中许多人送子女到美国读书，这些孩子却在美国的校园离开了基督信仰，再也不再回家乡了。他们跟我说：“我们相信神会使用你，在美国的华人学生当中事奉，领他们归向基督。”

一切都出人意料之外！这些在日本的华人信徒甚至自愿透过众教会，为我全家筹募旅费。他们提出：“我们愿意为你祈祷，差派你从日本到美国的宣教工场去。”所以，我又成了宣教士，这一次是从第二个外国土地被差到第三个外国土地去！

我直到如今仍为韩国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祷告，也一直对他们充满负担，但是，神显然不带领我在那时到韩国事奉。拣选之际，神引领我来到祂的门前，让我清楚知道事奉祂的下一步。旅程的安排是由我和文田各自带着部分孩子，分别乘搭两艘不同航线的船前往美国；我到达西岸，文田则到东岸，然后我们在一九六二年秋天于华府会合，展开新一页的事工。

第 20 章

属灵果子

今天的学生像往常一样，有同样的属灵需要，
只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他们。
我们必须有创意并因应时代的需要，
把火炬和异象传给下一代的基督徒工作者，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相信神会引导和使用他们，来荣耀他，
正如他昔日带领我们一样。

华府中国教会怎么会邀请我作他们牧师的呢？事情可追溯至华人学生事工展开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华人教会是由华府地区的一个查经班开始。我们先在华盛顿，以及附近的马利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的华人当中，邀请当地的华人学生、专业人士和家庭，参加家庭查经班和团契。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参加查经班的人提议，在主日早上聚集，一起用中文崇拜。于是每个主日的清早，在国际学生协会事奉的蔡弟兄，便驾车前往各个校园、宿舍和住宅，接载参加崇拜的人。

第一次聚会的地方，是在国际学生协会大楼的办公室。学生们帮忙把办公室的桌子和设备推到两旁，中间摆放折椅，并同心祈求神把那些需要祂的人带来，华府中国教会就这样诞生了。崇拜之后，常有团契时间，以及一顿中国式的家常便饭，那是单身华人学生和朋友所乐意享用的。

中文崇拜聚会的人数激增，人们感到神的时候到了，应该正式成立一间华人教会。就是这样一所新教会，邀请我们一家大小从日本回来，

成为华府中国教会的第一位牧师。

///

我对北美华人学生事工的负担，始于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因为亲身经历过孤单、适应困难、心灵上的压力，知道学生的经历和需要，就有负担要向他们传福音。自从我在一九五六年遇到蔡锡惠夫妇，我们便开始在更广的基础上，为华人学生事工祈祷，分享我们彼此的异象。蔡氏夫妇在宾夕凡尼亚州，继而在华盛顿参与国际学生协会的事工以前，曾在香港和新加坡事奉主。

一九五七年我们一起在宾州宾林研经大会的松溪（Pinebrook），筹办第一届华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约有三四十个学生参加，赵君影牧师是我们的讲员，学生在灵性上有热烈的回应。从那一年起，每年都不间断地举行同类型的夏令会。很多著名的华人教育家、医生、教会工人、牧师和其他行业的热心基督徒，纷纷在夏令会中信主，或献身事主。

举办了第一届夏令会后，我们便开始以中、英文出版《使者》（Ambassadors）杂志，我们希望不断增长的校园华人查经班，知道其他查经班正在做什么，从而建立灵性上和团契的网络。

前往日本之前，我曾有一段短时间作国际学生协会的义工，探访各校园的华人学生，向他们传讲神的话，并鼓励他们在基督徒生活和校园见证中，结出美好的果子。我离开美国到日本后，蔡弟兄忠心地与国际学生协会继续扩展事工。

从日本回来后，我接受了新教会的牧职，聚会的地点也从国际学生协会的办公室，迁到蔡弟兄在华盛顿西北第十六街家里的大客厅。由于参加人数不断增添，那里的设施不敷使用，所以我们改到蔡弟兄家隔壁一间房子的楼上聚会，也就是我们一家从日本回来后居住的地方。不久，人数又增加到容不下了，我们便把地下室改建，供主日崇拜之用，之后，那地方又太挤了，最后，教会终于在距离华盛顿不远的马利兰州松枝路（Piney Branch Road）兴建了新堂。

美国华人学生工作同时迅速增长，经过许多祷告和计划后，我们相信时候到了，便采取自然而合理的下一步：从国际学生协会独立出来。

我们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正式成立了“基督使者协会”（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这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团体。

///

几年来，蔡弟兄和我同是基督使者协会的总干事，我则同时牧养教会。蔡弟兄负责出版事宜，并与当地学生保持接触；蔡师母则负责办公室的事务和接待；我与蔡弟兄常一起探访其他各州的校园。每个星期四，我们会出城到较远的校园带领聚会，在星期六晚上最后一堂聚会后，驾车回华盛顿，有时候直到主日的大清早，才刚好赶上十时崇拜讲道。惟有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我才可以继续身兼两职，将我最好的献上。从主日聚会至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我在教会事奉，但教会增长得很快，以致会众觉得需要有一位全时间的牧师了。

在华人教会及华人学生事工的成长期间，我们除了教会工作、探访、办公室事工和直接作见证外，还承担了其他许多额外的责任。由于我们的总部设于美国首都，很多华人学生和家庭以游客身分来探访我们，我们必须尽地主之谊招待他们；我们也很努力为来读书的学生找住宿的地方，帮助他们搬迁、定居下来，还得协助解决一些入境问题。我们经常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一九六六年，当华人学生事工继续扩展，并结出属灵的果子的时候，蔡苏娟姐妹有一次忽然在祷告后，问起我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关于她和她干妈住的那一栋两层楼的大屋，她们两人百年之后，产权的问题。承蒙她的抬举，问我该把这产权交给谁？

当时有许多人代表神学院、圣经学院、出版社等来与她们接洽，要求承继权，并应许很多吸引人的条件来说服她们，想使她们动心。后来，她们说，盼望把这产业送给做学生工作、对中国传福音有帮助的人或机构，也盼望她们的农场，能为着神的国度，被用来种植和收割属灵的果子。我就建议她们把这一份家产交给一个信仰纯正、向政府已经立案的机构，千万不要交给个人。最后她们两人经过祷告，把一百多亩地的农庄及住家完全交给基督使者协会来承继。事情公开后，外界当然有不同的反应。当基督使者协会接受这承继权的时候，我心里得着一个启

示：人可以有经营权，也可以有管理权，但是，惟有神掌握着所有权！

农庄中有一栋以前佃户住的楼房，基督使者协会的同工们把它整修后，就开始进行培训的工作，我们的口号是：“栽培收割的工人，为天国聚集庄稼。”在农庄上，我们推动了许多造就性的退修会，使多人得帮助。蔡小姐亦经常与来参加的同学展开属灵的交通。

///

因为基督使者协会的总部设在华府，当时我仍然兼任华府中国教会的牧养工作，所以无法长期住在宾州，只好经常驾车两地奔波，每次单程要开两个半钟点，相当费时费力，如此并非长久之计。而且，无论是华府中国教会或基督使者协会，都已发展到需要全时间投入的阶段，因此，我就考虑，是放下教会的牧养工作？还是放下使者协会的学生及传福音工作？

放下牧养的工作比较容易，因为以教会当时稳定的经济能力和不断增加的会众人数，应该会比刚成立的基督使者协会，更容易聘请到全时间的牧者，也比较容易支持牧者的生活费。至于放下使者协会的工作，就比较困难，因为要重新找到对这工作有强烈负担的同工，凭信心生活，比较不容易。我为此事祈求神的指示，感谢神！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教会物色到适当的牧师，所以我在一九六九年辞去教会的牧职，全时间在基督使者协会事奉。

很奇妙的，我看中了离农庄约一刻钟车程的一栋小屋，很适合我们居住，蔡小姐听到后也很高兴，表示现在是时候了，我应该考虑迁到宾州来。她知道我经济上有些困难，立刻代我向银行周转，我应允她将尽快还清债务。董事会的同工也表决将总部迁至宾州。一九七四年，基督使者协会在李氏家族的土地上兴建了一座简单的办公室，所以我们就告别了在华府的旧宅，来到宾州。搬到宾州后，可以照顾风烛残年的两位老人家，我们也比较安心，可以天天见面，时时拜访。不外出领会时，我每天早上向她们请安，或者经过她们住的地方进去问候，晨昏定省成了我每天的习惯。

感谢神！当使者协会总部迁至宾州的时候，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又

隆重的感恩礼拜。刚好那时有一群中国来的合唱团，用国乐来演奏。举行奉献礼的时候，也正是李玛丽家族，第一位去中国南京宣教的李查理牧师（Rev. Charles Leaman），离开乐园镇到中国作宣教士，整整一百年。真是薪火相传！主恩长流！

///

在校园作见证，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与现今大学的情形相比，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的校园单纯多了。无论哪个世代，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诱惑永远强大，不过，那时候的华人学生还是勤勉向上并且出类拔萃。今天，许多校园的气氛已没有那么认真，学生常常以玩乐代替勤奋和纪律。

今天的学生大多受人文主义和无神论的冲击，很多学生和教授都嘲笑和贬低基督教信仰和它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媒体更公开攻击基督教。道德一直被轻视，学生都受到鼓励要订下自己的价值观，按照自己的准则生活，他们极少尊重权威，“政治修正”成为现代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世界的变化、职业的选择，以及在专业和商业世界里价值观的改变，都使毕业生的思想变为复杂，当中也包括了华人学生。

今天的学生像往常一样，有同样的属灵需要，只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他们。我们必须有创意并因应时代的需要。我们草创这运动的人，正把火炬和异象传给下一代的基督徒工作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相信神会引导和使用他们，来荣耀祂，正如祂昔日带领我们一样。

当我们开展基督使者协会的事工时，北美的华人学生已超过一万名。他们多半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很多人在家乡已有基督教背景，有些人在亚洲已积极参加校园福音团契（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其他则得到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培育。我们尝试装备、巩固他们的信仰，叫他们在世俗化的校园里为主生活和作见证。许多非基督徒的华人透过华人查经班，尝到基督的爱，并接受祂为救主。

而在文革期间由于中国大陆的闭关政策，中国学生是不准出国读书的。同时期，中国也紧闭大门，禁止从外面进去的宣教工作，而且封锁

消息。我们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能不能逃过迫害？所有教会及传统的基督教机构是否遭受破坏？

在基督使者协会早期的事工里，我们发起在华人和美国基督徒当中，为中国而设的祈祷会。我们的口号是：“在每月第十天为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祷告。”这口号要求基督徒每月至少为中国祈祷一次。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神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已经开始以祂的大能，回应我们的祷告！祂真的在铁幕后面，以圣灵的运行来动工，使中国在严酷的逼迫下，仍有极大的属灵收成。神有两个奇妙的计划在进行着：

- * 首先，神奇妙地在中国教会受苦的日子里，将它们保存下来。教会不单死里逃生，而且繁衍下去，可说是自使徒时代以来，世上最迅速的教会增长。主真的“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实在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 * 其次，神使中国政府改变孤立政策，开启铁幕，广邀技术、科学和教育人才进入中国，并与西方建立联营企业、实施学术交流；开启的结果，也让学生和学者可以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深造。来到西方的学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并接受新的思想理念。

当我开始在写这本书的英文初稿时（一九九三年），已有十多万中国学者、访问教授和研究生来到美国，包括政府资助和私人自费的都有。神奇妙地应允了属祂的人恳切的祈祷，实在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校园的华人学生组成，和我们早期展开事工时，已完全不同了。从前美国的国际学生中，在海外出生的华人，是人数最多的一群——超过十五万，但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却在其中占了最大的比例！除了人数外，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些学生素质高、有雄心壮志、具备将来当领袖的潜力。他们大部分没有基督教背景，甚至对圣经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认识都没有。因此，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他们。感谢神，现在所有国际学生当中，中国大陆的学生似乎是对福音最有反应的。

基督使者协会现今在这些学生当中的事工，是透过同工直接接触、建立友谊、谘商辅导、实际帮助、传福音、布道、门徒训谏，并与其他同有负担的基督徒和基督教机构建立网络，弥补我们与学生们直接接触

的不足之处。我们的地区同工，继续以传福音和门徒训练，作为他们整体校园事工的一部分。我们所举办的福音营和训练营，对许多学生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也特别关心中国大陆人士的福音事工，有些同工甚至到中国去，探访已归国（海归）的学者，鼓励他们。

这些年来，基督使者协会的同工由最初开拓的三位，增加至现今的三十多位。我们另有不少的董事、特约同工和义工，忠心地与基督使者协会一同工作，举办许多活动和各种聚会。我们也定期协助门徒训练讲座，这项工作继续延展至全国。我们还派遣同工、董事、义工到欧洲和其他地方作短期宣教。

基督使者协会的“单身事工”，发展得很快。这些单身人士是华人参与宣教的潜在资源，他们对宣教工作有很积极的回应。为了满足单身基督徒的需求，我们也在不同地区举办单身退修会，参加者十分踊跃。

文字事工是我们最初的负担，“基督使者协会”便是以我们的杂志——《使者》（Ambassadors）来命名的。当文字事工蓬勃发展以后，我们便陆续成立“使者书房”、“大陆文字事工部”、“出版事工部”，及美国地区最大中文属灵书刊的“发行中心”，我们每年为中国大陆华人送出超过二十万份书籍、圣经、材料，并且填补了北美华人属灵生命的需要。

我们事工的房角石就是校园的华人查经班。一九九三年，华人查经小组在美国的数目已增至一百五十多个了。在顶盛时期，活跃的查经班曾多达二百五十至三百个。现在，它们已成长为一千五百间以上的华人教会。

我们早期服事的许多华人学生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有些现在甚至是祖父母了！由于新一代华人已长大成人，华人教会和基督使者协会都愈来愈关心美国土生华人（ABC）和美国长大华人（ARC）的属灵情况。我们祈求和计划如何有效地在他们当中做工。

华人家庭也经历到其他美国家庭的压力和问题。美国土生和在美国长大的华人青少年，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甚至不同的目标，惟有基督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可悲的是，很多美国土生的华人学生，很少或甚至没有受到基督信仰的熏陶，反而被世俗化的负面气氛影响，使他们成了新的未得之民。

每一类别的华人都有特别的需要，接触他们的方法应有所不同，而

且要有创意。但是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领他们认识基督，“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歌罗西书一章28节），借此荣耀神。

现在的华人青年学生，和华人教会领袖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我们需要评估传统的传福音和门徒训练方法是否合宜，希望发展出更有效的方式，把今天的学生领向基督。

第 21 章

赢得学生

留学生到了美国，还没喘一口气，
生活的重担立刻压在身上，食、住、行，
样样都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茫茫的人海中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衷肠。
留学生需要的是人生的目的和方向、盼望和力量，
这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

回想当初筹划基督使者协会时，我们的目标是为基督赢得在美留学的华人，或说是，把基督耶稣介绍给他们，引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面临着许多的困难。离乡背井，初抵异境，经济是一个大难题，早期港台等地经济没有目前的富裕，父母辛苦积下来的钱，仅够作为旅费，如果得不到学校的奖学金，更是“行不得也”。留学生到了美国，还没喘一口气，生活的重担立刻压在身上，食、住、行，样样都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入境，有居留的问题！未入学，有语言的问题！开始上课时，老师用一大堆的洋文，讲解厚厚的英语教科书，就是随时查字典，也很难应付。尤其是念文科的学生，每周的读书报告，再加上论文，真是崎岖难行。之外，再加上留学生内心的空虚，他们眼见街上、校园里满是行人，茫茫的人海中，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衷肠。我们确定留学生所需要的，是人生的目的和方向、将来的盼望、今日的力量，这些，只有在

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只有依靠基督，才有力量去完成祂所赐给我们的使命。

第一、所有同工需要迫切的祷告，为拓展神的国度，求神拯救北美留学的华人学子，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在校园中工作。我们也为已成立的查经班祷告，求主保守、导引他们。我们在祷告中也不忘中国大陆，求主早日打开传福音的门。

第二、我们知道文字工作是接触留学生的重要管道，能与已信主的肢体互通声气，鼓励各地基督徒在神的话语中茁壮，向未信主者介绍福音，给初信者提供栽培、训练，所以我们定期发行《使者》杂志，出版各类属灵书籍、培训材料、福音单张等。

第三、我们不单是在神面前代求，用文字互相激励，更不断在各地校园中与基督徒教授、特约同工、当地教会等配合，做探访、门徒训练的工作。

第四、每年当学生、家庭或单身者，在假期或有较长时间相聚时，我们就有培灵、造就、传福音的聚会。

第五、我们知道，主给信徒的大使命是去传福音，所以我们鼓励同学们用祷告、金钱、行动去参与宣教，并参加三年一度的“华人差传大会”。

以上是基督使者协会事工的重点。感谢神，祂不但保守我们信守不渝，更能引导我们发扬光大，证实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求主，使我们有力量，坚定地朝着这几个方向努力，并且能不断创新。记得蔡苏娟小姐曾嘱咐我们：“不怕慢，只怕站。”撒了种就得浇灌、施肥、除草，并等候开花、结实，我们也感谢神，祂让我们看到基督使者协会在各方面的事工上都有长进：

第一、祷告方面已扩大到掀起各地祷告的热潮；重开中国大陆传福音之门，已见到明显的实效。

第二、文字事工不单是定期发行刊物，亦出版大量繁体与简体字书籍，供应大陆及来美新移民的需要。

第三、在更多校园驻有同工，将福音传入学生当中。

第四、培训已扩大，我们在各地举办不同需要的聚会，已有家庭、单身、差传等聚会。

第五、激起了北美华人差传的热潮，这几年间还差派实习同工到欧洲短宣。

基督使者协会的工作，在神的整个事工当中，只是小小的火花，不过就如前面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徐松龄（Rev. Stephen Knights）牧师，虽取一个浓郁中国风味的名字，从外表看来，却是道地的西方人，来自民风友善的加拿大，带着一口很浓重的四川口音。他自己说，他像一个“煮熟后剥掉壳的鸡蛋”，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

认识他更深，就觉得他比中国人还要像中国人。徐牧师年轻时，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四川等地工作，大陆撤退后，到过台湾、印尼等地，继续忠心地事奉，后来回国在加拿大定居。基督使者协会成立后，内地会知道我们的需要，请徐牧师与我们同工。他经常在美国工作，与美国各地查经班密切联系，同时亦倾力协助加拿大的学生团契，又因为他住在多伦多，可在各教会中担任桥梁的工作，并成立传道人的联祷会。

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二人曾在加拿大，做巡回访问的事工，到过几个有基督徒团契的大学城（在美国，称华人基督徒学生聚会为“查经班”，在加拿大就称这聚会为“团契”），成员大多来自香港。我去过加拿大东西部的学生冬令会，那里多数的同学也来自香港。他们学生工作的经验已很丰富，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可作为我们的借镜。

宣道会在加拿大发展华人教会很有成效，他们善用地利人和之便，各大城市，甚至僻远地区，只要有华人居住，大半都会建立教会，宣道会的中、西传道人，亦非常注意领学生归主，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华人学生的聚会。徐牧师也曾带我去过他的母校—草原圣经学院（Prairie Bible Institute有“加拿大的慕迪圣经学院”之称），在那里，我们也见到几位中国同学。

有时，我们也请一位青年同工一起到各团契，他在香港的神学院接受神学教育，然后移民加拿大，参加学生工作。他与我们一同外出，分工合作，每次在一处工作完毕，上车离开前，我们总是找一个僻静的路旁，一同祷告、检讨、分享，这样做对工作很有裨益。

经过徐牧师不断的耕耘，使者协会的同工们都认为时机已成熟，为了行政、经济及事工的发展，我们决定在加拿大立案，成立加拿大基督使者协会。加拿大的基督使者协会于一九六七年成立，借着许多活动，在各省的华人当中，作了有力的见证。



1

1. 五个小萝卜头来到日本相会。
2. 吴勇长老（左二）来我们夏令会讲道。



2



3. 东京会友在艰难中仍充满喜乐。



4. 韩国基督徒的热心爱主，使我们觉得汗颜。

5. 韩国的中国教会，信徒热心爱主。



6. 使者早期在松溪（Pinebrook）举办的学生夏令会。
7. 我成了华府中国教会的第一任牧师。





8



9



10

8. 基督使者协会的第一个办公室成立。

9. 我们全家在华盛顿D. C.。

10. 1974年AFC搬到宾州乐园镇。

11. 1980年代的AFC同工。

12. 早期的董事及同工们。



第六篇

海外宣教IV

【华人差传】

是的，万国都必须回应那大使命，
一旦领受了福音，不论肤色或文化，
都要把福音传给别人。

第 22 章

岛国事奉

我实在对东南亚地区人们属灵的需要极有负担，
我渴望在每一个岛上多留一段时间，
参与长期的事奉。
神在每一处地方都有他忠心的工人，
但他们都需要支援，
来传福音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

神呼召我到海外宣教的这个负担常在我心里，主也给我特别的机会，让我可以在有生之年完成它。我在基督使者协会事奉了十五年后，一九七八年获得休假前往东南亚事奉，走遍新加坡、印尼、香港、越南、菲律宾、日本、冲绳和夏威夷，所到之处差不多都是岛屿！因此，我称那段时期是我的“岛国事奉”。

///

我到新加坡参加“普世福音会议”（Worldwide Congress on Evangelism）。虽然，差不多有两百万人住在那个岛上，许多高楼大厦，像塞满了人的笼子一样，但是里面的人都互不相识，我仍感觉到他们的寂寞。一位新加坡朋友说，那些高楼大厦就是人类最孤独的纪念碑，标志着人心的空虚寂寞。

那时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紧张，整个岛似乎陷在囚笼里，人们纷纷寻找希望和人生意义，但是他们在现世里却不能找到。没有神，他们如同无根的浮萍。虽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颇高，但是物质不能填满他们空虚的心灵。我为他们的需要深受感动。

在新加坡露天的国家剧场讲道，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经验。国家剧场可以容纳一千五百多人，在晚上的时候，灯光非常明亮，讲员的眼睛因为被强光照耀，根本看不见下面的群众，只知道有许多人坐在下面听道，而且因为灯光太强，完全无法看到讲章。实在是神的恩典，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跟新加坡的人传讲神的福音。有很多青年人信主、悔改，愿归荣耀给神！

感谢神的恩典，也让我有机会在许多教会的差传年会里为神作见证，看见神自己的带领。新加坡实在是一个有希望、有前途的国家，当时他们的总理李光耀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领袖，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在在让人看见神在他们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紧邻，合称新马，当中以一条很长的桥隔开，两国联络非常方便。神也给我机会到马来西亚，看到神许多的恩典。基督教传到以前，有许多宣教士在马来西亚一带工作，建立不少教会。我在那里看到不少古迹，神也让我有机会在马来西亚为主工作。特别有一个教会，弟兄姐妹都非常爱主、热心事奉，他们需要一位传道人，很盼望我可以留下来，不过我觉得神对我的托付不在马来西亚，所以就离开他们回到印尼。

马来西亚回教的势力和影响很大。当英国统治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曾把人都集中在一处，叫作“新村”，新村里的人大都在橡胶园里工作，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心，在新村里建立了好几个布道所，特别向新村里的人传福音，所以那里的工作机会非常多。虽然事工繁忙，非常辛苦，但是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他们有的从新加坡来，有的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人。在新村里的生活十分简单，也很苦闷，但是神的福音让他们有希望、得满足。常常老远就可以听见橡胶园旁有人唱歌、有人聚会，他们的热情十分叫人感动，也看见神自己的恩典在他们当中。

我在印尼事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位富有的华人房地产商，在新开发的地区兴建了许多楼宇。一天下午，他午睡醒来，惊

讶地发觉自己竟跪在床边，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梦见耶稣基督来问他：“你为着许多目的兴建了很多楼宇，但为什么没有一幢是为我兴建的呢？”他在梦中回答耶稣：“我会做的。”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跪在地上。

由于他不知道基督教的建筑物应该是什么模样，所以他只建了一座大礼堂。当建筑物落成以后，他四处打听有哪间教会想拥有它？我知道“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其前身即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因共产党统治大陆被迫撤出中国内地而更名。）需要在印尼设立总部，立刻联络师悌德牧师（Rev. George Steed），于是海外基督使团接受那产业作宣教用途。后来，海外基督使团迁往新的地点，印尼灵粮堂便把它买下来，将它改装重建成四层楼高的教堂，二楼作为圣堂，其余各层供主日学及其他教会活动使用，主真是用了奇特的方法来成就祂的目的。

///

我实在对东南亚地区人们的属灵需要极有负担，我渴望在每一个岛上多留一段时间，参与长期的事奉。神在每一处地方都有祂忠心的工人，但他们都需要支援，来传福音并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在每一处地方，我都有机会一方面跨文化地作见证，另一方面把福音传给住在当地的华人。我知道神给我宣教的负担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跟年轻的华人基督徒分享那异象。神可能会呼召和装备他们，往那些未来有需要的岛屿，甚至世界各大洲去传福音。

当一个基督徒真诚地献身，愿意前往主所差遣的任何地方事奉，他总会尽量认识世界不同地方的需要，但他也可能会感到挫败，因为知道自己不能满足所有的需要。研读相关的资料是必需的，但神的呼召也同样不可缺少。我心里常常挣扎，不知道“被重大的需要所感动”，和“蒙神呼召去回应那需要”两者之间有何分别。

在亚洲一个青年宣教大会中，我担任讲员，主讲：“举目向天观看”，引自约翰福音四章35节耶稣的话。世人属灵和物质上的需要绝对大得惊人，我们都可以看见做工的人是那么少，但我愈来愈明白，需要并不就

是呼召。

当我们听见或看见有重大需要的时候，不该以为神就是要我们冲往那里去，凭一己之力做点事情。恩主要我们付上的行动，就是在祷告中求庄稼的主，打发祂想差派的工人出去，收祂的庄稼（参考路加福音十章2节）。如果神呼召你，你去；如果神不是呼召你，你也愿意让神呼召别人去。

如果你看见任何需要，便迫不及待地投入，这是以人为中心，以工作为导向。你需要从神得到确定的呼召，否则便是白费气力，把你的力量分散在自己看见的每项需要上，但问题是：神真的呼召你吗？

一旦听见有人求救，便立刻跳进水里，并非明智之举。你可能还不会游泳，尚未预备好自己去拯救那人；也许你擅长结绳，是那个要紧握着绳子的人，也可能你应该驾一条船出去救援。

我想，如果我在宣教大会中，以世界的一切需要，来向学生发出挑战，例如提出人口统计数字、物质短缺、经济危机、人类的堕落等，会使他们感到困惑沮丧，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每个人都必须领受从神而来的呼召，神会把责任托付给祂所选召的人，并且祂应许常与祂差派的工人同在。如果你坚持以需要为导向，神可能会说：“好的，这是你自己找的，但是我可没有应许看顾你，因为不是我差派你往那里去的。”

///

在我的事奉里，曾面对许多国家里不同地方和不同人群的迫切需要。我必须分辨究竟神呼召我往哪里去？不是由我自己考虑哪里是最佳的地方，也不是由我衡量哪种需要较迫切，才决定往哪里去。一次又一次，在人们看来，我决定前往的地方，似乎并不是最有迫切需要的地方，但那不是我的决定，而是神的决定。

在我目前的生活和事奉里，我也必须在重大的需要和神的呼召之间有明确的认知。有时候，这些因素一致，有时候却不是。此外，马其顿的呼声：“来帮助我们”，不足以成为一个绝对的事奉原则，或者创出一套理论。这种呼唤有时候是从工场上一个真正有需要的地方发出的，但不是每件个案都应成为我们的指引。发出那呼声的人，有时候也不知道

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我不能向学生大会说出我自己也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讲道以前，我总是天还未亮便起床，寻求神的话语，并祈求祂赐给我信息。到了五点钟，我相信是神光照了我：是的，举目观看神的庄稼是重要的，神吩咐亚伯罕向右、向左观看祂赐给他的地；摩西看见燃烧的荆棘；约书亚望着耶利哥城，就看见神的使者在他面前；先知望着百姓，就看见他们没有牧人；以西结书里，神说祂已看见祂百姓所受的压迫；耶稣看着那来问祂永生之道的少年人，就爱他；祂也看见人们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祂看见那失去了儿子的寡妇；又看见饥饿的五千人，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城，便为它哀哭。

是的，“看见”是很重要的。

要看些什么？首先，你必须真实地看看自己，正如以赛亚一样一看到自己的不配、无能，然后，你必须像神看你一般看看自己，那么，你便会明白神的心，明白祂对世界的心，以及你在那工作中应负上的责任。

有时候我们看得不准确，所以听不见神的呼召。为什么会看不准确？至少有六件理由，那就是：当你盲目的时候、当你老眼昏花、当你近视、当你受到撒但蒙蔽、当你自以为有所见、当你身处黑暗只见幻象。有时候我们看见是看见，却不明白。千万年来，看见苹果落地的人多不胜数，但是并没有像牛顿一样发现万有引力，很少人从他们每日所见的事物里看见意义。

当我们看到世界的需要，我们应该求神为我们诠释，从祂想要我们为祂做什么，来理解我们所看见的是什麼。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让我看见。”正如经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诗篇一一九篇18节）我们在内室里，在神面前安静下来默想祂的时候，我们便看见祂要我们看见的东西。

只以需要为导向，我们便看见世界上的青少年，像洪水般奔腾。在亚洲的街道上，像在台湾、香港、新加坡，你很难面对如潮涌般的青少年而行，尤其是下课的时候，更是寸步难行。在清早或午饭时刻，亚洲的青少年像蝗虫一般挤满了小吃店。在新加坡，超过一半人口是在二十五岁以下，有超过六亿人是在三十岁以下，国民的平均年龄则是二十四岁。

当然，我们必须求庄稼的主差派祂的工人，去收割已成熟的庄稼。

我已用了大半生，在不同地方实践神呼召我参与的学生事工，但不是每个人都奉召参与学生事工，神的呼召因人而异。

神的仆人，特别是蒙召作宣教的，面对的另一个事奉难题，便是神的呼召是在自己的同胞当中事奉，或者往世界其他民族跨文化传福音？对我来说，这难题是持续不断的，在我早期的基督徒生命里，主已在我心里摆下了对其他民族的负担，而非只是我的同胞。对当时的华人基督徒来说，那是一个崭新、少见的观念，因为早期的外国宣教士没有清楚教导华人，耶稣的大使命中——“往普天下去”也应该应用在我们身上。此外，我们几乎已被极大的属灵需要压倒。

这难题，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而神也信实地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带领我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事工地点。

我查考使徒保罗的生平，来帮助自己明白如何保持平衡，并且帮助自己厘清想法和负担。我已学会不需要在这些负担中作选择，可以双向地履行我的呼召。

保罗是个犹太人，他对自己的同胞有很大的负担。然后，在他事奉的关键时刻，神呼召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拒绝向任何群体作见证——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智慧的、愚拙的、为奴的、自由的、男的或女的——都在不同时间或同一时间出现在他的领域中。

我明白保罗的感受。无论我的骨肉之亲身在何处，或是在故乡，或是分散各国，我对他们都有沉重的负担。然而当我还年轻的时候，由于神直接和个别的呼召，便毫不犹豫地离开，到印尼从事宣教工作。神呼召我往一个方向去——那就是离开，同时祂又呼召其他的人往相反的方向——去传福音。

神在祂的呼召里是否自相矛盾呢？不，神是整个庄稼的主，祂知道整幅画面是怎样的，祂亲自执行所有的工作编配。祂差遣自己的众仆人进入和离开，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祂派出工人往祂看为最适当的地方去，也应许他们出入都找到草场；无论祂呼召我们往哪个草场，我们都应照料祂的羊。

神好几次将我的宣教工作从一个跨文化群体转到另一个群体，也从一洲转往另一洲。只要神赐我力量，将来可能仍有更多的工场转移。

因此，我踏上使徒保罗的道路——无论祂呼召我向何人、在何地、于何时，我都不分种族、不分阶层地传讲神的道。有时我向美国人、日本人、印尼人传道，有时向国外的华人学生和专业人士传道，有时向分散在非洲、欧洲、美洲、亚洲的华侨传道。

我最关注的是，我能否觉察出祂在特定时刻要我在何处向何人传道，然后毫不犹豫地跟随主。无论如何，我的生命务必不断地讨神喜悦，将荣耀归给祂。

第 23 章

差传年会

我用结结巴巴的“破”英语告诉他们，
主怎样呼召我前往印尼作个“宣教士”。
我注意到，一些美国弟兄惊讶的表情，
习惯上他们总认为“宣教士”只局限于白种人，
一个中国人，怎么能自称是“宣教士”呢？
现今，真正是福音借万国传到万国去的时候了！

当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圣经弟兄会的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一个差传年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一类型的聚会。事实上，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聚会，他们向我描述的时候，我想，它应该与布道会、研经会、培灵会、奋兴会不同，但它的性质是什么？我期望找出答案。

“要交多少费用？”我问道。

“不用。”他们笑道：“你是我们的嘉宾，希望你能与信徒分享，神给你的负担是什么？”嗯！我真要去学习一下。事后证明，我实在是学到不少！

///

在中国，我们见过很多外国宣教士，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宣教的会议。有时候，我们感到奇怪，究竟是谁差派那些宣教士出去？是谁

支持他们？是谁作他们的后援呢？

在差传年会中，我找到了答案。当我到达的时候，立刻感受到全教会充满欢乐的气氛，会友用世界各国的国旗、国家地图，以及各地区有多少未得之民的统计图表制成海报，把会场布置得琳琅满目；四周的摊位，由正在休假述职，或正准备前往世界各国去工作的宣教士当值，穿上他们所谓的“民族服装”，陈列出他们所代表国家的珍宝和纪念品。

大会的节目，包括来自世界各地、许多令人兴奋的报告，讲述神怎样透过宣教士赢取灵魂，归向基督；我们听到不同语言的歌曲，也观看了展示宣教工作的彩色幻灯片和影片。

那天，除我以外，所有宣教士都是白种人，我不知道按照他们的定义，我算是个“宣教士”，或算是他们努力的“成果”。但他们热情地接待我，我也从他们对神话语的阐释中，获益不浅，尤其是关于向全人类执行大使命的意义。我心里想：“是的，万国都必须回应那大使命，他们一旦领受了福音，便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不论我们是什么肤色或什么文化，我们都必须作‘宣教士’，那是主给每一个人的共同使命。”

想起早期在中国拓荒的日子，很少中国基督徒认真思想要参与宣教事工。赵世光牧师发出旷野里的声音，他常呼喊：“往普天下去，也是神给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命令！”很多人嘲笑他，使他感到挫折，因为，到中国以外的地区作宣教士，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不敢想像的新观念。

早期，中国基督徒对“宣教是什么？”没有正确的观念。他们误以为举办福音聚会或在华侨当中建立教会，就是宣教了！以致赵牧师的宣教工作，受到“一人唱独脚戏”的限制，没有基督徒团队支持，遑论在异文化的国家，带来更长久永续的宣教工作。

与北美的宣教机构，和具备宣教士心志的基督徒接触，加强了 my 宣教异象，使我在跨文化宣教上有了实际方向。看见不同的国家应用宣教原则，把不变的福音带给天下万国时，的确有许多事情需要彼此学习。

///

他们请我分享见证。我在有限的词汇下，用结结巴巴的“破”英语告诉他们，当我仍在中国的时候，主怎样呼召我前往印尼作个“宣教士”。

我注意到，一些美国弟兄惊讶的表情，习惯上他们总认为“宣教士”只局限于白种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自称是“宣教士”呢？

感谢神，自从多次宣教大会以来，时代已经大大改变，世人正目击，神把仆人从一个国家差派到另一个国家，彼此交流。在传统上一直处于“接受”宣教士的国家里，现在也有了“差派”宣教士的教会。现今，真正是福音借万国传到万国去，而主再来的日子也愈来愈近了！

神让我看见各样充满宣教热诚的平信徒，有些钱袋不丰，有些年事尚轻，还有一些年长者，谦卑地以祷告和金钱作回应，献上宣教所需的预算金额，来鼎力支持神的工作和海外的工人。我也看见，很多年轻人愿意奉献他们的生命，在宣教工场上事奉神，并且开始装备自己，去迎接神的呼召。神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见，祂怎样呼召祂的工人去收割祂的庄稼。亲眼目睹这一切，令我大受激励！许多年来，我继续不断地从参与西方宣教士的工作和宣教大会上，学到许多东西。

这次大会中，我请大家为我的国家——中国祈祷。那时，马克思主义政府统治了中国十亿多人。整个中国大门紧闭，外国宣教力量无从进来。

当时，基督徒经历了极大的考验和逼迫，不能公开作见证，更不能在教会里公开敬拜上帝。千千万万人为着基督信仰，在劳改营和监狱中受苦，很多人甚至为主牺牲了生命。共产党政府逼迫西方宣教士离开中国，却将他们的宣教产业和工作留下来，外面的基督徒，惟有祷告。

我在美国每一处地方，都鼓励美国的基督徒恳切地祈求神，怜悯中国人民，让祂的百姓从属灵的黑暗中见到真光。许多在美国的基督徒都答应为中国祈祷，那时候，神已经聆听和应允了他们的代祷，只是祷告者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第 24 章

神国生力军

现在由非西方国家差派出来的宣教士，
已有戏剧性的增长，约占宣教力量的一半以上。
今天华人基督徒，纵然已蒙神厚赐丰富的资源，
却仍未显著地参与宣教事工。
我们祈求庄稼的主，
引起华人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的觉悟，
叫他们尽上自己的责任，
履行主的大使命。

一九八一年，我由印尼回到美国，恢复在基督使者协会的事奉。我向华人基督徒发出更大挑战，要他们知道自己的身分、机会和使命。由学生事工开始，我们发现华人基督徒愈来愈积极参加普世的宣教工作。

自从基督使者协会成立以来，宣教的观念已深植于董事会和各同工心里。我们赞助短期宣教士到海外宣教，继宾州松溪（Pinebrook）的华人学生夏令会后，便开始设立“东南亚传道基金会”。那些参加者，都认献金额，支持在台湾、新加坡、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华人事工，例如设置华人神学生奖学金、出版基督教中文杂志，以及向中国广播等等。

记得在学生时代，我参加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在伊利诺州（Illinois）的湖畔娜（Urbana）举行的宣教大会时，满腔热血沸腾。因此，在我为早期北美华人福音会议（NACOCE）

而写的一本小册子，《骨肉之亲》的最后一章中，提出：“我们应该开办一个华人宣教大会，着重差传，激励华人，要他们成为神的生力军，把祂的国度传遍普世。所有基督使者协会的同工，都祈求并且相信，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于是，一九八三年，基督使者协会举办了“1983华人差传大会”。那是三年一次的大会，目的是燃起华人学生的宣教异象，鼓励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参与宣教——有些人称这样的差传大会为“华人湖畔娜”。

- * 第一届大会于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在华盛顿的四健会中心举行，约有一百人参加，我们的主题是“神国生力军”。
- * 第二届是在一九八六年举行，主题是“动员神国的生力军”，讲员有当时担任海外基督使团华人事工部工场主任的戴绍曾牧师（James Hudson Taylor III，即戴德生的曾孙），和蔡伟贤牧师（Dr. Chua Wee-Hian）。出席人数倍增。
- * 第三届于一九八九年举行，主题是“装备神国生力军”，吸引了一千人参加，讲员有王永信牧师（Dr. Thomas Wang），林芸伍女士（Ms. Ada Lum），张子华牧师（Dr. Fred Cheung）和Dr. Tony Campolo。
- * 第四届于一九九二年举行，有一千六百人参加，主题是“推动神国生力军”，讲员有戴绍曾牧师，Mrs. Elisabeth Elliot Gren，王永信牧师和我自己。
- * 第五届于一九九五年举行，主题是“扩展神国生力军”，有一千八百多人赴会，三百位华人信徒重申他们奉献给神的心志；这当中且有一百位，是平生第一次决志全时间事奉的。
- * 第六届于一九九八年举行，以“迈进廿一世纪，为神国收庄稼”为主题，有近两千人参加。
- * 第七届于二〇〇一年举行，以“预备、整装、出发”为主题，来自全球十二个国家，全美三十二个州，近两千位弟兄姐妹齐聚一堂，共同领受恩典，研读神的话语，并在圣灵的引导下寻求神的旨意。
- * 第八届于二〇〇四年举行，主题则是“遵行大使命”，约有一千五百人参加，其中包括七十多位牧者。
- * 第九届将于二〇〇七年举行，正值马礼逊入华宣教两百周年纪念，

届时（二〇〇七年年底）我们将在宾州费城郊区举办第九届华人差传大会，大会主要讲员有：蔡元云医师、钟志邦博士、黄子嘉牧师、李勉群教授、Mrs. Michele Rickett、沈保罗牧师、戴绍曾牧师、远志明弟兄等。求神保守他们有健康的身心灵来事奉祂。我们期望，二〇〇七年能够成为中国宣教史的转折点。

在这些三年一次的大会中，我们强调：希望借所邀请的宣教团体提供有关资讯，并且安排研讨会及相关信息，帮助我们举目向庄稼观看；希望透过祷告和圣灵的工作，感动人心回应神的呼召，激励众人；我们也想挑起大家对普世宣教的注意，鼓励每位参加者参与一些宣教工作。

我们的差传聚会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帮助华人教会订下它们的差传计划，并提供与各地福音派宣教机构的联系。基督使者协会赞助那些认真考虑献身宣教的人士，参加短期宣教旅程和暑期宣教计划，提供他们亲身参与和训练的机会。我们至始至终都忠心地作教会的左右手，去接触校园的学生，把他们带到教会去。

我的负担和呼召常是华人学生事工和华人教会。在北美，这两项工作对传福音和门徒训练来说都是重要的环节。当我们开展华人学生事工时，北美的华人教会尚在发展初期，一共只有一百间左右，大部分是由海外出生的华人组成。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大多数华人教会是由查经班开始。现在不少华人牧者和教会领袖，都是在学生时代献身事主的，学生事工对他们的生命有着重大的影响。

///

北美的华人教会，在会友的恩赐和经济资源上，可谓得天独厚。华人教会现在至少有一千五百间，其中三分之一是在过去二十年间成立的。会众人数平均约二百人，当中的成员与早期不同。愿神感动华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为着神国度的推展，忠心、慷慨地运用他们的资源。

在这些华人宣教大会中，许多年轻人奉献他们的一生来事奉神，准备进入神学院装备自己，并且加入宣教团体。我盼望、也恳切祈求神，让华人宣教大会继续举行，将来成为华人教会中的主要运动。

我不能不把今天的普世宣教力量，与早期的比较一下。我年轻的时候，大部分宣教士来自西方国家。但是现在由非西方国家差派出来的宣教士，已有戏剧性的增长，约占宣教力量的一半以上。今天华人基督徒，纵然已蒙神厚赐丰富的资源，却仍未显著地参与宣教事工。我们祈求庄稼的主，差派祂的工人。另一方面，也善用各样方法，尝试引起华人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的觉悟，叫他们尽上自己的责任，履行主的大使命。

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已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那是一个包含了一切的使命。耶稣拥有一切能力，也就是在天上地下完全的权柄。那命令是颁给所有门徒的，要他们往普天下（即所有地方）去，向万民（即每一个人和民族）传福音，教导他们遵守主的一切命令。我们有祂同在的确据，因为耶稣应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夫复何求？

华人基督徒需要从西方宣教士接过棒子，奔跑那仍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时不我予，没多久耶稣就会再来。而且，华人基督徒可能不是神所呼召在葡萄园里工作的最后一批人。我们不能说，我们会写上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第二十九章，圣灵仍在世上进行的工作），但是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和权利，至少参与神的收割，趁着白昼还可以做工的时候，在那最后一章里写上一节经文。

第 25 章

接受挑战

一位赞比亚牧师带领高声唱颂灵歌，
然后介绍我，说：“我们以为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员，
也从未遇过一位华人基督徒弟兄。
神现在差遣他到我们这里来讲道，
并告诉我们怎样向别人传福音！”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非洲讲道，感到很兴奋。

非洲？神还给我机会在另一洲事奉吗？一九七三年，这件事果然出乎意料之外地发生了。

学园传道会在德州道乐思（Dallas）的棉花球场（Cotton Bowl），举行一个大型的布道会。每天晚上有四万人坐满大球场，讲员们是从世界各地邀请来的基督徒工作者。我跟三十多位讲员住在道乐思一间大饭店里，日间有训练课程和拓展工作，晚上则在大球场举行公开的布道聚会。

大会安排我们这些讲员、牧师和宣教士，早上前往当地的中学，向年轻人讲道。上午九时大家便齐集在饭店门前，等待搭乘挡风玻璃上贴有自己名牌的汽车，前往指定的场所。

一天早上，我正在排队等候车子时，一个外国人走近，问我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我是。于是我们开始谈及中国、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作福音见证的需要。我说：“我只是十亿中国人的其中一个。”

那外国人问：“你认识一个名叫周主培的人吗？”

我说：“认识，我跟他熟得很。”

“他在那里？我怎样可以联络他？”

“他就在这里，站在你身旁。”我回答说。

他感到十分惊讶，喜出望外。他说：“我心中有些事要跟你谈谈。”

我问道：“你是谁？”

“叫我安得烈弟兄就可以了。”

“噢，我听说过你。你是‘为上帝走私的人’——是主用来将圣经运进铁幕国家的人。”

这时，挡风玻璃上有我名字的汽车驶近了。他很快写下我的饭店房间号码，并且约定午餐后见面。

///

我们再次会面时，首先是一起祷告，然后他跟我分享非洲赞比亚（Zambia，又称尚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属灵需要。由于中国派遣数以千计的工人，前往协助他们筑铁路、建广播站和机场，甚至当时的总理周恩来，也由于赞比亚有中国所需要的铜矿而访问该国。相对的，赞比亚也派年轻人到北京学习。因此这两个共产国家，跟中国的关系良好。

由于当年没有合适的基督徒从外面进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安得烈弟兄便有异象，要趁着那些华工在非洲的时候接触他们，盼望他们成为基督徒，可以把见证带回中国。

他解释说：“赞比亚当地的基督徒，无法向人传道或作个人布道，因为有言语的隔阂，而且这样做，有人会告发他们，使他们下监。那里的宣教士也不许向他们作见证。”

以长期的目标来说，他是盼望能找到一些华人基督徒工程师，和他们一起参与铁路工作，这样便有机会向这些工人传福音。

“但在短期内，我们急需一些人进入这两个国家，探索传福音的可能性，做一些个人布道工作，以及分发中文圣经。我深信你是神要用的人。你可以去吗？”

我告诉他这件事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的时间表已排得满满的。他要求我慎重为这事祷告，敞开心胸，任凭神来带领，然后我们一同跪下

向神祷告。

回到华府后，我迫切地为这极大的需要和难得的非洲机会祷告。我收到安得烈弟兄正式的邀请信，他在信中答应提供各项安排，并且答应以祷告来支持我，只是我需要自己筹措旅费。我深信那是神的带领，结果七月底，我便成行，到达赞比亚。

一位在赞比亚工作的荷兰宣教士到机场来接我。他一眼便看出是我，因为我穿了一套西装，不像当地其他的中国人，都穿着独特的毛装。特别是在周末，当地人看见许多中国人在街上购物，却不敢接近他们。

东非的季节跟北半球相反，七月的气候是寒冷的，差不多是冬天的天气。但赞比亚人十分热情，尤其是我所遇到的基督徒。他们带我到一所赞比亚教会，那里早已聚集了数以百计的牧师，要听我讲道。他们的肤色比我在美国所见的任何黑人还要黑，但他们脸上却散发出基督爱的光芒。

一位赞比亚牧师带领高声唱颂灵歌，然后介绍我，说：“我们以为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员，也从未遇过一位华人基督徒弟兄。神现在差遣他到我们这里来讲道，并告诉我们怎样向别人传福音！”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非洲讲道，感到很兴奋。人心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一渴望的心要听闻福音，爱人的心在他们开放给主之后开始形成，我也鼓励他们向华人传福音。

会后很多赞比亚牧师围在我身旁，跟我握手、摸我，有人甚至拥抱我。他们说：“我们从没有摸过一个中国人。”有些则告诉我：“神若差遣我们，我们也愿意有一天能到中国去传讲福音！”

次日晚上，他们安排我在一所大学，跟赞比亚的学生演讲，那就像个“基督徒学联会”（Intervarsity）的聚会。对他们来说，这又是一个突破性的经验：“我们以为所有宣教士都是西方的白人，现在竟来了一位亚洲人，一位从东方来的宣教士！”他们给我的题目是：“基督教仍适合于今天的世界吗？”他们对我的信息有很热烈的反应。

///

第二天他们问我：“你准备到中国人的营地去吗？”我早就准备好

了！他们带我去一个铁路工人居住的营房。一位赞比亚信徒当我的司机，开的是日本车。公路很现代化，那是在英、法、美三国的协助下筑成的。路上没有车速的限制，车子稀少，因此司机便使劲地踩油门，简直是在公路上飞驰，虽然路上行人不多，但是这对路上的行人来说还是十分危险。我很害怕，连忙系紧安全带，默默祷告，低唱着：“带领我回家，父啊，带领我回家！”我对司机说：“请小心点！我已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主，但却把身体交托给你！”他笑起来，却继续高速驾驶。

我合上眼睛，他以为我疲倦，在休息，实际上我是在祷告。突然间，他重重地踩煞车，猛然使车子慢下来。我睁开眼睛，看见许多工人沿路走着，全都穿着灰色的制服，像是一片人海。十五分钟后，我们便抵达营地的大门。司机很担忧地问我：“牧师，你真的想进去吗？我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狮子的洞穴！”

“是的，我们要进去。”我回答。“我们中国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吧！神差遣了我们，祂一定与我们同在。”

前面的大门紧闭，有一个赞比亚士兵守着，他看见我们的车子由一个本地人驾驶，车内坐着一个中国人，便一言不发，迅速打开大门。显然他们常常让中国共产党的官员进入营房，因为他们一般都带着本地的司机。

我轻声对司机说：“进去！快点进去！”

我们直驶进营地中央。我对他说：“现在轮到你祷告，我要去工作了。不要下车，在这里等我。”

我一下车，便有许多工人围着我，一个看来是领导的人，用纯正的英语问我：“你是谁？”

我用国语回答他：“我是华侨，到赞比亚来观光，听说你们协助这国家发展，而且做得很好。”他似乎轻松了一些。

“啊，那么都是自己人。你离开祖国多久了？”他问道。

“二十多年了。”我回答说。

“噢，你应该回去看看，在新政府领导之下，国内的情况好得多了。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甚至可以协助一些友好的国家。你看见我们带来的重型设备和人力吗？我们不但在进行各项建筑工程，也帮助别人发展。来，请进来！你是我们第一位海外华人访客，希望你可以多逗留

一会儿。”他带我进入一个客厅详谈，不断告诉我共产党政府有多好。

我想转变一下话题，同时默默祷告神，希望这人对我有好感。我问道：“国内的基督教会又如何呢？”

他对于我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讶异，他回答说：“我们现在没有几间教会，我从来没进去过。你，一个海外的华侨，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他好奇地反问我。

我心里为有这机会而高兴，回答他说：“你既问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便告诉你整件事情。”我告诉他心中无神，就没有平安；因为与神隔绝了，人都失丧，没有目标、空虚不安，而且我强调“寂寞”。他告诉我，他只身离开中国，留下妻儿在家中已超过半年时间。“人远离神的时候，也会感到寂寞，而作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渴望我们能返回祂身边。”他只静静地专心听，“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到天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6节）”

他问我怎么确定神是存在的？当然他会问这个问题啦！因为他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的。我解释说：地球和人类不可能从无变有，我们必须用一些东西来开始。他提出了进化论，我问他可曾见过正在变成人形的猿猴，或任何半人半猿的品种？他承认自己从未听过这样的事。

他似乎有一些医学背景，我便提醒他说，你不能把猿猴的血输给人类，也不能把人类的血输给猿猴。他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告诉我最近发生在营内的一宗汽车意外，其中有中国人和非洲人一同受伤，当一个非洲人需要血的时候，他们给他中国人的血。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邀请我共进午餐，说营里有自己的中国厨师，他们从本地的非洲人那里买鸡和菜。我欢喜地接受主继续赐给我的机会，我们谈了三四个小时。饭后，我必须离开了，就问他要不要看看圣经或《四个属灵的定律》？他表示愿意，并接受了这两本书。

我们返回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加（Lusaka，又称路沙卡），沿途看见许多工人。我们经常停下车，把中文的《约翰福音》送给他们。有些人收下来，说会看看书中说些什么；有些则拒绝了，说他们不相信这样的事。

第二天我有机会探访大卫·李文斯顿（1813-1873年，生于苏格兰，是非洲宣教与探险的拓荒先锋，维多利亚大瀑布是他发现的。）的坟墓，他们说墓中只埋葬着他的心脏，他的躯体却葬在伦敦的西敏寺大教

堂。我深受感动，回想起这位属灵前辈为基督所作的见证。

其后的日子，我继续探访别的营舍，以及中国人在帮忙建设的广播电台和机场。不过，机场的保安比较严密。

我和赞比亚信徒一起参加主日崇拜。他们唱的圣诗，有些听来耳熟，但他们都是以沙哈里语唱的，我完全不会，讲台上的信息，我也是一点都不明白，但我们却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一，我们一起敬拜，神也悦纳我们的赞美。他们邀请我作一个短讲，反应非常热烈。牧师告诉我，他们很高兴看见赞比亚有一位华人基督徒。

他们教我跟人打招呼时要说：“强婆。”我觉得那很容易。他们又说，我回应别人时要说：“洗强婆”，意思是“好”。我有很多机会使用这个新学的沙哈里语！

///

离开赞比亚以后，我有机会去希腊、以色列和罗马。从前我曾在哥林多、雅典和别的新约重要地点停留。在以色列，我探访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加利利和许多圣经提及的地方，圣经顿时变得活生生起来。

在罗马，我游览了许多名胜，如：巨型的斗兽场，早期的基督徒曾在那里为信仰受苦，被狮子吃掉或被火烧。我也参观了地下墓窖，基督徒在大逼迫期间，曾在那里秘密敬拜，并且埋葬在那里。

我还参观了一座独特的罗马天主教堂，称为“君往何处？”（Quo Vadis）。在圣坛两旁，我看见两幅图画：一边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另一边则是一个人倒钉在十字架上。

据说使徒彼得曾住在罗马，当基督徒受到极大的逼迫之时，彼得的门徒劝他逃离罗马。大清早，当他与门徒一起上路，出了城门，彼得看见一个大光，耶稣出现在大光之中，然而，他的门徒却什么也看不见。彼得跪下求问耶稣说：“Domini, Quo Vadis?”这在拉丁语中意思是：“主啊，你往哪里去？”

他听见耶稣说：“我正要去往罗马去，因为我的门徒，我的儿女正在患难和逼迫之中。”

彼得说：“主啊，你不要去，我会返回罗马去。”他起来，便转往罗

马的方向。他的门徒也以相同的问题问他：“Domini, Quo Vadis?”（君往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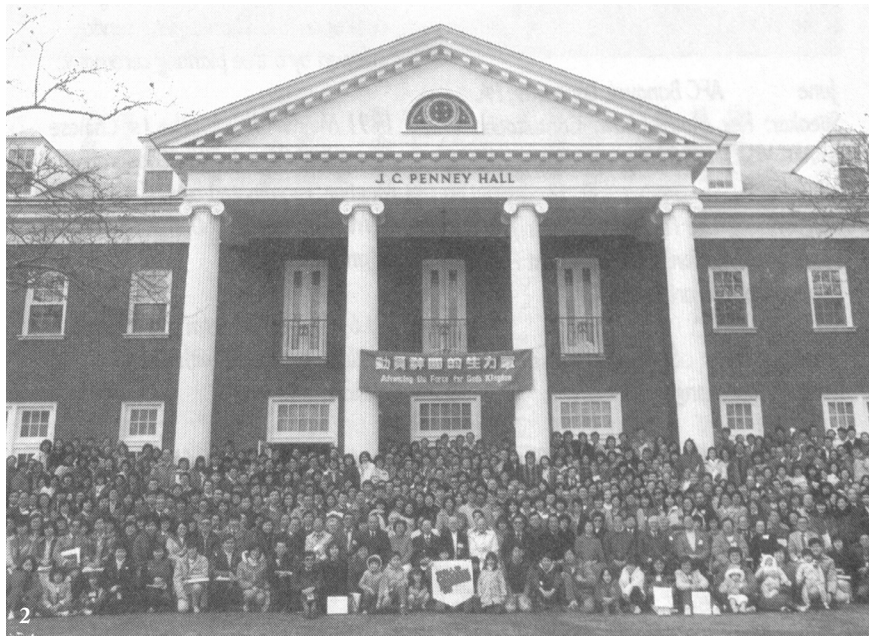
彼得回答说：“我们要返回罗马去，和我们正在受苦的弟兄同在一起。”

根据这故事，彼得回罗马时，被罗马政府逮捕了，并被判以钉十字架的刑罚。他提出异议说：“不要把我放在十字架上，像我的主一样。我不配，因为我曾三次不认祂。你们最好把我倒钉在十字架上！”

我想起世界各地有许多基督徒，仍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心里便激动。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前面的日子可能会变得更黑暗，但我心里感到喜乐，因为神给我机会跟各地的弟兄姐妹见面、一同敬拜，也有机会向不同文化的人传扬基督。真的，“在基督里不分东西；整个世界，只有一个爱的团契”。

1. 1983年第一届华人差传大会主要讲员，左起艾得理、罗曼华、唐崇荣、王永信。

2. 1986年华人差传大会。



第七篇

重返家园

火车启程了，我终于再次回到中国！
神没有容许圣经中的摩西进入应许地，
但我这同样名叫摩西的无名小卒，
却蒙神得偿宿愿，返回我植根的故土！

第 26 章

应许之地

我愈来愈了解圣经中的摩西。

他若不是与亲属分离了，看见自由与奴役有着天壤之别
就很难那么深刻地感到自己有极大的责任要拯救他们。

现在我是一个美国公民，但我仍深深地感到，
自己与故乡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系。

我相信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与故乡有这种剪不断的牵连。

中国本为宣教的广大禾场，自从政权易手后，由“Mission Field”转变成“Missing Field”（由“宣教的禾场”沦为“失落的荒地”），政府要求宣教士离境、教堂关闭（成为仓库或政府的办公室）、信徒停止聚会、传道人被迫洗脑或下放劳改，“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撒迦利亚书十三章7节）。

有人说中国的教会已陷入深谷，可是神的计划与人不同，人可以建立铁幕，却无法遮盖屋顶；人也可以用电讯向竹幕广播，纵使竹幕不能隔音，更不能挡风，圣灵的风仍然能吹入。我们要求在美国的信徒为重开传福音之门祈祷，更印制一些贴纸及用金属仿铸的铜钱，铜钱上印有：“为中国祷告”，并用英文印了一本小册子：“When China Opens”（《当中国开放》），这里的“when”不是“何时？”乃是指：“当……”！我们要求弟兄姐妹不要灰心，要准备。我们亦推动中西信徒对传福音有负担者，在每月十日为中国代祷，也不定期在华府举行祷告会，总而言之，我们要常常祈求，不灰心。

我们向神祈祷，盼望神能打开中国封锁的大门。当中共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后，我就去要求签证，想回中国，他们问我去的目的？我说是探亲，因为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我已经三十多年未曾见到我的老母亲。他们问我的职业，我就照实回答：“我是传道人。”申请递交后，如同石沉大海。后来有机会去加拿大，到了渥太华，我同样的申请，亦是音讯全无。但是我们的神真是又奇妙、又大有能力！祂的方法常常是超出我们所能想像的！神借着带领我到香港牧会，竟赏赐给我机会重返中国。

///

用“香”被命名的一个港口，应该是个美丽且具有吸引力的地方。香港曾经是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为她的主子挣了不少的财富。她也是接近大陆的避风港，当大陆政权易手时，有不少国内的有钱人，带着大批资金来香港避难，也有人赤手空拳来香港，后来因缘际会而成为亿万富豪。香港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地狱；那里有豪华的大厦，也有暗无天日的陋室。

第一次经过香港，是1949年，我们一家三口，搭荷兰渣华邮轮到印尼去传道。这船由上海启碇，在香港停泊，我就趁机上岸，与几位由上海移居香港的友人见面。香港最吸引我的是夜景和令人眼花撩乱的灯饰，真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还有水果店中的香吉士柑橘，和香港人称为“蛇果”的红苹果，我买了好多回船上与家人共享。

到了印尼以后，又去了香港十多次，大都是应邀去讲道，活动的范围不过是教堂、旅馆、餐馆，很少有时间去观光。当“华人福音会议”开会时，香港灵粮堂要趁机按立十几位执事，我被邀请参加，那时赵世光牧师才离世不久。后来印尼教会事工增多，我分身乏术，只得婉拒许多教会的邀请。直到一九七八年，香港灵粮堂得知我在基督使者协会工作十多年后，可以享用“安息年”，就邀请我去香港牧会。

///

当我被呼召出来事奉时，对牧会有极大的负担。但后来主为我开

传福音的门，要我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为祂使用。不过，我对那些忠心在教会坚守岗位、鲜为人知的牧者，怀着极高的敬意和羡慕，因为他们每年在同一个工场耕耘，面对一群熟悉的会众，每年至少预备一百多篇不同的讲章，作随时流通的管道，照主的榜样认识、牧养主的羊，关心每一位信徒，任劳任怨地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带领他们，期望他们由信徒成长为门徒。同时，深知自己需要倚靠由神而来的力量，更时常亲近神，忠心而谦卑地服事祂。我羡慕一个称职的牧者。

不过，有的教会不能让牧师“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六章4节），要求传道人在教会中“一把抓”——无论大小事都要做，连传道人的配偶，亦要帮忙做很多的事，小型的教会请传道人，要求“买一送一”——请一位传道人，外加师母，不另加钱。当然传道人的妻子亦是教会的一分子，不过她是“内助”，要照顾牧师的饮食起居及整个家庭。

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师母就是颈项，她不但要托住头，更可以转动头，可是她千万不要成为“硬颈”。也有人说牧师是得人的渔夫，可是有些师母，站在牧师背后向水中掷石头，她不是“内助”，反倒成了“内阻”。所以教会不单要求主预备合适的传道人，更要求主预备一位合适的师母。牧师的配偶绝对不是教会的副牧师，也不是助理牧师，按她的地位，以现在的话来说，她是教会的“第一夫人”，很多信徒的眼睛都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当香港教会呼召我去担任牧会的工作时，我非常喜欢这个呼召，可是，虽然我在基督使者协会正逢“安息年”，却不能完全放下总干事的责任。这时刚好有一位资深的学生工作者，愿意接手总干事的职务，使我得以安心地去香港负责牧养的工作。教会特别恩待我们，安排我们住在教会后面的楼上，他们装修了一个套房，包括卧室、书室、厨房及卫生设备，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感谢神！使我们在人的眼前蒙恩。

///

初抵香港，看见教会荒凉，不单是晨祷、晚祷，会友出席的人数寥寥无几，连主日聚会，来参加礼拜的人也不多，会堂中间大部分的座位总是空着，他们称之为“地中海”。

教会建造时是由政府拨地兴建，但有附带条件，即规定兴建教会就需要附设学校，所以在这闹市中，寸土寸金小小一块地，就要造四层楼，下面两层由学校使用，上面两层由教会与学校共用。于是，主日聚会在三楼举行，祷告及查经聚会在四楼。

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之下，我们用祷告来开始神的工作，神的圣灵亲自动工，将人数天天加给教会。每个主日，聚会人数不断增加，中间的“地中海”慢慢消失，讲台前的浅滩也涨满了，就这样，拉近了讲员和信徒之间的距离。

这教会的成长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年轻人慢慢地增加，另一方面，有许多年长的信徒，从前在本教会受浸信主，却多年没有参加聚会，现在听到神恩待教会，所以重新回归。有一个感人的场面，一直在我心中难以忘怀，一位很久没来聚会的年长信徒，平时只送孙子来教会上主日学，现在看到教会的复兴，他流着泪对我说：“我为你祷告，愿神赐福这个教会！”

增加了这些年长的信徒，是很好的现象。不过，由于他们的身体已渐渐衰残，上下楼梯时极不方便，在此情形下，神感动一位中年企业家，奉献一部电梯给教会，使长者来聚会时方便了许多。后来他们夫妇也每星期都来这教会聚会。

这次到香港就任，在神的带领下，颇蒙神赐福。一年以后，执事会要求我延长在香港的居留期限，结果一延再延，在香港继续事奉长达三年之久。也因着延长居留，神让我完成了两件梦寐以求的事情。

首先，神打开大陆的门，让我得以重返中国，一方面探望几十年未见母亲，一方面将福音传回我心所系的祖国。

其次，神使我重回印尼与政府商讨，收回十多年前因政变被政府没收的宣教士训练院址，经整修后，重新启用。当这两件事完成后，在北美接任基督使者协会总干事的弟兄，刚好另有高就，向董事会提出辞呈。因总干事一职不能悬虚太久，董事会要求我返美重作冯妇，我妥善安排好香港的事工后，即返美复职。

一九七八年，当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突然接到香港代表团来电，通知我可以到国内探亲；不谋而合的，在香港有人主办基督教人士回国观光团，已经有主流教会的十几位传道人，包括：圣公会主教、牧师及平信徒，报名参加，他们来邀请我，经过祷告后，清楚知道神的时候已来到，我就和内子加入他们的行列。旅程分两部分进行，文田和我先回故乡一周，然后我单独加入只有被邀请才能参加的基督徒访问团。

我和文田乘火车离开香港，跟其他旅客一样在边境下车。我们徒步行走过罗湖桥，到前往的火车站。出口上有个小小的、手写的中英对照路牌：“往中国”。

我祷告、期待良久的，正是这一刻！

我对火车的旅程很熟悉，在香港事奉的时候，就是乘这火车，前往位于香港对面九龙半岛上的新界讲道。最远，我只到过离中国边境二十哩的地方。曾遥望着中国，充满期待地祷告——果真是咫尺天涯！我的感觉，宛如摩西当年的感觉，他已来到应许地的边界，但神却不许他进入。

现在，只有一条小河把我和祖国分隔着，而我正经由一座小桥越过这条界线。英国国旗在香港边境飘扬着，海关官员都穿着英国制服，我们的护照被盖上“离境”的戳印。

在桥的另一端，我看见许多人民解放军，穿着宽宽松松的橄榄绿制服，军中裁缝师竟将制服的尺码统一，不管合不合身，而且制服的领口和帽子上，都绣有共产党的五星标志。他们多半都很年轻，看起来很友善，但似乎羞怯怯的。

那个鼓吹“无阶级”社会的政府，马上把旅客分成不同阶层：拿着别国护照的海外华侨，跟本地的华人要分开，其他外国人则被指向另一个方向。那里实在有高低阶级之分，大半的港澳居民要走低级的路，受着不一样的对待。许多人都带着一箱箱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和录音机，不单用来赠送亲友，也拿来售卖，赚取厚利。也有人是回国观光，那是一批混杂的人群，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一起，高声谈话，显得很不耐烦。

共产党的海关官员有男有女，都在长木桌子上检查行李，我们要排队等候。他们把一些行李箱子整个倒出来检查，我开始关注他们会怎样处理我们的行李，因为我们两人共带了十六件行李，其中包括八个大帆

布袋。袋子里有赠送亲友的新旧衣服和一些食品，我最担心的是里面的六十五本中文圣经和一些基督教书籍。“主啊，请你照管这些东西，那些都是为了神的家而预备的。”我暗自祷告。轮到我们的时候，那些海关官员检查过我们的护照便问：“你们是第一次回国吗？”

“是的，三十年来第一次。”我回答说。

那位女关员格外友善，她没有叫我们打开每一件行李！在海关申报表上，我写着七只手表，包括我们手上戴的。我的朋友警告我说，这些手表可能要纳200%的税款。她只给三个新手表打税，而且税款很合理。我带了十二个小型计算机，两台收录音机，那是我们的亲友需要的，这些物件打的税也不太高。我们没有“走私”圣经，我们在申报表上全按照他们所要求的填写，他们既没有问我们有什么书籍，我们就不认为要自动提供那些资料。

我们的行李会直接运往目的地宁波，我把行李运送的安全交托给主，只取了两件在旅程上需用的行李，便上了火车。

///

火车启程了，我终于再次回到中国！神没有容许圣经中的摩西进入应许地，但我这同样名叫摩西的无名小卒，却蒙神得偿宿愿。我以为在这样的时刻自己会十分激动，没想到却意外地平静，觉得一点也不真实，但是心中对神充满感谢，祂让我的大梦想得以成真！我正返回我出生的地方，我植根的故土！

从火车里向外望，沿途的景色是那么陌生、又那样熟悉，因为中国的地形，多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什么改变。那是春天，农夫正开始种植稻米，他们涉足在稻田里，弯着腰在插秧，水田淹到膝盖那么深。那一阵子雨水特别多，所以稻田有足够的灌溉用水。他们还是很原始地利用水牛耕田，这叫我想起儿时见过的景象。

火车轨道穿过小茅舍，窗外人民的活动一览无遗。我在新界小屋看见的那些在风中飘扬、疏疏落落的国民党旗帜，已被共产党的五星旗所取代。除了这些新的徽号外，我所看见的东西，跟多年前离开时没有多大的分别。我是否像“立凡”（Rip Van Winkle，《李伯大梦》的主角，为

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 Washington Irving 所著) 一样睡着了, 醒来时的景物竟已是三十年后的世界?

时值三月, 我和文田、女儿离开中国前往印尼时也是三月! 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归某个循环, 而神是一切的掌管者。那是真的, 神不单掌管着各国的命运, 祂还掌管每个人的生命蓝图。我思想着: 未来的几星期, 当我探望童年、青年和早期传道的地方时, 神为我安排的会是怎样的经历呢?

我已离开父母和亲人太久了! 长久以来, 我经常为肉身的亲属和神家的弟兄姐妹流泪祷告。虽然我在属世的家中是独生子, 但在中国却有许多主内的兄弟和姐妹, 而他们就像摩西时代的希伯来人一样受到捆锁。

我愈来愈了解圣经中的摩西, 他若不是与亲属分离了, 就很难那么深刻地感到自己有极大的责任要拯救他们。他与同族人分离, 自己住在皇宫时, 看见自由与奴役有着天壤之别。他若是与族人一样, 每天都要不停地做砖, 就可能无法看见拯救他们的需要。

现在我是一个美国公民, 但我仍深深地感到, 自己与故乡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系。你若是住在自己的国土里, 就甚少会想到你有多爱她; 若是远离他乡, 倒可能常常想起祖国的人, 盼望返回故乡。我相信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 都与故乡有这种剪不断的牵连。

///

火车在宁静的绿野田畴之间奔行, 文田和我只是静静地坐着, 没有交谈, 强忍着波涛汹涌的心情。郊野完全显不出“大革命”摧残的痕迹, 对我们来说仍是那么熟悉。

沿途所经之处, 看不见任何私家轿车, 倒有许多单车、公共汽车和拖拉机, 拉着一车车的煤炭、石块、沙土或农产品, 还有不少日本制造的货车。我知道, 政府不容许私人拥有轿车, 多年在香港, 看惯路上繁忙的交通, 在这里, 却连一辆轿车也看不见, 总觉得有点惘然。

村庄的墙上满是毛语录, 但很明显是多年前涂上去的。墙上红白鲜明地写着: “毛主席万岁!” “把国家经济搞上去!”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共产党敌人!” 那些耀眼的标语是文化大革命的全盛时期写上去的, 自毛

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这些标语已失去他们的光辉，油漆的色彩褪却，墙上的纸张在风吹雨打之下，已破烂损毁，人民的梦想和盼望也同样破灭褪色。本地人很少会对这些过时的海报多看一眼，只有外国游客会以此为背景，拍下一两张照片。

我默想人生里不可避免的改变，想起但以理书二章21节写道：“**他（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历史（History）确实是“祂的故事”（His Story）。神在万有之上，仍掌管着生命中各种改变。当人类及其领袖尝试抬高自己，圣经说，神只会取笑他们意图使自己变得重要，其实他们的力量是薄弱的。共产主义在高峰时期像原野之火，烧遍大陆，但现在开国英雄已逝，人民的希望也粉碎了。

“我们吃点东西吧！”我建议：“到达广州时会很晚了。”

餐车内挤满了回乡探亲的华人，人声鼎沸，我们得排队等位子。这些旅客的目的地不一定是广州，而是从广州再分散至各地。我们听见身边的人说着不同的方言，有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在讲国语的人中，甚至可分辨出我们熟悉的上海话，那情境仿佛置身于巴别塔内。

我们点了饭和两碟菜，一面吃，一面看着郊外的景色。在山边仍可看见一些传统的墓穴，但有些好像已被挖除，用作农地。在城市内，许多坟地已被摧毁，好腾出空间来兴建新的住宅。时移世易了！在旧中国，亵渎家族墓冢是大不敬！历史上，甚至有人为保卫祖坟而动武，但是亲戚写信告诉我们说，现在火葬在城市里已经十分普遍，因此，纵有十亿人口，坟墓并不会占去很多空间。他们说，中共对百姓有五个保证，就是衣、食、住、医药和殓葬，他们保证为每个人负担简单的殓葬费。

文田望着那山边的坟墓，静静地说：“不能去看看你的父亲，多么叫人伤感！”

我哽咽着，说不出任何话来。父亲已在十年前逝世，我只能见到母亲了！父亲给我最后的印象像雾也像梦，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正要与妻儿离开，往海外做宣教工作，父亲安静地站在码头上，高高的个子屹立在亲友群中……长袍在三月的风中拍打着，他的面容像禁欲主义者，早年的道家背景，使他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知道他有很深的离愁。还记得，我们离家的前一晚，父亲跟我们一起谈话、一起祷告，他向我微笑，用英语叫我“摩西”——父亲给我取的教名。

父亲啊！父亲！我终于回家来了！没想到，竟一去这么多年，而你已返回天上的家，不能来接我了。父亲啊！我永远怀念你！

我们回到座位上，一位年轻的列车服务员，用拖把擦拭我们旁边的地板，她就这样逐一在车厢内进行着清洁工作。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短袖上衣，把短发挽在脑后，一面向前擦着地板，一面害羞地微笑着。车厢里相当舒适，却古旧得好像是这世纪初所制造的。我和文田面对面坐着，中间有一张小桌子，窗子上挂著有饰边的窗帘，而我们背后的壁上，则挂着一棵栽在小瓶子内的植物。

一些穿着白色上衣，戴着毛帽，穿着过宽黑裤的年轻女服务员，不时拿铝壶来为我们冲茶，并盖上杯盖。每个车厢后面的天花板上都悬挂着一台闭路电视，播放着一些节目，及女服务员用甜美声音广播的通告。从香港往广州的几个小时之间，我们看了中国见闻、著名的天津杂技团表演和一个魔术节目。

我们一心只想着：与母亲的重逢会是怎样的呢？当年的儿子，回到她身边时已成为祖父了！我们能否再次见到我服事的第一间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是否忠心地为主站立得稳呢？可有一些人为耶稣的缘故而牺牲性命？可有一些人在极大的压力、逼迫下，或因逃避监禁而卖主？他们是否还认得我？而我，还认得出他们吗？

第 27 章

宁波团圆

火车兜了一大圈子，终于驶近宁波，
我又回到我的根，我的种族之根，
地理上的诞生之根，以及我的信仰之根。
道家描述的永恒人生，无论凡人如何追索，终究不明白。
但是在基督里，我找到自己永恒的人生之锚，
那正是如今引导我去实行他完美旨意的去向。

在广州下车后，只见火车站闸口外，挤满了一波波焦急等候亲人的
人海，我们着实费了一番工夫才挤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到广东首府广州，广州市有两千年历史，位于珠江三角
州北部，有三条河在那里汇合。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广州是中国人首次与
外国商人、殖民者及其他受欢迎与不受欢迎之“侵略者”见面的地方。

广东人的身材一般比北方人矮小，他们在海外谋生时，很会经商赚
钱，然后就寄回家乡，建房屋、购置田产。

旅行社的人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带我们搭乘一辆现代化、舒适的公
共汽车到达一间华侨旅馆。我们解释说，因为想要赶快和家人团聚，不
必留宿，不过，看来想把旅途时间缩短的计划，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
自由掌控！想拜托旅行社的负责人动作快一点，也行不通。对于服务旅
客、接待外人，三十年来，他们一点进步也没有，甚至比以前更差！这
才发现我已习惯美国那种电脑化、即时而有礼的服务。我对那些政府“公

仆”的态度感到很不耐烦，好像听你诉说已是赏你一个很大的面子，我肯定他们从未听过“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格言。

一个站在我旁边、正在排队的人抱怨说：“四人帮把整个国家的道德都打垮了，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吃这苦果。无论勤劳与否，人人所得的工资都一样，只要在其位，便得俸禄，这样你大可什么也不做。若勤劳工作，你的同事会取笑你，叫你‘小绵羊’，意思是说你愚昧，尽管努力，也得不到什么。工人往往从工厂的前门进、后门溜，什么也不做，没人知道，也没人理会。这种工作态度，使工厂的生产变得极为缓慢。”这个陌生人做了很长的一段分析，我也深有同感。

///

火车车程需要三十个小时，我们愈来愈感到心焦，因为停留在那的短短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国家的“制度”，造成一切进行得像蜗牛一样，但我们无法催促它快一点。我们遇到了更多的排队，更多的耽延，更多得不到回覆的紧急问题。最后，我们终于搭上了那列前往目的地的火车。

事情并不像大鹏飞翔那样直线地进行，而是像一条毛毛虫，绕着一片菜叶爬行那般迂回！开始时，火车取了一条曲折的路，先朝西进，然后才绕回东岸。我们经过广东、湖南、陕西各省，最后来到浙江。火车在郊外疾驰时，我曾看见墙上漆着当时共产党主席华国锋的一句标语，说：“思想要解放！步伐要加快！勇气要更大！做事要进步！”我心想：你在开玩笑吧！

我们又再度坐着看郊外，停车的各站，静得叫人难以置信。那些车站很清洁，并且井然有序，没有兜售零食、茶叶蛋、米糕、炸鸡或美味面食的小贩。我很怀念从前在火车站上售卖的美食。那些小贩嘈杂的叫卖声、那些令人垂涎的小吃，都是搭火车的乐趣之一。缅怀着往日，像小孩一样期待着那些叫人兴奋的事物。

不能品尝国内各地美食，叫我有点失望，那正是我们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之所在呀！这次回来，我没打算吃什么山珍海味，只希望品尝一下传统食物。还好在陕西一个小站稍作停留时，买到一些糕饼，令我回味

无穷。后来还找到一种熟悉的蒸包，虽然颜色不是白的，而是叫人失望的灰，但至少“包子”里有些咸肥肉，是我熟悉的家乡风味。我的衣着虽然很朴素，但本地人一眼便认出我是海外华侨，这些同胞们友善地推我向前行，让我先买为快，实在令人感动！

///

旅途中，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一个陌生人开始与我攀谈，他以为我是外地出生的华侨，今天第一次探访祖国，便很热切地向我介绍了一些历史背景。

“你知道吗？绍兴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这里是两位名人的出生地，有一个博物馆就是用来纪念他们的。他们两人都姓周，一位是著名的作家周作人，笔名鲁迅。”我早在一九三〇至四〇年代读书时已知道鲁迅，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政治评论家，也是近代文学的滥觞，他选择以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另一位是周恩来，”他继续说：“他是人民爱戴的前任总理。”

我点头谢谢他给我这些资料。其实，我们正停在我的出生地！虽然我以宁波为故乡，因为年轻时住在宁波，但其实我是在绍兴出生的，我没有告诉那人说，虽然我没什么名气，不过我也姓周！

在小站短暂停留时，我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步行了数分钟，沉浸在昔日回忆里。眯着眼看从前行过的水道，河上有一些古老的乌篷船，得用脚踩踏，才能使船推进。我记起那单调、自在的声音，小船一遍复一遍地咻咻咻响，我们则坐在船里悠闲地品茶、吃点心。小时候，春节要探望亲友，就是用这一类小船。那时的生活，天天都是如此悠闲、恬静、美好。

火车逐渐驶近宁波，我的思想也跟着跃回童年，想起父亲要我背诵的一段道德经：“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十六章）

火车兜了一个大圈子，我又回到我的根，我的种族之根，地理上的诞生之根，以及我的信仰之根。道家所描述的永恒人生，无论凡人如何去追索，终究不能明白。但是在基督里，我已找到自己永恒的人生之

锚，那正是如今引导我去实行祂完美旨意的去向。火车好像永不停止似地不断前行，不过最后，我们终于驶近宁波。经过一番折腾才及时下车，忽然有一大群我不认得的人涌上前来，让我又惊吓、又茫然。

我是家中独子，所以父母亲收养了四个孤女，让她们在家中与我一起成长。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儿女和孙儿女，她们都比我记忆中的样子老了一至两代，脸上留着许多受苦受难的烙印，其中有些人下过监，受过折磨。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何时到站呢？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时间表如何，他们必定是天天在这里等候每一班车的到达！

母亲呢？母亲在那里？有什么事发生了吗？我的心焦急地跳动着，无法隐藏不能在车站上见到她的失望。

幸好，亲友急忙保证母亲安好，已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我回去。

///

宁波啊！我终于再次踏足在你身上！这城市是浙江省东岸的一个著名海港，自唐代起（西元618-907年）已开始对外贸易。宁波的商人越洋与日本、韩国、东南亚，甚至欧洲各地进行贸易。这城有许多水道交错，如今有一座新桥将城河的南北相连，夜晚看去，万家灯火把她点缀得风姿万千。三座弯桥犹如彩虹一般，河中驳船和小艇往来如织。

不知道红卫兵对宁波的古迹和历史文物有多少破坏？希望天一阁藏书楼和西区的花园没有受到摧毁，那幢美丽的建筑物和平静的庭院里，覆庇着最古老的图书馆，收藏了三十万部珍贵的书籍，我盼望它们仍完好如初的安藏在那里！

当时任何到中国旅游的人，包括我们，都要接受旅行社的安排。没有他们的安排，寸步难行！因此，亲友带我们到旅行社安排的海外宾馆。我们放下行李，马上乘计程车直奔老家。由于国内计程车不多，也很昂贵，所以来与我们见面的人，多是骑脚踏车或步行而来，因此他们比我们晚到达母亲的住所。

母亲的居所从前是浸信会的牧师馆，现在政府把它分成一些单房或两房的小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接管了所有的教会建筑物。我们

从前住在宁波郊外教会的隔壁，政府认为教会与那房子是同一个单位，因而接管了整幢物业，并要我父母离开。他们分配给我父母两个房间，并且要在房子外面煮食。父亲死后，他们再把母亲的住所缩至一个房间，前面用作起居室，后面用作卧房。

我们从计程车下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母亲、我的岳母和大姐。我们赶紧穿过大门，进入院子与她们见面。虽然我们都很激动、很兴奋，但是根据中国的风俗，我们没有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母亲的双手，不愿放开，强忍着泪水；母亲则喜极而泣。我仿佛人在身外，以旁观者的位份目睹这一幕。

我轻声对母亲说：“我觉得好像做梦一样！”

母亲啜泣着说：“我不时地梦见我们重聚。半夜梦醒时，我非常失望，因为只是一个梦，我感到更加孤寂，不知流了多少泪！后来，我又作梦，梦见我们再重聚，而你也不再离去。我醒来发现这梦也不是真实的。儿啊，我希望这次不再是一个梦！”

梦境终于实现了！我和母亲再次聚首。我曾求神在我们有生之年让我们重聚。但中国似乎与外界隔绝，在国内有三反五反，划清界线，海外关系拦阻我们自由通信，我不敢奢望能回到中国与母亲见面，只希望能与母亲在有生之年团聚，奉养她安享余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她老人家离世前，将她接出中国。

我渴望单独与母亲倾谈，把多年来积累的话统统向她倾倒出来。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已不能直接与双亲通信，因为他们跟在美国的我联系，是政府所忌讳的。我都是把信寄到香港，再透过朋友转寄给他们的。从中国寄出的信件，政府会抽查，因此双亲也不能把我想知道的事情告诉我。我尝试从字里行间，了解他们的言下之意，但经过多年的分隔，要这样做也并不容易。

我和母亲几乎没有机会私下安静交谈，这令我感到有点失望。许多人在家里进进出出，有亲戚，有朋友，他们都带着儿女来，为我们回国而高兴，母亲为了儿子的荣归，特别请了几位亲友为众人预备膳食。他们几个月前已开始筹备这件事。有些亲戚也带食物来，与众人分享，其中有佳肴美食、山珍海味，甚至有不是这个季节的食物，只要他们记得是我爱吃的，就都带来，有鱼、蟹，甚至从上海带来西式蛋糕。他们不

惜一切来欢迎我，使我感到荣幸万分。此情此景，令我想起当年结婚时的喜庆，访客如潮水般不断涌来，纵然他们已一一介绍过，我还是只能认出几副面孔。

我记得一首古诗这样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孩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文田和我抽出几分钟环顾这屋子，他们改动了许多东西，但我们仍然认得这幢产业。我们也去隔壁看看从前就读的小学，现在虽已分隔成几个住宅单位，但我仍记得办公室和教室的位置在那里，往事不堪回首，真令我伤感不已。

第 28 章

一起敬拜

星期日早上，天仍未亮，人便开始涌进四合院。

母亲的屋子，站满了人，有的是基督徒，亦有些是来看热闹的，
我的干部朋友还是来了

满屋子的人喜乐地敬拜神，唱诗赞美他。

他们唱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没人敢唱的旧诗歌，

现在，就是年轻一辈也能跟着唱。

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欢庆重聚时，一个穿着深蓝色毛装的人出现在门口。他微笑与我打招呼，并伸出手来，说：“还记得我吗？”

我努力思索，随即有人提醒，他是我在年轻时就相识的一个人，高中毕业后在一家百货商店工作，其后奉献给主，在一所圣经学院进修，后来做了循道会的牧师，现在他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员，受命于共产政府的宗教事务部之下。

他说：“我来告诉你，我如何信奉共产主义的。”他对我说他的政治“见证”，并告诉我一些他认为我已经知道的事情真相。

“帝国主义者在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强迫我们签署各项不平等条约，每一次都从我们身上榨取利益。外国人侵略中国，剥削中国。你知道那些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由外国宣教士起草的吗？他们有几个人在宁波当宣教士（他提出了他们的名字）。外国人不单用鸦片荼毒中国人民，更向中国政府要求一些治外法权的特权。一个外国人杀了中国人，

中国法庭不能判他的罪；外国宣教士开办的学校使中国基督徒变成‘走狗’；宣教士在所有外国人所犯的罪中都有分，他们将宗派引进中国，叫我们分裂；他们用外国钱收买我们的忠贞。”

他的“讲词”听来好像经过背诵和排练似的，十分纯熟。我当然很熟悉这个观点，我估计这位从前的朋友、现在的干部，是被派来了解我的政治立场，并监察我的一切行动，他很小心地观察我对他所说的话的反应。

这是我回家的第一个晚上，人才刚到，他竟这么快闯进来，在这里纠缠不清，不是太无礼了吗？他阻碍我与母亲相聚，又胡言乱语，实在叫我很不耐烦。

我默默地求神把他的到访转化为好事，让我们从中得到益处。我鼓起勇气问他：“后天是主日，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主日崇拜吗？”我早已知道，政府自从一九六六年七月血腥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不容许举行这样的聚会了。

他被我的要求吓了一跳，冷冷地回答说：“这有些困难，这里仍然没有可用的礼拜堂。有一间正在清理，但是还不能用。”

“你当然知道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神，并不需要一座礼拜堂。”

“但是你也明白，我们的政府，是把宗教聚会限制在宗教建筑物之内的。”他反驳说。

我引述了在火车经过的布告板上，所读到华国锋主席的话——那是有关要有勇气和主动性去向前推进——来回答他，他似乎奇怪我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继续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不加快步伐向前进呢？中国政府说，做事应该要知道变通呀！”

我坚持不让：“我们可以在我母亲家中举行主日崇拜聚会。”他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你可以回去和你的同志商量一下，明天再告诉我好吗？”时为礼拜五，我攻其不备，他只好悻悻然离开。

///

欢迎的聚餐和重聚的时刻，继续进入高潮，在这段欢愉且兴奋的时间，我不忘向神祷告。“主啊，正如圣经中摩西所求：‘让你的子民去，可

以敬拜你’。中国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是借你子民的祷告、眼泪和信心而得来的，求你使这个政府准许我们在礼拜日聚集，宣扬你的主权！”

我们在宾馆过了一夜，文田和我天亮之前便起床，乘一辆三轮车到母亲家去用早点，然后，我们按照先前安排好的行程，到郊外去给父亲扫墓。父亲的墓已经从原本安葬的地方迁往山顶。我们所乘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机，它可以在狭窄而崎岖的山路上行驶。这次只有我和文田，加上几位亲友前往，因为母亲经不起这样的劳碌奔波。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坟墓都被掘起，墓碑放在通道上当作石阶。有些人把墓碑拿去做自己家人的墓碑，他们把原有的名字削去，再刻上自己家人的名字。由于木材短缺，也有人把坟墓掘开，取出棺木，弃掉尸体，拿来做家具。因为许多坟地都给铲平了，因此我父亲的坟墓也移了位。

我们到达山上，车子已开不上去了，只好下车，攀爬山路到父亲的坟地。我们在那里静静地站立了很久，风柔柔地吹过山顶。我流着泪向神祷告，为父亲忠心的生活和见证而感恩。我为了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而极其悲伤，但确信他已经返回天家，与主同在。

我们一路默默无声地乘车回母亲家，当天稍晚的时候，我的干部朋友又来了，他说：“我有好消息带给你们，政府方面已同意让你们举行一个特别的聚会，因为这是你第一次返乡探亲。”

“感谢主！”我说，并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推托说：“我明天很忙，来不了。”

“我可以配合你的时间安排聚会呀。”他仍然支吾以对。

///

星期日早上，天仍未亮，人便开始涌进四合院。母亲的屋子，站满了人，有的是基督徒，亦有些是来看热闹的，其中有很多是年轻人。我的干部朋友还是来了，他用很奇特的表情对我说：“这么多的群众！政府有规定，凡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年男女，都不可以参加宗教活动，请告诉他们，凡不满十八岁的都要离开。”我就请他自己跟他们讲，结果没有一个人移动。满屋子的人喜乐地敬拜神，唱诗赞美祂。他们唱了一些文化

大革命期间没人敢唱的旧诗歌，现在，就是年轻一辈也能跟着唱。

我先带领大家唱一首短歌〈荣耀归主名〉，接着念约翰福音二十章19节至23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读完后，我就开始传讲信息。那位干部很害怕，他说这篇道会给我带来麻烦，他责备我：第一、不应把“黑夜”比作中国的处境，因为现在是东方红、太阳升起的日子。第二、不可以说现在是末世、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而且不应指出门徒“害怕犹太人”，即当权者。

///

许多人盼望我们带圣经回去，当他们知道我们带着一些，就急切地向我们索取。公开地分发圣经是不智之举，而且可能使聚会被迫停止，于是众人轻声地把消息传开，说他们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地走到后室，在那里拿取一本圣经。他们都喜极而泣，静静地把圣经收进外衣带回家。

聚会后，亲戚都留下来与我们一起用膳，两三张大桌子都摆满食物。那些来“探望叔叔”的人，许多是最近信主的，我连名字都未曾听过，但在基督里都像弟兄姐妹一样亲密地团聚。

接着，当地的革命委员会请我们吃饭，来的是高级干部，亦请了几位传道人作陪，我心中感谢神，我本是阶下囚，现为座上客。吃饭前，我要求他们把我前面的酒杯拿走，代以喝水的玻璃杯，同时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吃饭前要祈祷，他们都同意，我就在他们面前开口感谢神，也为国家的领袖祈求。席间，我把带来的电动刮胡刀送给他们，以后我们就互道珍重再见。

主日聚会以后，我算算，在去北京以前，还有一点时间与母亲相聚，也可以休息一下，想不到这些弟兄姐妹非常热情、也是非常有心地每天到

家里来探访我，从早到晚一批一批的人川流不息。有的来问关于圣经里的事情，跟我一起查经，有的是盼望能得着神的话语。让我心里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是：当我把一本串珠圣经，交到一位弟兄手里的时候，他竟然激动得抱着圣经大哭，也感激地拥抱我，真是一幅感人的景象！

由于贺客盈门，家里吃饭的时候总得席开二桌，教会弟兄姐妹也都来协助预备膳食，还有人在河里捕捉到一条大鱼，就带来与我们一同享用。

第 29 章

父亲受难

因为父亲在政府主导的学习会中，大胆直言，
为教会的忠心传道者辩明是非，得罪了领导层，
当局认为他是顽固分子，脑子是花岗石做的，
加上我在海外，就借假罪名把他拘禁入狱，
至于他在牢中受了什么苦？
他被释放后，从未向人诉过苦，
也不愿向家人提及。

那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在母亲家接待客人，谈论我们分离后所发生的事，还回答各样问题，交谊团契。最后，我坚持将母亲带到旅馆，好让我们能单独交谈。

“妈，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她呆坐了一段时间，没有回答我，双手不断发抖。这次回来我留意到，她说话的速度比我记忆中慢很多，走路的步伐也是一跛一跛的，常常要由两个人搀扶着，我问亲属们，她在那些恐怖的年日里，可有受过身体的伤害？他们摇头说没有，但说话的时候却逃避我的目光。

母亲拖着脚行走，有时候，若声音很嘈杂，或身处人群中，她会突然立定，好像受了惊吓。后来我发现，当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即使我们只是横过一条繁忙的街道，她也会显得不知所措。一位亲属把我拉到一旁说：“你父亲遭遇不幸以后，她就被吓成这个样子了。”此外他们便

不再说什么。

///

最后，母亲终于说话了，但声音是那么微弱，我要挨近去用心聆听。“……就是在共产党掌权后，你父亲仍勇敢地为耶稣作见证……像从前一样，常常作见证，劝人要信耶稣。”

回乡后，许多朋友都告诉我，父亲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告诉别人有关主的事。他没有读过神学，是教会中的长老，他知道主呼召他去作见证，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来做主工。

父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跪在床边的硬地上祷告，以致膝盖上长了硬茧。他祷告的地方就在我睡房隔壁，因此我知道他天未亮就起来祷告，不过他很安静，不会骚扰我们，到了六时或七时，他的祷告才会比较大声。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祷告，他每次都祷告两三个小时，并且常常禁食。他会为很多事情祷告：为他所知道的、神国度的工作祷告；为他作见证的对象祷告；为他的儿女和他们的儿女祷告。

早上父亲会跑到街上与人交谈，分享圣经，并逐家逐户去分发圣经。他为人极慷慨，不会拒绝任何有需要的人，他们若需要金钱，也会给他们，有时送日用品，甚至连穿的衣服也会脱了送给人。他的本性善良，加上信主后，因着神的爱，他常愿帮助需要的人。我记得，他在家中收养了好几个孤儿。我年少时，父亲曾接待过一个中年的吸毒者，虽然家中的人都不喜欢，父亲还是向他传福音，盼望他信主。我也记得，父亲帮助过无家可归、两代寡妇的母女，带领他们归向真神。

记忆中，我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春天，当父亲与我到后园巡视时，忽然看到园中已经可以收割的蔬菜，全被割去，竹园里刚钻出的春笋，已被折断，只剩下根部留在土中，好像被野兽践踏过的残景。父亲看见这情景后，一言不发的，走到邻近村庄的一间破屋前，推开了木门，里面出现一个睡眼朦胧、衣衫不整的“阿木”。

这人是全村皆知的惯窃，屋内到处都是蔬菜和断笋，这是他昨夜忙碌的成果，犯罪证据使他无话可辩，只好就地求饶，父亲没有以恶言相问，只是叫他改过自新，以后别再偷窃，甚至还留一些蔬菜和竹笋给

他，余下的，请他帮我们拿回家中，家人为这些食物忙了大半天，连着吃了好久的咸菜和笋干，还不知道原因何在。

有时父亲会带我到街上一同作见证、分派单张。我虽与他同去，但有时难免会问：“为何我们要这么辛苦去领人归向基督呢？神既是全能的，为何祂不站在天空中，向所有人显现，然后吩咐他们相信祂呢？”

父亲像长官一样满有权威地回答我：“神希望我们作祂的见证人，证明祂所做的事，这是祂的命令，我们必须遵从。”

父亲很热心地作见证，以致别人谈及他怎样事奉主时，会说他是一个狂热分子，甚至说他是疯狂的。他不单觉得自己必须传道，而且，自从神多次回应他的祷告、救回我的命以后，他也不停提醒我：“我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你。我已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叫你服事祂。我希望并求告神，让你成为一个传道者。”

他一次又一次地谈及对我的期望，即使遭母亲和收养的妹妹反对，父亲也坚持说：“我的儿子必定要做一个传道人！”我走每一步，他都鼓励我；当我犹疑不决时，他总是站在我旁边；当我因一些神仆表里不一的生活而受挫时，他就教导我把目光从人转向主。他日日夜夜提醒我：“你的生命得保存，是为了作主的仆人。”

///

他热切为主作见证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么，父亲发生什么事了？”我催迫母亲把更多事情告诉我。

“他们强迫每一个人劳改，去做苦工。政府把你父亲派往宁波的一家酒厂工作。”

“酒厂！”我惊讶地说：“他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吗？”

“他们当然知道。就因为这样，他们才派你父亲去做那种工作。所有传道人，甚至是牧师，也被迫去做制酒工作。你父亲很努力工作，但在那些可怕的『批斗会』中……”她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妈，那是怎样的？”我柔声地问她，我知道叫她回忆那些日子是痛苦的。

“他很失望、很沮丧。他不忍看见那些忠心、无辜的传道人被冤枉，

说他们做了许多无法无天的事，并且受折磨……”母亲停了很久。“他们也诬告你父亲……一次、一次、又一次……”

我没有干扰她，只是等她能说时再继续说下去。

“他不介意他们怎样控告他、攻击他，但是当他们的攻击其他人……是的，是其他人，他便感到难受。他不明白为何神容许祂忠心的仆人、牧师受苦，而不拯救他们。有些人自尽了……”

“每次他从那些批斗会回来，就许多天不能吃饭、也不能睡，他变得很沮丧，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些传道人反目相对，彼此出卖？我真的不明白。’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问。”

因为父亲在政府主导的学习会中，大胆直言，为教会的忠心传道者辩明是非，得罪了领导层，当局认为他是顽固分子，脑子是花岗石做的，加上我在海外，就借假罪名把他拘禁入狱，至于他在牢中受了什么苦？他被释放后，从未向人诉过苦，也不愿向家人提及狱中的事。

“妈，我在西方教会事奉主，他们有没有指控我？父亲有没有因此而受苦？因我而受苦？”我很激动，几乎说不出话。

“是的，儿啊！他们也指控你，说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说你父亲有海外关系。但你父亲不在乎这些指控，没有为此担忧，也没有为你担忧，因为他知道那些指控是不真实的。他常常说：‘我的儿子不是那种人！他若做那种事，就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是那种人！’真正叫他苦恼的，是看见教会里，神的仆人受逼迫、受折磨。那才是把你父亲拖垮的原因，他为此伤心绝望至极。”

“那些指控者找不到你父亲有什么错处，就说你父亲必定是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不停地传福音。这事反而使他高兴，他说因为神给他机会为耶稣受苦了。他不能忍受的是别人受逼迫。就这样，他的身体变得愈来愈衰弱，直到……”

母亲坐着，良久不说话，黑夜渐渐笼罩我们的房间，她却视而不见。

然后，她几乎是耳语般说：“你父亲临终时安慰我说：‘不要担心，我们的儿子总有一天会回来，他会带你离开这里。我们所受的苦，若与永恒的喜乐比较，是短暂而轻省的。神是信实的！’”

我们两人都不再说话，只是紧紧地互握着双手。我的热泪，静静地掉在母亲那粗糙的裤管上。

第 30 章

恐怖岁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恐怖事件，
是共产党采取“强硬路线”的阶段。
政府把基督教工人和平信徒下监，送进劳改营或边疆。
他们与教会和家庭分离，许多人从此杳无音信。
这些打击不但临到基督徒身上，
也临到其他宗教人士身上。

我在宁波的一个星期里，许多亲戚朋友来看我们，分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恐怖年日里的第一手经历。有些人说得声泪具下，有些人怒不可遏，有些人咬着牙关，还有些人则表情冷漠地诉说痛苦往事，仿佛谈的是别人，事不关己。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人的恐惧感仍很明显，那些把故事告诉我的人，都不停地四处张望，惟恐隔墙有耳。第二个星期，当我随着三自爱国运动会赞助的基督徒旅行团旅行的时候，也发现同样的现象。为了保护我在不同情况、不同城市所遇见的人，我不便明说是谁，或他们在什么地方吐露过心声。

有些见证，是与我一起成长的老朋友告诉我的，有些则是陌生人在公车上告诉我的。一些牧师也讲述他们多年被囚于劳改营或监狱中的经历。有一个人，不发一言，把要说的话写在手掌上给我看，也有人比较勇敢，直言不讳，显然不介意谁在侧耳而听。有些故事我是在别人家中

听到，有些则是家庭教会的领袖告诉我的。晚间走在街头，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也听到神怎样保守祂的忠心仆人，捱过极大的艰难和痛苦，或有些人又怎样捱不过。连坐在单车后座，前往信徒家的途中，也听到一些故事。

我曾参与一次“澡盆洗礼”，那位初信者原是一名政治领袖，我也有机会听他讲得救的见证。吃饭、游览、交谈，都能听到人们心声。我听到在最黑暗的年月里，人们日常的生活的光景如何？又知道在迈进一九八〇年代时，他们的生活又是如何。

///

离开中国的三十年里，国家经历了好几次政治动荡，像钟摆一样从这个极端摇到另一个极端，每一次都叫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新政权统治的政府，加压在基督徒身上，视他们为另类的人，指控他们存着反革命的态度，并进行反革命活动。回教徒、佛教徒、迷信者和祭拜祖先的人，也不能幸免。不单是基督徒或其他宗教的信徒受苦，一些本地的共产党领袖不讳言地告诉我，他们也曾被指控和迫害，在文革中吃过苦。政治斗争影响着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与西方国家有联系的人。我们必须知道那些飘忽不定的政治风暴曾怎样影响教会，然后我们才能了解今天基督徒的处境。

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在所谓“解放”中取得政权，当时并没有立即干扰宗教活动。然而，新政府却巧妙地一点一点地控制教会和信徒。到了一九五八年，基督教会的出席人数开始下降，因为政府强迫人民一星期七天，在工厂里进行生产工作。他们也必须参加一些经常性的小组政治会议。同时，基督徒也惧怕和外国宣教士过于紧密联系，因为政府的排外态度愈来愈强。政府“建议”许多教会关闭，并把教会建筑物用来“服务人民”。而且，无论不同宗派之间有什么分别，政府都强制规定联合崇拜聚会。

政府在一九五一年设立了宗教事务部，以控制所有宗教。每一个主要的宗教，受制于一个独立的部门之下。在基督教方面，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和天主教全国爱国协会。三自意思就是所有教会必须自养、自

传和自治，说来好听，其实三自只是用来对付各种外来控制所做的政治反应。在那些国家控制的运动里工作的人，都是一些得到国家信任，能实行共产党路线的宗教领袖，由政府付给酬劳。政府没收了教堂和牧师的住所，租给人民作住宅，收取租金，有些则用作工厂或仓库。政府把租金交给三自组织，让它管理所取得的所有教会产业。

从开始，许多真正的基督徒就拒绝与三自运动有任何联系，他们相信三自会跟政府妥协。他们也远离一些与三自有联系的牧师，称他们为自由派、打小报告和政治傀儡。那段期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怀柔政策”。

神一直在预备一些本土化的华人基督教群体，来面对即将来临的共产党“强硬路线”。很快地，政府没收教堂，将牧师关入监狱，把外国宣教士赶出中国，那时，与外国宣教组织紧密联系的教会，成了凤毛麟角。

但许多教会从开始就是独立的，他们约占基督教更正教会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以三个主要的本土化群体为代表，就是：“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小群教会”（即由倪柝声设立的“基督徒聚会所”）。这些群体，大部分不接受外国控制，也不接受外国在经济上的支持。他们是很强的福音派，通常在崇拜和聚会时带五旬宗的特色，而生活往往是公社式的。他们不需要教堂，不属于任何宗派，以家庭聚会为主，有坚强的平信徒事工。他们不必为政府所施加的压力而忧虑，因为他们的团契和崇拜的结构是分散的。他们已经根据新约的方法，按三自的原则来运作。

///

接着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运动并不如其名那样“文化”，它与创作艺术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把古代、当代文化连根拔起的一场龙卷风，对整个国家造成极大的震荡。这运动由毛泽东和“四人帮”发起。所谓“四人帮”指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三个极左的共产党年轻领袖，他们在毛泽东的暮年强烈地影响着他。

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全国都疯狂起来。由于毛泽东知道他对共产党的控制力正在下降，因此想出这个可怕的计划，唤起千千万万不认识革命“长征”为何物的年轻人，他们不曾经历上一辈所经历的，毛泽东要让他们尝一尝革命的滋味。

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学校，数以百万计由初中至大学的年轻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串联到全国各地去“破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毛又鼓励他们攻击任何人，包括政府的高层官员、老师，甚至是中坚干部。这些红卫兵臂上的红章，便是他们的通行证，让他们到处破坏珍贵的国家纪念馆、历史遗迹、公共建筑物，并侮辱和迫害人。他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人身上海所欲为，包括对付宗教人员和制度。

毛泽东容许人把他当作神明，这主要是他的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所构想的计划，想以政治效忠把人民团结起来，使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宗教性的狂热。借着大量印制毛语录小红书来广传，毛语录被视为共产党的“圣经”，因为，人民学习和背诵毛语录，就像基督徒在研经小组研读和背诵圣经一样。

群众被迫接受毛泽东是他们的救主、伟大的拯救者、至高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等等。红卫兵的狂热失去了控制，以致整个国家几乎进入自毁的状态中。毛泽东便命令人民解放军，把他自己燃起的大火扑灭，免得被不能控制的暴乱完全毁灭。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大部分教会都已关闭，红卫兵烧毁圣经和基督教书刊，宗教领袖遭受侮辱，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困扰、逼迫，甚至杀害。一些跟外国宣教士有联系的基督徒，尤其受到攻讦。最后，就是与三自运动有关的领袖和人民也不能置身事外。

政府要求教会工作者举行“自我审查”，其形式和激烈程度跟斗争大会无异。共产党员强迫人“彼此帮助”和“自清”，与反革命“划清界线”。一些牧师和基督教工作者甚至被迫而自杀，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作假见证控告人的压力。

中共政府至今仍坚持基督徒从未因宗教理由而被杀害，坚称那些情况通常是基于道德、伦理、政治原因。共产党不想制造任何殉道者，免得他们被视为英雄。他们也否认曾在没有证据之下，把任何人判刑——但是他们怎样取得证据、证据是否确实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的策略是强迫所有基督教工作者互相批判，然后他们收集所有证据，宣称：“我们没有指控你们，是你们自己人干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恐怖事件，是共产党采取“强硬路线”的阶段。政府把基督教工人和平信徒下监，送进劳改营或边疆。他们与教会和家庭分离，许多人从此杳无音信。这些打击不但临到基督徒身上，也

临到其他宗教人士身上。

中国宪法声明，人民有“信仰宗教、不信仰宗教、奉行无神论的自由”。政府不会干预一个人内心的宗教取向，然而，法律却不容许人公开进行宗教活动，也不能宣传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无神论者却有权宣传他们的无神信仰，因为政府是信奉无神论的。也就是说，无神论者可以反对基督徒、佛教徒，或任何人。随着时间过去，人民选择信仰的宪法权利，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褫夺了。在那些混乱的年月里，就是宗教事务部也停止了运作。

共产党的宣传机关向外面的世界宣称：所有宗教已在中国消失了，年轻一辈全是开明的无神论者，服务人民才是最高的荣誉。毛泽东尝试说服群众，让他们以为，中国具备进步的智慧和力量，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因此他把中国的门关闭起来，去实践他那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

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逝世，四人帮被捕，他们“篡夺党与国家权力”的计谋遭粉碎后，发生了一次权力斗争。他们继续共产党的“强硬路线”，在多次被整肃的副总理邓小平，和任期很短的新党主席华国峰的领导下，一个较温和而开放的政府执掌政权。欢迎外国援助的新政策，使举世震惊，这跟毛泽东先前的孤立政策背道而驰，他们欢迎西方专家，帮助中国在公元二千年之前达成现代化。

我在一九七九年首次回国时，当时的领袖已开始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恐怖事件道歉，并声称那并非他们的错。他们以四人帮为代罪羔羊，消除毛泽东主席的罪责。我在中国期间，无论走在那里，都听到人们把所有国家的错处：发展缓慢、经济衰退、工业萎缩等指责，全算在四人帮身上。在北京的言论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承认毛泽东犯了一些错误，但说那是由于四人帮不当地影响了他，还说“毛主席并非神，却由于他救助了人民的许多成就，仍然应当受到尊崇。”

我首次探访期间，中国正在为那些被控反革命、被下监、下放的人平反，即使他们已经死了，也要恢复那些受逼迫、被中伤之人的名誉，那是为了国家良心而作出的谢罪。许多宗教人士和基督徒，都得以从监

狱和下放中得到释放。

可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些平反来得太迟了。我父亲已经在逼迫和苦难中死去了，他已看不见钟摆摇向另一方的景况。我知道，很多在宁波的牧师，都受到很大的痛苦；不论他们年纪多大，有些在恶劣的天气下，仍要出去清理街道，做各种肮脏的苦工。我的朋友告诉我，父亲从不透露他在监狱中发生的事，或他受了什么样的待遇，他在最后终于获得释放的时候，性格已被扭曲，变得怯懦和疑心重重，那并不是他的本性。而且，他的健康每下愈况，直至离世见主。

第 31 章

红毯底下

在中国孤立自己的黑暗年间，我们从不同来源听到：
那些隐匿在暗处，真正的中国教会，
在政府的压力逼迫下，在红卫兵无法无天的摧毁下，
仍然生存着，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她！
文化大革命的逼迫，把假基督徒筛出去了。
然而，千千万万的人仍然保持忠心。

我们跟母亲在宁波度过一星期后，文田继续留在宁波，与家人相聚。我则按照预先安排的行程，独自去杭州，参加了由三自爱国委员会作东的访问团。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是首次邀请国外华人牧师的访问团。

我在一九七九年回到中国的旅程，实际上要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睽违三十年的母亲在家里共度一周，跟那些靠着圣经的力量才生存下来的会友相聚。他们没有礼拜堂、牧师和神学院校，即使圣经和属灵书刊也极少。第二阶段的旅行，则是在政府登记有案，由共产党控制的教会组织所赞助。

///

他们这次的邀请，是否代表共产党政府在宗教政策上有所改变呢？

可惜不是。纵然中国在毛后的年代有许多改变，但仍属于共产党，坚信无神论。虽然中国已有了很多改变，却仍保留着基本的马列思想路线，对宗教的敌意仍未清除。那么，中国为何放宽了一些宗教上的限制，并正式容许某些教会开放呢？

我参加访问团期间，人民日报仍把宗教定义为：“人面对自然和社会压力时，因感到无力和恐惧，而作出的无用和错误的反应。”那么中国为何又好像容忍宗教的存在呢？毛泽东死后，对宗教采取较柔和的路线，似乎是联合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去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最佳策略。中国清楚表明她的目标：“所有持有宗教和无宗教信仰的人民，一起同步前进，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政府现在似乎放松了人民的宗教活动，容许人在登记有案的建筑物内进行。这政策并非因为政府看见宗教有任何价值，只是为国家发展而实施的权宜措施。政府多次声明：“只要有适当的科学和无神主义教育，人自然摒弃各种精神上的束缚。”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不过，官方资料表示，政府承认“宗教”与“迷信”是有分别的。他们解释说：“宗教是迷信的，但并非所有的迷信都是宗教。”他们定义宗教为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如有某种经书、有教义、礼仪及某程度的组织。中国承认的五个宗教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和道教。

他们坚持，对于封建迷信，必须积极地加以抑制，然后予以消灭。其中包括：“邪术、巫医、占卜、算命、去灾求雨、求子女、赶鬼、医病、看面相、手相等。”其中有几项和新约信仰略有关连，结果给了迷信的邪魔歪道可乘之机。

现今，中国对宗教的立场是，政府暂时会容忍宗教，只要他们“尊重政府有关的政策和法律，不干预政治或教育，不把『解放』以来已消灭的封建思想和制度恢复过来”。宗教必须不会“进行反革命及不法的活动”。因此，政府官员必须加强对宗教组织的监管。

一九七九年初，宗教事务局重新恢复运作，因此，三自爱国委员会才向我们发出邀请。隐藏在“红地毯”底下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听一听他们对宗教和涉及帝国主义的宣教士的看法。

这正是我那位宁波特务朋友所走的“路线”：不但放宽了某些限制，

让基督徒在认可的建筑物内聚会，对其他宗教也给予同样的自由。根据宪法，所有宗教都有同等的自由和同等的限制。没有一个宗教，比别的得到更多优待。估计当时有超过二千万人的回教徒（政府已动用国库为他们重新印制可兰经），和一亿多名佛教徒。

在共产党“解放”之前，其他宗教的信徒远比基督徒为多。那时只有一万九千间基督教会和福音中心，而寺庙却有五十六万三千座。

儒家不在宗教的名单上，因为它只是一种哲学思想，或一套道德伦理系统。对当时的领袖来说，那是封建制度的标志。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是多个世纪以来，使中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

在我们的旅程中，中国的领袖正尝试在无法无天的时期之后，把中国的法律制度重建起来。中国也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他们不想对宗教施加重压，也经不起，因为宗教而殉道的人，破坏他们想传达的友好形象。人权是普世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步步为营。

在访问期间，我们只看过少数开放的官方教会，就是北京的一所天主教堂和一所基督教堂，那是向游客展示的样板，主要是为外国使节人员提供崇拜的地方。我们的访问团在北京的那所教堂参加了崇拜。从那时起，中国各地逐渐开放了政府许可的教堂，出席人数也不断增加，但政府的政策，基本上仍保持不变。

在中国孤立自己的黑暗年间，我们从不同来源听到：那些隐匿在暗处，真正的中国教会，在政府的压力逼迫下，在红卫兵无法无天的摧毁下，仍然生存着。阴间的权势，并不能胜过她！

她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未来有希望成为真正的中国本色化教会吗？在我回去以前，我是不知道的。许多信徒不肯参与在三自辖管下的联合敬拜，“家庭教会”成为基督信仰幸存的主要途径。中国各地的基督徒，像没有教堂的初期教会信徒一样，开始在家中聚会。

文化大革命的逼迫，把假基督徒筛出去了。有些人变节了，有些人出卖了其他的信徒，与当权者妥协。有些人忍受不了可怕的逼迫，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不敢责怪他们，因为我们无法想像他们经历了何等

可怕的试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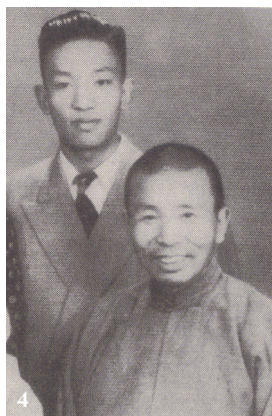
然而，千千万万的人仍然保持忠心。跟他们个别地接触时，才知他们如何在种种限制下，仍智慧地、忠心地继续为基督作见证，领人归主。那些基督徒是神真正的儿女，他们是从天上重生的。在时局紧张的年日里，他们以小组形式，秘密地聚会，常常只是在亲属相聚时一起聚会敬拜。渐渐地，有数以百计或更大的人群在“家庭教会”中聚集。

由于政府提供许可的聚会地点，供基督徒在以前的教堂内聚会，“家庭教会”便要面对另一个困难的处境。政府认为他们的集会违法的，因而向他们施予比以前更大的压力。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的处境仍然十分艰苦。他们要承受的压力和逼迫，端视他们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当时的政治气候、当地的干部态度如何而定。信徒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辨别能力，以及我们不断热切的祷告。

我在一九七九年首次回国时，基督徒刚得着一些透气的空间，但他们仍很小心留意政府的政策。他们的疑惧是有理由的。毕竟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曾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历尽了许多生死难关，下一次会怎样，他们不知道。



1. 与离开三十年的母亲重逢，就像做梦一样。
2. 1978年，我受邀担任香港灵粮堂的牧师。
3. 危机中，我得了机会在中国传讲福音。
4. 父亲至死忠心为主作见证。



旧地重游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
看着四周的墙壁、天花板、
窗户——回忆着昔日的情景。
我记得曾在那里研读神的话语，
记得有属神的人在那里教导我，
鼓励我跟从主，
我还想起崇拜时，唱诗赞美的光景……

第 32 章

西湖畔

梅花象征坚毅不屈，面对逆境和灾害仍能挣扎求存。

对我来说，梅花象征神国子民的忠心和忍耐，

他们在过去数十年里受到“埃及”的奴役，仍能存活下来。

我回到中国去，要寻求、鼓励那些比花更美的基督徒；

在过去三十年里，是神，

栽种了他们这些属灵的梅花。

由于三自委员会的赞助，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旧地重游，亲自去看看从前熟悉的地方，在这三十年间有些什么变化。他们安排的行程，包括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和北京一带。这个访问团，由十五位从香港和海外的牧师及基督教工作者，还有十多位东道主组成。虽然一切费用都是自己支付，我们却得到相当的礼遇；食物很丰富，下榻的旅馆也很舒适。

我也期待与基督徒肢体见面交谈，有许多教会的牧师已参加三自爱国委员会，这次他们与我们一起到各城观光。我渴望得到年轻非基督徒的观点，他们有几位是共产党员，奉命带领我们到一些历史遗迹和各城重点观光。我们在茶楼、餐厅，在搭乘巴士、火车、飞机的时候，都有很多交谈的机会，让我从他们身上，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况有了很多的了解。

我们先到杭州，革命委员会在西湖旁边的饭店招待全体团员。吃饭的时候，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致词欢迎我们说：杭州是名胜之地，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非常荣幸能在此相会。而杭州这个美丽的湖畔城市，是浙江省的首府，位于大运河的南端，她的历史尚可追溯至基督纪元之前。

我曾在杭州读书，所以希望逗留的时间，足以让我再回去看看昔日的建筑物。年轻时我对这些街道了如指掌，漫步在杭州的街道上，重新唤起了我的记忆。很想再去看看西湖，我们一行几人便乘坐三轮摩托车前往。西湖是一个人工湖，三面环山，事实上，那里有三个湖，最大的中心湖是外湖，湖上有美丽的小岛。湖的四周有许多风景点，各取诗情画意的名称，又有可爱美丽的溪流、泉水、洞穴和池塘。

我在湖畔漫步，寒风吹过湖水，静静地，可以听见波浪拍打着堤岸的声音。粉红色的桃花花蕾，不久便要盛开于两岸的堤道上。杨柳随着微风摇动。我真希望能在这宁静的美景中待至夏天，那时内湖和后湖上，会有莲花从水中冒出来。我也很想嗅一嗅秋天开满山谷的桂花香。年轻时，我常在这里看书、织梦、为未来祷告。

///

那时正值冬末春初，可以看见我所怀念的梅花，零落地洒在湖畔。许多诗人都曾歌颂它，画家也把梅花的姿态描绘在挂画和卷轴上。冬天下雪时，梅花坚忍不拔，在寒风凛烈中绽放。历代以来，许多作家都以“踏雪寻梅”作为他们写作的题材。

小时候，我读过有关宋朝（西元967-1028年）隐士林逋的故事，他一生在杭州附近的孤山上种梅和养鹤。传说他以梅花为妻，以野鹤为儿。我们小时候以他这种愚昧的行为当作笑柄，但他对我身处的地点，做了很美丽的描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梅花象征坚毅不屈，面对逆境和灾害仍能挣扎求存。对我来说，梅花象征我国人民、神的子民、基督徒的忠心和忍耐，他们在过去数十年里受到“埃及”的奴役，仍能存活下来。基督徒像梅花一样，需要阳光，然而却能在压制、逼迫等霜雪中存活过来。我回到中国去，要寻求、鼓励那些比

花更美的基督徒；在过去三十年里，神栽种了他们这些属灵的梅花。

我心中还有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从前的华东神学院。我很容易就找到转入神学院门前的街道，从里面传出儿童的喧哗声和笑声，告诉我它已变成了一所公立小学。这幢建筑物原来属中国内地会所有，后来和我所属的世界灵粮布道会合办神学教育。

我从大门进去，站在那儿看着那些小孩，感到自己恍如在梦中。环境虽变，但我仍可认出课室的所在，也找出昔日是礼堂的地方，现在已成了室内体操场或活动室了，小孩在那里喧哗地玩着乒乓球和别的游戏。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看着四周的墙壁、天花板、窗户——回忆着昔日的情景。我记得曾在那里研读神的话语，记得有属神的人在那里教导我，鼓励我跟从主，我还想起崇拜时，唱诗赞美的光景。

以往的先贤们在主里的工作不是徒然的，他们在年轻基督徒生命里的投资，仍借着遍布各地的毕业生，结出果子来。虽然这些生命曾受到火一般的试炼；而在我们这些散落各地、事奉主的人身上，也结出了果子。

///

我转过身子，步出校园，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访问团。

我祈求，中国再次容许这样的神学院开放，训练年轻的基督徒来为主做工。今天的年轻人中，神是否会呼召一批精兵，在这个受到限制、称宗教为“人民鸦片”的社会中，全时间事奉祂？他们可以到哪里进修，来预备自己事奉神呢？

“主啊，求你用你的方法去训练你的子民——无论有没有可见的场所——像你在旷野里训练摩西一样。你必能够用出人意外方法，预备你的子民在中国把福音广传。”

我选了一条很长的路返回饭店，在杭州的街道上蹒跚，再度体验年轻时的生活。入夜以后，街道十分昏暗，几乎看不见前面的路。那时中国各城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节约用电。

惟一灯火通明的地方就是电影院，那儿大排长龙，他们预备进场观看一部著名的印度电影，故事是关于一个到处流浪的孤儿的爱情故事。我很惊讶，中国政府竟容许播放这样的电影，而它又这样受欢迎！过去二十

年里，只有带着政治主题的电影或话剧可以公开上映，内容既沉闷，也没有什么创意或文化特色。在我们游历的各城里，到处张贴着这部电影的广告，也到处都听到那首著名的主题曲。

第 33 章

上海滩

我再次离队，以便可以回到一些熟悉的地方，
把新中国和旧中国作一比较。
我想再看看从前外国的租界，那是中国战败以后，
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下将这些土地租给外国政府的。
富裕的欧洲商人曾拥有巨大的豪宅，
当初建造时，却没有想到欧洲人有一天会离开。

当我们到达上海时，我的回忆更为鲜活。我幼年就在这里居住，很熟悉这里的街道和建筑物。他们安排我们住进以前的国际饭店，那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饭店，是一栋高楼，非常宽广、舒适，由高层的房间内可饱览上海的美景。而且国际饭店的前面就是有名的跑马场，这是当时很热闹的地区，后来改为人民体育公园。

很高兴有机会在上海待几天，与当地教会的传道人、领袖们见面，我见到好几位从前认识的老牧师，他们虽然年纪很大了，仍然不辞辛劳来看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三自委员会中所有的负责人。能这样在上海跟老、中、青各代的传道人见面，真是如同在梦中。

///

上海接近黄埔江口，但直至一八四三年，上海成为通商港口后，才

渐渐变成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自那时起，外国列强不顾中国君主和人民的意愿，强迫进口鸦片。到一八五〇年，鸦片已占了上海进口贸易的54%。

外国人都以上海为罪恶和阴谋的中心，小说和电影则以上海为背景，描写罪犯横行的事——确实接近事实。共产党大举肃清这城市，清除外国势力，已达到显著的成效，至少外表是如此。有些人说，上海在共产党“解放”之前，从未成为真正的中国城市；几乎没有别的中央城市，比上海更受外国统治和贸易的影响。

黄浦江穿过上海市中心，再与长江汇流。我缓缓地走在黄浦江上的码头，回忆着童年往事。儿时我喜欢看船，像其他地方的小孩一样；青年时代，我看着从外国驶来的船只，心里曾浮现过许多的梦想。

码头上，值班的工人操控着起重机，把新鲜的农产品从货车和小型推车上运送过来。有活动吊勾的大型起重机，又把货品吊进船舱里。我留意有一些码头女工，戴着藤帽，干着男人的粗活。货物整天不停地装卸，许多船货等着泊岸抛锚。我看见一旁竖立着阿尔巴尼亚、索马利亚、坦桑尼亚、挪威、德国的旗帜，也有很多货船从日本和韩国来。过去十多年间，中国造船业比任何工业的进步都大，不再需要购买外国的船只了。

我再也看不见的，是低下阶层所谓的“苦力”。这“苦力”一词，名符其实，就像负重的牛马，没有地位，到处流荡，争取生计以糊口。他们往往在年轻力壮时便死去，因为他们要经受日晒雨淋，而且常常吃不饱，病倒了也无钱医疗。现在政府宣称劳工都是有尊严的，最少他们有一个底薪的保障。

一个站在我身旁的工人告诉我，码头现在供应食堂、为工人子女提供托儿服务，并有医疗设施。我问他：“码头工人收入如何？”

他耸耸肩说：“一个月可能有五十或一百元人民币。”

街上的人都很自由地与我交谈，通常是他们先打开话题，而他们也乐意回答我的问题。我希奇，他们似乎不怕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谈及共产党政府的时候也是如此。当然，有些人仍只是背诵“政治上正确”的党路线，而回避一些直接的问题。但他们多半都如实地评论政府的优点和指出仍需改善之处。结束时，他们总会说出全国广传的口号：“我们

要在本世纪末之前，实现四个现代化。”

当你实际踏足在土地上，看见人民日常的生活，那种隔离和陌生的感觉就会消除。你知道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是以颇为正常的步伐过着日常的生活，而无视于革命和逼迫。人民一直都照常地吃喝、睡觉、工作、生孩子、欢笑、痛哭、作梦、死去，世世代代如是。惟独那些黑暗逼迫的年日里，他们要在难以想像的境况下活着。

///

在某城，一位当地的牧师告诉我，有位传道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诬告，已在狱中服刑多年，但共产党官员来释放他的时候，仍威吓他说，他若不背弃主，就把他送回监狱。

“你仍相信耶稣吗？”他们嘲弄他，“你若死不悔改，我们到了桥上，就把你推下去淹死。”

“我仍相信耶稣！”他说。他们真的把他推进河里。后来再把他拉出来，他已淹得半死。他们又再重复那问题，他仍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便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推进水里再拉上来，但他为主坚定地站稳了。这位牧师说，那位属神的人今天正在国内某处，忠心地传扬神的话语。

旅馆里有年轻的侍应生（服务生）接待我们，打扫我们的房间，我发觉跟他们交谈很有意思。有一次我们要出外观光，出发之前，我忘了一些东西，就回房间去拿。饭店房间没有上锁，方便侍应生打扫房间，更换床单。我这样折回把正在打扫的工人吓了一跳。他从我书桌上拿起我的中文圣经，正专心地阅读着。

他没有因为侵犯我的隐私而感到尴尬，却问我说：“这是什么书？”

他从未听闻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还以为基督是“鸡度”，自然也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如何得救？他完全不知道永生的事。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教会是开放的。国际饭店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叫慕尔堂，当时就被用作别的用途，我们离开以后才恢复聚会崇拜，改名叫沐恩堂。这都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心里最高兴的一件事。

我抓住机会以寥寥数语解释创造和十字架，问他可知道：为什么世上大部分地区都使用阳历，譬如今年是一九七九年？他并不知道原因。

我就告诉他，现在的历史是由耶稣基督出生时开始计算的。

他很好奇地问：“耶稣是谁？”

我又解释基督的神性、祂降世的原因、祂在世上的事迹和祂实际降临地上等。那年轻人一生中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思想，感到很惊讶。

我问他：“你喜欢这本书吗？”我把一本新约圣经送给他，他感到难以置信，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时候我才想起要赶快归队！

我们团里大多数人，携带十册中文圣经入境。有些团友因为在旅程中，没有接触别人的机会，而不能分发手上的圣经。我很乐意帮助他们分发，因为主似乎不断带领我跟本地人交谈。由于国内极度缺乏圣经，所以信徒聚会时，很多错谬的道理便偷偷地渗入，以致得不到完善的教义。

///

我再次离队，以便可以回到一些熟悉的地方，把新中国和旧中国作一比较。我想再看看从前外国的租界，那是中国战败以后，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下将这些土地租给外国政府的。富裕的欧洲商人曾拥有巨大的豪宅，有些大宅则属于有钱的商人、高官，甚至是黑社会大哥所有。大宅的结构属旧式的欧洲建筑，有高高的围墙、角楼、阳台、彩色瓷砖屋顶和用砖砌成的烟囱。在一个住宅空间极少的地区里，它们的面积大得惊人。花园通常是他们在人前夸示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举行盛大的园游餐会，有许多仆人陪侍在侧。当初被建造时，曾预备作为长久居所，却没有想到欧洲人有一天会离开。

它们现在的外貌如何？所有洋人都走了，我看见屋子内住着一般的平民百姓，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时，政府接管了这些大宅，后来划分成许多小房间。那些美丽的草地，现在已种满蔬菜，或建了房子，让更多人居住。有些宅邸则用作学校，有些用作街坊革命委员会的总部，有些甚至用作工厂。我目击彩色玻璃窗上不客气地晒满衣服，阳台之间搭上竹竿晾毛毯。据政府说，这些建筑现在都用来“服务人民”。

在上海有件事我要特别一提，就是有一个人来看我的时候，暗暗地问我要不要去看家庭教会的聚会？我说：“好啊！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去。”约好时间，我们就去了。出门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叫一部计程

车？他说，不能叫计程车，等在门口的计程车司机都有特别任务。所以虽然我蛮重的，他还是用脚踏车载我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好不容易到达他家，已有许多人等候在里面了，感谢主，大家都心照不宣，也没讲很多的话，就开始聚会。

在那里我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全教会只能共用一本圣经，他们共用的方式十分奇特，就是把圣经拆成好几十个部分，每人轮流拿一小部分回去，负责阅读和背诵他所接到的书卷，而成为该部分的“专家”。当领袖提出某段经文，那背熟的弟兄或姐妹便要站起来把经文背出，我看到不少其他的人也能同声背诵出来！因为他们熟读了原本收到的书卷之后，就会把书卷交换来读，渐渐地，这些人成为真正拥有那本圣经的人！

这给我许多的感慨和提醒，海外许多人家中都有很多本圣经，却不好好读。求主帮助我，能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因为那是别人不能夺去的，这是我在这个家庭教会学到的一个宝贵的功课。聚完会，那位弟兄原本计划要再用脚踏车载我回饭店，但我看他十分瘦小，就提议由我载他。虽然我很久没骑脚踏车，骑得很吃力，但我们俩一路唱诗歌赞美神，心中非常喜乐！这是我回中国一次难得的经验。

第 34 章

苏州庭院

我们到达紫金山的第三峰，参观一个天文台，
看见了古时的观星仪，知道中国古时的科技已很先进，
不禁从心底发出赞叹！
南京现在拥有一个星象研究中心，
主啊，愿中国人民找到那“述说神荣耀”的诸天创造主，
知道你以大能设立了月亮和诸星。

离开上海后，车行至苏州。苏州也是我曾住过的地方，不过风景依旧，人事全非。团员被接待去参观了一些古迹及苏州有名的庭园，这些富有人家建造的庭园，小桥流水，真是非常幽雅！“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大家朗朗上口的诗句，有一天我们到达寒山寺，在那里拍照留念。感谢神，也给我机会在苏州与几位从前相识的传道人相聚。

我迫不及待地，想快点到达南京，因为家父在军中服役时，我们家就住在南京。我想看看解放后的南京是什么模样。

///

南京是在二千四百年前建成的，从上海要沿长江上行二百哩或乘五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据南京之前，它是国民政府战前的首都。在日本侵华期间，发生了南京大屠杀。由于我曾在日本

事奉主三年，所以我有更大的负担，要为日本人的得救而祷告。没有基督，所有人都可能是暴戾、泯灭天良的。

南京曾是中国八个朝代的京都。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占据南京，清朝军队在十一年后把它夺回。随后有义和团事变发生于一九〇〇年前后，又在此建都十一年。

南京看起来像一个安静的郊外城市，但一些迹象显示南京会变成一个轻工业中心。留意生态环境的政府到处种满树木，使许多街道都变成林荫大道。

长江流经南京，两岸住了三百万人。看见我离开中国后才筑成的新长江大桥，实在为中国感到骄傲。桥分两层，上层是四线道公路，下层是火车铁路，这宏伟的建筑令人惊叹！晚上我们看见桥上的灯光闪烁，景色壮丽，真不敢相信中国的工程竟有如此的成就！

在团友到处观光的时候，我站在一个公园的空旷处，慢慢环顾四周，重拾童年的回忆。紫金山环绕着南京及其市郊，记得读过一些故事，把这起伏的山峦比作一条巨龙，暮色深沉，山峦在日落映照之下，果然是紫气万千。

我们到达紫金山的第三峰，参观一个天文台，看见了古时的观星仪，知道中国古时的科技已很先进，不禁从心底发出赞叹！南京现在拥有一个星象研究中心，他们在那里观察和探测人造卫星、太阳、行星和彗星，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观测诸天了。“主啊，愿中华人民找到那“述说神荣耀”的诸天创造主，知道是你以大能设立了月亮和诸星。”

此后，我们访问金陵神学院，现在叫南京神学院，属于南京大学的一部分。神院校舍虽已古旧，但能见到院长，并和教师们交谈、拍照，实在非常高兴！那位院长也是上海人，所以我们谈到很多上海教会的情形。

离开前，我问他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他说两件事：神学院里最重要的是教师，在他们神学院里，不少老师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新老师却不易找到，特别是教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另外就是好的图书馆，因为文革时期，很多书都被烧掉了，所以十分缺乏。我们就一起祷告，求神为他们安排，兴起一些新的老师来帮助年轻的一代；也求主为他们预备书，兴起一个好的图书馆。

第 35 章

北京见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了长城的第一段，
他宣称自己为中国第一个皇帝，取国号为秦，
而英文名称China也从“秦”朝（Chin）而来。
耶稣基督在秦朝建立后不久便降生，
他是神差遣来拆毁神人“中间隔断的墙”。
耶稣成为我们的平安、使我们与神和好，
也是我们的中保。

最后，我们到北京，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这次由香港去的，是各宗派、教会的代表，其中一位是救世军的中校军官，在飞机上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不会讲广东话，他跟我一样也是北方人，所以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告诉他很多国内的情形。

下飞机后，我们两人一起走出机场大门，门口有解放军把守，他看看我就让我通过，但他看到那位救世军的弟兄，身穿制服、头戴军帽，和其他人不同，就傻眼了。他说：“啥子啊！救世军？（救世军是什么啊？）”我就在旁边向他解释：救世军是基督教里的一部分组织，他们要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解放军碰到救世军；一个是要解放，一个是要救世，听起来有点相仿，目的却是完全不同。

到目的地后，我们被安顿在一个很好的招待所。当天晚上，国务院事务局举办一场座谈会，除了谈话，主办单位也解说许多国家的政策和教会的情形，最后他们问到有什么是他们可以帮忙的？我立刻提出三件事：

第一，盼望教会的门能重开，让信徒有地方聚会。这次经过宁波、杭州、南京、苏州，很多教会仍是封锁着。

第二，希望能重开神学院，造就年轻的基督徒，负起传福音的责任。

第三，我们在海外一直在为王明道先生祷告，听说他仍在监禁当中，受尽了许多艰难、痛苦，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政府能考虑把他释放出来。

感谢主的帮助，让我放胆直言。更感谢主的是后来教会重新开放；神学院重新开课，不但在杭州有华东神学院，在上海、华北共有六个神学院开放，学生也不少；而王明道先生也被释放出来，在上海与儿子居住在一起，家里也经常有聚会。我觉得真是感谢神，不虚此行，这是破天荒的一次机会，一次破冰之旅，看见神借着我们这些仆人，在那里为祂作了美好的见证。归荣耀给神！

由于这些事情，他们觉得我们是一群点火的人。在红卫兵串连的时候，他们是四处点火，我们则是带着基督的火，四处为神点火。

第二天我们被接待到各处参观，我记得经过燕京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从前有宗教学院，我们要求进去里面看，不过他们表示，还没有整理好，所以不带我们进去，盼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到燕京大学参观。

第三天是礼拜天，他们问要不要到教会参观？我知道那时候有几个样本教会开放，我们去参加的第一个教会，是特别让外国大使馆人员参加的教会，当天是由一位中国牧师，用中国话讲道，唱中文诗歌，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听懂多少？也许他们的中文程度还不错吧！

我们去的第二个聚会是开放给老百姓的，我们迟到了，教堂里面已经挤得满满的，不过人虽多却很安静，大家都低头默祷，我们也听到他们不久后会有洗礼，真是为他们感谢神，看见神在他们当中大大做工。

参加完第三个聚会后，当地信徒都站在路的两旁，让访问团的团员从中间经过，原来我们到北京访问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基督教界，所以很多人好奇这批国外来的牧师、传道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也在人群中

见到几个以前认识的面孔，在擦身而过的时候彼此点点头。

聚会完后，有个人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们夫妇都是资深的共产党员，他们想邀请我到他们家去。我认识这家人，他的母亲和哥哥是非常热心的基督徒，我在上海见过这位哥哥，他还曾到浙江的几个海岛上传福音、作见证。这个弟弟听说我来了，就邀请我到他家吃一顿饭。很感谢神，饭后给我机会跟他们讲到神及福音。

很奇妙的，等我讲完以后，他太太表示愿意接受主，问我当天晚上可不可以受浸？我就像保罗在腓立比所经历的一样，当天就为她施洗，不过有一个困难就是在哪里施洗？他们说：没关系，可以在澡盆里施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澡盆为人施行浸礼，他们把炉子的火开得很热，我站在澡盆的外面，她站在澡盆的里面，我就这样为她施洗，这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看见神的大能在人的身上工作。

///

后来我们到了著名的长城，我独自走开，攀爬着陡峭的斜坡，到达一个可以与神独处的地方。城墙约有二十呎高，十呎宽，用大砖石和砍切过的石头建在原来的泥地上。我扶着那粗糙的石墙，想到它二千年的历史，跟人短暂的一生相比是一番什么光景。

多半游客会游览的一段，约在北京以北四十哩，是在明陵的山谷以外。那一部分已完全修建好，但其他部分却有着不同程度的崩塌。长城像一条蛇，蜿蜒跨过四千哩的山岭和沙漠，城墙墙口向着北面蛮夷的地方，作为御敌之用。

秦始皇建了长城的第一段，约在公元前221年把不同部分连接起来。他宣称自己为中国第一个皇帝，取国号为秦，而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也从“秦”朝（Chin）而来。

耶稣基督在秦朝建立后不久便降生。祂是神差遣来拆毁神人之间“隔断的墙”。耶稣成了我们的平安、使我们与神和好，也是我们的中保。

这人造的长城——据说是惟一从太空可见的地球建筑物——从来没有发挥它的作用。侵略者只要贿赂守城者便可长驱直入——比攻破长城容易得多。但由于中国人与外界隔离，因此能发展一套比周围各民族更高深的

文化，而感到自己比所有中国以外的人优越，并称他们为“蛮夷”。

随着时光流转，有些国家赶上来了，特别在科技和其他近代的成就上，超越了划地自限的中国人民。在过去的一个世代里，毛泽东和共产党骄傲地意图赶英超美，再度把中国孤立起来，躲在另一种政治经济的“长城”之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中国要靠自己进步，但所做出的只是疯狂和愚蠢的盲干而已。

共产党确实有不少成就，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袖知道这工作十分艰巨，要独自承担是不实际和不可能的。因此，中国要征求这些原来要以长城排拒于外的“蛮夷”，在科技上给予帮助。在我短短一生中，中国的同胞竟受着这样飘忽不定的风吹袭！

从西伯利亚和蒙古吹来的北风打在我脸上，我把领口拉高，背向着风。站在长城上一个比较高的山峰，看着在我下面和四周美丽的风景。当时的感受，有一点像耶稣被撒但带往殿顶，观看世上万国的荣华。

我默想：在神眼中并没有任何长城。对我来说，被迫与同胞分隔三十年后，能自由地站在中国的长城上，是我一生中极为感动的经历。

正如以赛亚所宣告，神啊，所有国家在你面前都是虚无和虚空。“祂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祂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祂与我相等呢？”（以赛亚书四十章23-25节）

主啊，没有人可以与你相比；你超越长城和所有无论是由人或列国，或魔鬼所建的。你是主！

团友呼唤我与他们一起到长城山下的茶室用膳，我从斜坡滑下来时，天正开始下雨，浓雾使我的脸和双手感到冰凉，但我心中却温暖而兴奋。神若能按着祂叫中国福音化的计划，把我带到这个地步，能再次自由地站在长城上，祂也必能除去其他阻碍福音向我同胞广传的隔墙。

神在历史中，往往有祂成就事工的美好计划——祂自己的“时候满足”。圣经中的摩西花了四十年准备和等候。我只不过等了三十年呀！



1. 我抓住机会，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王明道先生的要求。王明道牧师获释后与儿子一起住在上海。

第九篇

海外宣教 V

【佳美脚踪】

神又把差传的负担赐给我们，
他要我们向远地传福音，
并支持、鼓励信徒成为专职宣教士，
组队去远地.....

第 36 章

德州道乐思

感谢神！牧会两年以后，
原有聚会的会址过于拥挤，
刚好有一个教会因另建新堂，
便把可容四百人的旧堂，以合适的价格出让给我们，
搬进去以后，不久又把教会坐满了。
这时，神又把差传的负担赐给我们，
他要我们向远地传福音……

一九七九年，我离开香港教会的事奉，返回美国基督使者协会总部，并在美国各地与学生团体分享信息。感谢神！祂赐给使者协会同工们一个异象，就是要在北美华人基督徒中，推动基督徒“差传会议”。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第一届大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至今参与差传会议的，已有多人献身投入神国大业。一九八三年华人差传大会中，主给我们一段很奇妙的时间，也给我们挑战。大会过后，一间华人教会请我前往德克萨斯州的道乐思，主领一个华人教会的退修会。主感动我，使我对该区的华人学生和家庭有很大的负担。

早期，神借着当地同学们传福音的热诚，在春假、暑期、圣诞新年假期，举行小型退休会，连着数年之久我被邀请参与。后来道乐思教会成立，教会需要牧者服事，就问我是否可以接受这个呼召？可是当时我仍在基督使者协会任职，按照基督使者协会的政策，我们只做学生工

作，不植堂建立教会，更不以基督使者协会的名义设立教会，不过，我答应每月一次帮助该教会证道，甚至证婚、施洗等。

后来，由于基督使者协会总部的事工已逐渐建立起来，我觉得应该有年轻一代的基督徒接任领导的空间。加上我愈来愈清楚神要呼召我去德州事奉祂，像使徒行传八章中的腓利一样，听见主叫他“起来往南走”，协会也同意我前往德州开拓学生工作，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与妻子和母亲迁往德州（在神的帮助下，我于一九七八年把母亲从大陆接出来，从此她一直与我们同住，直到一九九三年感恩节的时候，她安息主怀，享年八十四岁）。此后，我才有较多时间在当地教会中事奉。随后数年，我仍旧在德州继续基督使者协会的学生工作。这时，我的五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分别住在美国的不同地区，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庭。

///

先母离世后，我们怅然若失，不过心中仍有安慰，因为我们有盼望。由于照顾先母，文田和我都感到身心疲惫，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身体不适，全身无力，经医生检查，知道是中风了，后经文田悉心调养，除了手脚稍不灵活，身体已大致恢复正常。

在道乐思的时候，我的心脏曾出现一些问题，常觉得胸口很重，有绷紧的感觉，上山或上楼梯时很辛苦。一天，我开车前往飞机场时，便开始感到不适，得把车子停下来吃药。道乐思有一位爱主的医生，他得知我的胸部不适，便介绍我去看专科医生。医生为我作了一连串的检查后告诉我，我心脏里有四条血管阻塞了，一条是完全阻塞，一条有85%阻塞，另外两条则有75%阻塞。他坚持要我马上进医院作血管绕道手术。可是，我已经安排了在首都华盛顿主领聚会，那里的信徒希望我可以去，但他们也害怕我是一个“定时炸弹”，在领会时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同时，我又准备在第二届华人差传大会中，作其中一位大会的讲员。

我告诉医生说，必须把手术延至十二月的大会之后。他不同意我的决定，并严重地警告我，这样拖延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我的心脏病随时会突发，而那伤害可能是无法修复的，我求主保守，便飞往首都华盛顿。

讲道的时候，讲台旁有两位医生坐着注视我的状况，恐怕我的心

脏病会随时突发。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传出祂的信息，然后飞返道乐思，在一个星期后接受四条血管的“绕道”手术，那是一九八七年一月。

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住院九天。回家后，我再度感到极端不适，于是再次进医院，昏迷了两天。由于药物的影响，有九天不能吃，也不能睡。医生命令我在家完全休息六星期。感谢神！祂逐渐恢复了我的体力。

神与我一起行过死荫的幽谷，诗篇二十三篇更给我特别的安慰，主是我永远的牧者。我常为所得到的照料，还有全国和全球许多朋友的祷告而感恩。我为这次患病的经历感谢神，因为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学习从困境中更深入地认识神。我感谢神，祂恢复了我身体和灵魂的健康，又赐我更长的年日去事奉祂。

手术后，我继续参与基督使者协会的学生工作，在退修会、研讨会里如常地传讲神的话。我倚靠主，求祂日复一日地赐我力量，并把我的未来交托给祂。

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后，我向使者协会董事会正式辞职，于一九八八年正式结束二十五年在基督使者协会的事奉。

///

未搬到德州以前，我满以为可以在后院的草地上享受阳光、月色、湖水、草地，想不到，草地上却满布了红火蚁的蚁丘，偶一不慎踩在蚁丘上，就够受的。有家信徒，大人小孩都吃过这个苦，他们被红火蚁咬后，甚至需要送医急救，因为被咬后，伤处肿痛难忍，连呼吸都有困难，以后，为了避开蚁灾，他们全家西迁。

我很喜欢德州的天气，因为冬天很少下雪，但夏天可真热，有时，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回来，还是华氏九十多度，幸好屋子里有空调，进了家就舒服多了。而且神赐给我们的住家后院，有一个小湖，环湖有七八家住户，湖中鱼也不少，同学们替我们搭了一座伸出去的小码头，我们虽然没有小船，可是我可以在码头上安静默想。有时也钓鱼，有一次竟然钓到八磅重的鲢鱼，德州佬称为“猫鱼”，因为它口边有胡须。在湖边我们也种些瓜菜，还种了在美国买不到的茭白笋。

感谢神！牧会两年后，原有聚会点过于拥挤，刚好有教会另建新

堂，便把可容四百人的旧堂，以合适价格出让给我们，搬进去不久，又把教会坐满了，还有许多新移民。这时，神又把差传负担赐给我们，祂要我们支持、鼓励信徒成为专职宣教士，组队去远地——克萨克斯坦国及吉尔吉斯坦国（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国家Kazakhstan, Kyrgyzstan）——作短期观摩。

第 37 章

香港的震撼

那天清晨，香港被浓雾迷漫，飘着毛毛细雨，
忽然，街上传来不寻常的人声，
好像大军在怒吼、在咆哮！
原来他们是前往中共驻港代表团的大厦去请愿。
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喊口号，
只是默默地向神祈祷，求神拯救神州千万的同胞。

就在我预备安居德州的时候，香港灵粮堂又催促我再回去工作；
我们已经在九年多前与他们告别，虽然在祷告中时常记念他们，但是我对他们实在有很深厚的感情，尽管再三推辞，他们的情词迫切，实在使我们很难拒绝。

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神适时地为道乐思恩友堂教会，预备了一位多才多艺的资深传道人，他比我年长，又能教导，对祷告颇有心得，也愿意来道乐思牧会。所以一九八九年二月，我与妻子再次离开美国，返回香港作“全时间退休的事奉”，因为不到十年，香港就要在一九九七年脱离殖民地的统治，主权回归。我很希望在香港多参与福音和训练的工作，好让他们做好准备，能面对未来的种种改变。可惜的是，我们必须把母亲留在美国，因为她已很难再长途跋涉。我们的五个儿女分担了服侍祖母的工作，轮流给她很好的照顾。

感谢神！道乐思教会一位有爱心的弟兄，愿意替我们料理德州道乐

思住屋的事物，盼望我们三年后再回去时可以居住；他们的妥善安排，使我们不但无后顾之忧，也使我们回美后有安身之地。我们与德州的弟兄姐妹依依不舍道别，放弃了心爱的家园，又重上征途，第二次到热闹非凡的香港牧会，住在紧迫的城市，重新体会城市中的生活。

///

到了香港之后，警觉到那里的巨变，有人说香港不但年年变、月月变、就是日日都在变。中年人在变，青年人也在变，最大的变化，是移民风潮越来越汹涌，为了种种原因，人人都想离开这艘将沉的船，移民澳洲、美国、加拿大，连在街上行驶的电车，也有大幅的移民广告，说人人都在热烈争购“奥米茄”手表（澳、美、加）。还有个奇怪现象，是住屋的价格猛升，想移民的人急求脱售，许多涌进的人争觅落脚之地，香港当时正遭遇经济风暴，加上失业率增长，社会不安定，政府各级首长身负重任，实在需要神赐他们加倍的能力、格外的智慧，所以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

香港的人口，实在过度饱和。教会为我们在闹市中找到的住处，竟花费四百多万港币合美金超过六十万元，真是不合常理。这次未去香港之先，我就求神指示，祂有什么事是要我优先完成的？因为上次离开香港以前，我曾对长执们建议，教会需要一位年轻、本地出生、合适的牧者来牧养羊群，像我这样的人，究竟与土生土长的完全不同。

果然，长执们心中有同样的看见，他们已在我到香港以前，筹备了按立之事，按立两位同工，一位是男的，另一位是女的，两位都在教会工作多年，对于圣经的认识亦有根基，信徒们也喜爱他们。虽然对按立姐妹，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见，可是在查考圣经后，觉得可以接受，最后大家一致无异议通过，完成了一件艰辛的任务。

香港灵粮堂教会的情形，与我们离开时不同。我们靠主的力量，以祈祷传道为主，尽力做好牧养工作，不负责其他行政杂务，依信徒居住的地区分牧养小组，加强牧养事工。另外也注重教会附近的医院事工，开始床边谈道，与医院联络后，每周定期两人一组向病人传福音，效果颇佳。

///

每年六月起，南海便进入强风季节，香港岛的天文台便小心翼翼地，以红、黄、黑三种不同颜色的标示，预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程度。这几天，一直是沉闷的天气，令人透不过气来，每天电视上总是报导胡耀邦逝世后的学生运动，不同团体所组成的队伍，都举着颜色鲜明的旗帜，列队游行，人们的情绪都十分高涨，围观的人民也都很激动。后来，中共甚至出动军队，如临大敌，天安门广场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时，香港虽然没有天文台的预报，不过大家都察觉，政治的风暴即将来临。

那天清晨，香港被浓雾迷漫，天空飘着毛毛细雨，忽然，街上传来不寻常的人声，好像大军在怒吼、在咆哮！虽然我们住的铜锣湾，是个有名的闹区，平时车水马龙，但这种声音是平日很少听到的。我被好奇心驱使，穿着雨衣飞奔出去，一探真相。果真，在街上有成群的人们在呼口号，游行队伍中，多数是中年劳工阶级，老年人也不少，甚至连小孩子都出动了。

他们都用不同的旗帜，代表所属的团体，上面用大字表明他们的心态，原来他们是前往我们居所附近，中共驻港代表团的大厦去请愿。微雨仍在天空飘着，我匆匆忙忙出来，没有戴帽子，头发被雨淋湿，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直流向我的嘴角。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喊口号，只是默默地向神祈祷，求神拯救神州千万的同胞。

香港人是经济的动物，特别在殖民地政府统治下，满身铜钱臭，满腹肥肠油，两眼直往钱里钻，一心只想如何发财。所以，跑马场是他们平日热衷的地方，很少关心政治。现在他们站起来，而且动如怒海翻腾，万马奔跃，一队队游行的队伍，激昂的气氛，使我感动得不忍离去，目光一直盯在他们身上，那阵阵口号震撼了整个岛，令我惊奇，令我深思。

第 38 章

圣牛地脚踪

战后，我们被差派到印尼作宣教士之际，
另有一对夫妇同时被差派到印度去，
他们两位都是受高深教育的中年人，
妻子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广东人，
丈夫是一位山东大汉，在上海电力公司作工程师，收入很可观。
但是他们受感动，奉献作宣教士，
带着独生女到国外，同心合意地热心事奉主。

战前，在上海住过的人都知道，英租界有身材高大的警察，头上缠着不同颜色的布，有些满脸长满大胡须，看起来很神气，平常人称他们为“红头阿三”。原来他们是来自印度北边的一个部落，当时是由英国统治，就被英国征召到殖民地做警察，在上海与香港都有，香港人称他们为“阿差”。也有的印度人做大公司或银行的保全人员。

印度是个古老的国家，人口众多，土地没有中国大，人口却仅次于中国。在古书上称印度为“天竺”，唐朝的僧人去西天求取佛经，其实就是到印度。印度是个神秘的民族，文化、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农业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的成就，在东方的文化中颇受人景仰。

战后，我们被差派到印尼作宣教士，另有一对夫妇同时被差派到印度去，他们两位都是受高深教育的中年人，妻子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广东人，丈夫是一位山东大汉，在上海电力公司作工程师，收入很可观。但是他们受感动，奉献作宣教士，带着独生女到国外，同心合意地热心事奉主。

中国国内政治起了巨变，印度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艰苦，中国宣教士到印度是前所未闻的事。可是他们两位在印度开荒，赤手空拳，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却建立了四间教会及学校。除了两间华侨教会，其他两间是为印度人聚会而设的，其中一间印度教会，还是专事奉他们认为最低阶级的贱民。

为了庆祝教会的周年聚会，他们特别请我去参加，我与香港教会的长老一起去。虽然机票、住宿都是我们自己负责，但是他们为我们代订的旅馆很好，完全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住得很舒适，不过我们心中很不安，因为住的地方与当地人民住处并不相称。

印度的阶级制度历史悠久，虽然现在已逐渐淡化，不过贫富悬殊，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钱人穿金戴银，生活十分享受，像天方夜谭重演。印度人大多数是印度教徒，他们的教条及习俗是不吃牛肉的，却满街都是牛只，不单“牛步”阻碍交通，有时“牛性”大发，不顾观瞻，席地而卧，人车都得绕牛而行。然而，牛对他们用处却很多；皮可制革，骨可磨粉，肉可供非印度教徒食用，连牛粪亦可作燃料，烧饭、烤饼、冬天取暖，听说新研究成功的，是可以用牛粪加上牛乳、牛脂等制成美容产品，销路不错。

在加尔各答较偏僻的小街陋巷里，我曾见到许多墙上都贴满了泥饼，有一次我见到有人用一个大木桶用力在调泥浆，调好以后就用熟练的手法，把泥浆一团一团地掷在墙上，动作好像棒球投手掷球一样，掷得很准确，看到泥浆排列在墙上，我觉得很有趣，同行的弟兄告诉我，这就是印度有名的“牛粪手法”。牛粪干了以后就一块块地收存起来作为燃料；有人吃过牛粪烤的饼，据说很可口，可惜这种饼不是输出口。听说，在中国的大西北游牧民族，也很流行利用牛粪作燃料。

感谢神！给我机会在学校及教会中为主名传信息，很多青少年决志信主，也有华侨悔改信主，那里的华侨多来自广东梅县，与我同去的长

老是大埔人，他们言语相通，都可以交谈。华侨大都是经营制革工业，原料在印度就地取材，印度人认为制造皮革为不屑一顾的职业，所以并没有当地人与华人竞争。

第 39 章

泰国福音门

泰北接近缅甸，是著名的金三角，
种毒、贩毒很猖獗，治安不好，
传福音很有拦阻。
同工亦有心向北边拓展。
我们开车去缅甸的乡村，为踏足之地祷告，
巴不得福音的种籽也能传播到那里。

我曾去过泰国好多次，头几次是过境、观光，后来两次是被邀请去领会。我对泰国的印象并不好，海关贪污，明目张胆地索钱，对华人旅客诸般留难，不过我认为，有些情况应由华人自己负责。泰国马路上人车拥挤，与东南亚许多大城市现象相似——表面上，街道还干净，后街小巷却难以见人，这也是东南亚各地大都市的通病。加上毒品泛滥，色欲横流，泰国成为当时青年人的“乐园”。

听说泰国人以前称为暹罗人，他们与华人极有渊源。泰国至今仍有皇宫，那里盛行佛教，寺庙林立，地处热带，盛产水果，与印尼大同小异，滨海之地为燕窝出产地之一。华侨多为潮、汕人，都是经商能手。泰国人喜吃辛辣食物，有人以为热带地区的居民都有此习惯，其实不尽然，像韩国，天气寒冷，但是他们也喜欢吃辛辣食物。

美国德州的道乐思教会，有一位年轻姐妹，曾在餐馆做事，她的厨艺非常高明，独自一个人可以做出一桌好菜，是个女强人。大概因为厨房工作辛苦，整天焗在炉灶旁，火气难免较大，生活也太苦闷，就沾上了烟酒。但是进入教会几年后，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后来决志去泰北宣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这位姐妹先去神学院受造就，然后去了泰国，到泰国两年后，教会接受她，成为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泰国是一块福音的硬土，早年有西方宣教士在那边工作了十五年之久，没有一个人信主，后来又有另外一位去宣教，数年后只有两个华人信主，可见泰国福音之门，真如铜墙铁壁。

那位道乐思的姐妹到了泰北工作，经常发代祷信报告当地的事工。有一次，在她工作的地方，整个村落的茅草屋，一夜之间被大火焚毁。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一面为他们代祷，一面筹款为他们重建家园，不分信徒或非信徒都同样照顾，邻近的村落因为这件事都很受感动。

有一天，她来信邀请我去参加她们新堂落成的奉献礼拜，以及数位阿佤族信徒的受浸典礼。我们从香港出发，带了四箱福音性的造就书籍，感谢神！平安通过海关，我们与这位祈祷了很久的姐妹，终于在泰国相见。

她开着道乐思教会为她预备的福音车来接我们，机场离她工作的村子约有两小时车程，一路上看到金碧辉煌的佛教庙宇，与居民的茅草屋实不相称，仅见到一处屋顶上有十字架的天主堂。沿途道路崎岖难行，经过没有桥的河流，就要开车涉水而过，幸好她是识途老马，一路上行车有惊无险，平安到达福音中心。她为我们预备了一顿相当可口的晚餐，带我们进到中心的客房休息。这房间傍溪而建，晚上源源的溪水声在耳边流过，清晰可闻，加上旅途的劳顿，很快就入睡了。

忽然一阵浓烈的异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就难以再入梦，不久听到雄鸡的啼声，便起床灵修。那时天色已出现鱼肚白，我出门去看看，才发现我以为幽雅的一条流水溪，原来是一条污水溪，使我大失所望。溪水上流有很多中国人养猪，他们每天清晨将养猪的废弃物，倒入溪流，污染了这条溪水，所以我睡觉时才会闻到那种气味。后来同工带我去街上的市场，那里有卖煮熟的猪肉，由于早晨看到那条被污染的溪

水，又闻到那溪水的气味，使我倒尽胃口，一点都不想吃猪肉。

同工们问我能不能去参加孩子们的晨更？原来住在山上信徒的孩子们，寄宿在福音中心，以便每天就近上学。没有去学校以前，先有早礼拜，自从第一天参加晨更对他们短讲，他们就要求我每早晨都去与他们在一起，这五个孩子都很天真可爱，我很高兴服事他们。

///

吃完早饭，我们就出去探望上次火灾后重建家园的信徒们，途经七次浅滩。信徒们住在小山上，因他们早知道我们将前去访问，所以整村的人都盛装欢迎，有的信徒拍手唱诗。他们要看看这些远道而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对我们品头论足，彼此谈论，掩口而笑，大概是我们的模样与他们不同。他们把自己做的手工艺品挂在我们脖子上，色彩很美。

接着我们唱诗祈祷，他们还特设几把椅子让我们坐，自己则站着或席地而坐，我对他们问安及短讲，鼓励并传福音给尚未信主的村民。他们都喜欢唱诗，特别是孩子们，都能背出歌词，有的诗歌是我们熟悉的，有的是我们陌生的，当时我还学了几首新的诗歌。

中午与他们一同午餐，他们的厨房很简陋，在地上放几块石头生火煮饭、烧菜，菜色虽然简单，情意却甚浓郁，特别是在小山上露天吃饭，好像离天更近，仿佛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是在祂面前用餐。晚上，他们安排在当地神学院有五天特别的聚会，学生有泰、华、阿佤、拉胡等族的人，还有少数苗族人，聚会信息是用国语讲，译成泰语，所以也有些华人信徒来参加，他们非常渴慕真道，因此聚会蒙主赐福。

泰北接近缅甸，同工亦有心向北边拓展。我们开车去缅甸的乡村，为踏足之地祷告，巴不得福音的种籽也能传播到那里。泰北是著名的金三角，种毒、贩毒很猖獗，治安不好，传福音很有拦阻。归途经过泰国皇太后的行宫，那里风景非常优美，太后的行宫外是御花园，这日正巧谢绝参观，游客只可以在花园中行走。园外几间商店，专做游客生意。当然，中国餐馆是不会少的，路上还可见到潮州酒家。也有专卖燕窝的店，卖的燕窝，熟的可热饮，生的可装盒。还有一家珠宝店，专卖本地地产的黄宝石，店主是基督徒，据说曾参加过我们这次的聚会，他坚持邀

请我们入店内小憩，以茶水相待，并向我们展示黄宝石的原石和成品。

接著有受洗的聚会。经过多年辛勤工作，有六位阿佤族的信徒愿意接受福音，神赐我有此殊荣为他们施洗，信徒与非信徒都来参加盛典，也有从曼谷来的华人信徒代表，他们亦顺便参加新堂落成的感恩礼拜。经过剪彩启门的仪式，有三百多人挤满了礼堂，来宾中除了来自曼谷的华人信徒及牧师，并有当地的政府代表，信徒办筵席热烈地庆祝。

阿佤族的妇女，身穿绣花衣服，头上戴满了银饰，盛装赴会。献堂礼拜后，又有五天的聚会，对象是本地人，所以聚会信息还是要译成泰语，翻译同工是一位阿佤族姐妹，她熟悉华语、泰语，当然对阿佤语，绝对没有问题，能培养这样的当地人才，是宣教士的成功。就这样，我们在泰北逗留了半年。

第 40 章

越南烽火劫

战火燃烧，郊区不靖，负责人经祷告后，
将培灵的聚会，改在城区举行，
我们在宣教士住的四合院内聚会，
不单是学生参加，连职业青年亦来，
还有一些已经参军的华裔士兵，
穿着军装，抽空来参加聚会，
在炮声伴奏中，唱诗祈祷别有“情调”……

离开北京后，我们就回香港。当时香港有许多报纸，有左派的，有右派的，也有中立的，都报导这件事，特别是右派报纸，大大批判我们这帮传道人是到北京朝圣，也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为主的名，有机会去接触在中国仍然忠心信主的基督徒，鼓舞他们，也有机会把救恩传给从未听闻福音的人，虽然被人批评、反对，也被人恐吓，我的内心还是十分平安。

香港教会替我们安排的居处，就在离教会不远铜锣湾的一幢大厦里，从客厅里，隔一扇窗户，就可以看见维多利亚海港，每天港湾里往来的船只频繁，这情景，常令我回忆起十多年前，去印尼时经过香港的夜晚。虽事过境迁，世事仍混乱，却不断有人挤向香港，岛上人满为患。

有一天，在春雾迷濛的海港上，忽然添了一只又老又旧的船，船上挤满了人，船舷外挂了一幅白布大字，有求援的字样，而船的四围却是

香港警察的巡逻艇，打开电视才知道，原来，昨晚有不速之客来临——来自越南的船民，已进入维多利亚海港，这条新闻轰动了全岛的居民。

后来，天天有船民的消息，惊动了殖民地政府，他们的政策是不容船民久居，仅暂时供应生活必需品，并将船民安置在僻远的山旁，请联合国安排离境。虽然，有些团体要进去访问船民，也有要进去传福音的，可是，政府坚持不向外界开放。听说，有些船只，飘流到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岛，在那里遭受到更悲惨的命运。

///

隆隆的炮声，从我一下飞机就听到了，这不是欢迎的礼炮，更不是贺年的爆竹，这是玩真的，虽然我知道越南正在战争中，可是不知道战火已逼近西贡。那时正是阴历年前夕，越南人过阴历年，学校都放假，当地基督徒学生工作者，早就筹备举行学生福音营。在西贡华侨教会的传道人，是早期由“国外布道团”差派去越南的宣教士，现在已满头白发，仍忠心耿耿守住岗位，牧养神的群羊。他有一位独生女，为人温柔纯良，嫁给印尼出生的华侨，两人都热心事奉主。

战争期间，很难请到外地的讲员，所以这位老宣教士，听说我要去越南，就请我提早去西贡，先领三天的布道会，再有四天的培灵性讲道。我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因为撒种和收割，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两者能分开，各有专人负责筹备、祈祷、推动，再加上圣灵动工，将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达西贡的当晚，我由一对来自美国“基督徒学联会”（Intervarsity）的宣教士夫妇接待，他们对学生工作颇有经验。战乱期间，人心惶惶，内心空虚，寻求满足，有许多人追求真理，三天的布道会，很快就过去，会后多人决志信主，欲罢不能，结果再增加一天。下面接连的培灵会是针对信徒，蒙圣灵同工，人心向主，恩雨沛降，蒙主赐福，在祈祷声中，这个聚会圆满结束。

战火燃烧，郊区不靖，负责人经祷告后，将培灵会改在城区举行，我们在宣教士住的四合院内聚会，不单是学生参加，连职业青年亦来，还有一些已经参军的华裔士兵，穿着军服，抽空来参加聚会，在炮声伴

奏中，唱诗祈祷别有情调。会众把四合院挤得满满的，我对青年人每天讲三堂，早晨查经，下午专题，晚上培灵，蒙主加力量，教会以祷告托住神的仆人，我盼望在越南未变色之前，为主抢救灵魂，求主大能保守，让基督的真道在信徒心中生根。

///

在越南战争结束前，我有机会观摩越战后方的风情，当时所看到的，使我脑海里有抹不去的哀情，至今仍是感慨非凡。我曾亲见战乱中女囚的眼泪。在西贡学生的聚会后，休息时，刚好传道人要到女监去传福音，问我是否愿意去见识一下？我答应他同去。

监狱离开我们吃饭的地方不远，到了以后，我们经过重门铁闸，最后进入一间礼堂，礼堂里坐满了几百个人，她们很熟练地唱着短歌，主持的弟兄冷不防地要我讲十五分钟，我只好临时上阵。因为圣经要我们常做准备，我就一面默祷、一面开口把耶稣介绍给她们。讲道的时候，注意到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很留心在听，她一面听、一面流泪。我讲完后，在散会时，就大胆地问，谁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请伸出信心的手，她就是许多伸手的人之一。接着我领她们祷告，因为没有与管理的人预先商量好，所以没有机会与她们分别谈道，我只是请教会的传道人继续跟进，之后我在祷告中，一直记得那双无助的眼睛！

虽然离开了烽火连天的越南，回到平静安乐的香港，可是心中对越南仍有抹不去的忧情，脑中总浮现孤儿院里每张可爱的小脸，对他们来说，幸福的童年，是一个碰触不到的名词；对监狱的女囚而言，可爱的家园，只是她们梦中模糊的情景。街上多数的行人，只是撑着为生活打拚。夜色里，灯红酒绿的酒吧中，醉生梦死的男男女女，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无奈，享受在炮声中短暂的欢乐。我心中只有为越南人民叹息、忧伤和祈祷。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共军坦克车冲进总统府的铁门后，越南炮火沉寂下来，人们以为有个喘息的机会，接着的却是苛政如猛虎，民不聊生，百物昂贵。以前生活虽然艰苦，只要劳苦工作，一个人可以养活十个人，可是现在，十个人拼命工作也养不活一个人，加上下放、财产

充公、住屋没收，所以有人说，如果电线杆有脚的话，也会想逃离这个环境，每个有一口气的人，都想离开越南。

据说当时逃跑的人有三百多万，其中华人约占一半。逃离越南谈何容易，往那里逃？如何逃？飞机停飞，机场上早已寂静无声，陆路上，驻军防备森严，惟一的出路是投奔怒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海上有海盗，水中有鲨鱼，出海去是九死一生，不出海是死路一条，只要有一线生路，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地去追寻。

起先是偷渡出境，后来政府见走的人这么多，就大发慈悲开方便之门。自一九七八年起，每个要出海的人，只要付政府黄金十两，就可以挤进一条小船，至于得到什么船，就凭各人的命运了。有的船是铁铸的，有的船是木造的，每条旧船超载了四百多人，在内河中岌岌可危，听说有些船未出海就已沉没，有的人葬身鱼腹中。

有的人勉强到了白浪滔天，惊涛骇浪的怒海上，更是惊险万分，侥幸挤上大船，忍饥挨饿，奔向不知前途的渺茫未来。也有的人面对大海，想到自己几代在越南；自一九五四年奠边府战后，就由北越逃到南越；二次大战结束后，越战开始，几十年一直在逃难，现在出了海，妻儿失散，产业丧失，家破人亡，虽然出了十两金子买命钱，面对汪洋大海，前途茫茫，一时想不开，就投身大海，随波而去。

第 41 章

再访中国心

聚会时，经由他们的讨论，
看见神在他们当中动工，
赐给他们极大的恩典，
也觉得他们需要有人经常在当中协助。
我也为他们祷告，
求神预备，求神兴起人去帮助他们。

刚由泰国回港，恰逢中国大陆长假期间。中国大陆每年有两个长假，各放假十天，一个是在五月初劳动节期间，另一个是在十月初，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两个长假都有盛大的庆祝。国内的基督徒学生，就趁机举办联合培训聚会（类似美国的退修会）。

北京几所新兴大学，如：石油大学、法政学校，都有基督徒团契（就像美国大学里的查经班）。这年五月他们也早早筹备、邀请各大学的团契代表，集合在郊区一个安静的场所，展开为期五天的聚会。有人来邀请我去北京带领这个聚会，于是我有机会再访中国。

感谢神！在机场海关验证时，我很坦白地告诉他们我是传道人，因此并未受到刁难。两个学生顺利地把我接到郊外的聚会场地。据说这个场地是政府接待外宾、科技人员的地方，设备相当不错。清早起来，在院子里散散步，十分舒适。一天三餐都有十大盆菜，非常享受，其中有道菜是我第一次吃，叫作油炸土豆，就是把马铃薯切得很细去油炸，非

常好吃，味道比西式薯条好。听说这个招待所的员工也有好几位是基督徒，不过他们行事十分低调，不显露自己的身分。

聚会时，经由他们的讨论，看见神在他们当中动工，赐给他们极大的恩典，也觉得他们需要有人经常在当中协助。有位弟兄很殷勤地在那里服事，求神赐福，与他同在。我也为他们祷告，求神预备，求神兴起人去帮助他们。

第 42 章

阿拉木图情

这里是一个军事重地，对面就是以弗所，
听说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在这附近，
保罗到这里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人信主，
但是后来回教势力兴起，就把这地变成回教城市。
我们参观了一座很奇特的回教寺，
它原本是个基督教礼拜堂.....

感谢神给我机会到克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首都——阿拉木图（Almaty）去传福音。当我在德州道乐思的恩友堂事奉时，南方休士顿有个非常兴旺的中国教会，不但注重传福音给本地的中国人，也非常关心差传工作。他们听说有些克萨克斯坦的东干人聚集在阿拉木图，就寻求神启示他们该如何行？

经过祷告以后，他们有感动要差派一位传道人到阿拉木图，而且同心觉得有一位即将退休的弟兄很合适，这位弟兄也有相同的感动和负担，愿意靠着神的恩典，结束他们在休士顿的事业，接受这个挑战。于是，就像使徒行传十三章一样，教会经过祷告，把他们夫妇差派到阿拉木图，在东干人当中传福音。

我们教会知道此事之后，也经常为他们祷告。有一次，这位弟兄到我们道乐思教会作见证，分享阿拉木图的需要，盼望我们教会能有一些人去做短宣的工作。经过祷告，在一个深秋，我们夫妇及另外三位弟兄

起行前往克萨克斯坦。

///

我们一行人先搭飞机到土耳其，这是我第一次到土耳其，感谢神在这里给我许多新的经验。我们停留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原名君士坦丁堡），后来被伊斯兰军队征服之后，土耳其成为回教国家，首都也改名为伊斯坦堡。我们走到海边，看见他们的海产非常新鲜，而且听说可以请当地的餐馆烹调，我们就买了几条鱼，请他们烹煮，那鲜美的味道真是令人难忘！我们坐在海边享受，心中充满了感谢！

这里是一个军事重地，对面就是以弗所，站在此地，我心中有许多感触。听说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在这附近，保罗到这里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人信主，但是后来回教势力兴起，就把这地变成回教城市。我们参观了一座很奇特的回教寺，在基督教兴盛的时候，它原本是个基督教礼拜堂，楼下已完全改成回教寺庙的样式，但在二层楼高之处，仍保有一些耶稣和玛丽亚的碎石镶嵌像，以及基督教的图画。

在此教堂对面，是后来新建的大回教寺——蓝寺，里面非常大，礼拜的人也相当多。看着这两座寺庙，我想起：在启示录里，神责备基督徒未尽到应尽的责任，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神就把灯台拿走了。这是很清楚的一幅图画，基督徒若不好好传福音、作见证，教会的灯台就会被拿走。

傍晚我们五个人，由土耳其搭机前往克萨克斯坦，于清晨到达当时的首都阿拉木图。阿拉木图机场的设备很好，顺利通关后，一位弟兄开车来接我们到传道人家，路程虽长，而且发生了许多事，但神却一路保守。我们一边欣赏车外异国的风光，一边听弟兄告诉我们这里中国人生计、经商的情形。那些天，我们五个人住在传道人家，真是把他们夫妇忙坏了，他们尽心竭力热情的款待，让我们永远难忘！

我们在那里的宣教工作分两类型：一种是在教会里的事工，一种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事工。我们在机场时，遇到一群中国人，我就上前打招呼，原来他们是由新加坡来的基督徒。大概是他们有经验，知道在回教国家传福音最好不要太张扬，所以都隐藏身分，行事很低调。克萨

克斯坦出产石油，所以他们自称是油商，是到阿拉木图做石油生意的。听说他们在阿拉木图成立教会，不只对中国人传福音，也对当地人传福音，来聚会的人还不少，实在看见神大大地使用他们。

当地出产许多水果，不但有西瓜，还有哈密瓜，香港的哈密瓜大多是由这里进口的。中国有一首民谣：“大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瓜大又甜啊！”克萨克斯坦的西瓜也是又大又甜。我因着宣教去过不少国家，看见神给不同地方的人，各种独特的食物、环境，让人可以享受，我们也在哪儿分享了神特别的恩典。

在阿拉木图事奉的时候，我的鞋底脱线，行走非常困难，只能用绳子把鞋的前面绑起来，感谢神，祂让我胜过这个困难，也学习到一件事，就是外出宣教要准备妥当，预防意外发生。

///

克萨克斯坦虽是个产石油的国家，但是因为政府不善管理，许多地方非常落后。他们的加油站不像美国的加油站建设得那么好，通常只是放置一个大汽油桶。

中国人在克萨克斯坦大半做跑单帮的生意，许多由中国大陆来的人，把一地的货品，带到另一地贩卖。他们大多挤在一条长长的街道上做生意，通道上方用一块很大的布盖起来，每家有一个货柜车，车里储存各样中国制造的货品，像是皮衣啦！日用品等等，车子的尽头就是店面。克萨克斯坦人由各个小城镇到这儿来批发各色物品，一包包带回去卖，赚点蝇头小利。中国人在这里营生很不容易，他们整天待在这条空气不流通的街道上做生意，非常辛苦。

我们到每一个“店铺”发单张，虽然那时正值深秋，但是他们因为见到同胞，显得很热情，我们便顺势邀请他们参加聚会。感谢神！许多人星期天工作完，就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也有人蒙恩得救。

我们也去参加当地人的聚会。那位由休士顿去的弟兄，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颇有规模的教会，聚会人数也不少。靠着主的恩典，一位弟兄跟我在哪里分别作见证、讲道，实在看见神亲自在带领他们。在苏联，能用中国话向一群中国人布道，会后一起聚餐，实在是一个很特别

的经验。

他们是借用苏联人的教会，因此我们有机会跟他们教会的牧师讲话，他是克萨克斯坦人，不太会说英语。他邀请我也向克萨克斯坦人讲道，所以后来我用中文讲，一位弟兄帮我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感谢神，我们跟他们有很好的交通，而且借着这位牧师，给予我们许多的建议和帮助。

除了去商场发单张、作见证、在教会开布道会，我们还有机会去探访当地信徒。他们都十分热情、好客。有位弟兄家种了许多果树，其中有些我已很久没见过了，他摘了好多扁扁的蟠桃招待我们。还有人种瓜类的水果，也让我们享用。他们告诉我，以前政府还有津贴补助，从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就得自谋生活，但经济情势又十分不好，所以大家的生活越过越艰苦。他们很想离开克萨克斯坦，问题是：到哪里去？他们真如一群迷途的羊！

除了在中国人当中工作以外，我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向东干人传福音。在我们住所附近，就有一个东干人的群体。东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因为信奉回教，被称为回民，回民一度反对政府，清政府便派左宗棠将军去西北平定回乱。回民为争取自由，就跟政府对抗，当清朝大军一到，杀的杀、赶的赶，回民只好四处逃窜到苏联天山一带，然后在那里落地生根。东干人当中许多人姓马，听说当初逃难至此的人中，姓马的就有四千人之多。在东干人聚居的地方有一个陈列所，摆放他们当初所穿的衣服、所用的东西，甚至还有一辆车子！这些都是我未曾见过的。

在东干人所住之处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到处都是水，听说是天山的溶雪，水质非常好。还有，勤奋的人们，晒了满地的向日葵瓜子，也是一幅特别的景象。

///

结束这次短宣之前，在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有个令人难忘的经验。吉尔吉斯斯坦是苏联未解体前的邦联之一，地小人穷，解体后成为一个弃儿，民不聊生。有位年长的同工，退休后到东干做义工，在邻近的吉尔吉斯斯坦，购置一居所，他邀请我及文田到他家中过夜。

吉尔吉斯斯坦与克萨克斯坦是邻邦，开车不过半小时，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他告诉我，该地常会停电，所以给我们一个手电筒，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又带我们到市区看看，这市区不过是两条街，有一些商店，他又带我们到华商集中摆地摊的场所，这里的市场与阿拉木图不同，那边是用货柜车作店面，这里的店面是用竹子或木头支撑，上面铺盖塑胶布避雨，卖些日常生活的用品。

像是美国的旧货市场，他们大都独自一人或夫妻档共同经营。其中多数人来自中国大陆，可以用普通话沟通。在稍远之处，有位老年的妇女在摊位上招呼客人，看样子，她是个混血儿，我们就过去与她交谈。她用不十分流利的华语主动告诉我们她的身世，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来自何处？虽然她说自己只有四十五岁，不过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艰辛的岁月在她脸上划下许多愁烦的记号。

正在那时候，在她面前地上的一堆破旧衣服，忽然动了起来，而且站了起来，真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小女孩躺在衣服底下，她用那双大大的眼睛瞪着我们看，这位妇人连忙说这是她的孙女，而她的女婿——孩子的父亲，已经不知去向！她的女儿也远走高飞，丢下自己的女儿由老人家照顾。我心想，她怎能一面照顾地摊，一面又照顾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孩子喜欢到处奔走，若不专心应付客人，又怕坏人会顺手牵羊，偷走货品，因为那个地方贫苦的人实在太多。

后来我们才发现，她是用一条绳子把小孙女绑起来，拴在桌子的脚上，像带只小狗一样，我从没有看过这样的惨剧，眼泪禁不住流下来。我一面对老太太讲福音，一面在口袋里摸到一粒糖果，暗暗地递给女孩，她知道我并无恶意，就很快地拿去，放在嘴里，脸上展开一片非常天真美丽的笑容。

吉尔吉斯斯坦之行，我见到一个破碎的家庭，一名伤心可怜的小孤女，一个贫困的国家，一群需要牧人的羊群，和一片已经成熟的禾场。感谢神！让我们此行有机会向各样不同的人传福音，可惜我们不能停留较长的时间，只能为他们祷告。他们盼望有人可以去接替那边的工作，在那附近的几个国家现在大都可以自由的传福音，不过仍有许多人尚未听闻福音，而且那里回教势力极大，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该怎么做。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星期转眼便消逝了！虽然我们相聚的时间不长，但要离去仍觉得依依不舍。感谢神的恩典！祂借着我们的弟兄，在那里虽只一年多的时间，却做了很好的工作，不但有人决志信主，而且有好几位信徒进入圣经学院；有的正式入学修课，有的旁听，他们对神的话实在是饥渴慕义的心。我们就要离开了，他们很舍不得我们走。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的鞋子坏了，鞋面和鞋底分开了，所以送我一双很好的皮鞋，真是有心！我每次穿着他们送的皮鞋，就想到圣经上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十章15节）

他们在物质上不但供应我们平日的需要，还在一位信徒的家里为我们办晚会。这家的主人在教会也有很多服事。他们家很宽敞，院子也很大，他为我们预备了一顿很特别的菜肴，尤其是烤羊肉，大概是克萨克斯坦的菜，他们先烧木柴，再用烧烬的炭烤羊肉，味道真棒！我很少吃到这样又嫩、滋味又好的羊肉！我们也在一起唱诗、祷告、一起思想神的话。

那里要做的工作实在多，但我们能停留的时间实在短。听说我们离开后，神又差遣一些德州的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我们虽然离开了，心中却常惦念着他们的需要，求神保守他们，也求神预备合适的人和他们同工。



1. The Lambs一家是我们上海教会派往印度的跨文化宣教士。David、Mary以及他们的女儿Sarah。

第十篇

骨肉之亲

神借着这三次回港的机会，
又赐我三次回到中国，
向我骨肉之亲，
传讲十架救恩。

第 43 章

三牧香港灵粮堂

对于香港灵粮堂教会的呼召，
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知道自己已没有三十六年前那样的精神和体力，
然而，我的确感到这是极大的光荣，
纯粹是神的恩典，
才得以被从前事奉过的地方再次邀请回去工作。

离开香港，第二次在道乐思教会事奉又过了三年，于是要求教会让我完全引退。因为我已经七十岁了，事奉主已有半个世纪，希望可以不用驻守在一个地点事奉，而是自由地、无特定任务地事奉主。香港的教会听说我“再次退休”，正式邀请我第三度回去作他们的牧师，虽然我知道，自己已没有三十六年前那样的精神和体力，然而，我的确感到这是极大的光荣，纯粹是神的恩典，才得以被从前事奉过的地方再次邀请回去工作。

对于香港灵粮堂教会的呼召，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这样，我们第三次去了香港，在原教会牧会。神有美旨，在我第三次去香港之际，神又赐我机会去北京参与培训，使我看到国内的福音禾场已有人在收割。

第三次到中国，是因为他们说：“上次你来，我们得到许多，希望你可以再来。”这一次是在十月，他们又有十天假期的时候，虽然这回他们

没能借到上次那个招待所，不过跟上次一样，我们可以自由地唱诗、讲道，再次经历神的带领和恩典。聚会第二天，一对以前在中国相识的老友，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他们告诉我，由于这位先生在铁路单位工作，他经常有机会免费搭乘火车到各城市，就借机探访各个地下教会，与他们一同查经、鼓励他们。我实在看见神用各种方法将中国的门打开，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同胞们。

聚会结束后，有人邀请我和内子到天安门去看看，听说十月的天安门非常热闹，夜景灯饰特别吸引人，而且，以前来北京时，总是匆匆忙忙，很少陪文田出去逛逛，所以当晚我们就去开开眼界。不料下起倾盆大雨，天安门是个广场，无避雨之处，我们又都没带雨具，虽然穿上公安人员借给我们的雨衣，也无济于事，我们淋得全身湿透，结果受了很重的风寒。回到居住的旅馆，我开始觉得不舒服，因此，第二天便搭机返回香港。

由于我曾中风过一次，香港的弟兄姐妹接机后，看我脸色不对，细问原委，就坚持送我进医院检查，结果，我二度中风。这次中风后，体力大损，上下讲台非常吃力，不能久站，也不能久坐，外形虽无显著的改变，但左半边的嘴和眼睛却都麻痺了，医生说是神经受损，完全恢复的希望很微小。于是，二〇〇二年七月底，我正式放下香港灵粮堂教会的事奉，返回加州休养。

感谢主，让我三次去香港，在同一个教会任职，这可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神借着这三次回港的机会，又赐我三次回到中国，向我骨肉之亲，传讲十字架救恩，尽我的本分。虽然我很希望多有机会到中国大陆传福音，但相信神有祂自己奇妙的计划和时间。

第 44 章

影响一生的两个女人——念我慈母

一九八九年，香港教会二度邀请我们前往牧会，
母亲由于身体不好，加上移民的身分问题，无法同行。
我知道，若没有我们在身旁，她一个人留在美国是极其困难的，
她不懂英语，跟孙儿辈沟通也有困难，
但是她无怨无悔，极力鼓励我和文田去。
因为她知道，她的独子是为了拓殖天国的大业而离开。

有人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我没有任何属世的成就，一生的工作就是服事主。能完成神给我的这些托付，是由于两个充满爱和忠心的女人的支持，一个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另一个是我的妻子，她与我一同熬过生命里的争战，抚养我们五个孩子长大成人。

母亲比父亲年轻十四岁。她的体质很弱，经常头痛和身体不适。人说我长得像母亲，并由于我出生时她只有十七岁，所以我们看起来像姐弟一般。而母亲看我，比她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母亲身体虽然孱弱且娇小，却胆大心细、极其勇敢。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件事令我没齿难忘。

还清楚记得，大概四五岁的时候，父亲不在家，我生病发高烧，母亲为了照顾我，让我睡在她那张古老的大床上；我很喜欢这种古色古香的床，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床又高又大，三面都是蚊帐，只有前面可以开放出入，床的后面靠墙，床里搁置一块长的木板，有一尺宽，可供置物。

我睡在床上与外面完全隔绝，成为独自一人的小天堂，觉得很安全。

那天，我因为发烧，睡得头昏脑胀，什么都不知道，到了半夜突然醒过来，觉得口干，嚷着要喝水，母亲被我吵醒，就起身点灯。那时还没有电灯，我们是用煤油灯，这油灯就放在床里面的搁板上，她用“火柴”点火，想不到那包粗制滥造的所谓“洋火”，忽然整包都着起来。母亲处变不惊，把整包的洋火，紧紧抓在手上，直到它熄了为止。

若当时她将那包洋火放手一掷，很可能引起大火，不但我们母子的性命不保，房子会被火焚毁，同时可能祸及邻居。感谢神！借着母亲牺牲自己，不单救了我们母子，也保全了家产。然而，她的手因为严重地被火烧伤，医治了很久，到年老仍有疤痕。

///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城市被日军占领，日军只敢留守城中，而我家住在西郊外。当时日本人利用中国人组成所谓的“和平军”，城郊就由被日军操纵的和平军驻防。这些伪军作威作福，狐假虎威地仿倣日军，对中国人十分嚣张和残暴，他们命令所有行经岗哨的老百姓，都要必恭必敬地向伪军行礼，才可通过。

有一次，一位老人家因为行动较慢，那伪军竟然刮他耳光，打得他头破血流，摇摇欲坠。当时十来岁的我为这事愤愤不平，遂上前扶住老人，并与伪军理论。他们人多势盛，把我捉起来，押至部队，绑在柱子上。

有人通知母亲，她立刻单枪匹马冲进部队跟他们的长官理论。她用不流利的国语——那不是她家乡的方言，怒叱那些人，未得他们同意便替我松绑。她像一头勇敢的母狮，宁愿冒着被毒打的危险，也要保护她的儿子。那些人吓得目瞪口呆，忘了制止她，她便把我拉出警卫室，带回家。母亲平时总是平易近人，想不到那天发了虎威，把儿子从豺狼群中抢救出来。

///

我记得母亲只打过我一次。已经记不起是为了什么，但是她打完我

以后，自己却先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日后你成为人父，自然就会明白了。”

后来我真的明白了。有一次，我为了女儿一些错误的行为惩罚她，自己却哭了，那次，我和女儿一同跪下祷告，劝她以后不要再犯。

我们家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母亲便决志，接受了基督。后来她明白神呼召我一生为神的国而事奉主时，更愿意把我奉献给神。

///

小时候，我第一次大病时，母亲日以继夜地亲自照顾我。我开始康复时，她千方百计为我找一些名为“香吉士”的橘子回来，因为她要用最好的食物使我得着营养。她又不知从哪里取来难得的牛奶；甚至是罕有的快煮麦片。她照料我的时候，弄得疲劳过度，等我康复以后，她就病了。发高热，全身长满红点，大概是猩红热。

母亲被送往一所专科医院，留在隔离病房好几个星期，只有神与她同在，任何人都不得探望。她告诉人说：“我死了也不要紧，因为我儿子的性命已经保住了。我知道他会没事的。”她常常都是先为我着想。

我在外国的时候，她在强烈的逼迫期间，仍对主忠心。共产党指控我是帝国主义者和宣教士的“走狗”时，她处处维护我；他们散播谣言来诬蔑我时，母亲宁愿自己受欺、受骂，也要为我辩护。

自从离开家乡以后，我便尽力在经济上接济双亲，常寄钱回中国，惟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不能继续这样做，因为中国和外界完全断绝了来往。后来许多人告诉我，母亲在别人有需要时，总是牺牲自己帮助他们，更是特别照料一些受苦的牧者。

///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派母亲在一间位于庙内的制衣厂工作，母亲也抓住这机会向庙内一同工作的人作见证。

父亲在狱中受苦待、被打，后来病了，母亲便一直照顾他，直到他逝世。其后，她多年独居，得到护照后，文田单独回中国，将她接到香

港与我们同住。自此，她感到满心喜乐，因为可与儿子长久在一起。她在香港过第一个圣诞节时，为教会能有各种庆祝活动，再也不必惧怕逼迫，可以自由地敬拜神，感到十分兴奋。

母亲在我事奉的香港教会中，常与年长的妇女们一同读经、祷告，每当我返回香港时，许多人仍提及她怎样在属灵上帮助了她们。

母亲与我们在香港住了近一年，后来因香港教会比较稳定，我和文田决定返回美国，便将母亲一起接到宾州的乐园镇与我们同住。她见到分别将近三十多年的儿孙辈，虽然他们之间言语交谈有困难，饮食习惯有差异，不过在老年人心中，能团聚就是人生一大乐事。由于文田日间要工作，母亲便很乐于为我预备简单的午餐。她很喜欢这样做，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吃些什么。她常常轻声地唱诗，用很多时间祷告，把她的快乐及忧愁告诉主。



母亲在一九八五年与我们一起迁往德州道乐思。我们从宾州开车，一路拉着满载行李的搬运拖车南下。这旅程对母亲来说是艰辛的，但她喜欢在道乐思定居。她前后与我们同住了十多年。在最后的几年里，她用很多时间为家人祷告，又为每一个孙儿织一张毛毡。我们一家和教会会众一起为她庆祝八十大寿，对她来说，那是很开心的一天。

许多人记得母亲不间断地读圣经和祷告。我知道她昼夜都为我祷告；我在美国各地或海外讲道时，常常倚赖母亲的代祷。

一九八九年，香港教会二度邀请我们前往牧会，母亲由于身体不好，加上移民的身分问题，无法与我们同行。她不想因她的缘故使我留下，而不顾神的呼召，所以反而极力鼓励我和文田去。我知道，若没有我们在身旁，母亲一个人留在美国是极其困难的，她不懂英语，因此跟我们的儿女和孙儿沟通也有困难，但是她无怨无悔，样样逆来顺受，因为她知道，她的独子是为了拓殖天国的大业而离开。

我也很感激孩子们十分乐意且细心地照顾祖母。她轮流在我五个孩子家中居住，因为我们的儿女住在不同的地区，她要穿梭美国各地，由东岸至西岸至中部。有时她得困难地上下楼梯，或自己煮一些她需要吃的食

物；有时她又完全没有可以交谈的人，不过她一直坚持说她不介意，并说她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且鼓励我们继续事奉主，说她会没事的。

一九九二年初，我们在香港正忙于工作之际，忽然接到家人由美国来电，说母亲病危，已紧急入院，我立刻通知长执们，要求让我尽快回美探视她老人家。

在与我们同住的最后两年，她常常进出医院。有好几次，我们得请救护车送她进院。母亲最后一次患病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接近感恩节的时候，天气很冷，下着雪。她在夜里，安详地在主里睡了，走完她在世上的路程。

母亲一生对主忠心，对我爱护有加，她的一生，也给我们的儿孙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我们把她火化骨灰存着，等到将来，与我们夫妇的骨灰同放在一起，以候主再临。我无法描述母亲对我和我的事奉有多大的影响，我只为母亲感谢神。

第 45 章

影响一生的两个女人——爱妻文田

文田和我是很相称的一对，虽然她听我讲道已有半个世纪，
但每次我讲道的时候，她还是专心聆听！
她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批评者，
总会等候机会，私下与我分享。
我很感谢她，在晚年的日子里，
虽卸下了抚养儿女的责任，却陪着我到各处工作。

我的妻子文田，体现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描述的每一项基督徒品德，是我所见过的最佳榜样。我从未听她说过一句恶言，她从不抱怨，而且似乎有着无尽的爱。最重要的是，文田爱主，她全心全意为主而活；她一生都忠心顺服主。

///

文田喜爱神的话，每天黎明即起，殷勤地读经。她在许多经文上作记号，说那是神向她说的话，或是神的应许。

文田爱我，虽然知道生活不一定会好过，也不一定会有世上的赏赐，但她愿意嫁给一个默默无闻的穷传道。六十多年来，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停地悉心照顾我，她真是为我而生在这世上的！

文田爱我的母亲，这是很难得的美德。在传统里，人都认为婆媳

很难相处，并常把婆婆视为媳妇的难题。虽然文田自己已成为别人的婆婆，甚至作了多人的祖母，但母亲来与我们同住时，她仍竭尽作媳妇的责任。我们新婚时，文田对我母亲已很亲切和细心，是她把我母亲由宁波接到香港，再由香港带到美国的。

我常出外讲道，文田要独力照顾母亲，她对母亲所表达的爱心和耐心尤其难得。母亲最后几年时常患病，这对文田来说必定更加吃力，但她仍是那么温柔、忍耐、和善。

文田爱我们的儿女。自五个孩子出生开始，她便孜孜不倦地把神的道教导他们，特别是在印尼的年月，我在美国进修，她要独力照顾他们，母兼父职，在这人地生疏的环境里，是一个很大的磨练。但当地的人告诉我，他们很乐意帮助她，因为她既诚实又忠心。结果我们的孩子说中文时都带着很重的宁波口音，因为文田是第一个教他们说话的人。自从结婚以来，我们便实行什一奉献，她并常常提醒我把所拥有的献给神，也教导儿女这样做。

她全心支持我在主里的工作，若没有她的支持，我绝对无法自由地回应神的呼召，前往神要我去的任何地方。印尼的热带气候很潮湿，对文田来说是很辛苦的，因为她很怕热。她变得瘦弱多病，我怕她会活不了多久，但她常常向我保证说：“不要为我担忧，我死了也不要紧，你继续做神的工作就好了。”

///

在日本，情况又完全不一样。文田要照料那群在另一种文化环境入学的儿女，特别要学习怎样理财。她要为儿女交学费，又要交房租、买菜、烧饭，她一直尝试在物价昂贵的情形下量入为出。她从来没有怨言，也从不会为未来担忧，不曾忧虑我们的钱会用光，她为我们的生活要求告神，并完全倚赖主的供应，而主也确实常常供应。

在以后的日子里，文田手脚都患了关节炎，然而，她仍愿意在香港忍耐三年的炎热与潮湿，这种天气使她的病情更加恶化。有时，她会痛到不能行走，但由于我们同心为主做工，所以她总是充满喜乐地忍受一切，并倚靠主赐她力量。

我们住在美京华盛顿时，她每天在洗衣店工作八小时帮补家计。在乐园镇，她又在制衣厂里工作很长时间。她到晚年才学驾车，但现在已很勇敢地在各种交通状况和高速公路上驾驶。

我不希望把文田描述成完美的人，有谁是完美的？她很健忘，但这也可算是一种美德，因为她真的记不得谁曾得罪她。她很容易饶恕人，因此没有敌人。实际上，她有很强的个性，对事也有很明确的见解。她会说明她的想法，但从不与我争论，而是甘心顺服我的决定。她从不道长道短，相反地，她会温柔而确信地向人谈及神，又会向神谈及人。

她很少为自己买些什么，不奢求珠宝首饰，不介意外表是否漂亮。道乐思的教会为了我们的金婚纪念，筹备了一个庆典和感恩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他们安排我们再行婚礼，还准备了一套时尚的白色婚纱，连着头纱、长裙和花束。教会里的姐妹为了这盛典，要求文田容许她们为她化妆和设计发型。我觉得她很漂亮！没有人相信她已经七十岁了！我们拍了些结婚照片，感谢神真的把我们结合了半个世纪！

///

文田的情绪表达有典型的中国女性特色，她是以行为而非话语来表达她的内心。她以独特的方法爱着五个儿女。虽然儿女已长大成人，为人父母了，但有时她也给他们一些劝告。他们若不听取她的劝告，她也许会不开心，但却不会发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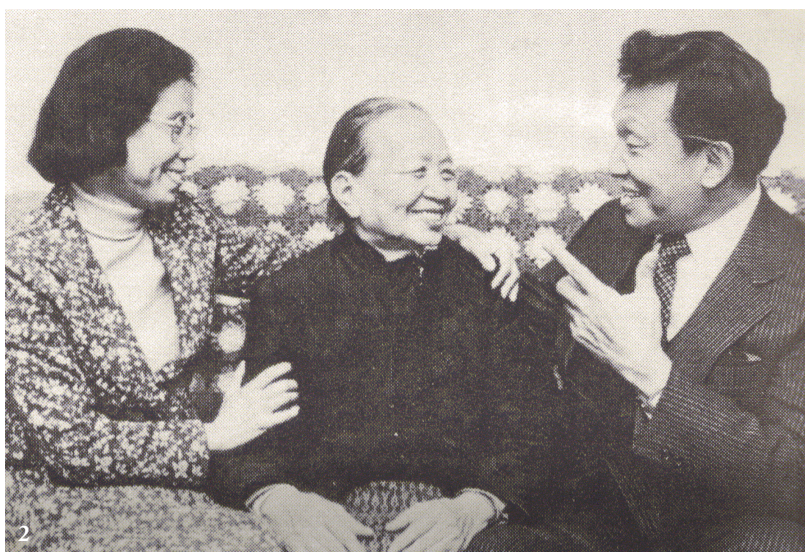
我们是很相称的一对，我话多，她则是一个聪明而细心的聆听者。虽然她听我讲道已有半个世纪，有些讲章她从前必定听过，但每次我讲道时，她还是专心聆听！她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批评者，她若要指出我讲章里的一些问题，总会等候机会，私下与我分享。她不爱社交，爱家里的宁静，但每当我乘飞机或驾车往别处讲道，她也很乐意与我同去。我很感谢她，在晚年的日子里，虽卸下了抚养儿女的责任，却陪着我到各处工作。

她的某些强处也是她的弱点，但我了解她的心。她有很明确的喜恶，却不会要求别人随从她。她对某些事情或许会感到很失望，但不会大声斥喝，也不会在我或任何人面前诉苦。每当看见她匆忙坐在钢琴前

弹奏圣诗，我就知道是她有这些感受的时候。

在道乐思教会里，文田鼓励许多执事的夫人一起祷告，支持主的圣工。她买很多有关祷告的书，并教导这些妇女以更有效的方法祷告。虽然我们所拥有的不多，但她从来不拦阻我为神的工作奉献，而信实的神也使我们衣食无缺。

真的，文田是一个“出色的妻子”，神拣选她作我合适的伴侣。正如箴言三十一章所描述的敬虔妇人：“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三十一章28-30节）



1. 我能完成神的托付，是她们爱和忠心的支持。
2. 母亲和我们住在宾州乐园镇。

3. 在母亲心中，能团聚是人生一大乐事。

4. 我赴美进修时，文田母兼父职，独自在印尼照料五个孩子。





5. 我觉得文田很漂亮！没有人相信她已经七十岁了！
6. 我们相爱相惜，同奔天路。
7. 我们是很相称的一对，感谢主赐我们一个爱主的大家庭。

后语

长存盼望

只要神赐下机会，
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们都要传道。

第 46 章

还有那未完成的任务

特别在中国，“钱财的迷惑”使那些
在极度受苦期间迅速建立的教会窒息了。
共产党不能逼迫中国教会毁灭，
但财富的追求、创业的诱惑、物质的渴望
都动摇了教会属灵根基。
让我们迫切祷告，叫那些在艰苦中屹立不倒的教会，
不会为“阴间的权势”所胜。

一九九五年，我七十岁生日的那一年，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引领文田和我离开美国，前往过去半个世纪里，我事奉神的所有地方。我们仿佛兜了个“圆圈”，又重访我深爱的东京、印尼、香港，并返回家乡宁波。

在每个地方，教会领袖们都安排了连续的聚会，让我有机会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也有机会鼓励、劝勉教会。

我发现属灵的仇敌，不断地在各地基督徒的心里和生命里播种荆棘，那些石头地仍需要敲碎，而种子开始发芽时，空中的飞鸟又来啄食。即或如此，圣灵却仍在好土里浇灌、滋养神的道种。我感谢神，在每一块要收割的田地里，靠着神的恩典，仍有属灵的果子存留着。有些地方，信徒带来了三十倍的果子，有的六十倍，有的一百倍。

特别在中国，我发现“钱财的迷惑”使那些在极度受苦期间迅速建立的教会窒息了。共产党不能逼迫中国教会毁灭，但基于他们新资本主义

的自由，中国在经济上有了迅速的发展，财富的追求、创业的诱惑、物质的渴望都动摇了教会属灵的根基。让我们迫切祷告，叫那些在痛苦和艰难中忠心、屹立不倒的教会，不会为“阴间的权势”所胜。

///

从香港飞往中国的航机原定在黄昏前起飞，却一再延误了。我想，这次前往故乡传讲福音的正式邀请，并不只延迟了数小时，而是自一九六三年延迟至今！过去我曾多次向加拿大和华盛顿的大使馆申请前往，都徒劳无功。直至一九七九年，中美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我才有机会首次回国探亲。当时，我不能公开在故乡传道。现在我满心感谢主，因为我终于接到国内三自教会的正式邀请，在故乡一所新礼拜堂的奉献礼上传讲福音。

正如诗人所说，我们从被掳归回时，就好像作梦一样，在我历经波折，终于抵达宁波那灯光昏暗的机场时，就有这种如梦的感受。我们过海关时，感谢神，关员并没有检查我们的行李，我所带大量帮助国内信徒查经的书籍和材料，都顺利过关了。机场外，许多人热切地等待着我们。我认得其中一些人，但多半都不认得。

有个人上前来与我握手，问：“你记得我吗？”他是那个将要举行奉献典礼的礼拜堂主任牧师。他告诉我，在他小时候，我曾去他们的教会讲道，并且担任传道、牧养的工作。他再次见到我，感到很兴奋，并欢迎我在献堂典礼时能到新堂讲道。我们感谢神让我们重聚，并求神带领未来所有的安排。

///

到了宁波，我们先去探望我岳母。一位穿着入时，和美国女孩没有差别的中国少女，驾驶着一部韩国制的新车来接我们。好一个摩登的女司机！她很健谈，一路上跟我们聊个不停。我发现她是一位基督徒，因为她说：“我婆婆是令尊开拓的锡安堂的会友，我现在则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很高兴能带你们前往聚会。”

我问她，翌日上午是否有空可以载我们，到城外去探望我父亲的坟墓？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因此，我们抵达宁波后的第一个早上，这位年轻女司机便载我们到父亲墓地。我站在山顶上，想起十六年前第一次回国时，到这里来的情景，心中深深感谢神让我重临此地。

回忆起父亲时，我既伤痛，又感恩。感恩的是，因为他是我的榜样，是一位把我一生奉献给神的敬虔信徒。他每天跪在床前，为我和未来的子孙祷告。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勇于向每一个遇见的人作见证，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活着，讲述他怎样帮助本地信徒建立教会。伤痛的是，因为他被监禁、受折磨而死，部分原因是有我这么一个儿子。自从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分别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他的面！相信神在这些年里使用我在许多国家传道，并带我回乡来传讲祂的话语，荣耀祂，都是因为听了父亲的祷告。

///

宁波在外观上有很多进步的地方，政府筑了一些新马路和高楼大厦；村落里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本地的人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黑暗日子，但对我来说，这四十年只像一眨眼的工夫。我这次回乡，并不是来观光，是希望能与神的子民相见，向他们传讲神的信息、激励他们。

在宁波的第二天下午，我接受邀请去一个家庭教会讲道。有些本地信徒劝我不要前往任何家庭教会，因为那可能影响我以后几天在三自教会的聚会。经过祷告和谘询本地的信徒领袖，他们鼓励我去，因为当局已认可那些团体。

家庭教会中，有些人认识我父亲，有些则听过他的事迹，一些年纪较大的，更是父亲协助建立教会的会友。这团体现在一星期聚会一次，那算不上是一个“地下教会”，聚会的地方也不在信徒家里，而是在一幢新建的建筑物二楼。聚会也不是秘密进行，有百余人拥塞在那聚会场所的不同房间里，还要使用扩音器，当我走近那幢大厦时，已能听到他们宏亮的歌声了！

我知道，这教会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日子，因此我以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一章鼓励他们，说神以受苦来使福音广传。主使祂的话变得丰盛，信徒也为我未来的几次聚会祷告。

中国政府宣称中国有宗教的自由，但事实是：自由是有限的。在我到达之前，政府对我的到来向当地牧师施加不少压力。我们待在那新教堂的宿舍里，三位当地牧师到我房间来，诉说他们面对当地政府的困难。他们说话时，我一直向神祷告，因祂在万事上掌权，我求祂把合宜的话放在我心中，然后让我说出来帮助他们。虽然身为局外人，我很难了解他们的处境，但我也尝试去做。纵使我为中国同胞，但在这些年期间却没有经历过他们所遭遇的境况。

政府当局明显地提出各种借口，企图阻止我传道。当地政府说，虽然宁波是我的家乡，但我现在是一名美国公民，而不是中国居民。他们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不应该在那里传道。最后他们有限度地默许我与会众“讨论或分享”，但却不可正式地讲道。

///

在这次离开道乐思之前，休士顿的中国总领事打电话来警告我要小心，并且提醒我要与当地的中国政府或管理部门合作，他们正式表示我这次探访是十分敏感的。

开始时，我申请签证是为了探望九十高龄的岳母。而且在获得签证以前，并没有得到三自教会的邀请，后来他们才请我参加一间教会的献堂礼拜，以及连续三天的聚会。

对于是否接受三自教会的邀请，我内心挣扎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问题对于香港和美国的华人基督徒来说，是很敏感的，他们认为我不该和政府立案的教会扯上关系。我只有祈求神的指引了。

当我研读神的话，我认识到：耶稣展开祂的工作时，祂的国家正被罗马帝国政权和军事政府统治，祂没有要求门徒向政府示威，甚至劝人向罗马政府纳税。在客西马尼园里，耶稣说祂可以差派天使来，与敌对的势力抗衡，但祂没有这样做。保罗在小亚细亚一带传道时，是先在当时的宗教中心传道。摩西虽曾带领两百万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和辖制，但他并非以示威和暴力完成使命，而是让神用祂的方法来成就的。

因此，我心里平安地接受当地三自教会的邀请，因为我相信只要神赐下机会，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道。

他们宣布一连串与奉献教会有关的聚会为“培灵”聚会或“奋兴”聚会，因为共产党不容许任何“福音性”的聚会。然而，纵使有种种规条，和人为的限制，神仍按着应该得救的人数加给祂的教会。

教堂的奉献礼订在星期三举行。星期二晚上，主任牧师来告诉我与当局交涉时的困难，他甚至前往省府杭州，澄清我所领的聚会。他们告诉他，在省的层次来说，他们没有反对，但当地市政府却反对我参加。靠着信心和多多祷告，我们继续进行下去。

///

清早，教堂挤满人群，管乐队里的喇叭、鼓和其他乐器大声吹奏着〈基督精兵前进〉、〈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和其他进行曲形式的圣诗，吸引了许多邻近的人到来。对我而言，这倒是新鲜事！我在中国成长的过程中，从未听闻教会内有这样的管乐队。

他们告诉我，现在多数向政府登记过的教会都有这类乐队。在共产党统治早期，所有公开的基督教活动都遭压制，但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停止教会的增长。政府压制和逼迫的风暴过后，基督徒再次起来，在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的家庭教会里聚集、传福音。他们告诉我，一位年逾九十岁的教会长老逝世，教会为他举行安息礼拜，竟有九百多人参加，还有送葬的队伍抬着棺木到坟场去，有一间教会派出管乐队来加入长长的队伍，他们吹奏圣诗，经过城的中心地区，整个城，甚至地区政府，都对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教堂的奉献礼中，另一个教会也派了管乐队来祝贺。崇拜分成两部分：先是感恩，接着是奉献典礼和讲道。

本地的共产党官员也参加，作一些政治讲话，劝告基督徒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光明的前途奋斗，然后由我负责一个短讲。

首先，我感谢神让我回国见证新教堂的完成。感谢政府给基督徒有敬拜的自由，并容许他们兴建教堂，这在今日中国是一件难得的事，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事绝不可能发生。当时的政府不断关闭教会，

把教堂作为别的用途。我为现在政府成就的这些美事感谢神。

然后，我以神的话鼓励会众，请他们留意耶稣给人的五个命令：第一个给门徒的命令是彼此相爱；第二是遵守祂的话语；第三是儆醒祷告；第四，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第五，被圣灵充满，这是主耶稣离世前告诉门徒的。若要成为一个灵里健壮、不断增长的教会，必须谨守这些指引。

对教会和会众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可以完成其他四个命令：他们祷告时会得着圣灵的帮助；他们会彼此相爱；他们会喜爱研读和听从神的话；并会实行耶稣的大使命，传福音给别人。

讲完以后，一个共产党官员对我说：“对，你说的是真实的。”我相信我在引言中衷心地向政府致谢，表达我的善意，已为信息被接受铺好了路。

///

由左至右，由前至后，教堂里挤满了两千人！是我从未见过的景况。他们拥挤至讲台前，中间没有一点空位。我讲道的时候，最接近我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头向上，整个人向后仰着！

回顾那些聚会时，我惊讶，主竟这样地保守了我们！新教堂实际的座位最多坐一千人。感谢神，却没有意外发生！此外，共产党也没有以“人群过于挤迫，很容易在发生火灾时有危险”为借口，而停止我们的聚会，特别因为聚会是在二楼举行。但是神看顾我们，以致整整五天，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从邻近的城市来，有些离家很远，五天聚会期间需要安排住宿，教会把礼堂下面的团契会堂，用作招待约九百人的大宿舍。他们都睡在地上，男的睡一边，女的睡另一边。早上，大家一起灵修。教会也为那些从其他城镇过来的信徒提供食物，杀了好几头猪，每餐都准备大盆大盆的食物，每顿饭几乎都有二千人一起用膳！

第一次崇拜以后，当地牧师说：“今晚你必须向全体会众讲道。”

按照政府的限制，只能“坐着分享”，不可以“站起来讲道”，我怎能

答应他的请求呢？若只有几百人左右，坐着分享也许可能，面对着二千人，却不能这样做！但靠着神所赐的勇气，还有当地牧师和同工们的同意，那天晚上我便站起来向他们讲道。在中国教会里讲道，他们不希望你把讲道时间限制在四十五分钟或一个小时内。他们会希望你一直讲下去，至少两个小时！

很不幸，那里的扩音系统并不能常保持正常运作，因此我必须尽力大声说话，让所有人都听见。我真的十分疲倦。他们说既然会讲宁波话，可以不必用国语讲道，因为一些年纪大的信徒可能不完全听得懂国语。这情况跟保罗在耶路撒冷讲道，群众更留心聆听很相似。

第二及第三个晚上我都照样讲道。后来牧师请我次日讲两堂道。第三天的晚上，主给我一个很重的负担：在中国，牧师和教会工作者都多半年逾七十，许多甚至八十来岁，二三十岁的传道人只有几位，年老的牧师跟年轻一辈有明显的代沟，实在需要有年轻人奉献自己来事奉主，而神学院却只有极少年轻人报考。因此，在主的带领下，倚靠着圣灵的大能，我在两小时讲道后，在讲台上发出了呼召。由于当时在教会里，多半参与聚会的都是老年人，我若发出一个给“任何人”的邀请，也许有一千人回应！因此，我限制年龄，只呼召那些三十或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奉献事奉神。

许多年轻人马上站起来，我想他们必定是误会了，因此重申并澄清我的邀请，那些年轻人泪流满面，他们是真正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

我问当地牧师有多少人站起来？他说大约六十。我请他们把奉献人的名字和地址写下来，好让我为他们祷告，记下来的名字有八十多个，到我离开那天，总人数已增加到一百多人！其后，陆续有更多人留下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请我为他们祷告，我求神帮助他们可以持续奉献的心志。

第二天早餐时，好几位牧师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以后，没有牧师敢在讲台上发出呼召。纵使有人呼召，也没有人敢在公众面前站起来回应。过去三十年里，他们从未见过像前一夜发生的事。我知道这样成功的一个聚会，是许多人多年祷告的结果，而不单是我的信息。神在祂的时候来到，便运行在人中间。将所有荣耀都归给主！

那间教会的牧师，一点也不害怕。我担心在我离去之后，他会因我大胆的讲道和在讲台上的呼召而受苦，但他说我不必忧虑，既然是主

的带领，这样做便是正确的。不过我心中一直不安，直到许多个星期之后，我收到那教会的信，说当局并没有针对我的聚会而给予他们麻烦，才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

当地的牧师问我，可否多领一个特别为牧者和同工而设的聚会。他们不像以往一样，称同工为执事，而是称为堂务委员，但他们事奉的角色是一样的。他们邀请了六七间教会的同工，在其中一个大教堂聚集。

我们讨论了教会所要面对的一些大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十年里变得更加急迫。头十年的“黄金机会”已成过去，现在要争取像一九八〇年代，早期教会刚获得自由时聚会的良机，似乎已太迟了。其实，政治上的反对、压力，和共产政府的控制，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教会在火炼与逼迫中还是会增长。然而，由于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方兴未艾，正逐渐腐蚀教会的成长，我们也看到，社会的进步繁荣并不能建立教会。

到教会来的年轻人愈来愈少。从前，年轻人没有现在那么忙碌，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吸引他们。以前有些人因好奇而到教会来，有些人则由于政治上的失落感，诚心诚意地来寻求答案。他们有团契，彼此相爱，但现在却觉得讲道缺乏实际内容，和生活脱节，年老的牧者不能供应他们。那里只有一些正在受训的中年传道人，负责训练门徒，领袖荒的问题十分严重。要怎样训练出能够吸引年轻人的牧师呢？哪里可以提供训练呢？即使对基督徒来说，做生意、赚大钱都远比进神学院受训更吸引人。

在任何成熟的庄稼里，必定也有很多稗子。由于领袖和信徒都不以神的话为基础，难怪假教训，甚至异端都纷纷兴起。许多信徒缺乏圣经和教义方面的基本教导，那些旅行布道家往往都十分肤浅，或在讲道和福音信息上有所偏差。

“为我们祷告，并教导我们怎样做神的工作！”那些牧者恳求说。我告诉他们，要把我所讲的耶稣五大原则付诸实施。感谢神，我回家后，收到那些教会的来信，知道信徒间的爱和关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心灵仍很沉重，担心那里严重缺乏领袖、领袖需要训练，以及撒但使用迷惑人的战略等问题。让我们一起呼求主怜悯祂宝贵的中国教会，继续为

他们祷告，并尽一己之力去帮助他们。

在宁波的聚会得以成功，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政府派了密探来监视我们的聚会，有些还警告我说话要小心。我向他们保证只传讲神的话，不会谈及任何与政府或政治对抗的话题，而我也确实这样做，所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人骚扰我们的聚会，因为神垂听祷告。

事后我听说教会里的人曾得到警告，不要和我们太接近。这就是为什么，有几位热心的基督徒工人，在公众面前和我保持拒离的原因。但他们也很有技巧地让我知道，他们一直在为我祷告、支持我。

有些信徒请我与当局接触，要求他们重建我父亲昔日协助工作的锡安堂，我少年时，也曾在那里讲道。首先，我让他们明白我并不是教堂的“业主”，我没有权力要求他们这样做。作为一个美籍华人，我觉得自己不应牵涉在中国本地的事情之内。我要他们祷告，看神怎样成就他们的意愿，或许政府会在宁波另辟一块地，让他们兴建聚会的地方，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

感谢神，在祂仆人的生活细节上，也照料得无微不至。香港的人曾告诉我说，中国大陆的自来水不能生饮。其实这件事我早就领教过，我在印尼就得过严重的腹泻，全身无力，第一堂聚会时几乎下不了床，只好请别人代讲，到第二堂，才勉强坐着讲。

我离开香港之前，一个很细心的人给我带了三瓶饮水来。虽然那三瓶水似乎很累赘，但我不能拒绝他的好意。此外，我也不想让当地人以为我连水也要自备，因此，我只是把水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感谢神，那三瓶水实际上帮助我捱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连最后一滴水都喝完了。

我的身体软弱，主也看顾我。在宁波的时候，春天快要结束了，但仍有点寒意，不幸地，我只带了六套内衣裤，虽然气候清凉，但我身体虚弱，每逢讲道便浑身渗着汗。当时气候又很潮湿，衣服洗了，要很久才干透，尤其是，衣服只能晾在房间里，更不容易干。最后竟然有一次，五套内衣裤都未干，身上穿的最后一套也被汗水湿透，我真的感到很不舒服，还怕会因此而着凉。然而，感谢神，让我平平安安地回到

家，没有病倒。

离开宁波的那天晚上，牧师和同工们送我们到机场，与我们道别。他们还带来满袋“爱心的礼物”，都是些著名的土产，如虾干、咸鱼、竹笋等，我们诚心地接受了这些珍贵的礼物。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望向窗外，看见我心爱的城市里，闪烁着点点灯光，觉得基督徒就好像黑暗中的明灯，能照耀、祝福这城里的人，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主若愿意，我盼望可以再回来。求主保守这个小城，保守我们在这短短几天里所结的果子，更求圣灵在未来的日子里，借着祂所有的仆人，在中国成就更大的事。

正如在摩西的日子一样，神必已看见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受的苦难，已听见他们在属世和属灵的压迫者手下的呼求。祂知道中国人民的痛苦、患难和磨练，必会借着福音的传扬和教导，把中国人民从属灵的奴役中释放出来，并“容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事奉主”。



1



2

1. 长子周大卫按牧。
2. 求圣灵在未来的日子里，
借着祂所有的仆人在中国
成就更大的事。



3. 薪火相传，三代同堂参加华人差传大会，成为神国生力军。

4. 参与周大卫按牧的牧长们。

附录 1

愿作国度精兵——1992差传讲章

前美国总统布希(George Bush)，签署了一份保护华人学生的法案。
根据移民入境法专家所言，
不单大陆学生和学者可以申请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他们也可以利用这法例，申请他们的家人到美国来，
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将有另一波移民潮。
今天的华人教会已经准备好渔网去捕捉这些鱼吗？

主带领我在“1992华人差传大会”中分享以下的信息。我是向着华人学生和专业人士传讲的，但我希望当中的挑战，也可以帮助其他非华人明白我们华人基督徒，在开始接往向普世传福音的火炬时，所面对的处境。

///

我们齐集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有着同一个目标，盼望神的国度降临，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都深信神的国必定临到。它既然必定降临，我们该如何动员祂国度的精兵呢？神赐给我们紧急的使命和个别的责任。我们不只应该接受这个时代的挑战；还应当向世界的末了发出挑战。

作为神国度的精兵，我们正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这一代的世界已急剧改变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曾拉下



它的竹幕，而南北韩、东西德、南北越等国家，又溜到其他帘幕后面。我们经历过热战（明争），也看过冷战（暗斗）。世界似乎翻了个身，人们不再享受人生，反而只想逃避。毒品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加上失业，还有像燎原之火般蔓延的爱滋病，以及四处发生的暴力事件、臭氧层受到破坏，更有污染问题威胁着我们的未来。

科学家、医生和历史学家纷纷警告大家：我们正走向末世。启示录预言的事件，仍留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已经瓦解，但它在其他地方仍然十分巩固；苏联和东欧各国正分崩离析；虽然柏林围墙倒下了，世界仍未享有和平；种族主义不单在南非复炽，也在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美国和德国的新纳粹运动中，愈来愈兴盛。正如圣经预言：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

世界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亚洲有经济四小龙：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也成为逐渐升起的新星；东南沿海珠江口岸，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各种问题也随之增加，超级大国的势力下跌，而世界的均势也在转移。饥荒、天然灾害、暴风、地震、瘟疫，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性命，我们面对的世界真的很不稳定。

试看今天的教会，提摩太后书三章1至17节告诉我们，人喜爱三样事情，也憎恶三样事情。他们爱自己、爱享乐、爱金钱；他们不爱神、不爱良善、不爱真理。在这末世，我们对世界的人有什么使命和负担？谁又应该去执行这项使命？

首先，无论我们生于什么国家，让我们以身为华人而感谢神。有些华人虽然已是美国公民；但即使我们改变了效忠的国家，我们仍是华人。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是华人，有人说，如果全世界所有华人齐声说“一、二、三”，然后一起顿足，可能地球也会震动！虽然华人有许多缺点，但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还享有坚忍、冒险和具开拓精神的美誉；我们有经商的智慧，并且经常在生意上获利；我们也有钻研学术的天分，我们可与世上任何一个民族媲美。我们不但可以做得好，还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让我们感谢神，我们是北美的华人。华人在美国和加拿大已定居很久。第一批劳工忍受了极大的苦楚，甚至不人道和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自然地聚集在城里。早期的移民怎样谋生呢？经营餐馆、杂货店和洗衣店，也有些开设麻将馆，但在战后来美国的华人不同了，他们是优秀的学生，是知识分子。

他们刚来美国时，没有人注重他们，但是等到他们获得博士学位或其他学位以后，便受人赏识了。美国是一个机会平等的地方，许多华人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研究员。一位从台湾来的华人甚至成为加州大学的校长。神已把机会赐给北美的华人，去对社会作出重要的贡献，我相信华人将来会有更大的成就。

据说华人初来的时候，乘坐的车子很大，住的房屋却很小（乘公车、住公寓）。现在，华人的生活水平已有了相当的改善，他们驾驶的车子可能较小，但住的房子却大了许多（轿车、别墅）。华人的物质生活虽然改进了，但我们与社会其他人相处，仍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第三，感谢神，因着我们是北美的华人基督徒。神把我们放在自由的土地上，让我们享受安定的生活。当世界上很多人在挨饿，我们却在节食！我们的属灵异象应当在这里获得扩展。美国是拓荒宣教士的本土，他们放弃舒适生活，往遥远地方传扬福音。我们可能没尝过他们生活的艰苦，但我们应当重视他们云彩般的见证，向我们发出挑战，激励着我们。

美国到处都有教会，人们甚至可从电台和电视听到圣经的真理，基督教刊物也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得到何等大的恩宠！但我们不会因为住在这里而比其他人优越，我们也不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华人更机智、更聪

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4节宣称，他靠着神的恩典，成了何等样人。我们领受的全是神的恩典，不应该骄傲。祂的恩典叫我们承认，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得来的。

华人教会遍植北美的大城小镇，全国的校园都有查经班。过去一年里，我参加了十位华人牧者的按牧典礼。有些华人教授、医生和高级工程师放弃了他们的工作，献身全时间事奉，这些都让我再次受到激励，献身事主。感谢神，很多华人基督徒正参与普世宣教工作，华人差传机构已经成立，华人教会的差传基金也不断增加。让我们为着北美华人基督徒和华人学生感谢神！

我们既得了清楚的身分和那么多恩惠，应该想想：我们可以把什么献给神呢？其实，神拥有一切，万物都是从祂来的，我们只是管家，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出自于祂。有人说，我们需要派出千百位宣教士。我们举办三年一次的华人差传大会，正是为此原因。是的，我们需要宣教士去传扬神的话语。庄稼熟了，正等待收割。

///

但不是每个人都蒙召参与宣教事工，或投入全时间的宣教工作。事实上，很多国家是不容许宣教士入境的。神国的精兵可以是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师、会计师、厨师、理发师，或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每个基督徒都能蒙召去宣扬福音和建立教会。我们需要一些研究圣经、教导纯正信仰的神学家，我们也需要愿意委身去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政治家、科学家、农业家、音乐家、工业家、教育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能被主使用的各类专家。

如果你是医学博士，当你去到工场，不要自称为“宣教医生”，要作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宣教士；也不要自称“宣教教育家”，要作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宣教士，要以宣教士的身分为优先。

神也需要普通人。林肯曾说：“神一定爱普通人，因为祂造了很多这样的人。”神需要家庭主妇、双亲、工人、商人；他们都可以是神国真正的精兵。在世界每一角落，神都要我们成为祂的盐和光。

我心里有一个沉重的负担：无论人们追求什么事业、工作或成为什

么专家，他们是从哪里开始呢？校园！每个人都必须先在学校里学习他们的专业或技能。学生就是那把最重要的钥匙。基督徒必须夺回失土，我们曾经得而复失，我们失去了谁？我们失去了学生。

你可知道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原本是基督教学校，目的是训练大学毕业生出去传福音的，像：普林斯顿、耶鲁、杜克——现在我们已失去它们。中国信徒布道会（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把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的一篇文章翻译出来，让我们看见令人震惊的事实：在一百一十九间主要大学中，有一〇四间是由基督徒创立的；一百年前，哈佛大学许多教授都是基督徒；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是由浸信会开办；内战时期，四万名大学毕业生中，有一万名献身基督教工作。

然而今天，有六十万著名教授反对基督教，有些公开表示是无神论者，负面地影响着三千万个学生。每年有二百三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当教师，他们向四千万个青少年教导的是什么？基督教是一种迷信！无神论哲学正控制着他们年轻的心灵。

我们很多人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我们说要防制爱滋病，但示威反对这些事情，只治标而不治本，人如果不信神，又为所欲为，相信人是猴子的后裔，他会相信猴子得了爱滋病后，把病传给我们这些后代！你听过猴子搞同性恋吗？

我们必须回到校园，重获我们所失去的！我们不能忽略学生事工！不能忽略将来最宝贵的资源！历世历代以来，学生曾大大影响了社会。中国的“五四运动”，带来方向上重要的改变。我在日本事奉时，对日本学生提倡的一些重大运动，留下深刻印象。前美国总统艾森豪访问东京时，学生有足够的力量阻挠他的计划，学生也推翻了韩国总统李承晚。在中国的天安门，学生发起民主运动，结果带来可怕的屠杀，学生是独裁者的威胁，他们的力量消灭不绝。

曾为内地会宣教士的艾得理牧师（Rev. David Adeney），是一位重要的学生领袖，影响各处的华人学生。他举办聚会，向华人学生发出挑战，要他们接受基督。他帮助华人教会和宣教机构征召许多领袖。愿我们跟随他的脚踪；凡能掌握学生力量的，就能掌握未来。

///

今天的华人教会，面临一个始料未及的机会，我们必须抓紧它。前美国总统布希（George Bush），签署了一份保护华人学生的法案。根据移民入境法专家所言，不单大陆学生和学者可以申请在美国的合法地位，他们也可以利用这法例，申请他们的家人到美国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将有另一波移民潮。

华人教会已经准备好渔网去捕捉这些鱼吗？可悲的是，许多教会过于关注自己的需要，他们以语言困难、生活方式不同、不能与学生建立关系等作为借口，以致忽略了校园事工。愿神怜悯我们。但愿更多教会为校园祈祷，认真地参与校园事工。让我们在神面前详列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所领受的属灵好处。

首先，我们从神领受了生命。生命是何等宝贵！要享受生命，热爱生命！要委身为神而活！我接受心脏管道手术时，向神祷告：神啊，请帮助我活得久些。我那样祷告为的是要更认识神，有更多日子去事奉祂。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最佳礼物。

第二，神已经赐给我们救恩。我们没有凭自己去赢取它，这是无与伦比的一份礼物。约翰一书三章3节提醒我们，神是何等爱我们，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女。肉身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永恒的生命更重要。

第三，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一份宝贵的礼物。如果圣灵不帮助我们，我们便不能认识神，不能重生，也不能进入真理。对基督徒来说，拥有圣灵不是奢侈，而是必需。只有那样，我们才有能力事奉主。

第四，哥林多后书四章1节说，我们得到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就是劝人与祂和好的职分（五章18节）。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有责任向别人传讲和好的信息。英国女王要派遣一位使者到外国，她会把她们的剑按在他肩上，委以重任，他接受了，并且要去执行。我们也从神领受了使命。

保罗对谁说这些话？领受这使命与神和好职分的“我们”究竟是谁？不仅是弟兄。加拉太书三章28节说，在基督里，我们并无男女之分。也有人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这句话好像是赞赏姐妹，但我不相信女人只能站在男人背后。在神国度的工作里，姐妹应该与弟

兄并肩。正如圣经所说，男人是头，但女人是颈，颈部不只支持头部，也操纵头的转动！

姐妹们不是次要的，有些人觉得女性在教会里应保持安静，站在她们丈夫的影子下，在她们的作品中隐藏自己。很多勇敢的女性当了海外宣教士，她们没有要求权利、炫耀她们的才能，或要求受到尊重，只是至诚地把生命献给神。很多时候，我们错误地否定基督徒姐妹参与做决定的机会。在华人教会里，由于文化及传统，也让姐妹们不必要地限制了自己。

圣经教导我们要尊重女性。我们能怎样做呢？就是肯定她们的身分和恩赐。按着主赐给她们的恩赐和责任，她们也是神国的士兵，我们应该帮助她们运用才干。弟兄姐妹，让我们团结一起，面对挑战，来执行神国的责任。

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既从神领受了那么多恩赐，我们可以为神的国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开始传道时所强调的重点，以及耶稣天国的信息都宣告：天国近了。由于天国近了，所以人人都需要悔改。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悔改，我需要，你也需要。救恩是一刹那的行动，但是更新、洁净和悔改，应是每天在主面前的行动。是否只有那些需要接受基督的人，才应该悔改？悔改是初步行动，只适用于别人吗？施洗约翰说，我们需要结出果子，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基督徒需要为我们过往的罪悔改。

在那些方面悔改？我建议三件事情。首先是为了不合一而悔改。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我们祈祷，盼望我们合一，正如祂与父原为一。当我们合一，人们便认识耶稣是基督。今天很多教会分裂，以致外面的人不想接受基督。有时候，我们为了相互的利益，只在外表上合一，而非内心的合一。加拉太书五章15节宣称，如果我们相咬相吞，便彼此消灭了。

我们需要悔改的第二方面，是我们缺乏爱心。我们应该有“宁可别人亏欠我，我不亏欠人”的态度，来达成彼此相爱。第三方面需要悔改的，是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语。我们生活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我们忽略和忘记了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神的话语。查经班往往名不符实，并不把时间都用在查考圣经上；许多教会不是坚立在纯净的神话语上；信徒每周只“吃”一篇简短的讲章、一顿快餐，便期望整个星期都以它维生；很多

人不带圣经去教会；我们许多人只对神的话语略知一二，也可能只熟悉圣经各处的一两节经文。愿神引导我们悔改。

我们若离开了神的话语和道路，便陷入危险中，会被其他人和世俗的事所左右。在这末世的时代，许多假先知企图欺骗我们。在中国很多家庭教会当中，许多传道人都不明白自己在传讲什么？有些甚至从未见过圣经。假师傅正从他们当中出来，欺骗群羊。

我们作为传道人的，需要为着我们不圣洁的生活、行动和态度而悔改。耶稣要祂的门徒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神只能使用圣洁的器皿，惟有圣洁的教会才能荣耀神，愿神怜悯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审判必从神的家开始。很多基督徒并不真的害怕犯罪，他们只是怕被显露出来，我们犯罪的时候，常以为没有人知道，其实神是知道的。

撒但是天国最大的敌人，祂正寻找可控诉的东西，破坏、试探、企图摧毁神国的子民，当祂找到可控诉的东西，就会在神面前指控我们。祂也会在人前揭发我们的缺点，羞辱我们。启示录十二章11节告诉我们，羔羊的血胜过了罪，愿神怜悯我们，也让我们与诗篇一三九篇23至24节的祷告共鸣：“**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这里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耶稣教导祂的门徒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马太福音六章13节）我们需要为天国祷告。我们祈祷的时候，应该知道为了什么及为谁祷告？许多人是为别人去听道的，讲道内容似乎常是针对别人而说的。我们应该为着神的名、祂的国和祂的旨意祈求，而不只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而祷告，也应该为别人代求。

我们不应该只为国度祷告，也要寻求国度。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今天，人们追求金钱、享乐和个人利益——世界的东西。我们应把自己投资在神的国里，应当舍己。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把神的国比作贵重的珍珠，当人找到它，会愿意变卖一切来得着它。救恩是无价之宝，即使用尽我们一切所有，也买不到救恩，救恩是神白白赐予的礼物。

“剑桥七杰”之一的内地会宣教士史达德（C. T. Studd），他是个富翁，但他把所有财产奉献给神，因为他知道神把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如果那是真的”，史达德说：“便没有什么东西贵重得不能献给祂了。”爱是那么奇异、神圣，它要求我们献上灵魂、生命和一切所有。

当以赛亚在圣殿里仰望神的圣洁，他看见自己的不洁、罪咎和羞耻，他看见神高高在上，也看见自己的卑微。“我有祸了。”他喊道。神洁净他，才能使用他，以后，以赛亚才听见神的声音问：“我可差遣谁？谁为我们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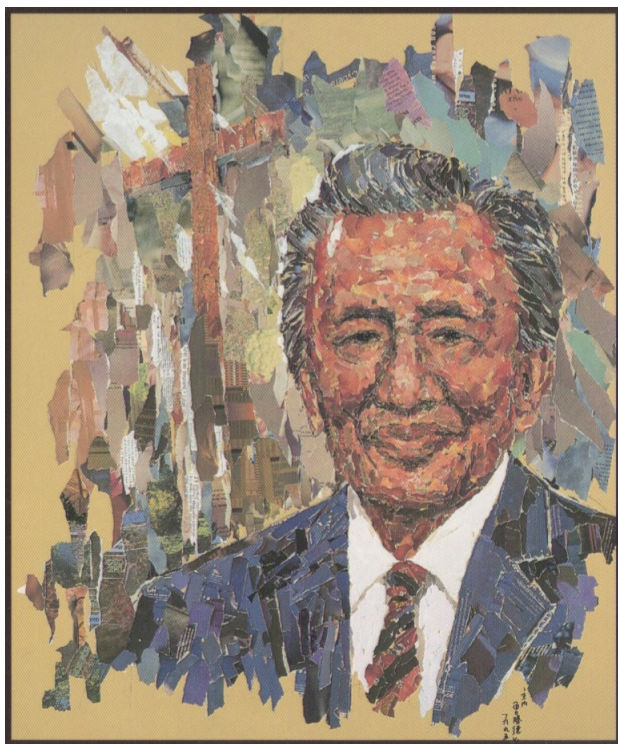
神不是问我们能否去，而是问我们是否愿意往祂差派的地方去。如果你想燃点这世界，你需要烧得兴旺，你需要先有一颗燃烧的心，才能够燃点周围的人，然后才能走遍世界，把世界燃点起来。

你是否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靠自己不能，但是我愿意。”只要你愿意，神就能！勇敢地宣告你是神国的精兵吧！

附录 2

满山秋色——同工忆语

简海兰



提到秋天，人们就会想到丰收。那果实累累、稻穗成熟的景象，总在秋天里发。而我，却总在见到这幅画；看见画上的您时，想起秋天收获的喜悦。

那是一幅由画册和报纸，撕碎了再拼贴而成的画像。仔细看，会发现那些报纸和画册，包括了各国的文字，画的意境传达出一份博爱的胸怀。后面的背景，有许多高楼大厦，也让我感受到您放眼世界的宽广。深蓝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结着一条黑红相间的领带，显出您一贯朴实的风格。尤其是您深邃的眼光，炯炯有神又充满睿智，像一盏明灯，照亮人们的道路。

您很珍惜这画，因为是一位好朋友，参考您的照片，体悟您的见证，再用碎纸拼画而成的，已跟着您好多年了。后来因着您搬到加州，住在女儿家附近，才把它运到“基督使者协会”。因着您是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同工们一致决定要把它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每次我经过画像前都会伫足欣赏一番。神采奕奕的您，充满了活力与亲和力，煦煦笑意也全都从那些缤纷的碎纸中散发出来。

///

想起第一次见到您，印象就非常深刻。到今天都能清楚记得您讲道的内容，您说：“我们常习惯说，要“作”光、“作”盐。但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13至14节却说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要先“是”光，才能发光；“是”盐，才有咸味，若不然，做也做不出来。”

据说古时候的盐往往混有杂质，当盐分失掉只余杂质时，便淡而无味，只好扔掉了。盐失了味道就没有价值，若基督徒没有付出努力去影响周围的人，对神也没什么价值可言了。信徒应该像盐一样，在世间发出调味与防腐的作用，就如盐可以把食物中最好的味道引发出来一样。信徒也应像光一样，做真理的灯塔，照明四周的黑暗。您的话，一直激励着我尽心尽力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

讲道当天您在台上唱的那首诗歌：“**因祂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祂活着，不再惧怕。**”也在这十几年的单亲生涯里彻底安慰了我的心。因为人生无常，我们不知道明天会遭遇何事？是依然阳光明媚？或是成了晦

暗风雨？世事多变，惟有神永远不变。靠主、为主所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信主之后，耶稣基督住在我心里，使我心中常有平安和喜乐，能不为明天忧虑，凡事交托主手中，相信祂会引领我的前路。因此，每当主日崇拜唱到这首诗歌，我就学您，用最洪亮的声音，唱出满腹的欢欣与盼望。

时光匆匆流逝，这次与您再相聚，离第一次已是十个年头。经过两次中风，您的身体不如从前了，但为参加机构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餐会，您风尘仆仆，往来奔波于各教会之间。坐在台下的您，身子虽早已疲倦，上台之后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精神抖擞地带着会众高声唱赞美诗歌。一首《野地的花》被您唱活了。借着歌词：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
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
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
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您唱出满腔爱神、爱人的感情。台下的朋友们都被您的精神感动，相信您软弱的身体，必定因着主耶稣得到能力。您的爱心鼓励了会众的心志，都跟着您大声唱出对神感恩的心情，那一刻，我看到您正用生命在影响生命。

///

一天早晨，您在使者农庄带领我们灵修。真诚与我们分享；您常因脸部神经麻痹、味觉不灵敏而感到日子毫无喜乐。您用圣经的话勉励我们：“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

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传道书十二章1节）您强调，人的生命中若没有神，在年老时必定痛苦、孤单、失望，而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则是充实的。即使因伤残、疾病而不能享受人生时，也会感到平安和喜乐，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在困境中仍要专心仰望神。您说，有时并不是因为环境快乐，人就快乐，而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您体谅我们工作辛劳，并鼓励我们可借此锻炼坚忍的毅力。提到忍耐，您说人的嘴巴里有牙齿和舌头；牙齿硬，舌头软，正像世界上也有这样两种不相同的人。您以牙齿咬到舌头的经验说明：刚硬的牙齿粗心又没有爱心，常常把舌头咬起泡来，柔软的舌头虽然疼痛，却能默默承受，并自行痊愈。牙齿时常因为“以牙还牙”、“咬牙切齿”的经验而容易受损，所以人老了牙齿会脱落，需要换装假牙使用；舌头的耐力却强韧可以接受一切，所以能活得长久并且永不损坏。您幽默的说，我们要学习柔软的舌头，才不会短命，真是有意思的人生哲理。

与您和师母同车去新泽西州若歌教会，公路两旁尽是璨丽缤纷的红叶，温暖的阳光穿过树梢自窗外洒入，洒满了一车晶莹。车内的我们和乐融融，亲切的感觉如家人一般。您说在美国许多中译的州名中，最有趣的就是新英格兰的麻省，有人把它译作“满山秋色”，和原来的英文发音很接近，也很贴切。

周主培牧师，当我享受着亲炙您的那份温馨时，脑海中冉冉升起了那幅大型的画像，倾刻间，那些斑斓缤纷的碎纸，都掺进了满山满谷的红叶里。枫红覆盖下的美景，是神无尽的恩典，是您努力后的收成，也是“基督使者协会”未来的景像。此刻，我向神祈求，求祂医治您病后的身体，求祂更加施恩祝福您！也求祂使用我们，成为神国度里的生力军。

附录 3

周主培牧师年表及大事记

1925年	11月9日出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县，父亲为周子卿，母亲为赵向德。
1930年	在主日学决志信主。
1931年	全家因信仰遭逼迫，离开绍兴，迁居至上海。
1933年	在上海“儿童主日学决志大会”委身事奉主。 第一次重病，濒临死亡。
1937年	日本入侵中国，全家离开上海迁至宁波。 第二次重病，濒临死亡。
1943-1944年	在宁波“伯特利圣经学院”休养。
1945年	日本投降。 12月5日与徐文田女士结婚。
1946-1948年	就读于杭州“华东神学院”。
1948年	就任上海“虹口灵粮堂”牧师。
1949年	至印尼当宣教士。
1949-1956年	在印尼事奉牧会，其间于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开设分堂。 “宣教训练学院”及“迦玛列大学”创立。
1956年	负笈宾州亚伦镇“庇哩亚圣经学院”。
1957年	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圣经学院”宣教研究院进修。

“第一届华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在宾州PennGrove举行。

《使者杂志》开始发行。

- | | |
|------------|---|
| 1959-1962年 | 在日本“东京国际教会”牧会。 |
| 1960年 | 家人离开印尼，全家在日本团聚。 |
| 1962年 | 接受呼召至美国华盛顿特区担任“华府中国教会”的首任牧师。 |
| 1963年5月6日 | “基督使者协会”在华府成立。 |
| 1966年 | 李曼家族（Leaman）将宾州乐园镇（使者协会现址）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基督使者协会”。 |
| 1967年 | 加拿大“基督使者协会”成立。 |
| 1969年 | 辞去牧师职位，全时间在“基督使者协会”服事。 |
| 1974年 | “基督使者协会”正式迁入宾州乐园镇现址。 |
| 1978年 | 在“基督使者协会”服事十五年后休假。
至“香港灵粮堂”牧会。 |
| 1979年 | 第一次重返中国。
在印尼重建的“宣教训练学院”服事。 |
| 1981年 | 恢复在“基督使者协会”的事奉。 |
| 1983年 | “第一届华人差传大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 |
| 1985年 | 服事于德州“道乐思学生事工”。 |
| 1987年 | 心脏血管绕道手术。 |
| 1988年 | 事奉二十五年后，自“基督使者协会”退休。 |
| 1989年 | 再度至“香港灵粮堂”牧会。 |
| 1992年 | 在德州“达城中华基督徒恩友堂”牧会。 |
| 1995年 | 重返中国宁波参加新教堂献堂礼拜。 |
| 2000年 | 第三度被邀至“香港灵粮堂”牧会。 |
| 2008年 | 在美国加州旧金山近郊安息主怀。 |

基督使者协会事工简介

基督使者协会蒙神呼召，一心朝着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而努力。我们派驻同工，与众教会及大学教职员配搭，进入校园服事、发行文字资源、并举办各样营会活动，带领北美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学生及专业人士归主，装备他们作主门徒，并鼓励他们信仰融入文化，进而服事基督，成为神国的生力军。

基督使者协会主要事工为：

1. 校园事工
2. 差传/动员事工
3. 培训/营会事工
4. 文字/资源事工

您可以参与使者的事奉，成为

- 全职同工
- 兼职同工
- 特约同工
- 代祷勇士
- 财务支持者
- 义工

文字事工

使用文字、传媒的力量，出版及发行基督教简体/繁体传福音、护教、灵修、门徒训练、宣教、单身、家庭等相关文字、影音资源。

- 大陆文字事工
- 使者出版事工

- 使者书房
- 使者杂志
- 使者通讯

差传事工

透过三年一度在美东、美西及欧洲等地的华人差传大会集结各样资源，动员北美华人基督徒学生及专业人士成为神国生力军。

培训事工

发展一系列培训课程，于各地教会及使者大使命培训中心举办门徒训练等各种聚会及营会，提供弟兄姐妹灵命进深、生命塑造的机会。

家庭事工

帮助华人家庭依据圣经的教导，建立荣神益人的家庭生活：针对夫妻、单身、单亲、年长父母、青少年、及孩童的需要，每年定期举办“珍爱一生”婚姻与家庭夏令会。

校园事工

五十年来，一直是AFC的核心事工，目前有四十多位全时间及特约同工在五十多所大学作传福音、门徒训练事工等，带领学生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

请与我们联络

地址：21 Ambassador Dr., Paradise, PA 17562, U.S.A.

電話：717-687-8564

傳真：717-687-8891

電郵：afc@afcinc.org

網址：www.afcinc.org

念骨肉之亲，作基督使者

作者周主培牧师生于江南水乡的浙江绍兴，
长在中国内地会早年宣教建堂的宁波。
蒙召去终年是夏、蕉风椰雨的印尼宣教；
走过浴火重生的南韩，烽火连天的越南；
亲临黄衣之国的泰国，种植鸦片的泰北；
足迹遍及圣牛充斥的印度。
对曾伤害过他的日本军人宣扬神是爱，
到过前苏联盛产石油的哈萨克斯坦向华商证道，
前往非洲李文斯敦的旧地，将耶稣介绍给华工；
念骨肉之亲，重返故国；作基督使者，传讲福音。

神的旨意与人的命运如何区别？
自由恋爱呢？抑或遵从父母之命？
传道人如何选择工场？需要？托付？
宣教的对象是以同胞为先？还是外族为先？
什么是完全、甘心地顺服神，尊主为大？
人如何能经历神奇妙、大能的作为？
祈祷是否能改变万事？

本书是周主培牧师信仰的心路历程，
将使您得到生命的启发、宣教的感动、爱主的赤诚！

ISBN 9781634202299



9 781634 202299

90000 >

